

哈維爾選集



哈維爾選集

基進出版社

基進出版社



哈維爾選集

基進出版社

書名 哈維爾選集
作者 哈維爾 (V. Havel)
編者 奕雯
出版 基進出版社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28號二樓
電話、圖文傳真：(852) 572-5057
印刷 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82號二樓
版次 199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32開 (210×140mm) 336面

目 錄

- 7 為《哈維爾選集》所寫的前言（劉賓雁）
- 17 譯序：哈維爾的「政治」（羅永生）
- 31 給捷克總統暨共產黨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1975）
（ Open Letter to Dr. Gustav Husak ）
- 61 無權勢者的力量（1978）
（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
- 130 否定政治的政治（1984）
（ Anti-Political Politics ）
- 150 「七七憲章」意義何在？（1986）
（ On the Meaning of Charter 77 ）
- 167 公敵正傳（1986）
（ History of a Public Enemy ）
- 196 希望的政治（1986）
（ The Politics of Hope ）
- 234 說文解字（1989）
（ Words on Words ）
- 246 意見（1989）
（ Opinion ）

- 251 人民，你們的政府歸還給你們了！（1990）
（"People, Your Government has Returned to You!"）
- 259 中歐的未來（1990）
（The Future of Central Europe）
- 266 對德國統一的看法（1990）
（The Return of Germany）

附錄一：哈維爾劇作

- 273 抗議（1979）
（Protest）
- 303 錯誤（1983）
（Mistake）

附錄二：貝克特為哈維爾所寫的劇作

- 310 浩劫（貝克特）
（Catastrophe）

附錄三

- 316 哈維爾年表
- 334 編後語（編者）

爲《哈維爾選集》 所寫的前言

劉賓雁

一、一個不該忽略的領域

共產黨善於攻心，靠一整套意識形態牢牢控制人們的思想來實現其統治，這一點早已不是甚麼秘密了。然而對這種統治的特殊機制進行研究並真正有了重要發現的，就我所知，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劇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哈維爾是第一人。本來，在執政的各國共產黨中，善於操縱、玩弄和「改造」人民思想的，應該說首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因而按理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應該走在前面，可惜落伍了。

對思想的統治並不全是靠思想的手段進行，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制度上把每個公民改變成國家的僱員和政治機器上的螺絲釘、專政的恐怖和由黨的基本羣衆組成的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在這方面實踐中最老練最成功的，仍然是首推中國共產黨，可惜中國人的研究又落在了哈維爾先生的後面。

這種落後，原因何在呢？中國知識分子既是在歷年「思想改造」運動中受苦最多的，又有過很多機會和農民或工人生活在一起，從而有很優越的條件去觀察毛澤東的精神奴役是如何進行的，然而我們卻至今沒有這方面的著作。

現在我們還不能探討這種狀況的原因，也許那原因本來就是中共和毛澤東成功地對知識分子實行精神奴役的結果。

哈維爾先生在他的幾乎每個劇本中和大部分論文裏，都把這種精神奴役的後果作為他揭示、分析或鞭撻的對象。他當然不是出於純學術的興趣，他很懂得中國古人說的「哀莫大於心死」這個道理。他好像立志要解開共產黨在捷克人民心中結得越來越緊、越來越大的那個疙瘩，也許可以稱之為心靈之癌。

在蘇軍入侵捷克的七年以後，無論在哪裏，你再不見人們「對於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異議的任何迹象」。「在我們的辦公樓和工廠裏，工作在按部就班進行，紀律井然。我國公民的努力工作正在收到明顯的效果，生活標準在穩步上升：人們在建造住宅，購買汽車，生養孩子，其樂陶然，怡養天年。」

可見，1968年布拉格發生的那次鎮壓，同1989年北京的那一次相比，效果不大一樣。在九十年代的北京，統治者要不幸得多，老是在那裏心驚肉跳。然而中國並不都是北京，北京也不是沒有順民，因而我們心裏也不是沒有哈維爾1975年思索的那個問題：「一個人必定會詢問的一個基本問題是：「人們究竟為甚麼這樣做？他們為甚麼會如此這般地行動，以致造成一種令人不能不相信的景象，表明一個團結一心的社會對於它的政府給以完全徹底的擁護？」」這當然是一個痛苦的問題：人民真的會擁護一個倒行逆施的政府嗎？哈維爾得出的結論是：「對於任何一個不抱偏見的觀察者說來，我想，答案只能是不問自明的一個：他們的所作所為，是被恐懼所驅使。」

然而這又不是心理學所指的那種普通的恐懼情緒。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是很熟悉的，咱們從1979年到1989年不是時常在私下和在會議上，用文字或用語言，為了辯解或為了撫慰自己的靈魂，不斷地用過「心有餘悸」甚至「心有預悸」這句話嗎？（唉，受迫害實在是太深太重太久了，怎麼能不怕呢？「悸」一「悸」又有甚麼可以羞愧可以厚非呢？）正如哈維爾所說的，這種恐懼，大部分人並不是噤若寒蟬，這些人是面帶自信、心懷自滿的公民。「這是一種倫理感，即或多或少地參與那種對於一種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危險的集體覺察；一種憂慮，一種關於一些甚麼東西正在或可能發生危險的憂慮，並且逐漸習以為常，把這種威脅當作了這個現存世界的一個實質性的部分；而對於這種威脅，我們又能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以越來越巧妙的和泰然自若的方式去做各種性質的迎合適應，作為我們唯一有效的自我防衛。」

分析得多麼貼切和多麼精闢！接下來便是關於那隻在全社會織下一張無形之網的可怕的蜘蛛的描述：「甚至即使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內看不見這張網，碰不到蛛絲，但是心地最簡單的公民也一清二楚地感覺到它的存在，在每一時刻和每一地點都知道它是悄悄地在望着你，並且你還會按照它的要求去行動——就是說，使你做的事不致令那些你看不見的眼睛與耳朵不滿意。」

哈維爾1975年致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是對於「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那種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專制獨裁的專制獨裁社會所特有的精神危機的全面揭示與分析。哈維爾展示了這種社會中人們思想感情的全部政治光譜，那是咱們炎黃子孫再熟悉不過的了。也許我們還可以為它做一些補充：中國人在更長的時間裏，有更多數量的人是以感恩戴德、積極主動、盡心盡力、爭先恐後的態度去迎合和適應那張蜘蛛網的需要的，是恨不得開膛破腹來洗淨自己心靈中非無產階級的污穢，恨不得棄絕一

切人間享樂，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地去履行偉大領袖關於脫胎換骨和鬥私批修的指示的。幾十年下來，這就成了傳統，成了風習，甚至成了本能。至少在中共執政的前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中間，人們精神中驅使他們去投合統治者的主要力量還不是恐懼，至少在多數人中不是。如果說有甚麼恐懼，那是怕在各種運動中成為落後分子，怕得不到「共產黨員」那個光榮稱號。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才有長達三十年的時間不需要建立一套對內的KGB機構。在人民自己中間，已有足夠的對付人民的義務情報人員了。

這種心理狀態直至今日也未消除。仍然會有人自願地去為中共抓「反革命」，儘管他本人幾分鐘以前還在咒罵共產黨！當然，這絕不妨礙哈維爾所寫的捷克人民的那種精神危機在中國全面開花，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我們才不能不感到惋惜：哈維爾是在捷克人民取得勝利的十四年前就在論述的這個主題，中國今天竟還未提上議程。

二、人人都應自省

在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再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那樣重視人的主觀世界了。後來發展為林彪的那一套「人的因素第一」的理論，以及這種理論在中國幾十年無所不在的實踐，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毛澤東在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創造性。

然而毛澤東越是重視人和人的思想，中國人就越是被動，越是在政治的和經濟的枷鎖之外被套上更沉重的精神枷鎖。這是因為毛澤東從來不認為人應該享有自由，從來不認為人可以不再做工具，他們甚至還必須做「黨的馴服工具」。

哈維爾未必了解過中國人接受精神奴役的過程，但他從觀察捷克斯洛伐克現實引出的結論，對於中國人也是適用的。

幾十年的特殊統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機。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不是靠外在的甚麼權威，不是通過說教，而是喚起人們去自省，在反對邪惡的行動中自己改變自己。這就必須使人們看到：你對於自己的國家和你本人墮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責任的：「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專制制度，都把它當做了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句話說，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專制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甚麼人只是一個受害者。須知，是我們所有的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為甚麼要談這些呢？把過去四十年可憐的遺產看成似乎是一些遠親留下來的、完全是外來的東西，恐怕不太聰明。相反，我們必須把它看成是我們自產的東西。這樣，我們才會懂得如何對待這份遺產。我們不能把過錯統統推到統治過我們的那些人頭上便了事。不僅因為這不符合事實，而且因為這樣做會使我們逃避擺在每個人面前的責任——自由地、卓有成效地和迅速地啟迪我們自己的創造精神。」（摘自哈維爾的總統就職演說）

對於那個政權和那個制度的力量，仍然不能低估：

「當我說政府或制度的「自我動力」時，我是指那種盲目的、無意識的、不負責任的、不可控制的和難以抑止的動量，那已然不是人民的行動，而是人民被拖着和它一起行進，因而人民是被駕馭的。」

人民被駕馭而破壞人民自己的利益和維護反人民的制度，這種事情已屢見不鮮。那麼現在需要做的就不該是由另一種力量取代共產黨去駕馭人民，而是由人民自己去創造自己的行動。1979年哈維爾入獄後寫給他妻子愛嘉的信中常常談及的一個問題，就是人在甚麼情況下才能獨立負責並自覺地行動？「我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只能由我自己對自己的過去所進行的反思，才能推動我去

從事實際行動，單靠某種思想啟蒙，那力量是不夠的。」

哈維爾本人是一個常常自省和自責的人。1977年5月他出獄後責怪自己不已的一件事是他不該在出獄前向官方表白他將辭去《七七憲章》發言人（這個組織的職務除每屆有三名發言人外，再無其他領導人），以致被政府利用來敗壞他的聲譽。為了補償自己的過失，從這次出獄後到1979年5月他正式入獄和被判刑的這兩年中間，哈維爾拚命去參加任何活動，以致負擔過重；精神又過度緊張，直至有些歇斯底里，一心只想洗清在公眾面前的恥辱，早日「恢復名譽」，甚至再次入獄以後，他仍然念念不忘此事，「每多坐一個星期牢，我認為這就是向我的「恢復名譽」又邁進了一步，於是便喜從中來。」

作為一位劇作家，哈維爾也是極力使自己的觀眾警醒，喚起他們內心沉睡着的動力。他說，他的任務不是向觀眾扯謊，安慰他們，使他們輕鬆高興，而是相反，「我要以最劇烈的方式把他們推到問題的深處，使他不能逃避而必須自問：我要把他的鼻子按到他自己的苦難、我的苦難和我們大家共同的苦難裏，讓他想到：現在已經是時候了，為了解脫這苦難，應該有所行動了。只有那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我們自己頭上和為我們自己找到的出路、解決的辦法和希望，方是靠得住的」。他的劇本《誘惑》中一個人物說：「我不給你出具體的主意，我也不替任何人想辦法。最多我也不過偶而給人一點鞭策罷了。」哈維爾說，「那幾句話也可以說就是我作為一個作家的信條。每一個人都應該從他自己內心找到他應該採取的辦法。」

這是對的。這樣，才不致使人們在不再為共產黨當工具之後，又成為另一種力量的工具。

哈維爾贊同一些哲學家的意見，認為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是發出警告，使社會預見災難可能到來，像卡桑德拉那樣告訴人們城外危險的臨近。「我也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不斷去擾動眾人的安

寧，應該把他看到的世界的苦難傾訴出來，應該獨立不倚，以致招人惱怒，應該是個反叛者，和一切隱蔽或公開的壓力與操縱勢不兩立，應該是對制度、權力及其詛咒的主要的懷疑者，應該是它們的謊言的揭露者。」

但是哈維爾卻比這走得更遠。他的行動遠遠超出寫作。他承認，他有時很想大叫一聲他不願再從事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了，「我只想作每一個作家想做的事——訴說真實！」然而社會卻不允許，他自己也未曾允許他這樣做，他也從不懊悔。「倘若我那樣做了，那將是違背我的天性的，也將無助於我的寫作，儘管有些人勸我說那樣我將會寫出很多劇本。我不相信那是正確的，而且我的不止一位同行的命運已經證明，把自己完全奉獻於文學，是最靠不住的，奇怪的是那麼做的結果，常常受害的就是文學本身。」

這種主張，這條創作道路和人生道路，同哈維爾在中國的同事很不相同。捷克作家、劇作家曾走在「布拉格之春」的前邊。捷克的知識分子又是1968年改革遭到鎮壓後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的唯一社會力量。一個強大的民主傳統起了重要作用。我們沒有——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傳統。1949年我們放棄了1919年以來的民主鬥爭傳統。1979年以後，我們又放棄了由魏京生等一代青年精英開創的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傳統。很慘，到1989年民運，天安門廣場上的許多學生竟然不知魏京生為何人。這又有甚麼奇怪呢！1979年以來活着的幾代中國作家沒有為魏京生等政治犯做過任何事，有人對於魏京生的了解跟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也相差無幾。

三、開闢新戰場

哈維爾先生和捷克的知識分子二十年來創造的反專制主義的

鬥爭經驗，於中國也大有用處。

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被撲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陷入沮喪、悲觀與對政治的冷漠狀態，除少數知識分子外，再無反抗行動。到七十年代中期，便有更多的知識分子重新開始了活動。在官方體制之外，他們開闢了第二個文化戰場，以合法、半合法的方式出版Samizdat（民間出版物），在私人住宅組織作品朗誦與演出、討論會、演講等等，把《布拉格之春》的精神延續下來。以打字機打印書稿每次只能印十二份，然後在流傳中再由他人以同一方式打印，當然是相當艱苦的，但十幾年間，居然也以這種方式出版了五百多種書籍！

到了1977年之初，由哈維爾等二百四十餘人發起的「七七憲章」運動，特別值得注意。「憲章分子」的目的，不在提出和實行一種反對派的綱領，而是盡量爭取在合法條件下活動。他們以憲法、法律、捷克政府在國內外公開做出的允諾和宣告為自己行動的依據，使對方的制止或鎮壓成為非法。同時，它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組織，而是視自己為一個平行的社會，任何人皆可參加，每屆選出三位「發言人」，並無領導機構。「憲章分子」調查和揭露政府違反人權的事件，向社會發佈官方新聞所隱蔽的消息，過問環境污染、經濟和青年人生活條件等問題。

有人懷疑「七七憲章」活動。當時已流亡法國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為此和哈維爾曾發生一起論戰。昆德拉認為在當時捷克的政治條件下舉行這一類活動是不會收到甚麼實效的，無異於自殺，因而認為不過是少數發起者顯示自己仍然能對歷史發生影響的一種企圖而已。

這場爭論涉及的問題，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也同樣重要：判斷一種活動的是非功過，能否以有無眼前可見的實效為標準？後來出獄的捷克政治犯們說：儘管「七七憲章」的抗議未能使他們獲釋，但他們感到外面的人知道他們被捕並採取了行動，便是一

大鼓舞，使他們覺得自己喪失個人自由是有意義的。哈維爾後來說：「它（七七憲章）還有深遠得多的意義。由此開始了一個過程，人們作為公民的腰桿挺得更直了。……那以後發生了數以百次計的請願活動，儘管政府一概不理，但它實際上卻不得不使自己適應已經改變的環境，而這種改變正是人民沒完沒了的公開要求造成的。這種效果是間接的，非立竿見影的，長期的，然而它確實有。舉例說，七〇年代初期政治犯常毫無緣由地被判很長的刑期，而當時無論國內國外都未予以任何注意，因而政府未因這種判決而惹來任何麻煩。現在……這一切都變了。現在，政府只要把某個人因政治原因而關上四十八個小時，全世界的報紙就都要來報導了。……現在數以百計的人正在做的事，是七〇年代初期他們中一個人都不敢做的。」

我在布拉格訪問期間聽到一位知識分子說：「七七憲章活動中，自然不斷有人被捕，有人失去工作，甚至會失去住房，但人們沒有退縮。幾個人被捕，立即有另幾個人補上他們的位置。久而久之，政府就不得不讓步了。於是人們看到，真正可怕的力量不是政府，而是百姓。同時，大家享有的自由，也在不斷擴大。」

我還要補充一點：七七憲章運動還為勝利後的捷克培養了很多幹部。我熟悉的作家J.柯然，就是在七七憲章運動中湧現出來，1990年年初被哈維爾總統任命為布拉格市長的。

最後，我還要告訴大家一件事。1990年3月在布拉格訪問期間，我曾問過捷克朋友，他們那裏政治犯判刑情況如何，答曰：一般是二、三年，長者也有五年的。

我為何要發此一問呢？因為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等等，動不動就判十五年徒刑，我早就覺得太長，太殘酷了，且不說都是一代精英，根本是有功而無罪。

現在我才明白，中國政治犯的刑期為甚麼那樣長，而捷克斯

洛伐克又為何這樣短……

1990年5月29日於Hartford

凡文中所引哈維爾的話而未註明出處者，皆引自西德作家Karel
Hvizdala對哈維爾的訪問錄《干擾太平》(*Disturbing The Peace*)

譯序： 哈維爾的「政治」

羅永生

蘇聯和東歐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陣營瓦解了。共產主義快要成為歷史的名詞，尚餘的共產主義政權，也沒有多少人(包括那些政權中人)真正相信這個模式是一個有前途的模式。

在這個急速轉變的年代，沒有人清楚知道歷史會將人帶往何處。原因之一是前路茫茫，未知去向，原因之二是對過去的並不清楚。我們肯定的只是我們正在踏進廿一世紀一個全新的世界，但正在逝去的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隨著銅像、斧頭、鎖鏈、語錄、偷聽器、旗幟、國家……而去的，究竟還有甚麼？——正在瓦解的那一種「主義」，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們並不太清楚。

作為坐上了這部駛得愈來愈快的列車，踏上「美麗新世界」征途上的人類一分子，中間固然有人畏懼於這樣或那樣的「重建」、「再起步」、「踏上新征途」，而未及登上這部文明列車的，就日夜夢想著歷史時鐘可以倒撥，讓我們的歷史「重新來

過」。對於這些「美麗新世界」的尋夢者，逝去的或許可以暫時放下，讓那些成為所謂「歷史問題」，但對於這一切還未有逝去的，就有「現實的政治意義」。

然而，我們又是如何去理解這種「政治」的意義呢？

在一些正統的政治學教科書中，政治被描述為「使事情變得可能的藝術」，用常人的理解，就是如何平衡利弊，以實現目的。於是，政治爭持的似乎只是比較不同的方式去爭取實現同一目標的事。政治於是變成一種「競賽」的遊戲，特別是一種國家與國家之間進行競賽的遊戲。

如山似海的文字和心力，花在為競賽的健兒如何保證獲勝之道。「失敗了——再來過！」「老是這樣不成器——肯定是有甚麼先天的缺陷（或結構的約制）！」……政治思維就是場中場外的「指指點點」，政治夢想就是時鐘倒撥。歷史，就像是驅魔除妖的警世劇。多少簡單「自明」的「真理」，就放在那兒——而且「久經考驗」——政治的意義，在當世似乎就只有一樣——重寫走進岔路的歷史。

勝利的欣喜，是人所羨慕的。歷史的時鐘可以倒撥，更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美好事情。1968年的捷克，就曾經一度使布拉格成為夢之天堂，情境正一如1989年北京的那五十多天——那是人民活得真像人的一段日子，當時布拉格甚至比北京還要好，因為作為捷克改革派首腦的杜布切克（Dubcek）當朝在位，改革有了「帶人性面向的社會主義」此一鮮明旗號，而民族的凝聚力，亦達到了頂峰。不幸的只是，這件對思想家哈維爾一生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最後只能以悲劇的形式，壯烈地在這個早來的春天寫上一幕。

哈維爾在其後長達二十年的痛苦反思和政治文化活動中，最能顯示出其轉變的，大抵是他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中所言：「在1968年時，我以為組成一個反對黨，能夠和共產黨公開競爭

權力，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我很早已發覺，事情不這樣簡單。」另外，在論及西方人如何看待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時，他說：「那些沉醉在自己那套政治濫調的西方媒介，或會將我們的方法說成太過墨守規條、太過冒險、修正主義、反革命、資產階級、共產主義、或太左、或太右，然而我們對此毫不感興趣。」

是甚麼令得哈維爾認為「事情不這樣簡單」，他說的「事情」又是甚麼？是甚麼使哈維爾對這些派別劃分、政治旗號「毫不感興趣」？——對中國的讀者來說，難道還有比倒撥歷史時針、瓦解共產主義體制來得更重要的「事情」嗎？而為了這個頭號「事情」，難道還有比劃清朋友、敵人，分清主次矛盾，打出明確可行、而又切合「實際」的政治綱領更有「興趣」的事嗎？而打擊共產極權體制最為有效的武器是屬於那一種「主義」，不也已經是「清楚明白」了嗎？

二十年的徹底反思，數度的牢獄災劫，為哈維爾提出了一些他認為是更為有趣、更為重要的事情。在這本《哈維爾選集》中，大抵可以反映出哈維爾政治思想中一些重要綫索。在每一條綫索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供爭議、探討的課題，而在眾多綫索中，最為核心的，相信是他對「政治」的重新思索和重新定位。

在《否定政治的政治》一文中，他明白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他說他喜愛「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程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那樣的政治，而是能對有意義生命的追求、保護及為此而作貢獻的那一種政治。」他所喜愛的，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他清楚的認識到由這種政治出發，所謂政治上的成功，已全然不能用權力的轉移、交換、更替等既有的公式來量度；他也認識到，一旦政治上的成敗不再是一種改朝換代，把歷

史時鐘推前撥後的遊戲，政治策略語言上的所謂「改良」、「革命」、「保守」、「激進」，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既然沒有了傳統意義的所謂策略，也不再囿限於原有那套思維所框定的那些目標，那自然牽涉及他作為一個政治和思想上的活躍分子（特別是他們還要為此而付出代價）的自我定位的問題。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就是要為這個關乎責任、動機、指向等的人的「身分認同」問題，作出相當詳細的探討。

「回到真實的人的政治」——是哈維爾的關切，他這種關切，肯定是超民族、超地域的。因此，冷戰的語言、冷戰的思維的確很難把哈維爾定位。西方的新右派理論家，為著東歐世界出現這樣一位持續不懈的「人權鬥士」而額手稱慶，遙遙敬贈「中歐新右派」的名號與哈維爾^①，想是因為哈維爾所大力撻伐的「後極權主義」，和冷戰語言裏面的「極權主義」只是一字之差，所以毫不保留的引為己類，稱兄道弟，竊為識者笑。在西方右派看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贊成」，推倒共產強權的，必是「自由世界」所稱道的「自由戰士」。要不為甚麼還會有哈維爾當了總統後，到美國國會演講^②，說「你們一樣也只是站在邁向民主的路途上……我們可以向你們送來的是，我們（來自極權主義底下）的經驗和認識」時，議員大人中竟沒有多少看得出這是一個尖刻的批評，而仍然故作明白，點頭稱是這樣的笑話。然而對於美國國會來說，「回到真實的人的政治」，難道不是一種外星人的話嗎？

語言就是這樣一種將不同世界相分相隔的東西。聖經裏巴別塔的故事，就是說上帝如何令負罪的人因語言錯亂，不能交往而互相隔閡，互相殘害。不過上帝在巴別塔故事還沒有做，反而在現代溝通頻仍、語言普及統一的情況下得到高度發展的，就是謊言的體制化。哈維爾在探討所謂「後極權主義」的時候，放在中心位置的，就是謊言這種維持體制運轉的機制。

謊言——在哈維爾的思想中，具有一種社會本體論的地位。對哈維爾來說，謊言並不局限於我們日常理解的「撒謊」，因為撒謊意味著有一獨立自存的「真實」可供對照、驗證。但正如後結構主義者對「再現」（representation）這個概念的爭論，認為事物別無本相，一切都在再現的中介過程當中一樣，哈維爾的「謊瞞騙隱的生活」（living in lies）實際是一種具本體論意義的陳述。「謊言」不再是對「真實情況」（reality）的背離和扭曲，謊言反正就已是社會生活的「真實」本身——而這也正是所謂「後極權主義」體制的本質。

哈維爾的「後極權主義」是建基在一種有關社會的語言學性質的社會理論之上，是以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裏面有關語言獨裁的觀察之上發展起來的。哈維爾論及的這種語言獨裁，跟勒福（C. Lefort）在《極權主義的邏輯》^③裏面談到權力的符號性質，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不過，哈維爾在突出「謊言」在社會本體的角色時，除了論及權力如何透過語言來行使，語言又如何塑造權力關係之外，更具啟發的是，他藉此而帶引出一個極見爭議、而又常無法令人滿意地解決的問題，也就是道德價值的位置。

和福柯（Foucault）相比，哈維爾眼中的謊言，並不單是一些自存自有的「權力」（power）的運轉機制，而是一種道德價值被離棄後的結果。如果說福柯因為有一套權力的運作技術學在背後，對於「人」、「主體」等概念感到極度懷疑和抱犬儒的態度，那哈維爾就具有更大的熱情去堅守一種有關人的基本存在意義和價值。這也是哈維爾的思想之容易被理解為一種人道主義的原因。

哈維爾的人道主義來自海德格和李維納斯（Lavinas）的哲學。他亦深受捷克的帕托奇卡（Patočka）的影響。在《給愛嘉的信》中，哈維爾反覆地談到諸如信念、責任、希望等問題，他對

謊騙隱生活的批判，是緊緊與他對「存有的意義」這問題的關切扣在一起的。他這種對終極意義問題的執著，令他的思想帶有一種宗教感和神秘主義色彩。但如果說他的思想出路在乎引申出一種有關上帝的概念和宗教熱情的話，那我們只可說，他類近的是一種祈克果式的上帝觀。但他和這些存在主義神學不同之處，是在於他並不需要先設一個「把人離棄」的上帝。他著眼的，仍然是人如何離棄「人」（即「存有」的絕對意義）。

哈維爾這段和宗教的距離，是來自一種對語言的高度警覺。「上帝」作為一個概念，一個詞語，並不能保證它免於在語言的運作中沉淪墮落，就如一切現代科技文明底下，一切偉大的詞匯如「社會主義」、「和平」等。也正因為同樣的原因，將哈維爾的思想用語言去歸類也是有問題的，這亦是他對人們如何去將他置放在政治光譜的任何一端「毫不感興趣」的同樣道理。

對哈維爾來說，人離棄人作為人的責任，可以以任何一種方式發生。關鍵在於一種自覺地面向真理的赤誠，那種追求生活得磊落真誠的閃念。但這種存沒之間的意義空間，並不是薩特式的虛無主義抉擇，而是發自一種對生活周遭的人和社羣的關切。所以，那不是一種孤獨的選取，背後也沒有尼采式的超人意志，反而是一種以「他者」（others）作為前提的博愛精神。哈維爾認為，只有這種以「責任」為核心的警覺才是將人從謊言體制拯救出來的希望所在。

哈維爾這種重返人性的努力，令他對任何社會解放的整體藍圖抱深刻的懷疑態度。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表明只有從人的生活出發，才能找到反抗力量的泉源。這種反抗，是高度的具有政治性，但那絕非權力分配那種意思的「政治」，而是「回到真實的人的政治」，是一種「否定政治的政治」。為什麼要回到真實的人，而非一般所說的「人道」？這是因為在笛卡兒式的人觀中，人透過普遍的理性能力，是可以達到一種類近神

的地位，對自然客體進行征服、改造，對人的世界立法。但這種「人道」下衍生出的科技力量，卻正好是一種異化形式，重新返回的「人性」，已不是這種科技文明下、人的普遍立法力量、理性權威下的所謂人性，而是另一種與具體的生活、際遇和歷史環境緊扣的「人性」，一種具有深厚責任感的人性，而非戰天鬥地的、與自然及「生活世界」(life-world)相對敵的「人性」。

由於哈維爾所關心的，並不是如何去戰勝一個客觀、外在、獨立於人的制度，所以從找推翻「共產極權」的策略為出發點去閱讀哈維爾，肯定要失望。而且，哈維爾從來沒有認為，「後極權主義」只是共產主義的代名詞。相反地，他認為「國家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提早出現的後極權主義形態。它們的出現從相反的意義來說，只是對西方人一種提早了的預報，他毫不諱言，後極權主義只是科技文明加上消費主義的結果，西方資本主義沒有絕對的保證能夠排除走上同一命運的災禍。哈維爾的這點觀察，令他和另外一些以冷戰語言來套用「極權主義」觀點去分析「國家社會主義」的人劃清了界綫。忽略了這點，無法不造成誤解甚或笑話。

由於哈維爾關心的是一場「存在的革命」，要談這場革命的策略，不得不要從全新的角度，用全新的語言去探索。他在檢討七七憲章運動時，毫不諱言去批評和反思捷克社會在過去幾十年的反抗體驗。他排斥了一系列源自傳統政治概念的想法。他否定暴力革命，否定建立反對黨，他認為「革命——改良」的二分法不適用於後極權主義，所以他也和一種「點滴改良」的思想保持距離。哈維爾所追求的，是一種能切合現時代人類處境實況的真正激進路綫。他認為這只能在一種外於政治(non-political)的領域中追尋。

七七憲章運動給哈維爾帶來大量的體驗。他毫不懷疑這種「公民抗爭」的歷史意義，並且視之為新型鬥爭的楷模。情況就

如西方左派近二十年不斷反思的，就是1968年的全球性社會運動和自發性反抗的經驗一樣。透過七七憲章的反省，哈維爾檢討了「持不同政見者」的作用和角色，保衛性行動和社會自衛的概念，以及在將來出現與政權平行的另一種社會組織結構。哈維爾在這裏不是去描述一個反對派組織如何成立，而是討論這些社會民間自發組織與政權／正規生活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發展的方向及定位。

哈維爾在這些策略問題上的探討，與其說是致勝公式，不如說是一種具有豐厚發展潛力的討論綱領；它們緊扣著哈維爾對體制本質的分析和判斷。特別是因為這個體制不是一個純粹外在的客體，或是外加於人的東西，而是一種互相壓迫、互為因果的自驅機器，人在這個體制互相造就壓迫和被壓迫的條件，所以，存在的革命只有從社會生活出發。

不過，哈維爾並不是單純的用鼓吹道德主義來當作反抗工具，而是認為只有依靠道德力量和人追求生存意義的直覺來開拓瓦解謊言機器的可能性，才能真正找到新社會的目標。在這裏，手段和目標並不是截然二分的。

道德的力量源自人對「本真存有」（authentic Being）的嚮往，這是源自深處的人性（humanity）。道德力量要克服的，不純是、也不能停留在於外在的體制，因為外在的體制之能壓制人性，是因為體制是由人所共同構造（constituted）的，是基於人性的異化。如果用海德格哲學的說法，是由於存有受到「遮蔽」的結果^④。對哈維爾來說，「後極權主義」是這種遮蔽的頂點，是謊言統治的頂點，是生活意識形態化的頂點，所以，「磊落真誠的生活」（living in truth）既是向體制挑戰的旗號；亦同時是人內在的爭戰。作為鬥爭工具的任何戰術主張，無可避免地會面對無處不在的「墮陷」（fallenness）的危險——語言（亦即口號、旗幟、路綫等）的危險亦在這裏。

和「極權主義」論者不同的是，哈維爾不需要假設體制真的能够為它治下的臣民「洗腦」（indoctrinated）。相反地，在哈維爾描述底下的後極權主義世界，人都是某種意義下的策略家（strategist）。人們是自覺地去「說謊」，去利用謊言，去與意識形態機器打交道，以此換取權力和財富、生活的安逸和平靜。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所描述的普通小人物正是如此。哈維爾社會本體論的悲劇性亦正在於這種小人物不斷塑造互相壓迫條件的狀態。哈維爾心目中的意識形態，正如謊言一樣，可以是任何一種說話，不管其內容如何。所以，出路並不在於建立另一套體制（即另一種可以讓人去說謊的言語），例如西方民主。他甚至提出，應該想象一種超脫人類存在困境的「後民主制度」。

哈維爾的政治戲劇，不是由一種較優較好的制度去取代另一種制度的劇本，不是由「反對派」去推翻「當權者」的「復仇記」。相反，雖然哈維爾是東歐由知識分子領導的民間反抗運動（也即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表表者，但他竭力要去質疑的，正是西方人對東歐地下反抗力量這種富有偏見的劃分。他努力要澄清的，正是知識分子在反抗運動中的非優越地位——那不是自謙，而是去說明「回到真實的人的政治」底下，甚麼才是要鬥爭的，甚麼才是反抗力量的泉源。這種「知識人」的自省，又豈是以「國家之寶」、以「指點江山」為職志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能想象？

類似哈維爾所探討的反抗政治模式，恰好在這幾十年西方社會運動（及廣義的西方新左翼運動）中亦受到討論。整個可名之為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的思潮亦與哈維爾這種思想有共鳴之處。例如，女性主義強調「個人的即政治的」，把壓迫的焦點從狹義的權謀政治看成只是廣泛的社會壓迫的特例；綠色和平運動亦要求在更廣泛的外於政治的層面開展抗爭空間，改革工

業文明（作為一種文化生活）的機體：葛蘭西主義者視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中，「霸權」（hegemony）的爭持是徹底改革領導和被領導關係的真正激進策略，以至晚近如拉克勞和慕菲（Laclau & Mouffe）的「基進民主」說（radical democracy），可說都是在不同層面上探索的「否定政治的政治」。這也實非怪事，因為以先進資本主義為抗爭對象的西方左派和東歐的地下反抗力量，早已有接觸、溝通以致對辯。這種在鬥爭之中和之外的民間對話，實是打破冷戰體制下人民與人民互相隔閡的突破。雖然不可以說東西方的「民間社會力量」取得共識，但一些基本的共通課題，是早已給指認出來的。

如果將哈維爾的思想放置到「「後工業文明」下「反抗」和「希望」是如何可能的？」這個廣闊的辯題下去考慮，哈維爾的特殊貢獻是：在西方左派一片後結構主義、新尼采主義的激進批判下所帶來的某種走火入魔的犬儒主義歪路上，送來一股深具道德熱情的清風。哈維爾的思想要面對的挑戰正是：他的道德執著，如何不是一種古老的傳統式道德主義（即普遍立法）？他的反抗主體，如何不是抽象而沒有歷史的笛卡兒式主體？這種泛社會的抗爭，又如何安頓抗爭者的主體性？如何可以避免福柯式的、沒有定點的泛權力論？——也就是說，在「道德——知識——權力」的綜合統治年代，反抗運動如何不會陷入僅僅是虛無主義、相對主義？西方左翼對社會運動、民間社會的探討，政治道德問題上的群善主義（communitarianism），以至廣泛的新女性主義及基進民主理念，都可以和哈維爾的思想互相參照。

例如，哈伯瑪斯（Habermas）在有關現代性的論述中，提出體系（system）和生活世界（life-world）作為理解現代社會的壓抑性質，發掘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的可能性的概念架構，就和哈維爾的後極權主義討論有很多可相對照之處。^⑤

哈伯瑪斯的理想是實現基進民主的、主體性分散的、免除體

系壓迫的、以生活世界為本的共和世界（radical democratic republic）。哈維爾的論述則建基於以具體的他者（concrete others）為前提，重視在一種包含了社會和政治意義的批判性「存在實踐」（existential praxis）上的「責任」。如果說哈伯瑪斯的理想是完全依賴於建立眾多「公眾領域」（public spheres）內免除了扭曲的溝通，那哈維爾則會指出，沒有具體他者所對照出來的那種不對稱（asymmetry），也就是人在「責任」面前那種不能逃避的不安，並認識到人的有限性（finitude），對抗總體力量（totality）的反抗，是無法單靠訴諸「平等——民主」來完成的。這也就是說，問題不是能否如哈伯瑪斯所指要設計出個人不再受體系壓迫的生活世界可容身之所，不是有沒有個體完全自主的非扭曲溝通，而是有沒有在跨主體（inter subjectivity）的基礎上，以道德責任來重掌自我及認同。而人在找尋這種認同時必然會經歷對荒謬的體驗，它所帶來的追尋意義的欲求，却才是希望的所在。

哈維爾的反思是源自布拉格之春之後，捷克社會的新變化。一如六四後的中國，反抗運動的沉寂一方面來自高壓的暴力手段，另一方面來自這一段所謂「常態化」^⑥（normalization）時期的經驗。政權的意識形態虛偽雖已暴露無遺，但麻木的人心，道德的頹萎，正伴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而來，滙合成一種政權所希望維持的冷漠狀態。七七憲章運動要求在法制領域所開展的公民抗爭，意義不在於所謂挑戰政權，而在於使社會保持自覺。哈維爾尖銳的認識到，所謂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絕對不是「經濟改革——中產階級成長——知識水平提高」的公式所帶來的。反諷的正是，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很可能正是反抗意識沉淪的先兆。在政治抵抗走入地下的環境底下，哈維爾敏銳地觀察到，有兩個互相矛盾的傾向在外於政治的領域進行。其一是非政治的抗爭和覺醒，其二是道德上冷漠、麻木、弄虛作假、陽奉陰違的現象盛

行。但是，一方面他並不天真地以為這便是舊體制瓦解的先兆，反而視之為新的政治整合的方式，消融反抗力量的機制；另一方面他又不是如馬爾庫塞（Marcuse）一樣，對全面操控感到無能為力，或者作虛無主義的抗議。他沒有馬爾庫塞那種失落了革命主體的鄉愁。反而，他試圖努力在這些非政治的社會抗爭空間找尋意義及樹立希望。

哈維爾的思想是來自具體環境下的抗爭，但這些抗爭的意義並不是地域性的。他當年和昆德拉（Kundera）的執拗^①，就是一種後現代情狀（postmodern condition）下，犬儒和堅持反抗與希望的兩種不同的政治回應，也是將會擺在任何一個處身後工業——後現代世界的人所面臨的兩種選擇。

歷史是不會自行重寫的，不斷重寫歷史的只是人自己。而每一次重寫都是人對歷史賦與新的意義，也就是人對自己的生存價值，人對自身所處的位置、角色，自己所做的一切一切賦與意義及認同（identity）的機會。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用真正具創新和解放意義的語言，來重寫我們的歷史。一種真正嚮往民主的願望，所追求的正是這種新的語言。哈維爾的思想，正好是六四之後中國人所值得引為借鏡的這種語言，因為它所開啟的，不單是「捷克經驗」、「東歐經驗」、「共產主義瓦解經驗」，而是一種更為深刻的人性經驗。只有立足於此，我們才可以開始更有意義的「反思」。

哈維爾的政治生命在他登上總統寶座之後有了新的發展，他過去的思想在整個現代反抗運動中的貢獻可爭議之處仍多。這裏僅希望可以提供一些綫索，使我們可以更靠近這個活生生的政治人，及他活生生的那種「政治」。

註釋：

①Scruton, R. "The New Right in Central Europe I: Czechoslovakia"

Political Studies 1988 Vol. 36, pp. 449—462; de Candole, J. "Vaclav Havel as a Conservative Thinker" *Salisbury Review* Dec., 1988, pp. 45—48.

- ②哈維爾1990年2月21日在美國國會的演說，形容東歐劇變帶來歐洲人打破冷戰二極世界觀的機會，又說能拯救世界的只有人心和高於民族、國家的責任。座中以「自由世界衛士」而自豪的議員，沒有多少人能領會哈維爾何所指。“The Revolution has Just Begun” *Time* 5/3/90; “An Intellectual’s Lesson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Vol. 40, 24/2/90.
- ③Lefort, C. “The Logic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 Society Polity*: 1986.
- ④見Tucker, A. “Vaclav Havel’s Heideggerianism” *Telos*, V. 85, p. 63—78.
- ⑤Matustik, M.J. “Havel and Habermas on Identity and Revolution” *Praxis International* 1990, Vol. 10 (3) , pp. 261—277.
- ⑥參閱Simecka, M. *The Restoration of Or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Czechoslovakia*, Verso: 1984.
- ⑦昆德拉當年認為七七憲章運動那種文人聯署，只是一種自我陶醉的「展出主義」(exhibitionism)。

給捷克總統暨 共產黨總書記 胡薩克的公開信

親愛的胡薩克博士：

在我們的辦公室和工廠裏，工作仍然繼續，紀律依舊嚴明。我們公民的努力獲得可見的成果：生活水平緩慢地上升，人民建造房屋、購買汽車、生兒育女、找尋消遣過着他們的生活。

這些東西若用來衡量你的政策成敗，當然是微不足道。在每一次社會動盪之後，人民最終總會回到他們日常的崗位，只因為他們希望繼續生存；無論如何，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他們自己，而不是為了任何一羣政治領袖。

人們不只是上班、逛街購物和過着他們的生活，他們還做其他更多的事情。他們接受各種的生產定額，並且完成及超額完成這些定額；他們一同投票並一致支持那些別人建議給他們的候選人；他們活躍於各種政治組織；他們參與會議和示威；他們支持任何他們被認為應該支持的東西。政府所作的任何事，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有人持異議的跡象。

我們當然不能對這些事情掉以輕心。至此，人必須鄭重地問：這是否證明了你們這批政治領袖設定的目標——賺取羣眾支持以及鞏固國家的局面——已然成功？

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須視乎怎樣才叫鞏固。

如果只從各種統計結果、官方公布以及警察對公眾政治參與的報告等來看，我們很難質疑局面已趨鞏固的說法。

但是如果我們認為鞏固還有更多含義，將它視作社會中一種真正的精神面貌呢？如果我們去要求一些更持久、隱蔽或難以估量的，但絕非次要的因素，問，在這些數字後面隱藏了甚麼真正個人的、屬於人的經驗呢？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問我們曾做過甚麼，以推動社會的道德和精神復興、促進人類生命的真正範圍的擴展、把人類的尊嚴提高至另一境界、使人類可以真正自由及確切地肯定他在這世上的地位，我們應如何回答呢？如果我們不只是着重外在的表象，而是注重表象的內在原因及其後果，注重表象的含意和各種關連；簡言之，假如我們正視現實裏沒那麼明顯的一面，但其所呈現的卻包含更普遍的人性意義呢？那麼，我們還可以認為我們的社會是鞏固的嗎？

我很大膽的回答說不——我肯定的說，雖然事情外表看來那麼美好，我們的社會內在卻並不穩定，相反，正日漸陷入一個史無前例的危機之中。

我將證明我這個判語。

每個人必須詢問的基本問題是：為甚麼人們的行為會像現在那樣？他們做的這一切，組合起來構成一個完全團結的社會完全地支持政府的感人圖象。為甚麼他們會這樣做？我相信，對任何沒有偏見的觀察者而言，這答案是不證自明的：他們因為恐懼而這樣做。

學校教師在教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他害怕失去他的職業；學生重複着教師教給他的東西，因為害怕影響他的前途；年

輕人加入共青團並參與任何必需的活動，因為他害怕將不獲批准繼續讀書；父親承擔起一切的責任並（自願地）做別人要求他做的一切事情，因為他害怕他的兒子在政治記分系統這怪物的控制下，不能得到進入某學校所必需獲得的政治分數。人民參與選舉，投票支持那些別人建議給他們的候選人，同時假裝把這些儀式當作是真正的選舉，為的只是害怕被排擠。他們參與會議，對每一個他們必須贊成的決議投贊成票或至少保持緘默，為的只是害怕影響他們的生計、前途或職位。恐懼令到他們可以忍耐各種侮辱性的自我批評和承認過錯，以及不忠實地填充一大堆侮辱性的問卷。他們不會公開或甚至私下地表達他們的意見，因為害怕有人會打他們的小報告。工人承諾各種生產定額，為的只是害怕出現財政困境，以及希望改善生活和討好單位領導人；社會主義工人大隊實在懷有同樣的目的；大隊清楚知道，它主要功能，就體現在寫給高層的得體報告中。恐懼令人們參與所有的官方慶祝、示威和遊行。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服膺於一些他們其實不接受的觀念、寫一些他們不同意或明知是錯的東西、加入官方組織或是參與一些他們本來最看不起的工作、或是歪曲及糟蹋他們自己的作品，為的只是害怕會被禁止工作。為了拯救自己，許多人甚至舉報他人，為的只是那些人對他們做了一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事。

我現在說的這種恐懼當然並非一般心理學所說的那種確切的情緒。我們周遭所見的全都是一些自信和自滿的面孔，他們並沒有像風中樹葉那樣顫抖。我們關注的是一種深層的恐懼，你可以把它叫作一種倫理的恐懼：人們多少是自覺地參與了集體體會到危機深重而漫無止境；為危機四伏而焦灼；逐漸適應這種威脅，視之為世界現狀的一部分；人們愈能適應，愈能揮洒自如，便愈能找到虛與委蛇的自衛方法。

恐懼當然不是現在社會架構中的唯一基礎。

但它仍是主要和最基本的組成原料；沒有了這種恐懼，那些表面的統一、紀律和一致均不能維持，而官方文件也不能基於這些表象而強調我們國家的「鞏固」狀態。

自然會出現的問題是：究竟人們害怕甚麼？審判？酷刑？喪失財產？流放？處決？肯定不是。當權者對公眾所作的各種最殘酷的壓迫，至少在我們的國家裏已成為歷史了。今天的壓迫已以較微妙和有選擇的形式出現。即使今天不再有政治審判——每個人都知道當權者是如何善於利用政治審判——它們仍代表了一種極端的威嚇，只是威嚇的主要形式已變成一種關乎生存的壓力；而事情的本質當然沒有甚麼改變。

如眾周知，一種威嚇的相對價值比其絕對價值更有效；一個人的客觀所失，往往比不上他的生活層面的一套價值標準對他的主觀重要性。因此，如果今天一個人恐怕失去自己擅長的工作，這恐懼可能和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中恐嚇要沒收其財產所造成的恐懼一樣地強，並且可以造成同樣的反應。事實上，「生存的壓力」這一技巧在某意義上是更為普遍適用的；從廣義的說，我們國家中每個人的生存都是容易被損害的。每個人都有一些可以失去的東西，故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一個人可以失去的東西可以有很多種：從統治階級的多種特權和有權力的人的一切特殊機會，如工作不受騷擾、執掌權力、在本專業中工作、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等——以至只求在有限的法律保證下生活，不致淪為連這些也沒有的特殊階級，即捷克斯洛伐克黨機構下的受害者。不錯，每個人都有一些可以失去的東西。最卑微的工人的同工可以被調到另一更差勁或甚至更低工資的崗位，即是，他亦可能因為在一次會議中或在茶室裏說出心中所想的，而遭受嚴重的懲罰。

生存的壓迫遍佈整個社會，包圍每個個體。它要麼是日常碰到的威脅，要麼是萬一出現的不測。這個壓迫人的制度，就像以前更為野蠻殘暴的壓迫一樣，沒有權力架構裏的後盾支撐，是不

能够有效運作的。有了後盾，這制度也就更加全面，更加複雜，更加強大。這制度的大靠山正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國家警察——它是一隻醜惡的蜘蛛，吐出無形的網，伸到社會上每個角落；它是所有恐懼的線在無限遠的地方終於相會的一點；它是不容抵賴的鐵證，表明沒有公民可以指望挑戰國家權力。這個蜘蛛網即使不是個一個人時刻親眼看到，親手摸到，但是再單純的公民，也清楚明白這隻蜘蛛無時無刻一聲不響地到處埋伏；而公民之所以循規蹈矩，只是為了討好躲在暗處的耳目。

一般公民實在太了解自己的一舉一動，非蜘蛛點頭不可。蜘蛛毋須把他咬在口裏，也可以教他活得規規矩矩。完全用不着真的把他抓去盤問、檢控、審判、定罪，因為上頭的人也跌入同一個羅網，在決定他命運的每一個場合，總會有人或出於自願，或迫於無奈，和國家警察通力合作。既然事實擺明，國家警察可以隨時干擾一個人的生活，而這個人又絕無反抗的機會，這就足以令他的生活失掉幾分自然真摯，多少變成沒完沒了的掩飾。

如果人們出於恐懼而嘗試保護他們已有的東西，那麼愈來愈明顯可見的是，驅策人們野心勃勃地嘗試攫取一些他們還未擁有的東西的主要動力，正是自私和野心。

近年來似乎鮮有一個社會系統，會如此公開和無耻地提供機會，讓人可以為了一己之得而無所不用其極；讓沒原則和沒腰骨的人可以為一己的權力和私利而不擇手段，讓一些天生的奴才隨時準備卑躬屈膝、犧牲旁人，以求討好當權者。有鑑於此，我們應該不會奇怪現在比以前有更多聲名狼藉的野心家、機會主義的空心老倌，和有不清白紀錄的人廁身於許多公職和要職。簡言之，這些人是一些典型的合謀者，他們特別擅長在每一次改變立場時說服自己，說他們卑污齷齪的行為只是一種挽救他人的方法，使他人不會重蹈他們的覆轍而已。現在所有公職人員的貪污達到了近十年未見的嚴重程度，而公職人員在任何情況下都願意

相當公開地收受賄賂，並且容許自己厚顏地以私利和一己貪念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如此看來，這也是不足為怪的了。

現在真摯地相信官方宣傳所說的一切，無私地支持政府當局的人，比以前任何一個年頭都要少。但偽善者的數目卻在穩定地上升；以至，每個公民都被迫成為一個偽善者。

這種令人沮喪的情況當然是有其邏輯發展的。近年來很少有一個政權是如此不在乎那些表面忠誠的公民的真正想法，以及他們的聲明的忠實程度的——我們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自我批評和表示悔過的行為中，根本沒有人真的在乎人們是否口不對心，抑或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事實上，我們可以穩當地說，人們差不多是自動地作這些聲明，不會因此而感到不道德。事實上，在從人們作這些聲明的過程中，未來的個人利益往往被用作一個主要論據。沒有人會嘗試說服悔罪者他已犯了或正在犯錯誤，反之悔改以自救已經是常規；同時悔罪者將獲得的好處會被吹得天花亂墮，而悔改後遺留的痛苦滋味則被淡化，或被當作是一種幻覺。而如果有一些古怪的人十分誠懇地悔過，並且顯示他的誠意（例如拒絕接受適當的報酬之類），政權本身很可能會把他視作一個可疑的對象！

說句公道話，某意義上我們全都正在公然受賄。如果你在工作地方接受某某職位——這當然並非一種服務你的同僚的手段，而是為管理層服務——你會獲得某特權以作回報。如果你加入共青團，你將可有權獲得某種款待。如果作為一個具創造性的藝術家的你參加某某官方活動，你會獲得某種真正創作的機會以作回報。不管你私下想甚麼，只要你公開表示同意，不搞任何麻煩事情，埋沒你對真理的渴求，讓你的良知保持緘默——大門會為你而敞開。

如果適應環境的原則變成了在社會達致成功的主旨，人們會問：這社會正鼓吹怎麼樣的人格？甚麼類型的人會得當時得令？

從絕望到妥協

有人戰戰兢兢，處事只顧頻頻招架；有人野心勃勃，為了一己利益要征服世界。介於這兩種心態之間，有各式各樣不容忽視的情緒。今天這個「大一統社會」的道德氣候得以形成，實有賴這些情緒：冷漠和與此相關的種種心態。

近代歷史此起彼落的衝擊，以及隨之在我國建立起來的制度，似乎使人民對未來失掉信心，不寄望在公眾事務上實行徹底整飭，不再熱心追求正義和真理。任何事情要不是日常生活為求糊口的例行公事，就會聳聳肩膀。逃避責任的方法五花八門：凡事漠不關心，對沒有切身關係的價值表現得滿不在乎，對同胞的不幸無動於衷，精神上處處顯得被動消極「情緒低落」萎靡不振。誰要是不肯俯首貼耳，比方說，誰要是還不肯為生存而惺惺作態，還不肯相信要完成自我就得用自我疏離作為代價——這樣的人在日益淡漠的鄰人眼中，便成了怪人、傻瓜、唐·吉訶德，最後必然會惹人討厭，因為大凡與眾不同的人物，都會像不留情面的鏡子般，令其他人醜態畢露。

又或者，漠不關心的鄰人表面上不與之為伍，避之唯恐不及，但私底下又會興起同情之心。因為這個人做了別人該做而不敢做的事，別人對他暗地裏大加讚許，好平息自己良心上的不安。

聽起來有點似是而非，但事實上，這種冷漠的態度，竟已成為社會上一股極為活躍的力量。難道我們可以否認，是冷淡而非恐懼在驅使人們投票、開會、加入官方組織嗎？難道人們在政治上支持政權，都不過是例行公事、習慣、無意識的行為，是得過且過嗎？這一切不都是因為他們已經逆來順受了嗎？明知參加所有這些沒人相信的政治儀式毫無意義，但生活起碼可以因此過得平靜一點。要是硬不參加，難道又會更加值得嗎？那時我們非但一無所獲，還會弄得永無寧日。

大多數人都不願意花時間和當權者鬧個不休，尤其是到頭來敗北的總是孤立無援的個體。既然如此，有關方面要我們做甚麼，我們又何必執意不從呢？這既不會有任何損失，而且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不以為忤了，根本犯不着停下來想一想。

由失望到淡漠，由淡漠到妥協，由妥協到墨守成規——竟有人還振振有辭，以此為「羣衆大批參與政治」的證據。這一切就是現代人心目中的「正常」行為。「正常」這個觀念，骨子裏十分可悲！

人們愈完全地放棄任何全面改革的希望、放棄追求不屬於個人的目標和價值，或放棄任何「外在地」發揮他們的影響力的機會，則他們愈會將精力放在最少阻力的方向——把它「內在化」。今天人們更多考慮自己、考慮自己的家居和家庭。家庭是他們可以獲得休息、可以忘卻世界的荒謬、及自由發揮他們創造潛能的地方。他們用各種美麗的物件和裝置填塞他們的家居；他們嘗試提高住屋的水平；他們建造村舍、打理車子、在衣食和家居舒適方面更為注意，以使他們的生活過得更為愉快。簡言之，他們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們私人生活的物質層面。

這個社會取向明顯有其良好的經濟效果：它推動了一些過往受忽視的消費品生產和公共服務領域的進步；它還協助了一般生活水平的提升。從經濟意義上來說，它代表了一種推動社會物質財富增長的動力；這種動力至少可以局部獲得成功，這成功並且是現在那缺乏彈生、官僚化而生產力低下的國營部門不能冀望辦得到的（你只須比較一下國營和私人建屋工業的質量差距便可知究竟）。

當權者對這種將過剩的精力用於私人生活的現象表示歡迎和支持。

但為甚麼？因為它有刺激經濟成長的良好影響？這肯定是一個理由，但現行的政治宣傳和政治習慣正靜靜但有系統地推崇這

種「內在」的取向，視之為人類在世上的自我完成的非常本質；這清楚解釋了當權者為甚麼對這種精力的轉移表示歡迎。他們的着眼點放在這精力轉移的真正心理來源：從公共活動的範疇中逃脫。他們準確地預卜到這種多餘的精力如果轉為「外在」，必會在不久將來被用作反對他們，反對他們正頑固地抱持的各種特殊權力；因此，他們毫不遲疑地把一種事實上是絕望的生活，當作是人類的生活。為了方便管理社會，社會的注意力被故意引離其自身，即引離社會的事務。人的全部注意力被釘牢於其消費利益上，為的只是使他不能覺察到他精神、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日益墮落。把人變作一個只適合在原始消費社會生活的臭皮囊，為的只是把他變作易塑的原料，方便各種的操縱。人被囚禁於各種惡劣的消費者角色之中，受到中央操縱的市場所控制，其目的是防範人們渴望人類應該有的無窮追求。

所有的證據均顯示當權者使用的方法對一些只求自我保護的生物是頗為有效的。這些生物選擇了走最少阻力的路，卻完全忽略了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對人類尊嚴的殘酷攻擊，和對人類本性的無情閹割。

但這批當權者仍念念不忘地堅持以他們的革命意識形態來合理化他們的行為，而這種意識形態的主要理想卻是人的完全解放！但人性本身和人性的多方面性、和諧、真正的成長這些概念，到了那裏去了？人從一個令人異化的社會機器的掌握中解放、從一個神秘的價值系統中解放、從財產的獨裁、金錢的拜物教和強權中解放出來等等的概念呢？人應該完全享有社會和法律的公義、具創造性地分享政治和經濟權力、人類尊嚴的提高和完成、真的自我等等的主張，又到哪裏去了？人們實際只被供給與選擇買那一個洗衣機或是冰箱的自由，而不是自由地參與經濟決策、自由地參與政治生活和自由地發展智慧。

放在台前的是偉大的人道主義理想的華麗堂皇的外殼，而在

其後蹲伏的是一個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平凡家居！口號一方面拚命轟炸，宣傳各種自由在史無前例地增加和生活的獨有的結構多樣性；而另一方面，生活變得空前地乏味和卑污，把生命變成只是對貨品的追逐。

層層的壓迫把人操控得像一頭頭言聽計從、只懂消費的動物。在這個科層的頂端，我已經提過，有一個隱蔽的力量，無所不能。這就是國家警察。它之所以恰好橫在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和實事求是的日常生活之間，造成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我以為一點也不巧合。

誰不幸親身體驗過國家警察的機關「作風」，一定會對官方就這機關的功能所作的解釋感到啼皆非。難道真的有人會相信成千上萬，卑鄙齷齪的告密者和職業密探，無數心態扭曲、行為狡詐、多疑善妒、刻薄成性的小資產階級和官僚，一攤攤惡息難聞的濃痰、充斥着背叛、推諉、欺騙、謠言、陰謀，全都是勞動人民的本色；全都是為了保衛人民政府，以免人民的革命成就給「敵人的詭計」一一斷送？要不是一切都黑白顛倒了，試問又有誰會比你們的小布爾喬亞更敵視真正的工人政府？這些人總是唯命是從，毫不躊躇地告發別人，來緩和他們那好比患上關節炎的自尊心所受的痛楚。在秘密警察的正規手續背後，可以清楚看出這些小布爾喬亞才是警察「作風」真正的精神導師。這種講一套做一套的矛盾，實在荒唐透頂，很難說得過去。除非我們都認清楚，國家警察今時今日的真正使命，不是保障人有自由發展的機會，而是助紂為虐，保護壓迫者，因為要真的讓人自由發展，就必定會對這批無恥之徒構成威脅。

有關新人和新道德的革命教義和把生命當作是消費的喜樂這兩者是如此背道而馳，使人不禁問：為甚麼當權者如此狂熱地堅持其意識形態？原因十分明顯：只是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因襲的儀式化的溝通系統，可以給予他們一套有合法性、延

續性和一致性的外衣，從而可替他們機會主義的行為披上尊嚴的外衣。

這些行為，目的當然在每一處都會留下官方意識形態的痕跡。意識形態的花言巧語成了一座無窮的大山，當權者不斷希望藉此以影響人們的思想，而由於這些花言巧語全無內容，公眾通常不大發覺在其深處流露了一個明確而有意義的訊息，一項現實的忠告：「如果可能的話別碰政治——把它留給我們！你只須做我們叫你做的事情，別嘗試深入思考事情；不關你事的，別多管閒事！閉上你的嘴，做你的工作，好好照顧你自己——那你就平安大吉！」

這項忠告是被聽取了。一個人能相對容易地和他的政府取得共識的一點，便是人是要生存的。那為甚麼不好好利用這點？尤其是當一個人無論如何也沒其他選擇的時候。

我嘗試勾劃的這整個情景，最終會引致甚麼後果？換言之，一個將每個人趕進純粹物質生存的防空洞和一個令人以欺騙作為和社會溝通的主要形式的制度，將帶給這建基於恐懼和冷漠的制度下的人甚麼影響？一個只以維持表面秩序和服從為目的，而罔顧以何種手段和付出何等代價以達致此目的之政策，將令社會墮落至何種地步？

不需很好的想像力也可想見，這樣的一個處境只會引致所有道德標準的逐漸破壞、所有社會行為標準的崩潰，以及嚴重摧毀對真誠磊落、恪守原則、誠懇、博愛、尊嚴和榮譽等價值的意義的信心。由於人們不再存有期望和不再相信生命是有意義的，故此出現了一種「深入的」非道德化，而生命的必然需要墮落為一種生物需要的水平。這只能令我們再一次面對人類地位在現代科技文明中的悲哀的一面：人類愈來愈不意識到絕對；我把這叫作人類身分的危機。一個苛刻地要求人們不要做回他自己的制度，又如何可以拖慢人類身分的崩潰呢？

秩序已建立了，代價是精神的癱瘓、心靈的死去和對生命的破壞。

表面的「鞏固」已然做到了，代價是社會中的精神和道德危機。

不幸地，這危機最壞的特性是它會不斷深化。我們只須稍稍超脫出來，不受日常生活的角度所限制，便可發覺我們全都在迅速地放棄一些一天前拒絕放棄的立場。社會良知昨天認為不適當的事情，今天便會隨便地被原諒，到明天顯然這就會被認為是自然的了，再過一天這便會被捧為一種行為模範。昨天我們宣稱為不可能，或至少斷言我們永不能適應的東西，今天我們接受它作為生命的一項事實而不覺詫異；而相反地，一會兒前我們視作當然的東西，現在視之為反常，而誰知道不久將來我們不會將之視為一個無法達到的狂想。

在過往幾年來我們對「自然」和「正常」的判斷的改變，以及我們社會中道德態度的轉變，比我們乍眼看來嚴重得多。正因為我們日趨麻木，所以我們對麻木的自覺能力也自然下降。疾病已從果實和葉子傳至主幹和根。故此，需要警惕的最重要原因，根源於現在將給未來帶來怎樣的影響。

文化的不毛之地

社會對本身更深入、廣泛和精細的了解，是社會自我擴張、豐富和培育的主要途徑。

文化是一個社會自我認識的主要工具。文化是人類活動的一個特定範疇，影響着普遍的思想狀態（雖然這影響常只是間接的），而同時又持續地受這思想狀態影響。

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會全然壓制社會多元的內在發展，而無可避免地社會的文化是第一樣被壓制的東西；除了說文化作為一種現象，本質上「自動地」與社會控制的「精神」衝突外，這控制

還是一種故意的「計劃」，源自一種合理的焦慮，恐怕社會會因為文化給予它的自覺性，而醒覺到自身受壓抑的程度。文化令一個社會更加自由和令它發現其真理——所以這對那些基本上只想壓制這些價值的當權者自然沒有甚麼吸引力。這些當權者只承認一種真理——他們在設定的時刻需要的真理；而只有一種自由：宣布這些「真理」。

「真理」要不是出於誠摯的求知，在辯証的風氣下茁壯起來，而是基於權力的計算而變得強大，那麼世界就會成為思想的不毛之地，塞滿僵化的教條，頑固的信念，最後必會產生妄顧道義的專制政府。這個世界也會到處充斥着禁制和規限，到處要人服從命令，而文化政策也會落在文化警察的手裏，由他們把持操縱。

當代文化所受到的蹂躪，早已是老生常談。數以百計的書籍列為禁書，作家受到冷藏，很多期刊遭到清算；出版社的計劃腰斬，劇場的節目刪剪，知識界所有聯繫給截斷；展覽廳讓人搜括一空，文化界人士不住受到匪夷所思的壓迫歧視；以往的藝術團體，數不清的學術機構被迫解散，然後換上一批傀儡，而在背後扯線的則是一羣好勇鬥狠的狂熱分子，臭名遠播的野心家，不可救藥的懦夫，蠢蠢欲動要抓住空檔爬昇然而一無是處的暴發戶。與其把這一切大書特書，倒不如讓我就目前的情況作更深層的反思，這樣更切合我在這封信裏要說的內容。

首先，目前的形勢不管如何惡劣，文化還未完全消聲匿迹。不但戲照演，電視節目照舊每日播出，甚至有些書也得以印刷出版。可是這些公開合法的文化活動，總的來說，都有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全面的外化。文化活動大都已名不符實，抽離其實質意義，被閹割了，不能再作為人類以至社會進行自我意識的工具。即使在今天，每當有美妙絕倫的東西出現——仍就藝術的領域來說，譬如一場出色的戲劇表演——也只不過是由於做得含蓄精緻

而取悅於當局。因此，從官方的角度來看，這齣戲在提高社會自我意識所起的作用上，比較無關痛癢。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只要這齣戲開始引人注目，有關當局就會本能地作出防衛：總的來說，一位優秀演員會由於演技過分出色而遭到取締，這種例子實在屢見不鮮。

不過此刻我關心的不是這點。我關注的是本來大有可為的領域如何會出現這種外化。這些領域原可以讓我們更直言不諱地道出人在其周遭環境的體驗，從而更有成效地促進社會對自身的意識。

假設一個文學作品，或是一個戲劇出版了吧；這作品的技巧高超、製作精巧、惹人共鳴並意義豐富（這倒是常有發生的事）。無論這作品其他方面的質素如何，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無論是由於審查或是自我審查，由於作家本人的性格或是自我欺騙，出於順從或是計算，這作品半點也不會逾越一個平凡、傳統、因而欺騙性的社會意識的禁忌。這個社會意識只會把經驗的表面說成和當成是真正的經驗；這些經驗的表面只是一連串順滑的、陳舊的、表面的瑣碎經驗，是這個社會意識一直所馴養的某些經驗層面的蒼白反映。雖然如此（或許正因為這樣吧），總有人覺得這樣的作品是刺激有趣和值得欣賞的，雖然作品實際上沒有任何真正的見解，沒有反映任何未知的事情，沒有一些沒有人說過的東西，也沒有為一向臆測的東西提供任何新的，突然發現的有效證據。簡言之，在描繪真實世界的過程中，這樣的一個作品其實是在否定真實世界。由於其已被證實無害，最常出現的作品形式必定是最受我們國家的當權派歡迎的，無論這些當權派是屬於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我把這叫作平凡的美學，這種美學由四堵牆壁保護：善良的小資產階級道德情懷、鄉巴佬純樸的感性哲學、工人家庭戲劇的歡愉，以及鄉下人的世界觀，一種基於相信其一般善意的世界觀。我說的這種美學原則的主旨是對「正

確思想」的平庸的膜拜，它植根於古老的民族自滿，其指導原則是任何東西都必須是漂亮、瑣碎而預先消化的；這帶來了一種虛假的樂觀主義，對「真理必將戰勝」這一格言作出了最乏味的詮釋。

大家都知道，按照政府的政治意識形態來創作的文藝作品，今天已經鳳毛麟角，碩果僅存的幾部，更談不上甚麼專業水準。這不單是因為沒有人寫這些東西，而是寫了也不會受觀迎。聽起來有點矛盾，但我認為的確如此。現代消費社會的人，實際上抱着的態度就是：即使有這樣够專業的作品出現，提起了某些人的興趣，但由於它會把大家的注意力過分扯到「外面的世界」去，勾起大伙兒的傷心往事，使大眾聽了這些作品裏那副空泛偏激的政治口吻，煽起了同樣空泛偏激的政治反應，因而搞亂了太多灘最好任由它們腐臭的死水。現今更能符合當局真正利益的是我提到過的平庸美學。這套美學同樣和真理沾不上邊，可是更要來得不動聲色、言之鑿鑿、教人受落，而且既然碌碌之輩覺得容易消化，那麼最好就是拿來扮演消費哲學裏的文化角色，也就是說，對待人民，莫以真理激勵，寧用謊言撫慰。

這種作品自然是常常充斥市面的，但在我們的國家裏，公眾常可通過某些縫隙，獲得一些可真正被稱作傳達了一種較真摯的人類自覺的作品。這種藝術作品的道路從來都不是特別平坦的，他們不單遭受來自當權者的阻力，亦受到傳統的馬虎和怠惰所影響。但直至最近他們仍一直透過某些神秘的管道，迂迴曲折地到達個人和社會，以完成文化作為社會自覺的使者的角色。

這就是所有真正要緊的事情了。這正是我視之為真正重要的事情。它的成就自我們的民族復興時代以來，可說是無可比擬的，而這也正是現在的政府所能令致幾乎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官僚對文化的控制是如此絕對；對每一個縫隙的監視是如此全面，致使沒有重大的作品可以得見天日；政府是如此恐

懼：那一小撮口袋裏有着每一道門的鑰匙的人，對藝術又是如此恐懼……

損失一份雜誌

你當然領會此刻我並不是要羅列所有完全禁止創作或部分作品受到禁制的文藝工作者的名字，我要說的是另一份糟透得多的名單，那是檔案上一項「空白的索引」。它「先驗」地把一切囊括其中：任何有點創意的思想火花，鞭辟入里的洞見，發自內心的誠懇，與別不同的觀念，啟迪人心的形式，都可以列入這個「白」名單內。我要說的正是那明目張胆的「花撚」紙（拘票），它對任何體現出內心自由的事物，亦即在深層意義上富於文化色彩的事物，一律提出檢控。我要說的正是你們政府所發出的文化拘捕令。

再一次，回到我從開始就提出的問題上。究竟這一切意味着甚麼？可引申到哪裏去？換言之，對社會起着甚麼作用？

再一次，我來舉個實例。我國先前出現的文化雜誌，大多數已經絕迹。即便有雜誌幸存下來，也受到「劃一的控制」，乏善足陳。這情況產生了怎樣的後果？

驟眼看來，後果微不足道。即使完全沒有那些文學、藝術、戲劇、哲學、歷史及其他類型的雜誌，社會的巨輪依舊不停運轉。這些雜誌的數目即在先前也遠遠滿足不到社會上潛伏的需要，不過畢竟有讀者，起過一定的作用。可是今天有多少人仍會緬懷那些刊物呢？頂多只有三數萬個訂戶，只佔社會的極少部分。

不過，這種損失遠比發行人所顯示的更為重大。當然實質的影響也是諱莫如深，很難恰當評估。

強行清算這樣一份雜誌——如一份戲劇評論雜誌——不單剝奪了這類特定讀者特定的精神食糧，不單嚴重打擊了戲劇文化，

更甚者，這樣做會把社會賴以意識自身的特定器官也一併清洗掉，具體而微地影響到今日這個千層萬疊的社會有機體借以維繫生命的養料輸送、交流、轉化的整個複雜體系。同時這樣做又打擊了有機體內自然進行着的機能活動，擾亂了各種功能相互均衡的運作——靠這種相互作用，社會才表現出它那生理機制有多複雜。還有，人若長期缺乏某種維他命（雖只佔人的飲食量微乎其微的小部分）便會生病，因而長遠來說，社會這個有機體不單只損失一份雜誌，也足以造成始料不及的傷害。要是在實質上損失的不是一份，而是幾乎所有雜誌，試問又會如何？

在文明社會層層疊疊的世界裏，知識、思維、創造的真正作用，並不局限於最先直接與之可說是切身接觸（不管主動或被動）的特定圈子。這是不難理解的。固然，小圈子總會有，特別是在科學研究的領域內。但是小圈子裏所爭論的知識問題，不管通過多少中介，最後總會在社會上產生深遠的影響。正如個我們大多數人從未探討過導致原子彈產生的理論物理學，但核子的威脅，以及更廣義的政治問題，卻和我們息息相關。

同樣情況也可見於科學知識以外的領域。歷史上許多著名的事件，在說明了社會上的文化、政治和道德，會突然興起一股前所未有的革新浪潮，原來作為核心或催化劑的，不過是個很小的圈子，一個孤立的集團，身體力行，去提高社會的意識。即使到了後來，這些人的革新行動可能仍不為社會大眾理解接納，但依然是形成社會習俗一個不可或缺的契機。因為誰也說不準，一些不起眼的知識火花，彷彿在一小撮人的腦細胞內碰撞出來，以促成有機體的自我意識，會在甚麼時候突然替整個社會照出一條康莊大道，而它自己可能自始至終渾然不覺。

不過，故事至此，還未到尾聲。就算是那些從來不曾為整個社會照出道路，也有深遠的社會意義，只要它們「出現」過，只要它們有發出光輝的「可能」，只要它們的閃光展現了社會上某

些潛在的創造力量或行使自由的權利。這些曇花一現的知識對「文明的氣候」也出過一臂之力，而沒有這種氣候，更耀眼的光芒就永不能出現。簡言之，精神的自我意識所活動的空間是渾然一體、無從分割的，只要剪斷一條線，整個網絡必然失去連貫。因此，在我們提及的社會有機體內，所有微妙的過程都互相依存，每個環節都具有超乎尋常的重要性，所以擾亂了有機體的運作，其破壞也超乎尋常。

失蹤的小說

我不想把所有問題都簡化到這一件較為次要的小事情上。不過，這件事本身不是正好說明了「文化拘捕令」已經對現今社會的精神和道德狀況造成極大傷害嗎？更不用提將來，雖然此刻首當其衝的只是為數有限的才識之士。

假使近年來書局裏沒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說，加深我們對世界的體驗，當然不會有甚麼公開反應。讀者不會走上街示威，反正他們總會找到可以一看的東西。但是誰會料到這件事對捷克社會的重大影響？誰知道這種隔閡會如何干擾捷克未來的精神和道德氣候？我們的「自知」之明又會遭到怎樣的挫折？文化上要是喪失了這種自我認識的能力，那些今天或明天才起步認識自己的人身上又會留下多深的烙印？在一般人的文化意識裏，有多少逐漸成形，蠱惑人心的神話，得像拆堤似的一一鏟去呢？我們還需要倒退多少步呢？誰知道還會有哪些人有勇氣去點燃新的真理之火？哪一個時刻？哪一個樣子？用哪個火？——要是我們不僅虛耗了用來點起真理之火的燃料，也糟蹋了原可大有作為的滿腔熱情！

在書店裏消聲匿跡的那類小說，有幾本畢竟有手稿傳閱。因此，情況還不致教人灰心喪氣。就我提出過的論點來說，這樣的一本小說，即使有好些年不為大眾知曉，只得二十個人讀過，依

然是不可抹殺的。至少有過這本書，有人寫它出來，成為文化意識裏一個儘管是很渺小的部分。可是，在那些一定要通過所謂合法渠道才能產生效力的領域又如何呢？就戲劇和電影而言，它們對社會的衝擊是如此具體，可是其中一切有趣的新生事物都受到扼殺，試問已經造成的實際破壞，和行將產生的禍害又有誰能夠衡量？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和實踐要是處於真空狀態，長遠後果又會有多嚴重？本體論、倫理學、歷史學這些研究工作需要持之以恆來進行自我認識，需要翻查各種可以公開的文獻資料，需要通過公開辯論使研究深化。要是都用武力橫加干預，後果之不堪設想，誰敢估量？把一切資訊、觀念、發現、價值的正常交流統加以壓抑，阻止人民公開表態，結果之堪虞，又誰能逆料？

總而言之，問題在於：這個國家今天閹割掉它的文化，明天知性和道德會變怎樣無能？

可怕的是，基於政治利益而讓社會承受這樣的致命打擊，只會得不償失。在世人眼裏，那些人為了自己眼前的權力而犧牲國家的未來，毀掉國家的元氣，實在罪無可恕。

熵和我們的生活

正如熵的不斷增加是宇宙的基本規律一樣，生命的基本規律是愈來愈高度組合，並且對熵進行鬥爭。生命反對所有的齊一性和削平；它的目的是多樣化而非同一性，它的目的是永不止息的超越，是新鮮意念的不斷衍生和對現狀的反叛。生命的提升的一個必要條件是不斷把秘密的東西開闢出來。

另一方面，那些當權者的目的只是透過武力迫使社會出現持續的同意和齊一，以令他們可以永遠保持權位；這種權力的本質即為對所有多樣性、特殊性和超越的基本不信任；即為對任何未知的、難以捉摸的和仍未明確的東西的基本厭惡；即為對統一、

相同和惰性的癖好和對現狀的一種深厚感情。這種權力精神中的機械性已掩蓋了其活力。它嘗試建立的秩序並非對愈來愈高級的社會自我組織形式的尋求，例如是社會架構的日益複雜；相反地，它反對熵的高峰，反對「最高可能性的狀態」。它和熵同向而行，卻與生命背道而馳。

我們知道一個人生命中有某個時刻，結構的複雜性突然開始下降，而人的方向亦轉至和熵的方向一致；這個時刻也是他屈服於宇宙的常規的時刻：死亡的時刻。

在每一個選擇熵的方向的政權底層某處，都潛伏着一個死亡原則。這些政權希望把每個個人當作一部電腦，使他們可以輸入任何程序而個人必定會把程序付諸實行。這種政權推行的「秩序」有一種死亡的氣味：這種秩序對任何真正生命的表達、任何特立獨行、任何個人的宣洩、特別的思想、不尋常的意念或期望都懷有警惕，視之為混亂、動盪和無政府的警號。

我嘗試逐步描繪的現政權的整個政治方式，證明了這種政治方式的關鍵概念——秩序、平靜、穩定、「帶領國家脫離危機」、「停止分裂」、「平息過激的情緒」、諸如此類。對任何走「熵」的道路的政權來說，最終都將帶來同樣的致命的意義。

秩序不錯是戰勝了——一個灰色而千篇一律的官僚秩序，窒息了所有的個人性，一個機械地精確的官僚秩序，對任何有獨特性質的東西壓制，一個有着發霉的惰性的官僚秩序排除了超越。戰勝了的是沒有生命的秩序。

不錯，國家是平靜的。你會否承認，它平靜如一個停屍所或是一個墳地？

沒有歷史的民眾

一個真正生存的社會自然地常常有一些事在發生。當下的活動和事件的互相影響，以及公開和隱蔽的行動的互相影響，製造

了一系列的特殊環境，帶來了以後的活動和新的行動。延續和轉變的事情、有規律和隨機性的事情、能預計和不能預計的事情形成了一種神秘而極重要的對立，這個對立在「時間的歷程」和事情的發展中顯現。社會的生活愈是高度結構化，其「時間歷程」則亦變得愈高度結構化，而在這個時間歷程中，獨特性和不能重複性的元素亦顯得更為突出。這當然更可以反映社會生活的性質是循序發展的——即是說社會生活是一道不能逆轉的長河，由眾多不能改換的處境組成；故此回溯時間的歷程，我們能更好地了解，社會生活中的那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規律決定的。一個社會的生活愈是豐富，則表示這社會對社會時間的歷程——歷史的進程——有更清楚的了解。

換言之，只要社會活動還有空間，則社會也應還有記憶的空間。任何生存的社會都是有歷史的社會。

延續性和因果關係這些元素在歷史中，既是如此緊密地與不可重複性和不可預測性這些元素連繫起來，我們會問：真正的歷史作為「混亂」的不可消滅的來源，作為不安的泉源，作為對法律和秩序的一種蔑視，能否在一個「熵的政權」統治的世界下生存？

答案很簡單：不能。而無論如何，事實表面上它亦沒有生存。這樣的一個政權將真正的生活消滅了，令社會時間停止，而歷史亦因而消聲匿跡。

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也是一樣，人們有着一種感覺：在過去的一般時間內並沒有歷史。雖然過程很緩慢，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正在喪失時間的觀念。我們開始忘記甚麼時候發生了甚麼事情，忘記甚麼事早些發生甚麼事遲些發生，並且我們開始慢慢覺得這是無傷大雅的。事情的發展已失卻了獨立性和延續性，所有東西都溶合為一個灰色的影像。變成同一個循環，於是我們說：「沒有事在發生。」同樣地，這裏營造了一個死寂的秩序，

所有活動都完全是被組織的，因而被奪去其生命力。社會時序觀念的消亡，不能避免地令個人生活的時序觀念亦隨之消亡。由於社會和個人的歷史對其不再有意義，個人生活回復到史前時期一般，時間的節奏只來自出生、結婚和死亡等事件。

社會時間觀念的喪失似乎在每一方面都把社會帶回了原始時代：在那時代人們只能以由宇宙和氣候所決定的循環不斷的季節，以及與其相關的宗教儀式來量度時間。

「時間歷程」是傾向變動的，它所留下的空隙自然地必須被某些東西填補。故此真正歷史的無秩序便由假歷史的秩序性所取代，而這些假歷史的作者並非社會的生活，而是一個官方的計劃者。我們獲得的並不是一些真正發生的事件；我們的生活只是從一個周年紀念到另一個周年紀念，從一個慶祝到另一個慶祝、從一個閱兵到另一個閱兵，從一個一致同意的代表大會到一致同意的選舉然後從頭再來一次，從一個報刊紀念日到一個炮兵紀念日。因為有着這個歷史代替品的緣故，我們只須看看日曆，便可重溫這社會過去現在將來發生的所有事情——這決不是巧合。這些循環的儀式的性質，又是那麼為人熟知，令看看日曆所獲得的資訊，和親歷其境實在沒有很大分別。

我們得到的是一個完美的秩序，但代價卻是回到史前時代。縱是如此，我們還有一個限制：對我們的祖先來說，那些重複的儀式通常有深刻而關乎其生存的意義；但對我們來說這些儀式變成一種公式，進行儀式的目的就是進行儀式。政府繼續這些儀式，企圖使人覺得歷史在前進；公眾照樣通過動議以避免惹禍上身。

一個「熵的政權」透過加緊它的中央控制，令自己更一元化，和將社會關在一個更全面而密不透風的牢籠中以便單向的操縱，可以在它的影響範圍以內增加它的熵。但它在這方向上踏出每一步，難免也在增加它自己的熵。

這政權在嘗試令世界停止活動的同時，也在令自己不能活動，因為它令自己沒有能力應付任何新事物或阻擋生命的自然潮流。由於「熵的政權」的架構內缺乏任何動力以推動它面對自己，它註定最終要成為它自己的致命原則的受害者，並且是最脆弱的受害者。相反地，生命本身有着一種不能被壓抑的反對熵的動力，當違反生命的政權愈快自我僵化，生命愈能成功地和具創造性地反對違反生命的力量。

當權者在嘗試令生命癱瘓的同時，也令自己癱瘓，長期來說更令自己不能再令生命癱瘓。

換言之，生命可能被長期違背、衰弱和被麻醉，但它的進程始終不能永遠被阻止。卻是靜靜地、隱蔽地、緩慢地，生命仍會繼續前進；生命可能會被迫疏遠自己一千次，但它總有辦法復元；無論生命如何被蹂躪，它最終能比蹂躪它的權力活得更長久。每個「熵的政權」的矛盾性質令它必須鎮壓生命，但它到最後仍得倚賴生命以自保，而生命本身並不倚賴政權才可生存。在我們的地球上，唯一可真正摧毀生命的只有那沒有妥協的力量：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普遍有效性。

如果生命不能被永久消滅，則歷史同樣也不能被完全阻止。在慣性和假事件的深層底下，一條秘密的小河仍在慢慢的流，緩慢而不為人注意的在侵蝕這深層；這可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終有一天它會發生：那深層會開始斷裂。

在這個時刻，一些東西再開始發生了，一些真正新鮮獨特的事情，一些沒有在官方日曆中計劃的「事件」，一些令我們不再對發生甚麼事和何時發生漠不關心的東西。一些真正具歷史性的東西，因為歷史再次要求別人的注意。

可是現在我們這個情況，怎樣才可以讓歷史「大聲疾呼」？這樣做有甚麼前景？我既非歷史學家，也不是先知，可是不能不就這些「歷史時刻」的構成提出一點看法。

凡是可以讓大家多多少少以公開方式來爭取權力，就最能確保公眾得以監管權力的運作，並且最終保證大家有言論自由。而當權的人，不管願意不願意，也得就社會生活進行公開持續的對話。他們不得不時時刻刻斟酌處理生活向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凡是沒有這種公開的權力競爭，則言論自由遲早必然受到壓制——就像每個體現着「熵」的規律，每祝愈下的政權那樣。掌權當局非但不肯教自己和人民生活步調一致，反而叫人民處處遷就他們。他們不肯持之以恆地公開處理真正的衝突、要求、問題，反而極力掩飾一切。儘管如此，這些衝突和要求只會有增無減，直到老朽的外殼再也包容不住壓抑的時刻，便一湧而出。正是這個時刻，死氣沉沉的惰性給撕個粉碎，歷史也重新踏上舞台。

之後，又會有甚麼發生？

無疑，掌權當局仍然勢力龐大，還足以制止重大的衝突，不讓它們演變成公開討論，或公開的權力對抗。但是當局已經沒有力量抵抗這種壓力，於是，生活就在可以冒頭的地方冒出來了——在權力的秘密通道裏，大定都就生活的問題秘密展開討論，最後更在私底下互爭雄長。當局固然措手不及，因為任何就生活切實展開的對話都是當權者無能為力的。於是，他們慌起來了。生活開始在議會廳上製造混亂，令當權的人互相爭執對峙，策劃陰謀，陷害對方，甚至連自己的親信代表也不可靠了。領導官員以前都戴着毫無個性的死人面具，同流合污，現在突然撕下面具，各自以最「人道」的方式爭奪權力，謀求自保。這個聲名狼藉的時刻，會出現宮廷革命，會有人揭竿起義，部長大臣的職位會突然間離奇調動，千篇一律的政客演辭會變了另一種調子，真真假假的陰謀詭計和秘密結社——給人揭發出來，疑幻疑真的罪行相繼水落石出，陳年舊賬也逐件翻出來清算，大家爭先把對手排擠掉，彼此詆毀中傷，還可能會把政敵下獄審判，而在這一

切發生以前，每個有權有勢的人都講相同的一套語言，說同一篇濫調，為同樣的指標得以大功告成而拍爛手掌，可是現在權力的磐石突然土崩瓦解，他們就變成了一個個輪廓分明的人物。雖然還是說同一套語言，可是卻同聲不同氣，彼此針鋒相對，人身攻擊。我們會好生奇怪，為甚麼有些人，即那些在權力的暗鬥中落敗的人，竟發現原來他們從來未認真看待過自己提出的指標，也從未把自己的指標完成得妥妥當當；而另一些人，即那些權鬥的得勝者，竟然個個心口如一，而且唯有他們方可以完成指標。

長年累月，官方的曆書上愈發煞有介事地編列出無關宏旨的事件，則真正的歷史一旦爆發起來，就愈發不可理喻。那時候，所有長久壓抑的可一不可再、出乎意料的成分，所有從來沒人承認過的奧秘事物，全都從缺口裏湧將而出。這麼多年來我們連最平常的一點點可驚可嘆的事都給人剝奪了去，但現在，生活就大大地教我們意想不到——即使感到意外，還是覺得不枉此刻。歷史的狂野不羈好些年來給隱蔽在人為的秩序下面，突然間迸發出來了。

這情況我們多麼熟悉！我們有多少次親眼看見這種事發生在我們的世界裏！多年來彷彿作得完美無瑕的機器，沒出過半點亂子，卻一夜之間垮下來了。這個制度看樣子大權在握，百世不衰，彷如無止無終的世界，在全民一致的選舉中找不出任何異議的聲音對制度權力表示不服。但是，這個制度沒有發出半點先兆，就一下子粉碎了。我們遂錯愕地發覺，原來一切都和原先所想的大有出入。

這一場龍捲風，席捲冥頑不靈的權力架構，把發霉的地方通通掃去。這個時刻，對我們這些身處權力壁壘之外的人來說，當然遠不是鬧着玩兒。因為我們不管如何間接，也總會置身其中。長久以來靜靜地在那兒的生活壓力，社會上各種不斷遭到抗拒但始終無法抹殺的要求和利益，衝突和張力，常常就是這些東西動

搖了權力的基礎。可不是嗎？難怪社會總是在這樣的時刻甦醒過來，並對這個時刻無限眷戀，無限警覺，還興奮得要趁此良機大顯身手！幾乎每一次，這樣的震顫都會給人帶來一些希望，或者恐懼；教人去開創機會（或表面上開創機會），讓生活裏頭各種衝動和雄心都有用武之地；替社會上形形色式的運動加一把勁。

不過，幾乎每一次，權力由於動搖而和生活正面衝突，來得並不自然，因此出現很多無法逆料的風險。

我再試闡釋這種風險之一。

關於屈辱和激情

如果一個人每日默不作聲地聽取一個無能的上級的命令；如果他每日莊嚴地參與一些他私下覺得是荒謬的儀式；如果他毫不猶豫地不按他的真實意見填答問卷，並準備在公眾場合否認自己的立場；如果他對一些本來只覺漠不關心或反感的東西，假裝同情或甚至好感；這種種都不能表示他已完全喪失人的基本感覺之一：屈辱感。

相反，人們雖然並沒有宣之於口，其實，他們對外表的和平和緘默所付出的代價非常在意；這代價是對他們人類尊嚴的一種永久侮辱。他們可能將事情忘記以令自己好過一點，可能自欺欺人說這樣是無傷大雅的，或是只懂咬牙切齒——他們對此愈少直接的反抗，這經驗在他們的記憶中則更是深刻。能够抵抗侮辱的人可以很快把它忘掉，但能够長期忍受侮辱的必會將之永載心中。事實上沒有事情是被忘掉的。一個人忍受的所有恐懼、被迫潛伏的所有感受、所有痛苦而墮落的愚蠢行為、以至相信是最差的表現懦弱的行為——這些全都在我們的社會良知深處結集積聚，並靜靜的在醞釀。

顯然，弄至這田地，一點也不健康。腫毒要不清除，就會化膿。膿液不能排出體外，病毒就會蔓延全身。人自然而生的感情

要是不抒發出來，長久抑鬱在心，就會慢慢演變成絞痛難當的痙攣，像燃燒過程不徹底時所產生的一氧化碳那樣，逐漸成為毒素。

故此當地殼裂開而生命的熔岩湧出之時，湧出的不只是深思熟慮的改正錯誤行動，不單是尋求真理和回應生活需要的改革，還包括壓抑的仇恨、復仇的憤怒，和對尋求即時償還所有忍受的屈辱的一種狂熱（這種狂熱常以衝動和不受約束的形式出現，因為人們隱約覺得整個爆發來得太遲了，已喪失了意義，令它不再有任何的即時動力或直接危機，而只成為某些應在另一時空發生的事情的代替品）。這是不足為怪的。

同樣地不足為怪的是，那些多年來習慣了絕對服從、一致而毫無保留的支持，和偽裝完全統一的當權派，對此時刻這被壓抑的情緒的爆發感到非常震驚；他們覺得正面對一種聞所未聞的威脅，而由於他們假定自己是世界生存的唯一保衛者，他們將這威脅視為對全世界的威脅，故此他們毫不猶豫便召入外國士兵以保衛他們及全世界。

我們在不久之前曾經歷了一次這樣的爆發。那些多年來一直羞辱人民，而在那些民衆嘗試提出自己的聲音時感到大為震驚的人，現在把整件事說成是「激情的爆發」。天，爆發了的是甚麼激情？所有知道在爆發之前的漫長的屈辱及明白對這些屈辱的反應的社會心理機制的人，應該對這「爆發」的相對平靜、客觀和實際上是忠誠的形式，感到更加驚奇。然而，如眾周知，我們須為那個「真理的時刻」付出殘酷的代價。

今天在位的當權者和在這爆發之前的那批有很大的不同。後者是所謂「原來者」，他們的繼承人只是徒具形式，而原來者舊日的魔力也消失殆盡；但這並非主要的原因。早前的領導人有着一個真正而不可忽視的社會基礎，從部分人民獲得真正的支持，雖然這支持正逐漸下降；這些領導人透過他們本來承諾的社會福

利，也獲得同樣地真正而不可忽視的吸引力，雖然這種吸引力也逐漸消失。而今天的政權卻純是建基於掌權的極少數的自我保護本能，和被統治的大多數的恐懼之上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預計一個未來的「真理的時刻」的所有可能情節，預知整個社會那複雜而不經掩飾的墮落如何可討回補償；而我們更不怎麼可能估計，當這個時刻一旦來到，會為我們這兩個民族帶來（或是必然帶來）多大和多深刻的悲劇。

在這情況下，一個政府，只願吹噓自己是有史以來最科學化的，卻連自己本身運作的基本規律也茫然無知，連自己過去所取得的教訓也不能引為鑑戒，真令人覺得震驚。

我已表明了我並不害怕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陷於停頓，或是歷史由於現在的領導層掌權而暫停；每一個處境都是歷史，而每一個時代之後都有一個新的處境和一個新的時代。不論好歹，這些新處境和新時代跟前一時代的計劃者和掌權者的期望都相去甚遠。

我害怕的是另一些事情。這整封信實際上都是關乎我真正害怕的事情——現行各種嚴重惡習對我們的民族造成的毫無意義而又深遠的惡果。我恐懼的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為對歷史的激烈鎮壓、為不必要地將生活禁制以使它躲進地下和人們的靈魂深處、為社會最近被強迫「延誤」任何可以自然地生活的機會而付出代價。或許我不久前寫的東西已清楚表明，我擔心的不只是我們現在每天付的款項——對社會的被搶掠和人類的墮落而每日承受的痛苦，也不是持續的社會精神和道德淪亡這繁重稅項；我關懷的並包括當生命和歷史要討回老本時，我們所要付的難以計算的額外附加費。

一個政治領袖對他國家的情況需負責的程度當然因人而異，而明顯地這責任也從不會是絕對的。政治領袖從不會獨個兒統治，故此在他周圍的人應承擔某些責任；沒有國家孤立地生存，

故此國家的政策往往受其他國家的政策影響；前任的領導人也有很大責任，因為他們的政策先決了現在的處境；公眾也有很大的責任，因為每個個人的日常決定都參與締造了整個社會狀況，而人們集體作為一個社會歷史的整體，受着環境的限制，也同時影響着環境。

這些限制自然適用於我們現在的情況，但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你的責任仍然是重大的。你協助決定我們必須生活於其中的氣候，故此你可以直接影響我們為今天的“鞏固”過程所付的帳單的大小。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和其他民族一樣，懷有各種各樣的潛能；我們曾經有、現在有、將來也仍然會有我們的英雄，並同樣地有着我們的告發者和叛徒。我們可以釋放我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把我們的精神和道德提高至意料之外的水平，為真理而鬥爭以及為他人而犧牲自己。但我們也同樣可以完全地漠不關心，可以除了我們的肚子以外對任何東西都不感興趣，可以把時間花在互相陷害之上。雖然人類的靈魂並非一些可以倒任何東西進去的瓶子（注意官方發言中常見的那可怕語句——「我們」——即「政府」——發覺某某思想「正被灌輸進人們的腦袋中」——的狂妄含意），在我們的社會中，何種潛能會被准許發揮，以及何種會被鎮壓，始終視乎政治領袖的決定。

到目前為止，我們被有系統地引發及擴展的是我們最差的素質——自我中心、偽善、冷淡、懦弱、恐懼、順從，和不顧後果地希望逃避所有的個人責任。

但縱是今天的國家領導人也有機會去以政策影響社會，以鼓勵並非最壞而是較好的方面。

到目前為止，你和你的政府選擇了一條對你們自己容易而對社會卻最危險的路：為了外表而令內在腐化的路，為了增加一致性而扼殺生活的路，令我們國內的精神和道德危機深化的路，為

了保障你們自己的權力這可鄙的目標而令人類尊嚴不斷破損的路。

但縱是在這已有的限制下，你仍大有作為，至少可以相對改善現況。這條路會是較為吃力和較難有收穫，它的好處不是即時和明顯可見的，並且會到處遭受阻力；但從我們社會的真正利益和前途來看，這條路是更有意義得多的。

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個公民，我在此公開地要求，你和現政權的領導人嚴正地考慮我嘗試引起你注意的事情，以及考慮你的歷史責任，而作出相應的行動。

馬嶽 徐昌明 譯 李金鳳 校

本文寫於 1975 年 4 月 8 日，在捷克地下流通，後收入《活得磊落》（*Living in Truth*, Faber and Faber, 1986）

無權勢者的力量

I

一個幽靈正在東歐徘徊，那就是西方稱之為「不同政見」的東西。這個不息的幽靈並非從天而降，而是那裏實行的一套制度必然會出現的東西。它出現的這個時候，那制度已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再濫用暴力去消滅一切不循規矩的行為。實際上，那制度已僵化得甚至根本無力切實剷除那種種異樣的舉動。

那些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的究竟是甚麼人呢？他們的思想淵源自什麼地方？有甚麼大不了？「持不同政見者」共同推動的所謂「獨立組織」又有甚麼意義？這些做法真的可以成功嗎？可以把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叫做「反對派」嗎？如果可以的話，這種制度下的反對派又可以起甚麼作用呢？他們做些甚麼事？他們在社會上有甚麼角色？他們期望甚麼？他們的根基在那裏？這些身處建制之外，當其二等公民的「持不同政見者」，真

有能力去改變社會的現狀和制度嗎？他們其實又可以改變些甚麼呢？

我認為，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弄通在這些無權勢者活動的環境中權力的性質，才能了解他們的力量有多大。

II

我們這個制度，很多時被稱為獨裁制度，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一個在社會及經濟各方面都受到齊一的壓制，並且受政治官僚統治的社會。但我懷疑，雖然「獨裁」這個字在別的地方很容易明白，但在試圖搞清楚我們這套制度的性質之前，它可能只會帶來更多的誤解。我們通常將獨裁這概念指稱一小撮以武力奪取政權，公然運用各種手段顯示威勢的人，人們很容易將他們和被統治的大多數區別開來。這種傳統或古典的有關獨裁的定義，最重要之處是假定了獨裁只是暫時和表面的現象，只會在獨裁者有生之年存在，它並沒有牢固的歷史根基，它的影響只局限在特定的地方，力量的最終來源是軍警和武裝力量之多寡，而與它以甚麼意識形態理據去為自己的統治建立認授性無關。對這種獨裁制度的最大威脅，就僅來自另一些武備更佳的人起來推翻它而已。

單從這個表面的考察，我們更清楚看到，我們這個制度，和古典的獨裁制並沒有很多共同點。首先，我們的制度已不局限於一個地方，而是在兩大超級霸權其中一個所控制的龐大權力集團中橫行。而且雖然集團內部也存在一些地域差異，但這些差異和變化基本上都受制於同一個框框。這種形式的獨裁不單在任何地方都建立在同一原理上，以同一個方式（亦即那個佔支配地位的超級大國所展示的方式）來建構，而且，每一個國家更墮進受超級大國的中央操縱擺弄的羅網，完全臣服在中央的利益底下。全球的核子均勢，更令這個制度具有古典獨裁制前所未見的表面穩

定。很多地區性危機若在別的國家爆發，也許會使社會制度改變，但在這個集團內，卻會以別國軍隊直接干預的方式告終。

其次，如果說古典獨裁制的特徵是缺乏歷史根基（它們往往是出人意表的歷史事件，由偶然的人，偶然的事帶來的偶然結果），我們這個制度就絕非如此簡單了。因為雖然我們的獨裁制很早以前已完全和那些促成它誕生的社會運動斷絕了關係，但這些運動（我指十九世紀那些無產階級及社會主義運動）的確給予它無可置疑的歷史基礎。這些來源為它的成長提供了強固的基石，直至今天，它已完全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政治現實，更成為當今世界結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一個歷史來源是，在那些運動興起的時候，它對社會矛盾具備了「正確的認識」。在這種所謂「正確認識」的核心，其實已內含了其後發生鉅大轉變的種子，不過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心。因為不管怎樣，這些東西都是在那個時代的歷史氣候萌芽的，所以可以說，我們的確可以從這段歷史找到這制度的起源。

第三，那些「正確認識」留下的一項遺產就是，它令得這制度一定會依據一種無比精確、容易理解、條理清晰，本質上又極其靈活的思想來指揮，使得它和其他現代的獨裁制不同。它的精緻全面之處，已差不多使它成為一種世俗宗教，對任何問題提供現成答案，你很難只接受它的一部分而不接受其他，而接受了它就更會對人的生活有莫大的影響。在我們這個已無法對各種形而上學和存在的問題提出正確答案的危機年代，人們感到無根、失落、把握不住世界的意義，這種意識形態無疑是具有醉人魅力的。對於前路茫茫的人類，它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歸宿，人們只需要接受它，轉瞬間，一切事情都變得清楚明白，生命有了新的意義，一切神秘、疑難、焦慮和孤獨都會一掃而空。當然，人們為這所廉價的歸宿，要付上高昂的代價，那就是要人放棄獨立思考、良知和責任。因為這套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要將理性和良

知付託予更高的權威。它最根本的一條原則，就是要將權力的中心體認為真理的中心（我們這裏的情況，和拜占庭時期的神權政治有直接的關聯：世俗最高的權威也就是神靈的最高權威）。要說在我們的集團內，意識形態已再不能感召人，相信無人會反對（可能俄羅斯是一例外，那裏農奴心態當道，對統治者盲目崇拜和附和的情形仍然流行，混合着超級大國臣民的愛國主義，將帝國的利益看成高於人的利益）。但這點並不重要，因為意識形態在我們的制度內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為意識形態就是意識形態（這是我下面會討論到的）。

第四，在傳統的獨裁制度中，運用權力的技術含有必需的即興因素。運用權力的機制大部分並非固定不變，意外的變數。任意和不受約束的力量，完全有發揮作用的餘地。各種社會、心理和物質的條件仍然存在着，使到某些形式的反對仍可存在。簡單來說，整個權力結構充滿缺陷，在能夠穩定之前便會破裂。但我們的制度在蘇聯已建立了超過六十年，在東歐建立了近三十年，這個制度的很多特徵更源自沙皇時期的專制主義。在物質權力方面，它建立了一個全面而複雜的機制，對全體人民進行直接和間接的操縱。事實上它是一股全新的物質力量。同時不應忘記，這個制度實行國家所有制，生產工具由中央控制，所以更為強大，權力結構有着前所未有的、不受駕馭的力量去自我擴張（例如在官僚架構和保安力量上）。作為唯一的僱主，它更可以容易地操縱人民的日常生活。

最後，如果說古典的獨裁制度總還有一點革命興奮的氣息，英雄主義的氣概，奉獻的精神，及夾雜着洶湧狂熱的暴力，那麼，在蘇聯集團內，這些氛圍已一掃而空。這個集團早已不再孤立於其他發展了的世界，作為一個不受外界影響的閉關之國，相反地，它已是世界的一部分，共同擔負並塑造未來的世界。具體來說，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念，同時也在我們的社會存在（長

期與西方共存只會令這變化更快)。換句話說，我們這裏只是消費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另一種形式，有着各種伴隨而來的社會、心理和思想上的問題。不明瞭這一點就不可能明白我們制度下權力的性質。

本文作者為了從權力的本質着眼，去訴說我們的制度和一向熟悉的那種獨裁制度最根本的不同之處，逼得要搜索枯腸地去找一個適合的字眼，我希望這種不同已在上面粗淺的比較中多少弄清了。我知道用「後極權主義」去指稱這制度不是最精確，但我想不出另一個更好的字眼。用「後」這個前綴詞，絲毫不表示它已不再極權；相反地，我是說它用與古典獨裁制度截然不同的方式去顯現它的極權性質，有異於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極權制度。

上面只界劃出那些讓後極權制度實際權力構造建立起來的條件和框架，下面我會逐點深入討論。

III

有一天，一個蔬果店的主管在其店的窗櫺中間，在一大堆胡蘿白和洋蔥中間，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究竟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他想向全世界傳達甚麼訊息呢？他真的這樣關心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否團結起來嗎？他的熱情真是如此高漲，要迫不及待讓公眾知悉他的想法嗎？他會有花過一分一秒去想過這個團結起來的過程是怎樣的嗎？他知道團結起來是甚麼意思嗎？

我想可以說，絕大部分售貨員從未想過他們掛在櫺窗裏的口號，也不會靠它們去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那張宣傳海報只是上頭分發，與胡蘿白和洋蔥一起送來給我們的賣菜大叔而已。他將它們放進櫺窗，只因為他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以及他一定要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沒有在

櫥窗放上適當的「裝飾」，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他這樣做是因為如果他要過活，有些事就一定要完成。這只是保證他過安居樂業，「與世無爭」的生活時，萬千小節的其中一項而已。

明顯地，賣菜大叔不會理會標語的內容；他不是為了使口號的想法被大眾認識而把它張貼在窗櫥內。當然，這也不是說他的行為就全然沒有意義，沒有動機，或者它的口號沒有傳遞任何訊息。口號的而且確是個符號。作為一個符號，它包含了一種超凡但又特定的意義。簡單地可以這樣說：「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裏，我懂得做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裏過活。」當然，這個訊息是有一個收訊人的，那就是賣菜大叔的上頭。同時，這是一個保護賣菜大叔不受打小報告的人所害的安全罩。因此，口號的真正意義，深植於賣菜大叔整個人的存在。它反映了他生死攸關的利益所在。不過，那又是甚麼生死攸關的利益呢？

我們試想：如果賣菜大叔被指示要掛起這句口號，說「我怕得要死，所以不敢多問，絕對服從」，他就不會對內容漠不關心了，雖然這句話反而說出了實情。如賣菜大叔真要把這樣一句說出他墮落苦況的率直說話展示出來，他就會非常尷尬和羞恥。這樣是很自然的，因為他畢竟是人，人總有自己的尊嚴。為了克服這種困擾，他惟有借助一種標記，至少藉著文字表面，以求展示某種程度的冷淡信念。這方式一定要容許賣菜大叔說：「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是件壞事啊！」因此，那符號就讓賣菜大叔隱藏了自己忠順的最根本動機，同時亦將權力最深層的根基埋藏起來。它將這些都掩蓋在一些更高更大東西的外殼底下，而這些更高更大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就是人與世界關聯起來時，一種似是而非的方式。

它給人提供了一種有關身分、尊嚴、道德等的幻覺，但又同時令人更容易遠離這些東西。作為一些裝載「超於個人」的客觀事物的百寶袋，它使人不斷欺騙世界，欺騙自己，收藏自己的良知，掩飾真正的立場，以及厚顏無恥的妥協。那是最便捷的也是最有面子的做法，使上天下地各方面的東西看起來都合理，對人如是；對神也如是。它是一塊面紗，人人可以用來遮掩其「墮落的存在」，及庸碌苟且，安於現狀的心態。下至那位害怕失去工作而呼籲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賣菜大叔，上至戀棧權位，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高幹都可以借用。因此，意識形態首要的辯解功能就是為同時作為這個極權制度的犧牲者及支持者的人們提供幻想，令他們以為這制度和人性的秩序及宇宙的秩序和諧一致。

獨裁制度愈小規模，而社會因現代化過程而形成的層級化程度愈低，獨裁者就愈容易直接行使其意志。換句話說，獨裁者可以直接運用差不多是赤裸裸的紀律和控制手段，而毋須由宇宙的大道理到如何為自己辯護都要繁瑣囉嗦地搞一遍——不過這卻是意識形態要做的工夫。當權力的機制愈趨複雜，它所駕馭的社會更龐大，更多層級，制度運作的歷史愈長，那人就更需要從外面來和權力機制打交道，而訴諸意識形態的藉口亦更為重要了。它好像成了人民和政權的橋樑，政權透過它靠近人民，而人民亦以此靠近政權。這解釋了為何意識形態在後極權制度中有這麼重要的角色：由各個單位、層級、傳送帶、間接的操縱工具，以千百種形式去保證政權的整合。這套龐大機器不容有任何差池。如沒有意識形態去為全體開脫，為各部分找藉口，那簡直是不可思議。

IV

在後極權制度的目標和生命的目標之間，存在着雲泥之別：

當生命本質上已邁向多元、多樣、自主和自管，簡單地說就是邁向實現自身的自由時，後極權制度卻要求順從，齊一和紀律。生命努力去創造嶄新的和「不常見」的制度，後極權制度卻設法將生命變得刻板無味。制度的目標展示了它內傾的本性，不斷全面和毫無保留地為自身而運轉，也就是使制度的影響範圍不斷膨脹。制度只有在保證人民為制度服務的範圍內才會為人民服務，而任何超過這個範圍的東西，也即是那些使人越出預定角色的，就會被視為對體制的攻擊，因而每一個僭越的行為實質上是對體制的唾棄。因此可以說，後極權制度的根本目的，並不是像表面看來的要將權力保留在一幫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集團手裏。相反地，死抱權力不放的現象，實乃從屬於更為廣泛全面的那套盲目推動整個制度運轉的自動機制。對體制來說，無論一個人在權力的階序中佔有甚麼位置，他們都不是因為本身具有何德何能，他們其實只是那些用來為這體制添火加熱的東西而已。因此，個人的權力慾望，只能在不違反制度的自動機制運作，以機制的方向為馬首是瞻時才可以存在。

意識形態作為制度和個人之間一道由藉口組成的橋樑，銜接了體制目標和生命目標之間的鴻溝。它使制度的需要假裝成源自生命的需要。那是一個假象力求冒充成真實的世界。

後極權制度在每個方面都觸及人，但每次都帶上了意識形態的手套。這就是為甚麼在體制中的生命總是滲透着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的名義下被奴役，人的墮落被說成是人的最終解放，隱瞞事實叫做令真相大白，操弄權力去卡壓人民叫做權力掌在人民手裏，濫權無度叫做依法查辦，壓抑文化發展叫做百花齊放，擴張勢力範圍叫做支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變成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變成民主的最高階段，扼殺獨立思考變成最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變成兄弟友邦施加的援手。因為政權本身也受自己的謊言

所困，所以它一定要偽造一切。它偽造過去，偽造現在，偽造未來。它也偽造統計數字。它假裝沒擁有無孔不入，胡作非為的軍警力量，假裝尊重人權，假裝沒有逼害任何人，假裝不怕一切，它也假裝從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人們不需要相信所有這些玄妙，但就一定要表現得好像他們相信一樣，或至少一定要默許它們，和那些幹這些勾當的人保持良好關係。無論如何，由於這個原因，人們一定要在謊言中生活。他們不用接受謊言，但他們接受了以謊瞞騙隱來生活，接受生活在謊言中，並且心滿意足。而正因為這樣，人們鞏固了這制度，充實了這制度，構成了這制度，以至就是制度本身。

V

我們說過，賣菜大叔那句口號的真正意義和口號的本文怎樣說並沒有關係。雖然如此，它的真正意義是很清楚易明的，因為那表達的方式實乃司空見慣：賣菜大叔要以政權可以聽到的方式去表白自己的忠順（如要這表白被接納，他根本別無他法），那就是接受規定下來的儀式，接受將假象當作真實，接受遊戲規則。但是，他在這樣做的時候，自己也變成遊戲中的一員，使遊戲能夠得以存在。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聯繫整個制度與個別個人之間的橋樑，那當人踏上這道橋的一刻，它同時也就成為制度與制度成員之間的橋樑。就是說，意識形態原初只充當心理藉口，（從旁）協助構成權力，但一旦藉口被人接納，它就成為權力內部的活躍因素，從內部起着權力體系主要的儀式性溝通工具的作用。

我們已討論過整個權力結構在物質上的相互扣連，但整個結構如無某種「形而上」的秩序將各個部分結合在一起，使他們聯結起來，用同一解釋事物的方法，使不同部分以相同的遊戲規則

運作，即提供若干規條，限制和法理根據，它是根本無法存在的。而這種形而上的秩序是權力結構的根本，它提供了整個結構的標準，整合了它的溝通體系，促成內部交往，傳遞訊息和指令。它好像一堆交通指揮燈號，為事物的發展構成形狀和結構。這套形而上的秩序保證極權權力結構內部的聚合力，它是黏合整個結構的黏合劑，維繫結構的原理，和執行紀律的工具。沒有這種黏合劑，這個極權結構就會瓦解，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混亂地互相碰撞，各為其是。整個極權權力的金字塔若果沒有這些把它黏合起來的東西，就會像發生原子內爆一樣，自行崩潰。

在幫助權力結構去解釋世界時，意識形態往往要從屬於體制的利益。因此，它很自然的會和現實脫節，建造一個假象世界，變成純粹是一種儀式。在那些公眾可以競爭權力和監督權力的社會，公眾同時也可以監視着意識形態如何去為權力辯護，因而在這些社會，會有一些改正的機制令意識形態不致完全和現實脫節。但在極權體制下，這些改正機制消失了，根本就沒有東西去防止意識形態愈來愈變得天馬行空，蛻變成一個假象世界，純粹的儀式以及一套不切實際的語言，和一個由儀式性符號組成的體系，用假的現實去取代現實本身。但後極權體制卻確已變成這個樣子。

不過，正如我們見到，意識形態同時也愈來愈成為權力的構成因素，它可以成為提供藉口，獲取合法性，取得內聚力的支柱。當另方面愈來愈明顯，也就是，當它愈來愈脫離現實時，它卻獲得了一股奇特但又真實的力量。它自己已成了現實本身。只不過，那是一個完全自足的現實，而在一些地方（主要是權力結構內），甚至比現實更有分量。慢慢地，進行這儀式的那套技巧要比背後的現實更為重要。現象的重要性已無法由現象本身引伸出來，重要的是看那些概念處身在意識形態脈絡的甚麼位置。現實不再塑造理論，理論毋寧在塑造現實。權力漸漸與意識形態靠

近，而非向現實靠近。它從理論中獲取力量，甚至完全依賴理論。自然地，這帶來一個自相矛盾的結果：不是理論，也不是意識形態去為權力服務，權力反而開始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像意識形態由權力那裏獲取了力量，它好像已變成獨裁者本身。因而好像是理論、儀式、和意識形態本身，作出一些決定去影響人們，而不是人們作出的決定影響理論。

意識形態成為權力內部一貫性和延續性的重要保證。在古典獨裁制度下，權力的繼承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覬覦王位者沒法為自己的認授性取得合理依據，因而往往要訴諸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但在後極權體制中，權力由一個人傳給另一人，由一個幫派傳到另一幫派，由一代傳到另一代，基本上都是例行公事。在選擇承繼人時，新型的擁立新君方法，就是要在儀式中取得合法地位，顯示他可以運用儀式，滿足儀式的需求，利用儀式，令自己在儀式中變得鬥志昂揚，威風凜凜。當然，在後極權體制中也存在着權力鬥爭，很多時比起開放社會要慘烈百倍，因為鬥爭是在幕後進行，不受公眾和民主程序監督（執政共黨更換第一書記時，有哪一次不至少將軍警力量處於戒備狀態）。但是這些權力鬥爭並不會危害體制的延續性和本質（如古典的獨裁制度那樣）。它最多可以使權力結構換班，但很快就會復原過來，因為黏合制度的東西——意識形態——絲毫沒有被動搖。不管誰代替了誰，都只能在一套共通儀式的框架和背景中改朝換代，但絕不可以否定那套儀式。

然而，因為這種獨裁是儀式性的，所以權力已變得沒有個性特徵。個人已幾乎在儀式中消失掉。他們由得自己隨風飄轉，有時甚至好像是儀式把人由昏黑混濁之境，帶去看見權力之光。在後極權體制中，在各級權力階梯之上，人們不是愈來愈為那些沒有個性、面貌的木偶，那些一唱百和，默守儀式和常規的奴才所

推擁而隨波逐流嗎？

那個自然而然地就會將人非人化，將人變得沒有面貌、沒有個性的權力結構，是那個自動機制的特殊產物，它已成為體制的根本。看來正是這套自動機制的強制要求，選擇那些缺乏個人意志的人來躋身權力結構。正是強制要求所需的空洞言辭，令只有空談的人才能掌握權力，以保證制度的自動機制可以繼續運轉。

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往往過分強調個人在後極權體制的角色，忽視了執政者雖然具備中央集權制賦予的無比力量，他們也只不過是制度內部規矩的盲目執行者而已。他們從不會也不能質疑那些規矩。無論怎樣，經驗再三告訴我們，這套自動機制，遠比個人意志強大。如果有誰具有更為獨立的意志，他就要好好地收藏起來，加以掩飾，以便有機會在權力階梯上往上爬。而當有一個人抓着一官半職，試圖開展自己的抱負，這個自動機制遲早都會以其巨大的慣性將他征服。他要不是被權力結構視為外星人而被排斥，就會被迫放棄一己的個性，向這個自動機制俯首貼耳，成為奴隸，跟前人和後人都沒有分別（例如我們可以想起胡薩克（Husak）和哥穆爾卡（Gomulka））。為了要裝蒜和遵守儀式，權力結構中最開明的人也要和意識形態打滾。他們從不可以將真相坦坦白白地公諸於世，他們往往最終也會將真現實和意識形態的假現實混淆起來（我認為1968年杜布切克（Dubcek）的領導層對當時局勢失控，就是由於這班人在極端的情況和最終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將自己從假象世界中抽脫出來而導致的）。

因此，作為內部溝通工具的那種意識形態，保證了權力結構的內聚力。在後極權體制下，它超過了權力的物質性，在一定程度甚至主宰着權力結構，保障其延續性。它是支持體制外部穩定性的重要支柱，建立在非常虛弱的基礎之上，它以謊言為本。它只有在人們都願意在謊言中生活才能發揮作用。

為甚麼我們的賣菜大叔會在商店櫥窗公開展示他的忠順呢？他在很多內部和半公開的場合不已展示足夠了嗎？在職工大會上，他不也按應做的投了票嗎？他也曾參與過各種勞動競賽啊。他就像任何一個良好公民一樣去投票，他甚至在「反七七憲章運動」上簽過名。為甚麼在這些之外，還要公開地展示他們忠順呢？更且，每日行經窗櫥的人，也斷不會駐足細讀，知道原來賣菜大叔認為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應團結起來。事實上，他們從不會細閱口號，也可以坦白說，他們根本視而不見。如果你問一個在店前停下來的婦人，她在櫥窗裏看見甚麼，她肯定會告訴你她今天有沒有見到鮮紅柿，但大概不會說她有沒有留意到有一句口號，更遑論口號說些甚麼了。

看來要賣菜大叔公開展示他的忠順並沒有意思，但畢竟這仍是有其意義的。人們雖然不理會口號，但因為這句口號也在其他商店的窗櫥、電燈柱、佈告板、住宅的窗口和建築物出現，可說是無處不在，所以他們也會跟着做。當然，人們不會理會那些細節，但人們是很留意這整個景觀的。賣菜大叔的口號只不過是這個日常生活大佈景下的小擺設而已，除此之外它又會是其他甚麼嗎？

因此，賣菜大叔一定要將口號放進櫥窗裏去，他不是希望別人讀它或被這句話說服，而是要和其他千百句口號，合組成這個人人都留意的景觀。當然，這個景觀有其不凡的意義：它提醒人們他們生活在甚麼地方，期望他們做甚麼，它告訴人們，別的人在幹甚麼。而如果 he 不想被排斥而陷於孤立，與社會隔絕，破壞遊戲規則，冒着喪失平靜、安穩生活的危險，他們自己也要做些甚麼。

那個對賣菜大叔的口號視而不見的婦人，很可能早在一個鐘

頭前在她辦公室的走廊上掛出一句類似的標語。她也多多少少是不假思索地就做，正如賣菜大叔一樣。她這樣做也正因為她活在這大景觀下，也留意這個景觀，而賣菜大叔也是這個景觀的其中一分子。

當賣菜大叔走到她的辦事處時，他也不會注意那句口號，正如她會對他的視而不見一樣。然而，他們的口號是互相依靠的：兩人都顯示出對此個人景觀的意覺，甚或可以說都在其規條的控制下。不過，兩者也同時有助於構成這個大景觀，因此他們也同時締造着那些強制要求。賣菜大叔和辦事處的職員都適應了他們生活的環境，他們也幫助造就這些條件。他們做那些一向做的事，那些將要做的事，那些一定要做的事。但同時——正因如此——他們首肯了那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他們服從某些特定要求，同時也就使這些要求延續下去。形象地說，沒有賣菜大叔的口號，辦事處職員的口號不會存在，相反也一樣。每一個人都提議其他人重複做一些事，每個人也都接受別人的提議。他們對彼此口號的漠不關心其實只是幻像。實際上，每個人在展示自己的口號時，都在催迫着其他人去接受遊戲規則，因而鞏固了先前那要求人們展示口號的權力。每個人都幫助其他人服從，這是簡單不過的。大家都是體制要控制的對象，但大家同時都是體制的主人。大家是體制的犧牲品，也是體制的工具。

整個街道都張貼了那些沒有人看的標語，這一方面是街道黨委書記向地區黨委書記發出一項訊息，另一方面更是這個社會自動總體機制操作的示範。後極權制度一個本質特徵，就是將每個人都吸納到權力的範圍下，不是要他們意覺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要他們在體制的身分面前，放棄作為人的身分，成為體制自動機制的螺絲釘，為它自定的目標賣命，把他們拉來，誘來，為體制分擔責任，一如浮士德和魔鬼靡菲斯特一樣。他們更會因此而形成羣體壓力，迫使其他人民遵守這種規範。他們也會

因此學懂習慣參與這制度而依然心情暢快，甚至認同了它，就好像那是自然和無可避免的一樣。最終，他們會——在沒有外力催迫的情況下——自動監察其他不參與的行為，把它們看作離經叛道、狂妄自大、顛覆破壞、與社會為敵的行為。後極權制度就靠着將每個人都拉進其權力結構內，使每個人都成為一個相互構成總體中的器具，而這總體已成社會的自驅總體。

事實上，下至賣菜大叔，上至總理大人都參與其事，亦同受其奴役。不同級別的人只不過以不同程度參與：賣菜大叔的參與程度低，因而掌權較少，總理大人具有更大權力，自然泥足深陷。兩者同樣是不自由的，只不過方式不同已。真正的始作俑者不是某個人，而是制度。在權力階梯上，在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責任和罪咎，但沒有人要負全部責任，也沒有人可以將責任完全推諉。因而，生命目標和體制目標的衝突，並不是兩個分隔着的社會羣體間的衝突。將社會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大陣營，只是一種非常粗枝大葉的觀點（並且只是近似而已）。要搞清楚的是，這裏正顯現了後極權制度和古典獨裁制的最根本區別。在古典獨裁制下總還可以在社會階級之間劃出衝突的界線，但在後極權制度中，這條界線實際上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因為每一個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同時成為體制的支持者和犧牲者。因此，我們所熟知的這個制度，並不是一個由某一班人強加於另一班人頭上的秩序，而是一些滲透着整個社會，塑造着社會卻又無以名狀，難以把握的東西（因為它性質上只是一些原理而已）。整個社會體現了它，使它成為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徵。人類創造了，並正每日創造着這樣一個最深入地剝奪人的個性，一個會自我推動的制度。這並非出於人們對歷史的誤解，又或者歷史走上了錯誤的軌道。這制度也絕非一些邪惡力量，為了未知的原由，用來懲罰世人的方法。它之能夠出現，以及存在下去，正是因為在現代人性中，明顯地存在着某些令這制度產生，或至少容

忍它產生的趨向。在人類中間，肯定有些東西是和這制度相呼應的。那是一些在這制度容納了並得到反映的東西，一些存在於人心中，麻痺人的良知反抗力的東西。人們迫於生活在謊言之中，但他們之能被迫，是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可以用這方式生活下去的。因此，不能單說制度使人性疏離，相反，是疏離的人性在支持這個制度，作為自己不由自主地要獻身的偉業。它成為人性墮落的寫照，充作人們不能忠於自己的見證。

生命必不可少的目標自然地每個人身上存在，人心中也總渴望有人性尊嚴、道德良知、自由表達自己，以及追求超越當下存在的願望，但同時，每個人亦可以或多或少地與謊言的生活妥協。每個人多少都會褻瀆自己內在的人性，讓利慾薰心，混在羣眾背後，隨虛偽的生活濁浪同流。那並不單是兩種人性的爭戰，更嚴重的是它動搖了人有屬人本性的這個看法。

非常簡單的來說，後極權制度建基於獨裁制與消費社會的歷史交遇。人們廣泛適應謊瞞騙隱的生活、那個社會自動總體機制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橫行，難道不正是與以消費為取向的人們，不願以犧牲安穩的物質生活，來換取精神和道德良知的態度相關嗎？不正是與他們寧可放棄高尚情操，屈服於庸俗的現代文明，與他們受到大眾冷漠風氣的感染相關嗎？歸根結柢，難道後極權制度下生命的灰暗、空洞，不正是一幅現代生活的百態圖嗎？（雖然從文明的外表去比較，我們遠遠落後於西方）難道我們事實上不正好成為西方人的一種警號，把它們自身埋藏着的傾向暴露了出來嗎？

VII

我們試想在這麼一天，賣菜大叔突然變了，他不再為了討好自己而張貼那張標語，他又不去投票，因為他知道那是一場鬧

劇，他在政治集會上說出了心裏的話，他甚至有足夠勇氣去支援那些他的良知告訴他要去支援的人。在這一連串反叛當中，他由謊言的世界中走出來，他拒絕儀式，違反遊戲規則。他重新發現他被壓抑了的人性和尊嚴，他使自己的自由有了具體的意義。他的反叛就是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

不用多久，他就會為此而付出代價。他會被革除商店主管的職務，被調往貨倉工作。他的薪金會被削減，他往保加利亞度假的願望也要落空。他的上司會折磨他，他的工友也會猜疑他。不過，大部分施加這種壓力的人都不是因為內心的甚麼呼召，相反只是基於環境壓力而迫不得已，這些環境曾迫使賣菜大叔張貼標語。他們逼迫賣菜大叔，是因為職責所在，又或者要顯示自己的忠順，甚或僅是要成為大景觀的一部分，這景觀提醒人們要怎樣處理這些事，特別如果不想自己也成為嫌疑分子的話。因此，懲罰賣菜大叔的執行者的行為多少與常人無異，他們只是後極權制度的螺絲釘，這個自動機制的代理人 and 社會自驅總體中的小工具。

因此權力結構就可以透過這些不見經傳的代理人 and 體制的螺絲釘去執行這些制裁，將賣菜大叔流放。制度透過一種異化於人的存在，懲罰那些對制度的叛逆行為。這是制度的自動機制和自衛機能決定了的。

賣菜大叔並沒有犯任何特別的一項罪，不過他的罪咎更為嚴重，因為他破壞了遊戲規則，以及遊戲本身。他揭露了那只是一場遊戲，他粉碎了假象世界，也就破壞了制度最重要的支柱。他拆開了將制度凝聚在一起的東西，從而搞壞了這個制度，他打破了制度體面的外表，暴露了權力的真正基礎。他喊出了皇帝並沒有新衣，只是赤條條的一個。正因為皇帝的確是赤條條的，事情就變得非常危險：賣菜大叔以他的行動向世人訴說，令每個人都往幕後張望。他向每一個人證明了，人是可以活得磊落真誠的。

那個需要人生活在謊言底下的制度，如不能令謊言四處泛濫，它根本無法維持。謊瞞騙隱的原則一定要滲透和貫徹到所有地方去，它絕不可能和磊落真誠的生活和平共處。因此每個違反指示的人都在徹底地否定這原則，危害到整個制度的存在。

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只要當假象碰上了真實就會打回原形。當謊瞞騙隱的生活還未遇上磊落真誠的生活，揭露其欺騙性的眼界就不會出現。當另一種選擇出現了，它就會危及假象的存在，以及謊言生活的一切。同時，究竟這選擇佔有多大空間是不重要的：它的力量不在乎實質的東西，而在乎它對制度支持者以及其虛浮基礎的影響。簡言之，賣菜大叔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實質力量，只因為他的行動超出了自身，照亮了周圍，帶來無可估量的後果，他才成為制度的威脅。因此在後極權制度中，磊落真誠的生活不單有存在的意義（返回人性深處），或知性的意義（揭露事情原來的真相），甚至道德意義（成為他人的典範），它更有毫不含糊的政治意義。如果制度的支持者都生活在謊瞞騙隱中，磊落真誠的生活就自然成為威脅，所以它一定要被狠狠地壓下來。

在後極權制度中，廣義的磊落真誠有很特別的意義，那在其他地方是匪夷所思的。磊落真誠扮演着不同的（總是更大的）角色，成為構成力量，或乾脆叫政治力量的要素。磊落真誠的力量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呢？作為眾多力量的一分子，磊落真誠如何運作呢？磊落真誠的力量，如何可以以一種力量顯現出來呢？

VIII

人可以異化出來只是因為在人當中，的確有些東西可以異化。發生這種乖離現象的領域，正是人的至真至誠的存在狀態。所以磊落真誠的生活和謊瞞騙隱的生活是交織在一起的。磊落真

誠的生活是受壓抑的選擇，目標是達致真誠境界。而謊瞞騙隱的生活，卻是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中，虛與委蛇的回應。只有聯繫這點才容易理解謊瞞騙隱的生活，因為它正是由於這點才得以存在。深植在人性秩序中的謊瞞騙隱的生活，有着歉疚和虛幻的性質，它回應人對真理之嚮往。在謊瞞騙隱的生活井井有條的表面背後，隱伏着人生的真正目標，和對磊落真誠的渴求。

追求活得磊落真誠是一股獨一無二的，具爆炸性，而且威力無窮的政治力量，因為活得磊落真誠者，必定有一個不見經傳但又無處不在的盟友相伴，那就是一個隱蔽空間。安然地過磊落真誠生活者，其生命在這空間成長，生命在此細訴款曲，並在此覓得知音。溝通了解的可能性也在此中尋得。但由於這是一塊隱蔽之地，所以從權力的角度看，那是非常危險的地方。當在此中暗地滋長的東西冒出頭來的時候，往往出人意表，使體制大為吃驚，難以如常的掩飾補救，政權亦變得驚惶失措。

在後極權制度下，廣義的反對派之溫床就是磊落真誠的生活。當然，反對力量和當政者的衝突形式跟開放社會和古典獨裁制都極為不同。初始的時候，這種衝突並不在以權力手段高下的實際組織力量層次發生，而是在人的意識、良知和存在的層次上發生。這特殊力量的影響幅度不是用跟從者的數目、投票人數、兵員實力來量度，因為它散佈在社會意識的第五度空間，在那份生命的默默冀盼，在對人權和尊嚴的那份備受壓抑的渴求，在實現自身真正的社會和政治利益的願望中。因此，它的力量不在於特定社會政治團體的實力，而主要在於一種佈滿整個社會，包括官方權力結構內的潛在力量。這力量並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敵人供養的百萬雄師——那即是說，在於所有過謊瞞騙隱生活的人，終會（至少在理論上）在某一個時刻，為真誠的力量感召而揭竿而起（又或者有人出於自保本能而與這種力量妥協）。它可說形同一種細菌武器，在條件成熟時運用，就可不戰

而屈人之兵。這種力量不會參與任何直接的權力鬥爭，反而是要使人在存有的暗角體驗到其影響力。不過，隨之出現的隱蔽運動有時也帶來一些可見的影響，例如一些政治事件、社會運動、突然而來的社會不安、權力結構內尖銳的鬥爭，或乾脆地就是社會和文化氣候上一些不可逆轉的變化（至於何時何地，以何種程度，在何種條件下發生則難以逆料）。而正因為所有真正的問題和至關緊要的事，都給收藏在一層層厚厚的謊言底下，人們永不會知道何時會出現致命的一擊，以及這一擊是甚麼。這也正是政權為何總是要防患未然，像條件反射一樣將最不足道的追求活得磊落真誠生活的異動，都要消滅於萌芽狀態。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為甚麼會被流放國外？肯定並非因為他代表一股實在的力量；即是說，沒有任何當權者真的以為他可以推翻他們，取代他們的位置。他的被流放其實另有文章：就是要堵住那個可以帶來人們意識上翻天覆地轉變的真誠態度之泉，因為它可以在某一日拖垮政權。後極權主義的體制要嚴守的，就是以保衛假象世界的整合來保護自己。因為謊瞞騙隱的生活所依傍的，只是由一些古怪的物料做成的空殼。在它能將整個社會密封與外隔絕時，它就堅如磐石，但一旦有人在某處打開一個缺口，有一個人喊出了「皇帝沒穿衣！」，有一個人破壞了遊戲規則，將遊戲的實質揭露，每件事物就像會完全改觀，整個外殼就會形如敗絮，一碰就分崩離析。

我說的活得磊落真誠，並不是單純關乎概念思考的事，如知識分子的抗議或寫公開信等。它可以指任何人或團體反抗操縱的行動：由知識分子的公開信到工人罷工，由一場搖擺音樂會到學生示威，由拒絕在鬧劇般的選舉中投票，到在官方安排的大會上公開發言，甚或絕食抗議等都是。如果對生命目標的壓制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而且是要在多方面控制每一種生命的表達的話，依據同樣道理，每一個生命的自由表達都會間接地對後極權制度產

生威脅，雖然一些這類的表達方式，在另一種社會制度下根本微不足道，遑論有甚麼爆炸性威力。

布拉格之春往往被理解為在實際力量層次上，兩大陣營的對立：一邊是想維護現有制度的保守派，另一邊是想改革它的改革派。但人們常忘記了這場對壘，只是心靈和社會良知戰場上漫長鬥爭的最後一幕。而在這幕戲劇的開端，總是有某些在艱苦困頓中仍然力圖活得磊落真誠的人。這些人無權無勢，更沒有這方面的慾求。他們要活得磊落真誠的空間也不必是政治主張上的空間。他們可以是詩人、畫家、音樂家，又或者是那些能夠堅持人性尊嚴的普通百姓。今日，我們已難於指認出一個行動或態度，可以在甚麼時候，以甚麼方式隱蔽和迂迴地產生甚麼特定的影響，使我們可以追索磊落真誠的細菌，如何慢慢傳染到謊瞞騙隱生活的機體去，令它解體。不過很清楚的一點是，政治改革並非使社會覺醒的成因，反而是這種覺醒所造成的後果。

我想以下的經驗可以更好地說明這點。捷克七七憲章運動的一千位成員和後極權制度的對峙，如果我們用開放政治系統下的傳統眼光去看，它在政治上是完全無望的。這當然是實情。在別的地方，每一種政治力量的大小都以實力來衡量，從這種角度看，好像憲章運動這樣一個小黨派，根本就毫無取勝之道。但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在後極權制度的背景去看，那就全然不同。目前我們不能準確估量七七憲章運動的存在和工作，對開拓那個隱蔽空間，以及對重燃公民自覺和信心的影響。各種努力會否、何時及怎樣產生成果，例如政治上的轉變，就更言之尚早。但這已是磊落真誠生活的一部分。作為一個解決存在問題的方法，它將個人帶回一己本性最深層的地方去；而作為政治，那就等如將他們投進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因此，只有那些為了前者而寧可去冒後一種危險的人才會參與，另外就是那些認定今日捷克政治，捨此已別無救藥的人。其實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作出這種結論的

人，正是那些不願為了政治而犧牲掉一己本性的人，又或者是那些如參與政治就一定要作此種犧牲，他就寧可不相信政治的人。

後極權制度在實力的層次上愈徹底地將各種異己力量壓下去，將任何獨立於其自動機制的政治活動消滅，潛伏着的政治威脅就愈會把重心向存有的領域及先於政治的領域轉移。這每每是不用着意做的，因為所有反抗體制自動機制的活動，都自然地以追求活得磊落真誠作為它的出發點。而且，即使這些活動最後超越了追求活得磊落真誠的範圍（即意味它們已轉化成各種平行結構、運動、組織，開始被視為政治活動，對官方結構產生一定壓力，在實際權力的層次上有影響），它也會刻着其原來的印記。因此我認為，若果忽視了這個他們出現的特定背景，我們對甚至所謂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也是難以正確理解的。

IX

謊瞞騙隱的生活帶來深刻的人性危機，而這危機亦反過來為那種生活造就了條件。這箇中同時是一個道德問題。也就是說，除了其他，它還是社會上一個深刻道德危機的問題。一個為消費社會的價值體系所引誘，將一己的個性消磨在大眾文明的各種配備，在存有的秩序中找不到根，感受不到任何高於一己生存責任的人，正是一個完全非道德化了的人。體制正需要這種非道德化，並且在深化這個過程。而體制本身也正是這過程向社會各處伸延的產物。

相反地，活得磊落真誠就是一種重拾責任感的嘗試，一種人性對強加安排的反抗。換句話說，那明顯地是一項道德行動。不僅因為人們要為此付出高昂代價，最重要的還是那是只能問耕耘，不能問收穫的事。有時這種冒險會有一些補償，但也可能一無所獲，一如我上面說過，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很難想像

一個理智的人真會以為，今天的犧牲在明日一定會帶來酬報，那怕僅是一點安慰（說起來，權力場中的人毫無例外地會不斷以利慾動機，例如為名，求利，渴望權力等來醜化那些過磊落真誠生活的人，意圖將他們也捲進自己的世界，即那全面非道德化的世界裏去）。

如果在後極權制度中磊落真誠的生活已成為獨立政治思想的溫床，那麼任何就這些思想的性質和發展前景作的估量，都必須深入反思，把這道德領域視為政治現象（若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道德僅視為「上層建築」產物，妨礙了他們充分明白這事的意義，那將是我們這些朋友自己的損失。他們要恪守的世界觀，常令他們不能明白自己產生政治影響的途徑，使自己雖然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也成為「虛假意識」的奴隸，而這倒是他們對別人常有的疑慮）。道德在後極權制度下特有的政治意義，是現代政治歷史非常罕有的現象——下面會談到——可能有深遠影響。

X

1969年胡薩克上台後捷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無疑是七七憲章運動。但促使這個運動出現的精神和思想氣候，卻不是政治事件的直接結果。那氣候是由審訊名為「宇宙膠人」的年青搖擺樂家開始的。這場審訊並不是不同政治信念和力量的衝突，而是兩種不同理解生命的方式之間的衝突。一方面是後極權主義建制無能落伍的清教主義，另一面是寂寂無聞的普通青年人，他們玩他們喜歡的音樂，唱與他們生活有關的歌，自由自在，追求自尊友愛的生活。這些人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不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反對派活躍分子，也不是給權力結構清洗出來的前度政客。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機會去適應現狀，接受謊瞞騙隱的生活，不惹麻煩，安樂地過日子。但他們走上了另一條路。或者正因如此，他們的

事對每個未曾完全放棄希望的人都有特別的震撼。更且，在審訊進行的時候，一種新氣息浮現了，一洗多年來枯候冷漠的氣氛，及人們對各種反抗形式的疑慮。人們因「討厭沉悶」，不能再忍受停滯、沒有生氣、遊手好閒、守株待兔的生活。從某些方面看，那場審訊確是致命一擊。很多不同流派的人，突然強烈地感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在這之前，很多人彼此老死不相往還，不願合作，各自為政。但當時每一個人都知道，攻擊捷克地下音樂就等如對一件很基本很重要的事，亦即對「磊落真誠生活」，對生命的真正目標的攻擊。而那的確是將每個人都凝聚到一起的事。愛搖擺音樂的自由被視為一項人的自由，本質上和參與哲學、政治思考的自由、寫作自由、表達和保衛各種社會的政治利益的自由一樣。人們感到一種與青年音樂家患難與共的團結氣氛，他們知道無論彼此間找尋創造力的方式，以及對生命的態度有多大差異，但如果他們不站起來為他人的自由出力，那就意味着放棄了自己的自由（在法律前沒有平等就等如沒有自由，而沒有自由也就是在法律前沒有平等；七七憲章運動為這個古老的格言賦予新的和特別的意義，對現代捷克歷史有重要影響）。《六八》的作者斯萊布切克（Slabeczek）在一篇精采的文章中提出一個「排擠原理」，認為那是現代道德和政治悲劇的根源。這個原理在第二次大戰末期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間的怪異聯盟中誕生，後來愈發走向極端，但七七憲章運動在幾十年來首次克服了它。所有團結在憲章運動周圍的人，首次成為平等的成員。七七憲章不單是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的結合——這結合其實沒有任何新意，在道德和政治上絲毫沒有革命性——而是一個先天地向所有人開放的社羣，沒有人先天地處於次等位置，那就是七七憲章運動誕生的氣候。有誰又會估計到控訴一兩個藉藉無名的搖擺樂手會引起這樣深遠的影響呢？

我認為七七憲章運動的起源很好地說明了我上面討論過的那

點：在後極權制度裏，那些漸漸取得政治影響的運動，其背景多不是一些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力量或思想互相對峙的政治事件。大部分這類運動源自另外更廣闊的先於政治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謊瞞騙隱的生活」跟「磊落真誠的生活」發生衝突，後極權制度的要求和生命的目標產生矛盾。真實的生命目標自然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出現。有時候它們是一些人或羣體基本的物質或社會需要，在別的時候就是一些理性或精神上的利益；甚或是一些更基本的存在要求，例如對生活尊嚴的渴望。這些衝突之具有政治色彩並不因為那些要表達的要求具有政治性，而僅因為後極權制度是建基於，並有賴於對每一個行為和表達進行複雜的控制。因此每一次的自由行動，自由表達，也就是磊落真誠的生活，一定會變成對制度的威脅，成為百分百的政治行動。任何期後自這些「先於政治」的領域發展出來的政治運動，都只是派生的。它們只是在與制度不期然產生衝突後才得以壯大和成熟，而不是開始時就有一套政治綱領或野心。

1968年的事件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那些試圖改革制度的共黨官員並不是一朝醒覺而提出改革計劃，而是因為不少社會生活範圍產生了持續增大的壓力，這些壓力按傳統的理解是與政治無關的。事實上，他們只是以政治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存在於社會各領域，每日生活都接觸到，很多人苦思良久，愈來愈表面化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即是體制的目標和生命目標之間的矛盾）。這些問題在全社會都引起共鳴，學者和藝術家們以不同的方式去探討這個問題，而學生就急切要找出解決辦法。

七七憲章運動的源起又證明了我剛才說，事物的道德方面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如果沒有不同羣體之間那種強烈的團結意識，沒有那種不能再讓事情如此下去的意覺，不感受到再不能害怕迫害，不計較在當下有沒有可見成果，也要公開地以集體方式發出真誠的呼聲，七七憲章運動的興起是難以想像的。帕托加（Jan

Patocka) 在臨終前寫道：「有些事情是值得為之受苦受難的」。我想這句說話並不只被視為帕托加的遺言，也是憲章運動支持者之所以擇善固執的最好解釋。

在外間看來，特別是從體制和權力結構看來，七七憲章是晴天霹靂般的意外。當然這不是甚麼晴天霹靂的事，但有這樣的想法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滋生這事的地方，是在那個事物難以追蹤、分析，晦明晦暗的「隱蔽空間」。當時要預測憲章運動的出現，其困難一如今日要預測它在未來的發展一樣。那種由隱蔽空間走出來衝破「謊言生活」衰殘外殼時常見的那種震盪力再出現了。一個人愈是為假象的世界所困囿，自然愈會大驚小怪。

XI

在後極權制度的社會，所有傳統意義下的政治生活都被取締掉。人們沒有機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政見，遑論搞政治組織。騰出來的空間，全由意識形態的儀式填補。在這個情形下，人們對政治事物的興趣自然消滅。獨立的政治思考就算存在也被多數人視為不切實際，天馬行空，是一種與日常生活無關的，讓人自我沉迷的遊戲，又或者是雖然可敬可畏但並沒有用的事，一來因為這全然是空想，二來也非常危險，因為政權對於任何朝這方向的發展都會絕不手軟。

但就算在這些社會，那些不放棄以政治為抱負，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力圖獨立思考，發表意見，甚至組織起來的人還是有的，因為那是他們一種過磊落真誠生活的嘗試。

有這些人存在並努力奮鬥是很重要，很有價值的。就算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都堅持進行政治思考。如果在那些「先於政治」的衝突中有這樣或那樣的實際政治動力出現，而又能及早適當地表述出來，增加其成功機會的話，往往都是多得這些「無兵

司令」們，在艱苦困頓的時刻，仍然堅持進行政治思考的努力。在適當的時候，他們可以以其思考的成果豐富這些力量。在捷克也可找到大量這些例證。在七十年代早期那個全然冷漠和士氣低落的社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進行政治活動，因而白白受苦的人，後來幾乎都成為憲章運動的活躍分子。在七七憲章運動裏頭，這些先行者在精神道德上的典範是受高度讚揚的。他們以其經驗和政治思考的成果豐富了這個運動。

但在我看來，這些從不放棄進行直接政治工作，永遠準備承擔直接政治後果的朋友，在思想和行動上有一個老毛病，就是對後極權制度這個社會政治現實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歷史意義認識不足。他們很少了解這個制度內權力的特殊性質，高估了那些傳統式直接政治工作的重要。更且，他們看不到那些「先於政治」的事物在政治上的意義，看不出它們是醞釀真正政治轉變的土壤。他們參與政治活動，或者說具有政治抱負，但卻常常偏重了人們政治生活中並不十分重要的地方。他們堅持的做事方法可能適合一些更正常的政治環境，因而不自覺地帶來一些陳舊的想法、習慣、概念和印象，用來應付這個全新的環境，並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些東西在當下環境的意義和實質，也就是它實際的政治含義，要做甚麼和怎樣做才有影響和發展潛力。因為這些人被權力結構排斥，不能直接地影響它（亦因為他們仍拘泥於那些多少是在民主或古典獨裁制下建立起來的傳統政治觀念），所以往往有一點與現實脫節。他們或會說，幹嗎和現實妥協呢？反正我們的意見是永遠不會被接納的啊。他們因此就將自己置身於真正的空想世界之中。

但正如我所說，在後極權制度真正具長遠影響力的政治事物，其來源和方式跟民主制度的都大有不同。假如大部分人對另一套政治模式和綱領，甚至自行組織反對黨等，抱着冷漠和疑慮的態度）這並非僅因為公民意識低下，失去「神聖責任」感，全

面的非道德化所導致的結果。這種態度其實也包含了一種健康的社會生活本能，就好像人們憑直覺也能感受到俗語所謂「舊物換新顏」，所以做事的方式也要徹底改變一樣。

近年在蘇聯集團國家內最重要的那些政治活動，起初——亦即在實質力量的層次上被察覺之前——都是由數學家、哲學家、物理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普通工人發起，而不是政治家所推動。很多「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背後的推動力也來自「非政治」性的行業。這些都不是因為他們比那些自命為政治家的人更聰穎，而是他們並不那麼為傳統的政治思想、習慣所囿，更能意覺到真正的現實，對於在不同環境下可以和應該做甚麼事更加自覺。

無可避免的是，不論再提出的另一套政治模式是多麼漂亮，它已不再可以呼召人心中的「隱蔽空間」，鼓動人民和社會，發揮真正的政治熱情。在後極權制度，政治是在另一個空間進行的。體制給人強加了繁雜的要求，與生命目標長期而尖銳地產生衝突引起了政治上不斷和殘酷的張力。那些生命目標包括：人們生活的基本需要、起碼的安寧、不受上司和官僚的壓迫、公安人員的監視、有權自由表達意見、發揮創造力、受法律保護等等。人民對於任何實質地觸及這些領域，聯繫到這些四處都會碰上的現實問題的見解，都會保持雪亮的眼睛。有關政治、經濟等安排的抽象理想大計，並不如這些問題之激發人們的興趣——這不單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成功機會渺茫，更因為今天人們已知道，愈是遠離具體「當下」的人的政治，愈是將眼界放在抽象的「將來終有一日」，就愈容易蛻化為新的奴役形式。生活在後極權制度的人已太清楚知道，他們能否活得像一個人，遠比一黨還是多黨，黨派怎樣界定自己，給自己封一個甚麼名字等問題重要。

放棄傳統政治概念和習慣的包袱，全面地將自己向人的存在世界開放，仔細分析後才作政治結論，這樣做不但在政治上更

為現實，從「理想狀態」的角度看，也是更有出路的做法。我會在另外一些地方詳細討論到，真正深遠和長久改變，肯定不能由某個傳統政治概念的勝利（假設它能勝利）所帶來。這些概念最終都只是外在，亦即屬於結構的或系統的概念。持久的改變於今更只能源自人的存在，來自徹底重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宇宙的關係。如果要創造一個更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比起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建基於人性和社會道德的深遠轉變。那是不能像設計一輛新車一樣去設計或引進來的。假如不是要新瓶舊酒，那必定要表達出生命如何改造自己。更好的制度不能立即保證有更好的生命。實情剛好相反：只有創造更好的生命，才能建立更好的制度。

我要一再聲明，我不是輕視政治思考和理論上的政治工作。相反地，我認為我們一向未能做好真正的政治思考和真正的政治工作。但是，當我說「真正」時，我是意想一種由傳統的政治框框中解放出來的思考和理論工作。那種框框只是從一個一去不復返的世界移植過來的（就算它可以回來，也不會為最重要的問題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正如很多其他政治勢力和組織一樣，第二國際和第四國際自然都可以在很多方面為我們的努力提供協助，但他們任何一個都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他們在另一個世界運作，是一些在全然不同環境下的產物。他們的理論概念我們或感有趣，甚或覺得有啟發性，但有一點很清楚的是，我們不能單靠認同這些組織就可解決我們的問題。將我們國家發生的問題放在民主社會政治討論的脈絡，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如，我們真的可以認真地談甚麼體制革命或是改良嗎？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環境，這是一個假問題，因為我們現時根本沒法做到任何一樣。我們甚至不清楚哪裏是改良的終結和革新的開始。從無數痛苦的經驗，我們知道，無論革命和改良都不能保證任何東西。我們知道，在我們生活的制

度下，無論根據某種信條，看來是「革新了」還是「改良了」，對我們來說始終都是一樣。我們關心的是能否在這制度下有尊嚴地過活，是制度服務人民，還是人民服務制度。我們用我們所有可用的方法，運用一切有作用的手段去奮鬥。那些沉醉在自己那套政治濫調的西方媒介，或會將我們的方法說成太過墨守規條、太過冒險、修正主義、反革命、資產階級、共產主義，或太左、或太右，然而我們對這些全都不感興趣。

XII

有一個概念經常引起混淆，因為那是由另一個全然不同的環境移植過來的，那就是反對派這個概念。在後極權制度下，究竟反對派是甚麼呢？

在一個擁有傳統形式國會制度的民主社會，政治反對派是指那些在實際權力層次上的一股政治力量（通常是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它們不是政府的一部分。它們提出不同的政治綱領，有執政的野心，而當權者亦承認並尊重其存在，視之為國家政治生活中一個自然的組成部分。它運用各種政治手段去擴展自己的影響，在共同遵守的法制軌道上爭逐政治權力。

除了這種形式的反對力量外，也有一種「議會外反對派」的現象，那總還是在實際權力的層次上組織起來的力量，只不過他們不依體制的規則活動，反而愛運用架構之外的手段而已。

在古典獨裁制下，反對力量也意指那些有另一套政治綱領的政治力量。他們合法地，或者在法律容許的邊緣活動，但卻不能在某些共認的規條範圍內爭逐權力。反對派這字眼也可用以指稱那些與統治者進行暴力對抗的力量，或者那些覺得自己已處在對抗狀態的力量，例如游擊隊、解放運動等。

後極權制度下的反對力量顯然並非以這種形式存在，那這個

概念究竟又有甚麼用呢？

一、 有時西方傳媒會用反對派來指稱那些身處權力結構內，但背後與最高領導人發生衝突的個人或集團。衝突可以是環繞某些觀念發生（但當然不會是很尖銳的那種），但更通常只是簡單地因為某些人渴望獲得權力，或對掌權者不滿等。

二、 反對派也可以指任何具有或能夠具有上述那種間接政治效果的力量，也就是使後極權制度中的一切感到威脅，也即是說實際上被威脅到的東西。從這點看，反對派其實就是任何想活得磊落真誠的企圖，它可以是賣菜大叔拒絕在窗櫺張貼標語的行動，以至自由地寫一首詩，亦即任何令生命的目標超出了制度所設限度的東西。

三、 但更常見（又是西方傳媒）的說法是，反對派就是公開表白不服從立場和批評意見，不隱藏獨立思想，以及或多或少自認為一股政治力量的人。在這個意思底下，「反對派」的概念大抵和「持不同政見者」的觀念是重疊的，雖然這個標籤被接受與否的程度不一樣。這不單視乎人們怎樣自視為一股直接的政治力量，及他們有沒有參與分享實際權力的志願，而更需要看他們怎樣理解「反對派」這個觀念。

我們可以再舉那個例子：起初七七憲章運動強調它不是一個反對派，因為它沒有提出另一套政治綱領的企圖。它認為自己有另一種使命。事實上，如果提出另一套政治綱領是界定後極權制度下反對派的性質，那憲章運動就不能被視為一個反對派。

不過，捷克政府一開始就將憲章運動打成公開地搞對抗的政治組織，並按此對付。這就證明政府是怎麼從我上面說的第二點去理解「反對派」這個字。它把逃避其全面控制，反對制度對個人擁有絕對權力的任何人都視為反對派——這對它們而言是很自然的反應。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反對派的定義，我們就一定得和政府一

樣，將憲章運動看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對派，因為它對依靠全面的謊瞞騙隱生活而存在的後極權制權力，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不過，當我們考慮七七憲章運動的個人聯署者看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反對派時，事情就不會一樣。我的印象是很多人是從傳統的，亦即在民主社會（或古典獨裁制）基礎上的意義去理解反對派這個字的，因此他們將反對派（甚至捷克的反對派）都看成一股不會拒絕參與實際權力機會的力量。儘管這股力量不是在實權的層次上，更不是在政府定下的框框內活動，但他們具備了不同的政治綱領，其支持者準備負起任何直接的政治責任。由於憲章聯署者是這樣去理解反對派，部分人（絕大多數）並不視自己為這類人。另外小部分人會這樣想，但他們很清楚在七七憲章運動裏頭，根本沒有這種意義的「反對派」活動的餘地。但與此同時，大概每個憲章運動的支持者都會很清楚後極權制度的特殊環境，由此知道不僅人權鬥爭具有獨特的政治力量，那些「純正」得多的活動其實也一樣。因此他們可以被視作某種形式的反對派。沒有憲章運動的支持者會反對在這意義下被稱為「反對派」。

有一種情況使事情更複雜。蘇聯集團的統治者多年來都用「反對派」去抹黑人，將它視為「敵人」的同義詞。扣上「反對派分子」的帽就等如說顛覆政府，危害社會主義（自然那是受帝國主義的指使）。這曾經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使人不敢以這個名號自封。再說，那只是一個字而已，實幹永遠比叫名號重要。

最後，很多人不喜歡這個字，是因為「反對派」一詞有貶義。這樣界定自己就要針對一個已存在的「立場」。換句話說，他們要透過當權者來界定自己，由政權的立場引伸出自己的立場。但那些一心只想活得磊落真誠的人，只想大聲說出心裏話，幫助同胞兄弟，想幹就幹，「心安理得」，平靜過活，自然不想被迫從否定的角度，根據別的甚麼去界定自己的正面「立場」，

將自己看成是反對甚麼的人，而不單就是他現在的自己。

顯然，在我們的境況下，避免誤解的唯一正確方法，就是在開始使用之前說清楚「反對派」及「反對派分子」的意思。

XIII

如果說由民主社會移植往後極權制度的「反對派」這個字，在差異如此大的環境下究竟意指甚麼，其實還沒有共識，那「持不同政見者」這個由西方傳媒選用的字，卻已普遍地被接受用來標誌後極權制度中一些特殊現象，這現象（至少其形式）是絕少在民主社會出現的。

究竟甚麼人是「持不同政見者」呢？

看來這字最初用以指那些蘇聯集團中一意要活得磊落真誠的人。此外，他們更須有下列條件：

一、 他們在非常嚴峻的規限底下，公開和完整地表達其不服從的立場以及批評意見，因而在西方變得知名；

二、 雖然他們在自己的祖國難以出版著作，亦面臨政府各種可能的清算，他們仍能以其不屈不撓的態度，在公眾甚至政府那裏，贏取一定的聲譽。所以他們實際上享有一種程度很有限而間接，但非常奇特的實際力量。這令得他們免受那最殘酷形式的清洗，如他們被鎮壓的話，至少保證了政府亦要承擔一定的政治煩惱。

三、 這些人批評的範圍，以及願意投身的事情，往往超越了自己有限的周圍或特殊的興趣，以追求更廣闊深遠的目標。因此他們的工作本質上也具有政治性，雖然每人將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看成一種政治力量就並不一致。

四、 他們以知識分子的追求為職志，也就是說他們是「搞文化」的，他們將文字工作視為首要的事，以致往往是他們唯一能

够掌握的政治手段。靠此引來關注，特別是來自國外的關注。這些人要活得磊落真誠的其他方式，要不是屬於一些只關乎一時一地的事，就是因為比起他們的著作時，這些都相形見拙，所以被外面的觀察者遺漏了。

五、 不管他們實際的職業是甚麼，西方人們談及他們的時候，多是因為他們作為一個有犧牲精神的人，又或者在其著作中有着批判性，或政治性的內容，而非因為他們在自己的領域內「實際上」做了些甚麼。從我個人的經驗知道，事實上存在一條無形的分界線——你自己未必願意，也未必察覺到，但只要你超過了這條線，他們便不會視你為一個碰巧也關心世事的作家，反而是一個偶然碰巧（大抵在餘暇時）才會寫劇本的「持不同政見者」。

無疑那些人都具備上述特徵，但要討論的只是我們應否用一個本質上是偶然特定的字眼去界定這一羣人，以至應否稱他們做「持不同政見者」。不過，反正人們都在用它，我們也無能為力。有時為了溝通方便，我們也用此來稱呼自己，雖然說的時候滿不是味道，充滿自嘲，甚至常要用括號將它註明。

或者這是時候去說清楚為甚麼「持不同政見者」不喜歡被人這樣看待了。首先，從字源學的觀點，這個字是有很多問題的。在我們的報刊上，「持不同政見者」就是那些類似「叛徒」、「賣國賊」的東西。但持不同政見者並不將自己視為叛徒，很簡單的是因為他們主要不是要攻擊或否定甚麼。相反地，他們只想確認自己作為人的身分，而如果他們有否定甚麼的話，那只是否定他們生活中異化和錯誤的東西，即否定謊瞞騙隱的生活。

不過這不是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這個字通常還意味着一種特殊職業，彷彿在一般的職業以外，還有另一種職業，專門對事情嘮嘮叨叨。事實上，「持不同政見者」只是物理學家、社會學家、工人、詩人，他們只是做他們覺得應做的事，亦因之而與政權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對他們來說不是刻意造成的，只是

由於他們有自己的思想邏輯、行為或工作而已（衝突往往來自他們多少不能控制的外在環境）。換句話說，他們並非故意成為專職的牢騷客，好像其他人立志做裁縫、金匠那樣。

事實上他們往往只在成了持不同政見者很久之後才發覺自己已經是這樣的人。「不同政見」的源起與追求慾望、名銜、聲譽等動機有很大的不同。簡言之，他們不是立志要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就算他們每天花廿四小時於此，這也不是一種職業，毋寧是一種存在的態度。更且，這也不是一種碰巧符合了上面所說的各種條件的人，一種有了「持不同政見」名銜的人才能獨家擁有的態度。有千百個藉藉無名的百姓也在嘗試活得磊落真誠，而更有千千萬萬的人希望這樣做但卻無能為力，因為在他們生活的環境，或許需要比那些已先行一步的人要多付十倍的勇氣。只從所有這些人中間隨便抽選幾十個，放他們到一個特殊類別中去，就會全然扭曲了整個圖象。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這會意味「持不同政見者」是一班知名人物，一些「受保護的品種」，他們容許做一些其他人不被允許的事，政府甚至可以利用他們來充作證明自己仁慈的證據。其二是這等如為一個假象作見證，說由於只有一小撮這些發牢騷的人，政府也不曾對他們做過些甚麼，因此其他人實際上是心滿意足的，否則他們也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啊。

事情到此還沒完結。上述分類法也無意中強化了一個印象，謂這些「持不同政見者」的目的，只是為着自己一班人的既有利益，彷彿他們和政府的整個爭論都只不過是兩班人的明爭暗鬥，與社會大眾無關似的。這個想法和「持不同政見者」的真正意義大相逕庭。實際上他們是以其他人的利益，社會整體的利益，也就是所有沉默大眾的利益為依歸。如果說「持不同政見者」真有甚麼威信，又或者他們雖然死不足惜，還不曾被人像消滅害虫一樣連根拔起的話，那絕非政府特別對這班人的思想敬畏三分，而

是因為當權者其實很清楚植根在隱蔽角落那股追求「活得磊落真誠」的潛在政治力量，也知道「不同政見」滋長及發揮影響的地方，正就是那人們日常生活的世界，每日都有生命的目標和體制的目標在產生衝突的那個世界（難道還有比七七憲章運動出現之後政府的行動能更好的證明這一點嗎？那時他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強迫全國上下去聲討七七憲章，那數以百萬計的簽名反而倒過來說明了誰對誰錯）。日常黨政和公安為免使人覺得政府害怕有另一股政治力量，並不會花大力氣去監察「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只是具有七情六慾的普通人，不過他們大聲說出了其他人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而已。我曾說，索爾仁尼琴的政治影響力不在於他個人擁有獨特的政治力量，而在於千萬個集中營犧牲者的經驗，他只不過是將之整理，傳送給其他萬千良善的人而已。

將一班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固定地劃為一種類別的做法，漠視了這類活動內在的道德性質。正如我們所見，「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出發點是平等，它建基於人權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再者，「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不是在波蘭的工人自衛委員會裏，支援那些不見經傳的工人嗎？他們不正是因此才成為「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嗎？那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由於走在一起支援那些無名的音樂家之後，才團結在七七憲章運動周圍嗎？他們在憲章運動裏，不正是和那些無名人物團結一起嗎？而他們之成為「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不也是因為這樣的行動嗎？這是個吊詭，一些人愈站起來支援其他人，他們就愈被一個字標誌着，令到他們與「其他人」分隔開來。我想，這會解釋清楚為何這篇文章裏把「持不同政見者」的詞語上劃上括號。

XIV

當捷克地區和斯洛伐克地區還是奧匈帝國一部分，捷克人和

斯洛伐克人在這個帝國的框架之外克人還不具備歷史、政治、心理及社會因素，去找尋自己的身分。馬薩力克（G.Masaryk）就提出過一個基於「點滴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綱領。也就是在現存的社會秩序底下，在廣泛的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中，進行誠摯負責的工作，啟發民族創造力和民族自信心。他自然將重點放在智育、德育等啟蒙和培育工作，以及生活上道德和人道的面向。馬薩力克相信，一個更有尊嚴的民族，一定要以人性作為立根點。而人性的首要任務就是為一個更人道的生活創造條件。在馬薩力克看來，應該以改造人作為改造民族精神境界的開始。

這個「為民族前途而奮鬥」的口號，深植在捷克社會。它在很多方面十分成功，並影響至今。雖然一些人曾利用這句口號來作為與政權勾結的藉口，但甚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真誠地堅持這個理想，它至少在某些方面帶來無可置疑的成就。如果沒有這些努力不懈的人，竭盡全力，忍受「活在謊瞞騙隱」之辱，負上最終為社會之真正需要發揮最大努力之重，情況會變成多壞是很難估計的。這些人正確的認為任何一點善的工夫就是對惡的政治的指控；而且有不少情況是值得堅持這條路線的，儘管這意味着放棄了進行直率批判的天賦權利。

不過，就算只用六十年代的情況來相比，今日要堅持這種態度將要面對更多局限。那些試圖按「點滴改良」原則工作的人，也漸漸發覺他們也要和後極權制度對着幹，面對一個兩難困境：要麼由一貫的立場倒退，淡化其誠懇、責任和骨氣，苟且偷安（這是大部分人的方式），要麼勇往直前，無可避免地和政權發生衝突（這是小部分人的方式）。

如果點滴工作這個提法的意思不是說要不惜代價，都要爭取在現存社會和政治結構內保存實力的話（在這情況下，那些遠離了權力結構的，就好像已放棄了「為民族奮鬥」的理想），那這說法就更會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根本不存在一套行為通則，告訴

我們清晰和普遍有效的方法，去決定點滴工作在那一點上會由「為民族前途」奮鬥變成「破壞民族利益」。但現在已愈來愈清楚，這種轉化的危險已愈來愈高，點滴工作愈來愈容易觸及底線，一旦超過了底線，為了迴避衝突就不能不出賣理想。

1974年當我受僱於一間啤酒廠的時候，我的直屬上司 S 君是一個釀製啤酒的老手。他為自己的專業才能自豪，熱切期望我們的啤酒廠釀造更多好酒。他差不多為工作貢獻出自己所有的時間，不斷提出改善生產的方法。他以為我們也和他一樣熱愛釀啤酒，這往往令我們尷尬。在社會主義鼓勵的那種懶懶散散，愛理不理的氣氛下，很難想像會有一個獻身工作的工人。

那間釀酒廠是被那些不在行，也不熱衷此道的人打理，他們只憑在政治上有硬後台而已。他們糟塌了這啤酒廠，不單沒有對 S 君的提議作出反應，反而對他愈來愈敵視，澆他冷水。最後情況愈來愈壞，S 君決定向管理人的上級上書陳情，解釋這間廠為甚麼成為區內最差的一間，以及指出了誰要負責。

他的呼籲可能有人聽到。那個政治上很有勢力但完全外行、憎惡工人、愛搞陰謀詭計的經理，很可能會被拉下馬。若採納了 S 君的提議，釀酒廠的情況也會獲得改善。如果這些都成為事實，那將會是點滴工作成功的好例證。不幸的是事與願違，那個同時是區黨委的酒廠經理有很硬的後台，在他的關照下，事情以對他有利的方式解決了。S 君的分析被視為「進行惡毒攻擊的毒草」，他自己被扣上「搗亂分子」的帽子，被開除出酒廠，調派到另一個完全不需技術的地方工作。在這裏，點滴工作碰上了後極權制度的銅牆鐵壁。S 君因為說了真話，越過了火位，違反了遊戲規則，使自己被驅逐出來，以被貶為二等公民，被打成敵人告終。他現在可以暢所欲言了，但已不能期望有人會聽得進去，他就因此成為東波希米亞釀酒廠的「持不同政見者」。

我想這個例子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我在上一部分談過

的：你不是因為某一天決定走上這條路而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反而你會因為一些個人的責任感，再加上很多複雜的外在因素，而被驅趕出現存架構，成為他們的對頭人。這件事由你想做好自己的本份開始，卻以被打成社會敗類告終。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的境況不能和奧匈帝國相提並論的原因。在栢赫（Bach）專制主義最惡劣的時代，捷克民族只有侯力錫（Karel Haulicek）一個被囚在布列桑（Brixen）的「持不同政見者」。今日，每一個街角都可以找到「持不同政見者」。

非難「持不同政見者」放棄了「點滴的工作」是荒謬的。「不同政見」不是和馬薩力克思想相對的另一個選擇，反而往往是這些工作的唯一結局。我說「往往」是要強調並非經常如此。我也不是說只有與現存制度對着幹的才是正人君子。況且，S君也有可能會勝利。反過來說，只因有人安份守己，還沒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而責備他們的態度，和把他們拿來作為教訓「持不同政見者」的例子同樣荒謬。「持不同政見者」只追求活得磊落真誠。我們是按個人的背景去判斷這種追求會將人帶往何種境地，而不是按某種行為的性質和好壞去判斷人的行為。所以無論上列任何一種態度，都和異議分子的整個態度相違背。

XV

賣菜大叔可以只藉着不幹某些事情來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他決意不再只因為害怕被房東告發而將旗幟掛在窗前，不再在那些弄虛作假的選舉中投票；不在其上司面前隱瞞己見，也就是說，他「僅僅」不再順從那些制度要他做的（這當然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一步）。但這一樣會有下文：他會漸漸超越單純為了抗拒操縱而作的自衛性反應，做一些更具體的事，表現出重新找到的生命的崇高責任感。例如，他可以組織賣菜同業，一起行動保

衛同行的利益。他可以寫信給不同部門，申訴身邊那些違法亂紀的事。他也可以去找一些非官方的文學作品，私下抄錄給朋友。

如果我所說的活得磊落真誠是所有這篇文章述及的「公民自立」、持不同政見者，或「反對派」運動中一個基本、具有存在意義（當然亦有潛在的政治意義）的立根點的話，那並不是說任何一種對活得磊落真誠的追求，都自動地成為上述的東西。相反地，從最終和廣泛的意義說，活得磊落真誠包含了廣闊的領域，其邊緣是很含糊和難以界劃的。那是一個充滿七情六慾，人生百態的領域。絕大部分人一直都藉藉無聞，其政治影響可能從不被察覺，或者除了一種所謂社會氣候或者氣氛之外，就沒有更具體的可說。很多這類的表達自始至終都是反對操縱的原始叛逆，亦即挺起腰板，活得像一個人那樣充滿尊嚴而已。

有時借助一些人的性情、原則、或職業，有時又借助一些偶然因素，例如特殊環境，私人關係，諸如此類無邊無際的無名領地，或會出現一些完整可見的力量，超越了「純粹」個人反叛，形成更自覺，更有系統，更有目的的活動。當磊落真誠的生活不再是對謊瞞騙隱生活的單純否定，反而以某種形式扣連起來，所謂「獨立的精神，社會及政治生活」就會出現。這個獨立的生活不能以清晰的分界線和生活的其他部分（「依賴的生活」）分割開來。兩類生活往往存在同一個人身上。然而，它最重要的地方是心靈的高度解放。在被操縱生活的汪洋大海中，它像小舟一樣航行，被浪濤拋動跌宕，但仍經常以磊落真誠生活的傳訊者一樣浮現，表達出備受壓抑的生命目標。

甚麼是獨立的社會生活呢？獨立生活的各種表現和活動自然是非常廣泛的，包括自學、自由創作、思考世界問題、溝通聯繫，以至各種各樣的自由心態、公民意識、獨立的社會自治組織等。簡單來說，就是使磊落真誠的生活態度得以彰顯、落實的領域。

所以，後來被視為「公民自立性運動」，「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及甚至「反對派」的，只是由獨立社會生活領域中浮現出來的冰山一角。換句話說，正如獨立社會生活是由廣義的磊落真誠生活發展出來，「持不同政見者」也是慢慢地由「獨立的社會生活」中滋長的。但一個重要分別是，如果獨立的社會生活，至少從外表上看，是活得磊落真誠生活的更高形式，我們卻不能由此而這麼肯定的說，「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一定是「獨立社會生活」的更高形式。它們只不過是其中一種表達方式而已。雖然它是更為明顯的方式，而且乍眼看來是最具政治性（及最表述得清楚）的顯現，卻絕不一定是最成熟或最重要的方式。從一般社會意義來說是這樣，從直接政治影響方面來說也是這樣。「持不同政見者」由於有了一個特殊的名稱，畢竟給生硬地與自己的母體割斷了。但把它與整個背景割斷實際上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只是背景的一部分，而且在那裏汲取活力的泉源。正如上面一向所說，後極權制度的特性是，那些在一時看來或自視為最具政治性的力量，未必是名副其實的。決定它有多大真正的政治力量，完全視乎整個先於政治的脈絡。

這樣說了又如何呢？我想正正是這樣：如果不首先考慮那些不一定是「持不同政見者」，但卻以不同方式參與獨立社會生活的人所做的貢獻，就根本不可能談「持不同政見者」究竟做了甚麼工作，以及有多少果效。那些人可以是只想隨心所願地，不受審查，不用為完成指派任務而創作的作家。當官方出版機構不再出版他們的著作時，他們就將之以地下作品（Samizdat）方式流傳。他們也可以是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所有從事獨立學術工作的人，如果不能透過官方或半官方的渠道發表其作品，他們也會以地下作品的方式流傳，或者組織私人演講、討論，或研討會等。他們又可以是私下向年青人教授國家學校禁授內容的教師，也可以是在職的，或者是被開除之後，仍然繼續自

由宗教生活的教士，以至那些不理會官方機構如何對待，仍然繼續自己工作的畫家、音樂家和歌手。它包括任何分享以及協助擴散這種獨立文化的人，包括利用各種可用的手段，表達及保護工人實際利益，還工會組織以真實意義，或者組織獨立工會的人，又包括那些敢於促使官員正視社會上腐敗不公現象，要求維護法紀的人，包括那些從他人的操縱把弄中掙扎出來，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價值標準生活的年青人。這樣羅列出來的清單是不會有盡頭的。

很少人會想到稱呼所有這些人做「持不同政見者」。但那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不就是和他們一模一樣的人嗎？那些活動不又正是「持不同政見者」所從事的活動嗎？他們不是以地下刊物形式流傳自己的學術著作嗎？他們不是寫詩、寫小說、寫劇本嗎？他們不是在地下的「大學」講授嗎？他們不是和種種腐敗不公鬥爭，力圖肯定和表達各階層人民真正的社會利益嗎？

在討論過「持不同政見者」原本的思想態度、內部組織及組成來源後，其實已從旁觀的角度走到探究他們實際做的工作，他們怎樣表達自己的想法，及這些想法會引導他們往何處去等。

首要的結論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活動領域，是人們如何嘗試創造和維持集中體現了磊落真誠生活方式的「獨立社會生活」，持之以恆，有意覺有系統地組織起來，恪守磊落真誠的生活態度。這大概是十分自然的事。如果磊落真誠的生活是人反抗體制異化壓力的立根點，也是任何獨立政治行為唯一有意義的基礎，更是「持不同政見者」精神中最內在深厚的力量來源，那就很難想像，除卻恪守磊落真誠的態度，過磊落真誠的生活，為生命的真正目標爭取空間外，「不同政見」還會以甚麼其他為基礎。

後極權主義體制全面地向人類進攻，人們只能孤軍作戰。所以「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很自然地只能以自衛性的運動出現，以保衛人類、保衛生命的真正目標，反抗體制的目標。

波蘭名為 KOR 的團體，正名是社會自衛委員會。「自衛」這個詞也為波蘭其他類似的團體採用，其實蘇聯的赫爾辛基人權監察組織和我們自己的七七憲章運動，本質上也是自衛性的。

從傳統政治的角度看，提出自衛性的綱領是可以理解的，雖然這看起來很低調、權宜，甚或根本很消極。它沒有提出新的觀念，新的模式或新的意識形態，因此它不是一般意義的那種「政治」，因為政治通常有提出「積極」綱領的含義，很少會只局限在為某些人保衛某些東西這麼簡單。

我以為，這顯示了傳統政治觀點的缺陷。後極權體制並不是特定政府所行的特定政治路線。它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一種複雜、深入以及長期的對社會的破壞，又或者說是社會的自我破壞。僅僅提出另一條不同的政治路線，冀求以更換政府來反抗這個制度，不單是不切實際，更是全然不對題，因為這根本搔不着癢處。問題已經不是甚麼路線、甚麼政綱出了毛病，而是生命本身的問題。

因此，維護生命的目標，維護人性，是一種更現實的做法，因為它與人們日常生活有關，可以由當下開始，更易普及，它同時（或正因為如此）也是更為透徹的做法，因為這才抓住問題的核心。

有時我們一定要走進苦難的深淵才能領悟真理，正如我們在天光大白下，一定要跑到井底去才能看見星光。我以為今日這些「低調」、「權宜」和「被動」的綱領——即「簡單」地保衛人們——在一定意義上（但不單單限於我們身處的環境）反而是最

恰當而又最積極的綱領，因為它迫使政治回歸到它唯一正確的立根點：個體的人，而所謂正確就是要避免所有舊的錯誤。在民主社會，對人類的摧殘並沒有那般明顯和暴虐，因而這個在政治上翻天覆地的革命還沒有到來，大抵要等待更壞的事情發生，這場革命的逼切需要才會在政治上反映出來。但在我們的世界，正因為我們身處的苦難，看來政治已經經歷了這場變革：政治思想的關切點，已不再是一個由自我救贖的「積極」模式所提出的抽象遠景（機會主義的政治自然地就是這個銅錢的另一面），而是人們悠來受到這些模式及其運作所奴役的情況。

每個社會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組織，但如果組織是為人民服務，不是人民為組織服務，人民就要解放出來，創造空間讓人們可以用各種有意義的方式自己組織起來。相反的，人們被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先組織起來（由永遠知道「人民需要」的人帶領），然後斷言人民已經解放了——這種貧乏的做法，我們有切膚之痛。

，很多囿於傳統政治思維的人，把「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純粹自衛性質看成弱點。那些人的角度看來，這些運動的綱領軟弱無力，但我正是把這看成是強處，超越了傳統政治。

XVII

在蘇聯集團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中，人們的自衛以各種保衛人權和公民權的形式出現，這些權利深植在各類文獻，諸如人權憲章、國際人權宣言、赫爾辛基決議以及各國的憲法中。這些運動要保護任何根據這精神行動而被控被囚的人，他們也持同樣的精神行動，反覆堅持要求政權確認及尊重人權和公民權，關注那些未能貫徹這些原則的地方。

，他們的工作是基於法治原則，公開活動，強調活動不單合

法，而且要將尊重法律視為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守法原則在蘇聯集團的「異議」團體間很盛行，雖然個別羣體之間，從沒在這點上有協定，然而它是活動的立根點和框架。但這帶來一個重要問題：在充滿濫權枉法的地方，真的這樣廣泛和自願接受法治原則嗎？

這種對守法原則的重視，基本上既反映了後極權制度的特殊情況，也是人們對這種特殊性有基本了解的結果。如果說歸根到抵只有兩條途徑去為自由社會而奮鬥——即合法手段和（武裝及非武裝）造反——那在後極權制度下，後者顯然是不合適的。當情況十分動盪，例如戰爭，或者當社會及政治情況都陷於白熱化，造反是對的。在古典的獨裁制剛建立起來，或者走向崩潰的時候，造反也是合適的。換句話說，當勢均力敵的社會力量（例如佔領國政府與一個爭取自由的國家）在實際權力的層次上互相對抗，或篡權者和被奴役的民衆壁壘分明，又或者社會陷入了公開的危機，造反也是合適的。但在後極權體制的情況下——除了在非常具爆炸性的情況，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情形恰好相反。那裏穩定、平靜，大部分社會危機只是潛伏地存在着（雖然那是更為深入的）。社會在實際政治權力的層次上並沒有尖銳地兩極化，而是正如我們談過的一樣，衝突穿透在每一個個人心中。在這情況下，造反的做法很少能在社會激起共鳴，因為社會給「催眠了」，沉睡在消費物慾的你爭我奪之中，全然消毀在後極權主義的體系裏頭（不單成為體系的一部分，甚且作為這個「自動機制」的載負工具）。任何像造反的事情都是不能接受的。社會上的人會將造反視為對自己的攻擊，不單不會支持，反而會更加偏向體制那一邊。在他們的觀點看來，體制至少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法治規矩。更且，後極權主義體制擁有一個史無前例地龐大而複雜的監視機制，直接和間接地操縱人們。任何反抗很清楚會走入死胡同，技術上也差不多不可能辦到。這些造反多

半會在真正有機會將想法付諸行動之先已被瓦解。不過，就算造反有可能，它也會變成只是少數幾個孤立個人的姿態，不單被國家（及超國家）權力這部巨大機器鎮壓，也會為社會所不容，雖然他們是以社會之名來進行這些對抗（這其實也正是政權及其宣傳機器要給「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扣上顛覆破壞罪名，說他們陰謀、非法，採用恐怖手段的原因）。

不過，這還不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堅持法治原則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於「持不同政見者」態度最深處的那種反暴力精神。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任何造反本質上都想用暴力去改變制度，但這往往帶來對暴力的迷信（一般來說，「持不同政見者」只會在極端的情況才贊成暴力，例如只能以暴力去應付的暴力，及當姑息苟且會實際上意味支持暴力，一如歐洲盲目的和平主義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了路那樣）。正如我說過的，「持不同政見者」很懷疑那種以為只有改變制度，更換政府（不理會甚麼方法）才能給社會帶來根本改變的政治主張，也很懷疑那種認為值得為改變（由於是「根本」的）而犧牲掉「不那麼根本」的，即人的生命的思想。對理論概念的尊重在此超過了對生命的尊重，這正是人性再一次遭受奴役的危險所在。

正如我所指出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抱剛好相反的看法。他們將社會制度的改變視為表面、次要、不保證甚麼的東西。因而這種面對具體的人，保衛他們的當下利益，遠離那些抽象政治遠景的態度，很自然地對各類型以「邁向美好將來」為名的暴力，抱有深深的反感，並且深信由暴力帶來的將來，實質上會比現存的情況還差，即是說這種手段會給未來留下致命的印記。不過，他們這種態度也不應被誤解為政治保守主義或溫和主張。「持不同政見運動」絕不是因為太激進而害怕以暴力推翻政權，反而是因為它不够徹底。對他們來說，問題實在埋得太深，已不能僅僅由更換政府或技術改革等的方法來解決。有一些忠於十九

世紀古典馬克思主義教導的人，將我們的制度視為一個剝削階級對另一個被剝削階級的統治，他們假設剝削者永不自動放棄權力，因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進行一場剷除這些剝削者的革命。他們很自然地會覺得，諸如為人權奮鬥的做法太過墨守法規、自我陶醉、機會主義、甚至是完全誤導，因為這只是一廂情願，以為可以在虛偽的法制底下和剝削者討價還價。但問題卻在於，他們不能夠找出任何人有決心去從事這場革命。結果就使得他們自己苦惱、疑惑、被動，直至冷漠，換句話說，他們正變成這個制度希望他們變成的樣子。這個例子說明了在後極權體制的環境下，人們由於機械地照搬另一個時代，另一個世界的意識形態而被誤導了。

當所有法律——特別是有關人權的一般法律——只不過是個空殼和假象的世界，只不過是埋藏着全面操縱的遊戲，縱使不主張暴力革命，也會懷疑向法制的訴求究竟有沒有意義。「他們甚麼都可以批准，因為反正他們會一如既往，為所欲為」——這是我們經常碰到的意見。以為「君子無戲言」而向那些所謂法律作訴求，但甚至小孩都知道，它們只有當政府喜歡時才有效力，這不最終也只是一種偽善嗎？那不是一種帥克（Svejkian）式的議會不合作派嗎？不最終又是另一種遊戲，另一種自我蒙騙嗎？即是說，墨守法規的方法真的可以和「磊落真誠的生活」的原則並存嗎？

要回答這問題，首先就要看看在後極權體制下，法典的功用是甚麼和有甚麼意義。

在古典獨裁制底下，統治者的意志是毫無制約地直接行使的，情況要比後極權制度嚴重得多。獨裁體制沒有任何理由要掩飾其權力基礎，或者隱瞞權力運作的方式，因此毋須多用法典去束縛自己。但後極權體制則完全沉溺在將一切事物都用一個單一秩序統合起來的夢想：在那種狀態下，生活完全浸透在規則、法

令、指示、常規、任務、規矩之中（但完全有理由說那正好是一個官僚制度）。這些常規大部分是作為後極權體制內對生活進行複雜操縱的直接工具，個人被化約為一個龐大機器中的螺絲釘，其存在意義就只局限於為這個機器運作。他們的工作、住房、遷徙、社會文化活動……一句話就是一切一切，都給盡辦法畜養起來，事先規劃、調節、控制。而任何從這個事先安排好的生活乖離出來的舉動，都會被視為犯錯誤、放肆出格或者無政府主義。飯館的廚師不能為顧客烹製特別菜色，因為他沒有從官僚機構中得到難求的許可證，歌手不能在演唱會中唱出新歌，因為沒有官僚的批准。後極權體制無可避免地產生出那張官僚作風的大綱，而每一個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纏繞着，不能逃脫。為了使這個原則貫徹到底，所有生命的表情達意和生命的目標都給拉扯到體制自身目標的精神，使體制順滑無阻，自驅自動地運作。

狹義來說，法典也以這種直接的方式為後極權體制服務，營造一個令行止禁的世界。不過，它同時會以另一種間接的方式起作用，在某些層次上，法律近乎意識形態，甚至有時更成為那種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一、法典就像意識形態一樣，為行為提供藉口。它以法律的辭令為權力的運作蓋上高貴的外衣，創造令人欣悅的假象，以為公義得到維持，社會備受保護，權力的行使被客觀地控制着。所有這些都掩蓋了後極權制度下法制的目標是要全面操縱社會的本質。一個對捷克生活所知不詳的旁觀者，如果單看其法律，就不會明白我們不滿的是甚麼。法院和檢察機關幕後受政治操縱，律師不能全力為當事人辯護，犯人實質上接受閉門秘密審訊，公安人員濫權和凌駕司法體系之上，引用法律條文中很多有意地含糊的地方，以及最根本的問題，即國家機關蔑視法律中有正面意義（公民權）的地方……所有這些都是旁觀者看不到的。他唯一的印象就是我們的法律跟其他很多文明國家的法律都不遑多讓，除

了諸如在憲法中列明一黨永遠專政，以及熱愛一個強大的鄰邦的條文，會顯得有點奇怪之外。還有，假如旁觀者有機會研究公安和司法「明文」規定的程序，就會發覺很多一般處理罪案的規條都有列明：逮捕之後一定期間之內就要落案起訴，發出拘留令也一樣有時效上的規定，起訴罪名要公告周知，被告可以聘用律師等等。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了藉口，他們會依法辦理。但實際上他們照樣會粗暴地毀掉一個年青年人的生命，只因為他抄錄了一本被禁作家寫的地下小說，又可能因為警察偽造了他們的證供（上至法官、下至被告，這已是眾所周知）。但這些全都在幕後進行。捏造的證供在起訴文件上不一定可以明顯見到，刑事法也不會排除被用於控告人抄錄被禁小說。換句話說，法律至少在某些領域只不過是一件外衣，只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而已。既然如此，為甚麼還要法律呢？因為法律和意識形態一樣，建立了個人和體制間的橋樑，令他們更容易進入權力結構，為權力服務。這些藉口讓人們欺騙自己，以為法律只是用來維護法紀及消除罪惡（如果沒有這些藉口，試想招募法官、檢察官、審訊員等會多難啊）。作為假象世界的一部分，法律不單欺騙了檢控人員的良知，也蒙騙了大眾，蒙騙了旁觀者，甚至蒙騙了歷史本身。

二、正如意識形態一樣，法律也是權力結構外儀式溝通的必要工具。法律提供形式、框架和一套準則讓權力施行。法律使體制的各個部分互相溝通、明白，並建立自己的認授性。它為整個遊戲提供「規則」，以它們的那套技術來駕馭一切。假若沒有這套普遍適用的儀式，使權力結構的不同部分粘合在一起，後極權主義制度的權力還可以運作嗎？權力結構中的重要位置愈是由壓迫性的工具所佔據，依法辦事就愈重要。如果沒有法官、檢察員、偵訊員、辯護律師、速記員，以及厚厚的檔案，又如果這一切不是用某些鞏固的秩序維繫在一起，以至沒有控罪中那看起來中性的第一百條條款，人們又怎會那樣容易不經不覺地就會因抄錄禁

書而被囚禁呢？當然在沒有法律及其一切附屬物的情況下也可以這樣做的，但這只會發生在如烏干達匪幫主政的短暫獨裁制中，而不會發生在一個文明大國，代表現代世界，強大穩定的禮義之邦。那不單是匪夷所思，更是技術上不可行的。沒有法律作為一種儀式性的聚合力，後極權主義根本不能存在。

把官樣文章、虛有其表、推搪狡辯等作用表現得最淋漓盡致的，當然不是法律中那些明文禁止國民做甚麼事，觸犯後又會根據甚麼而被指控的條文，反而在說明人們可以做甚麼，有甚麼權利等的章節，才會表露無遺。這些地方可說是名副其實的「一紙空文」。但就算如此，這部分法律對體制仍然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性，因為體制靠此在人民、在童叟、在國際輿論、在歷史面前建立起它整個認授性。體制不能一刻忽視這一點，因為他不能讓自己動搖自己意識形態的基本信條，這對其自身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剛才我們已討論過權力結構是怎樣被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其擁有的優越地位所奴役），否則就等如叫它自打咀巴，而支撐體制的其中一項重要支柱，亦即假象世界的完整性就會瓦解。

如果說權力結構內的權力運作就好像血液流過血管一樣，那些法典就像是鞏固着血管壁的東西。沒有了它，權力的血液就無法通暢，社會的肢體就會間歇貧血，秩序會瓦解。

那些堅持不懈地向法律——不單向有關人權的法律，而且向所有法律提出訴求的人，並不幻想法律在我們的制度下是另一回事。他們其實很明白自己的作用，正因為他們知道體制是牢牢地依靠法律那種崇高的面貌，他們更明白這樣的訴求有極重要的意義。體制不能沒有法律，除了假裝守法之外已別無他法，所以逼得一定要對這些訴求作出回應。要求維護法制就是一種過磊落真誠生活的行動，會在謊言的頂峰毀壞整個謊言的結構。這樣的訴求會一再使法律的官樣文章性質暴露於世，暴露於那些棲居在權

力結構的人面前。他們讓人關注事情的實質，從而間接逼使那些躲在法律條文背後的人去肯定它，為它樹立威信。沒有這些提供藉口的東西和這些溝通工具，以強化這個社會的血脈，他們的意志就不能在社會中流通。他們為了自己的良知，為了對外界保持形象，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作為體制內團結自保的機制），又或只不過為了害怕被恥笑在處理這些官樣文章時「藏頭露尾」，他們逼得要這樣做。他們別無選擇，因為他們不能放棄自己的遊戲規則，所以唯有更恭謹地對待這些規則。躲躲閃閃就只會破壞自己的憑藉，失去對溝通系統的控制。把法律看成只是一個偽裝，沒有可靠性，因而不屑向它訴求，實際上只會使法律作為偽裝和官樣文章的性質變本加厲，默許法律成為假象世界的組成部分，令那些利用法律佔便宜的人可以從容地享有這種（最虛偽的）藉口。

我經常看到公檢法人員在處理那些憲章運動的老手或一個大膽敢言的律師，以及案件受到公眾關注的時候（那時他們每個人都是具名的，不再受機器的無名性保護），會突然焦慮地留意那些儀式有沒有甚麼破綻。這並沒有改變在官樣文章之後是專橫力量這事實，但官員們的焦慮已給這種專橫力量的運行帶來制衡和框限。

當然這是不夠的，但「持不同政見者」態度的一個重要成素就是要從人的「當下」現實出發。它更強調持久不斷的具體行動——雖然這是不足夠的，只會紓緩個別無名人物的問題——未能提出一些在不明確的未來可行的抽象「根本解決方法」。這不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馬薩力克「點滴工作」方案嗎？但驟眼看來，「持不同政見者」的態度是和他們的做法大相逕庭的。

如果不談這種「君無戲言」策略的內在局限，這部分的討論是不完備的。問題出於：縱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法律都只不過是防止生活由好變壞時其中一種不完善、以至多少是迂迴的方

法。法律本身不能創造甚麼更好的東西。它的目的只是提供一種服務，其意義並不在法律本身。確立對法律的尊重，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更好的生活，因為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標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了法律和機構本身。我們可以設想社會有一套完備而具有威信的法律，但卻使人無法在其中生活的情況。反之，縱然法制不完備，執法也有漏洞的社會，卻也可以使生活過得去。最重要的是生活的質素，以及法律是幫助還是壓抑生活，而不僅有否被遵行（過分嚴格的法律規限往往對人的尊嚴有破壞性的影響）。開啟通往人道、尊嚴、富足、快樂生活道路的鎖鑰，不在於憲法或刑律本身，這些只指定甚麼可做，甚麼不可做，因而它們可以令生活更容易，也可以令生活更困難。法律限制一些事，容許一些事，懲罰一些行為，接受一些做法，保障一些東西，但法律不會為生活帶來內容或意義。所謂為「法制」而奮鬥就要將法律放在生活的真實境況去看。如果不將眼光放到生活的美善和苦難的真實面，不能和生命構成道德的關係，這些鬥爭遲早將會變成閉門造車，終至碰壁而嚐到苦果。不知不覺間，人變成旁觀者，單憑訴訟文件來判斷制度，一切都按章辦理，就心滿意足。

XVIII

如果「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基本任務是要為磊落真誠的生活而服務，亦即為生命的真正目標工作，而如果這又一定要發展成保衛個體及讓個體擁有自由、忠實生活（即維護人權、維護法制）的行動，那麼下一步要做的，即進入最成熟階段的工作，就是維克力夫·賓達（Vaclav Benda）所說的平行結構的發展。

當那些決意要過磊落真誠生活的人被剝奪了直接影響現存社會結構的機會，更遑論有機會參與，以及當人們開始創造一種獨立社會生活的時候，這種獨立生活就會以某種方式形成結構。有

時我們只會看見結構形成過程非常初步的跡象，有時又會看到結構已發展成熟。它們的出現和演進不能和「持不同政見」的現象分離，雖然它往往伸展到這個字所籠統指稱的領域之外。

這些結構是怎麼樣的呢？席華士（Ivan Jirous）是捷克個構思及實踐「第二文化」概念的人。他原先指反叛分子的搖擺音樂及精神上趨近反叛分子音樂團體的文學、藝術及演藝事態，但「第二文化」這字很快就被應用在整個獨立和受壓制的文化領域，包含藝術及其各種流派，和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第二文化」建立了基本的組織形式：地下書刊、地下演出、地下音樂會、研討會、展覽等等（在波蘭這一切都更為發達：甚至有獨立的印刷所及很多刊物，以至政治雜誌，除了碳紙複寫本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流通方式。在蘇聯，地下作品有一個悠久傳統，形式自然也很不同）。因此，文化是「平行結構」最高度發達的可見領域。當然賓達也考慮過這些結構在其他領域裏的原始萌芽形式，由平行的訊息網絡到平行的教育形式（地下大學）、平行的工會、平行的外交，甚至假設一個平行的經濟。在這些平行結構的基礎上，他發展出一個「平行邦國（Polis）」或平行國家的概念。又或者說，他在這些結構中，看出這種邦國的雛型。

發展到一個階段，獨立的社會生活和「持不同政見運動」就不可避免要建立起組織和機構。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除非社會的獨立生活受到徹底的鎮壓和取締，否則這個趨勢是會增大的，一種平行的政治生活也一定會出現。在某一程度上這種生活在捷克已經存在。那些或多或少地含有政治性質的團體會保持自己的政治色彩，互相交往和行動。

這些平行結構可以說是「磊落真誠生活」的最充分表現。「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支援和發展這些東西。它進一步肯定了，任何企圖抗拒體制的壓力，都起源自那些

先於政治的領域。平行結構就是一個讓不同的生活存在的領域，那裏生活與生命的目標和諧一致，生活的形式亦符合那些生命的目標。捨此之外，平行結構還會是甚麼呢？這些社會自我組織的嘗試，除了是社會某部分人努力掙扎，要社會生活變得磊落真誠，徹底擺脫後極權制度那種盲目自驅的性質，和它一刀兩斷之外，還有甚麼？這除了是人們用一種非暴力手段以否定存在於他們中間的體制，並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即自己真正的人性之上去建立自己的生活，還會是甚麼呢？這種趨向不是一再鼓吹將注意力回歸到真實個人的原則嗎？還有，平行結構並非先驗地從有關改變制度的某種理論觀點產生出來的（那裏沒有政治宗派），而是源自生命的目標以及真實的人真實的需要。事實上，所有制度的最終改變，如那些我們可以在這裏觀察到其萌芽狀態的改變，實質上都是由下面生長出來的，因為生命促使它們這樣做，而非因它們已走在生命前頭，發號施令來逼使它改變。

歷史經驗教訓我們，個人生命中任何真正有意義的立根點，通常都有着普遍性。換句話說，那不會是偏狹到只有小部分人才可以接觸及不能交流。相反地，它一定是向所有人開放，能夠預示一種全面的解決方法，因而不是只對個人自己負責的內傾和自足感，而是面向世界，和對世界負責。因此，將平行結構及平行邦國視為躲進小樓成一統，只想自己而對別的事漠不關心，退縮逃避和孤芳自賞的行徑是錯誤的。簡單來說，將它看成是小羣人的解決方法、與大局無關是不對的。這種想法一開始就將對他人的關懷和過磊落真誠的生活割裂，最終將之歪曲為只是「謊瞞騙隱生活」的一種複雜形態。這樣，當然不會看到那是個人和羣體的真正立根點，反而倒退到那種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誤解中去，以為他們只是一班特定的人，有着特定的利益，與當權者進行自己特定的，別人不可介入的膠葛。無論如何，至少在後極權制度下，平行結構中最高度發展的生活形式，最成熟的平行邦國

方式，也只能是為個人同時立足在「第一」的官方結構，與它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時才能存在，那怕這關係只是在他們的商店裏購物，用他們的錢，守他們的法。誠然可以設想的是，在平行邦國中，生命更根本的部分會顯得更有姿采，不過這樣一種的生活方式，作為一套綱領，誰說不會變成只是另一種每個人都要過的，精神分裂似的「謊瞞騙隱生活」？那不是證明了，如果人的立根點不是個「模範」答案，放諸四海而皆準，對個人也會失去意義嗎？帕托加時常說，責任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們會將它帶到所有我們去的地方，隨時隨地身體力行。這意味着責任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們一定要接受它，把它牢牢地在此時此地；在上帝安放我們的這個時空中抓着，無論是印度的靜修所還是平行邦國，我們不能借故他去，逃避承擔。如果西方的青年人常發覺退縮到印度的寺廟也不能為個人或羣體找到答案，那明顯地是因為，及只因為這做法缺乏一種普遍性，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退到靜修所去。基督教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它是一個讓我在此時此地出發的立足點，因為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運用它。

換句話說，平行邦國要指向超越自己的方向。它只有在成為深化個人責任，面向整體和為了整體，並為了這一責任不斷發掘出最有效途徑的方式，而不是藉此而找逃避這一責任的方式時，才會有意義。

XIX

在上面我已談過，磊落真誠的生活所具有的政治潛力，以及要預測這種生活的某一表達方式究竟會否，或在甚麼時候，以何種方式帶出真正的轉變，一定會遇上種種的困難。我亦談過，為這些事情作風險估計也是徒勞的，因為這些獨立的行動往往是一

種孤注一擲的賭博，至少起初是這樣。

不過，假若不去為這些工作對社會實際產生的影響作那怕是粗略的考慮，看看那種面向整體和為了整體的責任，怎樣可能（不是一定可以）在行動中實現，那這裏對「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工作所作的交待，恐怕會不大完備。

首先應該強調，獨立社會生活的整個領域，特別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當然並非影響後極權國家歷史轉變的唯一因素。在沒有這些運動影響下，潛伏着的社會危機可以在任何時間激發一系列的政治轉變，或會動搖權力結構，釀成或激化潛在的衝突，造成人事上、觀念上，或至少社會「氣候」上的改變，深遠地影響日常生活的氣氛，激發料想不到的社會不安，爆發不滿情緒。在集團中心的權力更替可以以不同方式影響不同的國家，經濟因素自然十分重要，而世界文明發展的大趨勢也同樣不可忽視。國際政治，另一個超級大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國際利益結構的改變，及我們集團所採取的立場等，是極其重要的領域，可以是徹底革新和政治變動的來源。雖然我曾說過，不應高估後極權制度下領導人物的重要性，但那些高層人物也不是沒有作用的。互為影響的變數這麼多，因此必須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放在這些背景，以及背景後的大脈絡中才可以看到其影響力。這種政治影響只是左右政治發展的其中一項因素（但遠不是最重要因素），它和其他因素之差異，僅在於其核心是從保衛人民的觀點去思考這政治發展的問題，以及如何將這種思考付諸實踐。

正如我們見到，這些運動的表面目標和方向常常是要影響社會，而不是影響權力結構，至少不是直接和立刻影響它。自立的行動向隱蔽的領域呼召，揭示出磊落真誠的生活是人和社會的出路。他們做的就是為擴展容納這種生活的空間而奮鬥，他們幫助人民建立信心，雖然這總是間接的。他們粉碎「假象」世界，暴露權力的實質。他們並不負起救世主的角色；他們也不是社會

「先鋒」，不是那些以為只有自己才洞悉一切的「精英」，其任務不是去「覺醒」那些「未能覺醒起來」的羣眾（這種誇誇其談的自我投射正正是那種全然不同的思考方法所具有的，那種思考方法以為獨擁某個「理想藍圖」的專利，因而有權將之強加給社會）。他們也不想領導任何人，他們讓每個人決定自己從經驗和工作中獲取些甚麼（如果捷克的官方宣傳機器將憲章運動人士描述為「自封自號的一伙」，並不說明他們真有甚麼「先鋒」式的野心，反而流露出政權自己的想法，將己度人。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批評意見背後都必然有取代其位之意，企圖「以人民的名義」君臨天下，這也正是多年來當權者自己為自己封的號）。

因此這些運動永遠只會作為社會一部份間接影響現存的權力結構。他們主要是要呼召社會的隱蔽角落，而不是如何在實際權力的層次上對抗政權。

我曾經指出其中一種實行的方法，即加強人們對法律的意覺及維護法制的責任。當然這只是廣泛影響的其中一個個別例子，讓人們感受到磊落真誠的生活的間接壓力，即由另一類價值，「另一類行為」和獨立的自我實現帶來的間接壓力。無論權力結構喜歡與否，都要對這些壓力作某種程度的回應，不過它的選擇只有兩個，要麼壓下去，要麼順應潮流。有時一種方法佔上風，有時又轉為另一種。例如波蘭的「地下大學」受到愈來愈多的壓制，「地下教師」被警察拘控。但與此同時，官方大學的教授們就不斷改善自己的課程，加入一些敏感、禁忌的科目，這就是「地下大學」施加間接壓力的成果。這些適應的做法有不同的動機，有的是「理想性」的（即人的隱蔽領域已接收到訊息，良知和堅持真理的意志給喚醒了）。有的是純粹功利性，即政權的求存本能逼使它們注意到思想的轉變，以及精神和社會氣候的轉變，從而靈活地作出回應。究竟那一種動機在特定時候佔主導，對最終結果來說就不重要了。

順應潮流是政權的正面回應，它原則上可以、事實上也常具有多種不同的形式與階段。有的人試圖將「平行世界」的價值觀或者那裏的人納入官方結構，收編入伍，把自己變得有點像他們一樣，同時也試圖把他們變得有點像自己，以調節那種明顯失控的不平衡狀態。在六十年代，進步的共產黨員開始「發現」一些不受注意的文化價值和現象。這是一個積極的起步，雖然有它的危險，因為那些被「融合」或被「拿來」的價值，已失去其獨立性與原創性，蓋上了官式架子，事事規行矩步，它們的威信也給削弱了。順應潮流的下一步可以是令官方結構在最終目標及體制問題上開始改革。這些改革往往是半吊子的，試圖融合，或者現實一點說，協調為生命服務和為後極權主義的「自動機制」服務這兩種不同的方向。他們捨此以外也別無他法。他們混淆了磊落真誠的生活和謊瞞騙隱的生活間清楚的界線，放出煙幕，迷惑社會，令人難於維持其原有方向。當然這仍是一件好事，因為畢竟會開拓出更多新的空間，只不過它令人更難分辨甚麼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協。

順應潮流的另一個更高階段，就是在官方結構內造成分化，令這些架構更多地向多少已成形的多元化形式開放，因為生命的真正目標正要求這些東西（一個例子就是，文化生活中太集中和組織化的情況如果不改變，新的出版機構、同人雜誌、藝術團體、平行的研究機關和工作坊等等，也會在來自「下面」的壓力下產生。另一個例子是那些後極權制度用以培養接班人、由國家控制的一元化青年組織，會在壓力下解體，變成一些多少有獨立性質的團體，如大學學生會、中學學生會、職青組織等）。諸如此類的分化令來自下面的力量被感覺到。這種變化與漸次出現的新的平行，甚至獨立的結構有關，他們被官方機構重視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這些新的機構不單是適應了生命的真實需要的自由化官方結構，更是直接體現了那些需要在既有的社會環境得

以正名，佔一席位的要求，表現了社會自我組織的趨向（六八年捷克最為人熟知的這類組織是 KAN，一個積極黨外人士的組織，及 K231，一個前政治犯組織）。

順應潮流最終階段就是，那些官方結構——它們充當後極權制度的代理，為它的自動機制服務，依樣建成——開始萎縮、消亡，由來自「下面」以全新方式聚合的新結構所取代。

當然，生命目標還可以有很多其他途徑影響事物的組成方式，帶來政治性的改變，削弱控制技術對社會各層份的控制。我在這裏只是將六八年我們在捷克親身經歷到的轉變描述出來而已。應該了解的是，這些具體事件都只是特定歷史進程中的一部份，不應以為那是唯一的選擇，又或者（特別在我們的國家）可以重覆出現。不過，這總無損於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的教訓，在今天仍然適用。

說到捷克一九六八的事件，應該講一下當時一些特點。那時候從一般「氣氛」，觀念以致結構上的改變，都不是在一如今日正成形的那些平行結構的壓力下導致的。當時這些結構——亦即與官方結構完全唱對台的那些結構——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存在今日所稱的「持不同政見者」。那時候的轉變是由多種多樣的力暈造成的，其中一些很全面地產生影響，有些只部份地發揮作用。當時已有一些自由思想，獨立創造及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發零星要求。而獨立社會生活對現存結構的滲透，是通過長期、自發和不明顯的努力所帶來的，通常以默默地將這種生活在官方組織或其邊緣建立起來開始。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社會覺醒的漸進過程，也就是一個隱蔽空間慢慢敞開的「靜悄悄」過程（捷克官方宣傳機器說有一場「悄悄地蔓延的反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說出了生命目標前進的狀態）。這種覺醒背後的動機不一定完全來自可以清楚界定的獨立社會生活領域（雖然它的確來自那裏，這點還有待被充分了解），也可以因為官方結構內一些認同官方

意識形態的人，他們透過各種潛在的社會危機，以及在與權力的真正本質打交道後，嚐到痛苦經驗而認清了現實真像（我這裏主要是指那些「反教條」的共黨改革派人物，多年來已在官方組織中形成反對力量）。今天這個「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年代所慣見的在當時卻是受到限制但仍力求「自我組織起來」的獨立行動，既無條件，亦無存在理，使它們得以截然立足於官方結構之外，整體地得到確認。那時候，捷克的後極權制度還未至如今日那般停滯、無能和僵化，逼使人們要重拾自我組織的能力。由於很多歷史和社會因素，六八年的政權要開放得多，但這個已受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侵蝕殆盡，只能絕望地摸索無痛改革方案的權力結構，無可避免地從裏面腐爛起來，對大氣候的轉變，對年青人想法的改變，對官方與非官方之間廣濶的政治領域內，由先於政治的層次展露的出來的那種萬千生命對真誠生活的嚮往，完全無法作理智的回應。

大體來說，有一點同樣重要的是：1968年的體制改革，從未有超越改良，也即是只進行分權或對一些其實只是次要的組織進行整頓。它並沒有影響後極權制度的權力結構，即作為社會組織基本依據的政治制度，甚至沒有觸及政治權力凌駕經濟權力的那個經濟制度。直接行使權力的工具（如軍隊、警察、司法機構）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改變的只是氣氛、人事、政治路線，尤其是行使權力的方式。其餘一切都停留在討論和計劃階段。官方採納的兩個至為深入的改革方案是六八年四月的捷共行動綱領以及經濟改革計劃。行動綱領無可避免地充滿了內在矛盾和半吊子的手段，從沒有觸及實質權力。而經改計劃雖然在經濟領域上吸收了很多關於生命目標的東西（例如有多元利益和多元動力、動態誘因等的提法，限制依靠指令的經濟措施等），但對於經濟權力的支柱問題，即國家擁有，而不是真正的社會擁有生產工具，則絲毫沒有觸及。因此這裏留下一個空隙。在後極權制度下，除了

匈牙利起義的幾天外，沒有任何社會運動可以填塞這空白。

將來有沒有其他發展可能呢？我想只能訴諸猜度去回答這問題。照目前來說，體制背後的社會危機通常以政治和社會動盪告終（五三年東德、五六年的匈牙利、蘇聯、波蘭、六八年的捷克斯拉夫、波蘭、七〇年和七六年的波蘭）（也沒有理由以為以後不會重演）。這些動盪的背景、進程和結果都不一樣，這些動盪背後都有不同的複雜因素，令隱蔽角落暴露出來的那些偶然事件（即最後致命一擊）也是難以事先預知的。再者，一方面「集團」內部權力不斷擴張，另一方面蘇聯境內非俄羅斯區域民族意識的覺醒導致蘇聯的解體（蘇聯並不能永遠在全球的民族解放鬥爭中置身事外），前途未卜，所以任何長遠的預測都是不可靠的。

無論怎樣，對「持不同政見運動」來說，這類猜度並無即時意義，因為這些運動反正都不是由猜度發展出來的。將他們放置在這個基礎上，只會把他們從自身真實的屬性割裂。

就「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前景說，未來的發展恐怕不會是兩個孤立，互不往還，互不理睬的東西——一邊是主導的邦國，一邊是平行邦國——長期共存。磊落真誠的生活要是保持原來面目，就不可能不成為體制的威脅。與謊瞞騙隱的生活並存而不發生激烈衝突是難以想像的事。只要後極權制度依然故我，而獨立的社會生活仍然是面向整體，向整體負責，讓人重建道德責任的領域，兩者的關係就永遠是公開和潛在衝突的來源。

事情的發展只有兩種可能性：要不是後極權制度繼續發展（如果有能力繼續發展的話），日漸趨近奧威爾（Orwell）筆下那個駭人的絕對操縱的世界，扼煞掉所有稍為明顯的對磊落真誠生活的追求，否則獨立的社會生活（平行邦國），包括「持不同政見運動」，就肯定會慢慢成為愈來愈重要的社會現象，在社會生活中佔真正地位，影響大局。當然，這種只是影響大局的其中一項因素，並且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因素，與其他適切的條件配

合，才能發揮作用。

無論應該集中於改革官方結構還是促進分權，又或者用新的結構取代舊的，也不論目標是「改進」制度還是相反的去打碎制度，諸如此類的問題只能在特定環境下，由「持不同政見運動」按當時的具體目標提出來，否則它們只會是一些虛假的問題。我認為，抽象的回答問題，及基於假想的遠景去引伸出一套綱領，只是向傳統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倒退，局限和割裂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工作。其實只有他們才真正忠於自己，對未來有最真確的洞見。我多次強調，這些「持不同政見運動」不是以發明改變制度的方法作為自己的立根點，而毋寧是為「此時此地」當下的更好生活而作的日常鬥爭。生命為自己而發現的種種政治和結構的改變往往是，或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有限的、半吊子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受策略權謀污染。它不可能是別的樣子，一定要把這些都預計在內，不因此失去鬥志。要緊的是主要的事情——亦即為了更自由、更忠誠、更有尊嚴的生活而每天了無止境，吃力不討好的鬥爭，從不固步自封，虛心假意，虎頭蛇尾，不為政治技倆出賣自己，或者陷入猜度行動的成果，迷戀於幻想未來。鬥爭的純潔性是它和後極權制度真正交手時致勝的最佳保證。

XX

後極權制度的特殊性質，即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看不到深遠的政治改變前景畢竟也帶來了一個積極的改變：它逼使我們去檢討我們處境背後一貫起作用的因素，把我自己的前途放到全世界的長遠發展前景去考慮。人類與制度最根本和最內在的衝突，較傳統政治深刻得多，並決定了對這種衝突進行思考的方向。

因此我們不得不轉向更根本的問題：現代科技社會整體危

機，海德格爾稱為人面對科技無所不在的權力時所產生的危機。作為現代科學思想之子和現代形而上學產兒的科學技術，已無法為人所控制，不再為我們服務，奴役我們，逼使我們加入自我毀滅的準備。人已經沒有出路：我們沒有思想，沒有信仰，更遑論幫助我們把事物重新安排，為人類所駕馭的政治主張。我們無助地任由自己創造、冷酷無情的大機器吞噬自己，將我們從與自然（例如廣義的寄居之地，包括在地球生物圈中的居處）的密切關係分割開來，一如它將我們從「存有（Being）」的體驗抽出來，拋擲到「眾存在物（existences）」的世界去一樣。這種情狀已從多方面被探討過，不少個人及羣體亦曾痛苦地找尋出路（例如東方神秘思想及組織公社）。抱有那種普遍性的成份（為了整體，面向整體的責任）的唯一一種社會及政治努力，是生態運動在混亂世界所發出微弱絕望的呼聲，而就算這些努力也局限在如何運用科技及反對科技獨裁等特定意念上而已。

海德格爾說，「現在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他說一定要有一種「全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即與多個世紀以來的哲學告別，徹底改變人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及人在世界位置的方式。海德格爾不知出路何在，他所能提議的就是「準備各種莫望」。

不少思想家和思想運動認為，這個仍未為人知曉的出路，也許可籠統地稱為一場全面的「存在的革命」。我也是這麼想。我更同意說不能從某些科技上的花招，也即某些騷不著癢處的改革建議，或從單純哲學上，單純社會上，單純科技上甚或單純政治上的革命，就能找到答案。所有這些都是「存在的革命」的後果可以而且一定會被體驗到的地方，但他們最牢固的據點只能建立在最深刻意義下的人的存在。只有從這個基礎，它才可以在道德上——以及當然最終在政治上重建社會。

我們稱之為消費及工業（或後工業）社會，及奧德嘉（O.Y. Gasset）曾叫做「羣衆的反叛」，以及今日世界的智性、道德、

政治和社會災難，所有這一切或許只是人類絕望地被全球科技文明的自動機制所拖累的深刻危機中的一個側面而已。

後極權制度只是現代人類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一個側面，也許是一個表現得更激烈，更能揭示其真正根源的側面。後極權主義的自動機制只不過是全球科技文明自動機制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它所反映的失敗，只是現代人普遍失敗的其中一種。

這種對人在世界的位置無所不在的挑戰，當然亦發生在西方世界，唯一的差別只是社會及政治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海德格爾直稱之為民主的危機。沒有證據顯示，西方民主，也即傳統的議會民主，能夠提供一個更為深刻的解決方法。甚至可以說，西方民主（比起我們的世界）提供愈多容納生命真正目標的空間，危機就愈為隱蔽，人們就更泥足深陷。

看來，傳統的議會民主也不能為科技文明的自動機制及工業消費社會提供更根本的反抗，因為它們自己也絕望地受它拖累。人們受到比起後極權社會殘暴的手法更為乖巧、細緻的方式所控制。由職業機器推動的那些停滯、僵化，想法亂七八糟，政治上看風駛輊的羣眾性政黨，抽空了人民自己的具體責任；而資本累積的孔眼就介入到各種秘密操縱和擴張的地方；消費、生產、廣告、商業、消費文化、資訊泛濫等無所不在的專制……所有這一切都很難想像為重拾人性的希望所在。索爾仁尼琴一九七八年在哈佛的一次講座中描述了那些不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的自由背後那種虛幻的性質，以及傳統民主形式無力抵抗暴力和極權主義的結果。民主制度下，人們享有我們想也未曾想過的個人自由和保障，但結果也並沒有甚麼好處，因為人們最終也是同一個自動機制的犧牲者；民主制度不能夠保衛人對自己人性認同的關切，或防止這種關切只流於表面；民主制度不能使人超越對個人自身生存的關切，使人成為邦國（Polis）裏頂天立地、不忘己責的成員，對創造邦國的前景作出真正貢獻。

因為我們所有為美好將來而提出的看法都是長遠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傳統民主的深刻危機。肯定的說，如果蘇聯集團中某些國家建立民主的條件給創造出來的話（雖然這愈來愈不可能），它可能是一個重建破落的公民意識，重建民主討論，容納一個讓政治多元性確立，生命目標得以確切表達的一個大好時機。不過，將傳統議會民主作為最高政治理想，幻想這些「備受考驗而且真正」的形式，已能夠保證人類享有不朽的尊嚴及獨立社會生活，在我看來，不啻是短視的想法。

我以為一種重新將焦點放在真實的人的政治，比起僅僅恢復西方（或你喜歡可叫資產階級）民主的各種和制要來得深刻。在一九六八年時，我曾以為組成一個能夠和共產黨公開競爭權力的反對黨，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我很早已發覺事情不這樣簡單。事實上，沒有本身就是反對黨的反對黨，也沒有自然而然就成為反對黨的反對黨，正如沒有一些本質上和自然而然地，就可以令社會不受新的暴力形式影響的選舉法，沒有任何「堅實」的組織方式本身可以提供這種保證。我們很快便要被迫從中發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們。

XXI

我們現在或許要問這個問題了：那怎麼辦？

我對提出另一種政治模式，對那些認為要由改變或改革制度來拯救我們的想法存有疑慮，並不意味我對所有政治思想工作都抱懷疑態度。我強調將注意力放到真實的人，不會令我放棄思索各種可能需要建立的結構形式。相反，既然想到一，就理應也想到二。不過我只會談談幾個粗淺的看法。

概而言之，任何存在革命應該為社會的道德重組提供希望，社會重組意味改造人與人的關係，徹底建成我曾稱之為「人性秩

序（human order）」的狀態，這是任何政治秩序所無法替代的。一種新的存在體驗，一種在宇宙中新的立足安身，一種對「更高責任」的重新掌握，一種與其他人和人羣新建的內在關係，這些都清楚展示出我們探索的方向。

這些東西在政治上的含義又是甚麼呢？它們很可能會給反映在某些組織結構的組成中。這些組織結構將會由「新的精神」，由人的因素，而非由某種形式化的政治關係或政治許諾所發展出來。換句話說，問題是重建諸如信任、開放、責任、團結、愛等。我只信任那些不以行使權力「技術」為目的的組織結構，那些以共同關心的事為基礎而組合成的群體，在運用力量時以事物的意義為目標的組織，而不是那些人們同抱「向外」擴張野心的組織結構。那可以而且只能是開放、動態和小規模的組織結構要是規模過大，人際聯繫如信賴、責任就不起作用。那須是原則上不會限制發展出不同組織結構的那種組織結構。任何類型的權力積累（即自動機制的一個特性）都是與此背道而馳的。這種結構將不會是組織、機構這意思的結構，而更像一個社羣。它們的威信肯定不會悠久但空洞的傳統為根基，一如羣眾性政黨所依恃的。相反，威信是建立在他們怎樣具體地進入一個特定的情景。臨時成立，充滿為着同一個目標而有的熱情，剛達成目標後又會自行消散的組織，比起一個形式化，深謀遠慮地組成的組織更好。領導人的權威應該來自他們在特定環境下經受起考驗的性格，而不是來自任何任命機構的指派。他們要享有大量人際的信賴，以及基於這些信賴而擁有的立法能力。這看來是超越傳統民主組織一貫無能的唯一出路，那些民主組織往往是建基於互相猜疑而非互相信任，建基於集體的不負責任多於責任。只有社羣裏面每一位成員都有圓滿的生命存在作為基礎，制止那「悄悄地蔓延的極權主義」前進的永久屏障才可以建立起來。這些組織結構自然從社會由下而自我組織成長起來，他們應和那些促使他們成

長起來的真實需要保持對話，從中吸取活力，而當這些需要過去了，組織結構亦應消失。他們內部組織的方式可以非常豐富多樣，從外施加的控制減至最低。這些「自我組織」最重要的標準應該是結構存在的真正意義，而不單是一個抽象的常規。

政治和經濟的生活都應建基在這些生生滅滅的組織，互相之間多樣和靈活的協作之上。在社會的經濟生活方面，我相信自管的原則，那可能是達成所有社會主義理論家夢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讓工人真正（即非形式地）參與經濟決策，為他們的集體工作帶來真正的責任感。控制和紀律的原則應該由自管自律的原則所取代。

就算在這樣粗略的提要中也已經清楚，一場這類型的「存在革命」的後果，會大大地超越古典議會民主的框框。既然我為了討論的方便而杜撰了「後極權」這個辭彙，或者就讓我將剛才討論過的想法——暫時地——稱作一個「後民主」制度的設想。

無疑這個想法是可以再發展的，但我想這樣做總會變得愚蠢可笑，因為這樣的話，整個意念肯定會慢慢地從自身異化和割裂出來。但無論如何，這樣一個「後民主」制度的本質，在於它只能透過實踐建立起來，也就是作為一個直接由生命，由新氣候、新「精神」（政治理論在這裏當然有一個角色，但不是一個指揮者而是一個嚮導）所發展出來的過程。但是，在這個精神還未有真正顯現，不知其具體形貌之前，試圖預想它以怎樣的結構形式表現，將會是太魯莽的。

XXII

如果不是為了一些經常纏繞的問題，我也許會刪去上面那一整個章節，因為這是個更適合作私人冥想的題目。看來確是太草率了點，所以我寧可將它用一個個問題去表述出來：這些「後民

主」結構的想像，不是令人想起在我們身邊那些熟悉的「持不同政見」團體，或某些人們獨立自發的行動嗎？這些為了多番共同面對的憂患聯繫起來的小社羣，不正產生了我們提過的那種「有人性意義」的政治關係和連結嗎？由於根本沒法取得直接表面的勝利，主要由對工作所具意義的深厚共同信念促成的這些社羣（社羣甚於組織），不是塑造了一種團結和友愛的空氣，填補了官方結構那種形式化和官樣文章的氣氛嗎？那些直接的人際互信，及非形式化的權利等「後民主」關係，不是由那些大家共同面對的困難所激發出來的嗎？那些團體不是在具體而真實的力量驅使下出現、成長及消失，完全擺脫了空洞傳統的重壓嗎？他們想建立磊落真誠生活的種種方式，在冷漠的社會重揚一種崇高責任的感覺，不是某種道德重組過程正在萌芽的訊號嗎？

換句話說，這些構成「平行邦國」的非正式、非官僚、動態而開放的社羣，不是一種更具意義的「後民主」政治結構的象徵及雛型，從中可能是更美好社會的基礎嗎？

我從千百次個人經驗中領略到，只因為簽署了七七憲章的宣言那麼簡單，立即就創造出一個更深更開放的關係，在人們中間突然激發起強烈而真實的休戚與共，真正的活在群體中的感覺。在冷漠的正規機構長久共事的人之間，這些事情也未必會發生。彷彿接受了一個任務和共享一個經驗，就可以改造人以及他們生活的氣候，好像這已可為他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別處難求的人性面向。

或者所有這一切都只是活在共同威脅下的結果，或者當威脅一旦中止或減輕，它幫助形造的氣氛就會開始消散（那些威脅我們的人當然有截然不同的目的，他們意圖以各種可恥手段破壞受威脅社羣的人際關係，真不得不為他們幹這些勾當時付出的精力而驚嘆）。

不過，這樣也絲毫改變不了我上面所列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如何走出這枯竭衰萎的世界。假如我們把自己僅能做的些微東西，視為根本的解決方法，又或者將我們、我們的群體，及我們對重要問題的應付辦法視為唯一值得做的事，那更是妄自尊大，無法原諒。

雖然如此，基於上面對後極權境況的思考，以及在這環境下，發展保衛人及其各種認同時遇到的內部和外部問題，我想我的問題仍是合切的。如果不是其他別的甚麼，這些問題就算是邀請我們對自己具體經驗進行反思而提出的吧了。它們要求我們思考自己的經驗，看裏頭是否有甚麼是我們還不曾察覺到，但已顯示出更為高遠的境地，超出了表面的局限，反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當下，有沒有一些需應付的問題還沒有被覺察到，還在靜靜地等候着一個被理解和被掌握的時刻。

真正的問題是，「光明前途」是不是真的永遠這麼遙遠。或是相反，它其實早已在這裏，只不過因為我們的盲目和懦弱，才令我們不能在自身、在周圍把它看出來，因而無法發展它。如是這樣，那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羅永生 譯 李金鳳 校

本文刊於《無權勢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New York, Palach Press, 1985.

否定政治的政治

小時候，我住過鄉村，至今我還清楚記得，當時我經常沿着田間的行車小徑步行到鄰村上學，途中看見遠處地平線上倉促建成的、十足戰時設施的某個工廠的大煙囪，噴吐出濃烟在天空擴散。每次看見，我都強烈地覺得有些地方錯透了，覺得這是人類在污染天堂。我不知道那時有沒有生態學這樣的學科，如果有，當時我肯定毫無認識。然而，那樣「污染天堂」令我本能地憤怒。在我看來，人類這樣做是犯罪，他們毀滅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專橫地破壞着自然秩序，而且必獲懲罰。當然，我的厭惡主要是審美意義上的，那時我完全不知道排放有毒物質將會摧毀掉森林，滅絕野生動物，危害人們的健康。

要是一個中世紀的人突然——比方說，在外出打獵時吧——看見地平線上有像大煙囪的東西，他很可能以為這是魔鬼的所為，並跪下祈求自己和同族能免受傷害。一個中世紀農夫的世界和一個男孩的世界，兩者之間究竟有甚麼共同之處？我想，是一

些實質性的東西。這個男孩和農夫比起大多數現代的成人，都更為堅實的扎根於某些哲學家說的「自然世界」或「生活世界」（life-world, Lebenswelt）之中。他們還沒有跟自己真實的、個人經驗的世界疏離。這個世界有其晨，有其夕，有其下（大地），有其上（蒼天）；太陽每天自東方升起，移過天空，向西方落下；在那裏，觀念如「在家鄉」與「在異域」、善與惡、美與醜、近與遠、責任與工作，仍具有鮮活和明確的意義。他們仍扎根於一個知道分界線的世界，在分界線的一邊，是所有親密而熟悉的、恰如其分地適合我們關懷和思索的事物，在分界線的另一邊，是上述界域（horizon）以外的東西，我們應要謙虛的鞠躬下拜，因為它和奧秘相關。

我們的「我」原初地（primordially）信誓於那個世界，由衷地肯定它。這是我們活生生的經驗的世界，一個我們還不曾麻木的世界，因為在我們的愛、恨、尊敬、輕蔑、傳統、利益以至衍生文化的前反思（pre-reflective）的意義裏，我們註定和它緊密相連。它是我們內心底層切實的、無以轉讓的快樂與痛苦的領域。在它裏面，藉着它，和為了它，我們得以面對問題，承擔責任。在這個世界裏，正義、誠實、叛逆、友誼、背信、勇氣或同情，有了完全明確的，跟真實的個人和真實的生活相關的內容。這個世界由來自有它的價值依據，這些價值於我們談到、想到和探求之前，早已存在。這個世界的內在一致性，歸功於某種「前思辨的」假設（something like a “pre-speculative” assumption），假設世間萬事萬物的正常運轉之所以可能，都只因為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它超出我們的理解和把握，但也唯其如此，它把世間萬事萬物鞏固在堅實的基礎上，賦予秩序和標準，也是世間所有律例、習俗、誡條、禁令和規範的隱蔽本源。自然世界，依憑着它的存在自身，內在地具有關於絕對的先設（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Absolute），這絕對鞏固、界定

激活和引導着自然世界，沒有了它，將無法想像自然世界。我們只能默默地尊敬絕對，意圖輕藐它，主宰它，或取代它，在自然世界的框架都只是狂妄自大的表現，為此人類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就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樣。

對我個人而言，烟囱污染天堂不單是沒有考慮及「生態因素」的令人遺憾的科技上的失誤；這種失誤，只需加裝適當的過濾器便能輕易糾正過來。對我，它更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這個時代企圖超越自然世界（譯按：即前述的生活世界，下同）的界限和規範，使之成為僅僅是私人興趣，是個別人的幻想、偏見和古怪念頭，是主觀偏好和私人感情而已。它是一個新紀元的象徵，這個紀元否認個人經驗有重要的約束意義——包括對神秘和絕對的經驗——並以一既不神秘也沒有主觀性「奇想」的，因而是非個人和非人性的、新的、人造的絕對，取代了作為世界標準的個人經驗到的絕對。這就是所謂客觀性的絕對：對世界的科學模式的客觀和理性的認可。

現代科學建構了普遍有效的世界形象，從而衝破了自然世界的規限，它只能把自然世界理解為偏見的牢籠，以為我們必定要衝出這個牢籠去找尋客觀真理之光。自然世界在它看來不過是落後的祖先的不幸殘餘，是他們幼稚和不成熟的幻想。以此，當然，即使是我們的自然世界的最內在的基礎，也被它看成是僅僅是虛構的而取消了：它殺死上帝，佔領了真空的王位，作為唯一的合法監管人，把存在的秩序掌管在自己手裏。畢竟，只有科學凌駕於所有個體的主觀真理之上，並代以高級的、超越主觀的、超越個人的真理——這樣才是真正客觀和普遍的。

現代人的自然世界已被科學和技術徹底征服，只有在惡臭侵入住宅後，才會抗議烟囱冒烟。他們絕不會形而上學地提出根本性的抗議，因為他們知道擁有該烟囱的工廠製造他們需要的物品。作為科技年代的人，他們只能在科技的局限下考慮補

救辦法，例如在烟筒裏裝上催化洗滌器。

請勿誤會，我並非建議人類取消烟囪、禁止科學，或回到中世紀。何況，絕非偶然的，現代科學某些最深奧的發現顯示客觀性的神話有驚人的爭議性，曲折地把我們引回人類主體和他／她的世界。我只要求在最一般的、大家都會同意的大綱上，考慮現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及今日危機的根源。儘管反省首先會着眼於危機的政治性而不是生態性方面，我還是希望用一個生態學的例子來釐清我的出發點。

多個世紀以來，家庭農場是歐洲農業的基本組成部分。在捷克，它的舊名是Grunt，這個名字本身有其詞源學上的分量。這個名字，源自德文Grund，事實上指土地或基礎，而在捷克，增添了獨特的語義學上的色彩。作為基礎一詞的口語同義詞，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不可置疑的、傳統的和前思辨的既予本真性（pre-speculatively given authenticity）。家庭農場無疑是各種沒完沒了和激烈的社會衝突的根源，可是不能否認，它扎根於自然的本分中，恰當和諧，由一代代的農人體認，由他們耕作的成果確證。同時，它也展示出一種相互均衡：包括田野、牧草、樹木、牛羊、家畜、水、路和所有屬於它的一切，在數量上和種類上都達至最優化。多個世紀以來，從沒有農人科學地研究它。然而，它構成了一個一般而言令人滿意的經濟和生態系統，其中每一樣事物都被千絲萬縷的相互關係有意義地扣連在一起，保證了它的穩定性，也保證了農產品的穩定性。

與今日的「農業綜合企業」（agribusiness）不同，傳統家庭農場是充滿朝氣和自足的。雖然它會受到各種常見災禍的影響，但這不是他們的過錯——惡劣天氣、牲畜疫疾、戰爭和其他災難是農人力所能及之外的。儘管，現代農業科學和社會科學有上千種方法去改良農業，增加產量，減少粗勞苦作，根絕最壞的社會不公平。但是要做到這些，只有當現代化是由某種人性指

引的才有可能，它得尊重自然的神秘秩序及山之而衍生的適當性，這種適當性是個人經驗和責任的自然世界所固有的。現代化絕對不應是非個人的客觀科學——由執持「科學的世界觀」的農學家或官僚所代表——妄自尊大和粗暴的侵略。

然而，那恰是我們的國家發生的情況：我們這裏稱為「集體化」。三十年前它像旋風一樣席捲捷克斯洛伐克的鄉村，影響遍及每一個角落。其結果包括，一方面有數以萬計的生命遭牢獄折磨，犧牲在科學烏托邦的祭壇上；另一方面，某程度地緩和了社會衝突，減少了粗重工作，提高了農業生產率。然而這些，都不是我提出此例子的原因。我的原因是不同的：旋風把傳統家庭農場掃盪乾淨的三十年後，科學家驚奇地發現了即使是認字不多的農人也早已知曉的——人類每一次嘗試激進而徹底地去取消以往曾對之謙卑恭敬的自然世界的界限，拋棄審慎的個人知識的傳統，結果都必定要付上沉重的代價。他們必定會為俘虜自然、支配自然和嘲笑其神秘而付償；為廢除上帝和自以為是上帝而付償。事實上，付代價的時候到了：隨着矮樹和林木被犁倒斬伐，野鳥絕迹，農作物也就失去了抵抗害蟲的免費天然屏障；大量的統一處理的農田每年無法避免地流失數以百萬立方碼的表層土壤，這些流失的土壤要幾個世紀才能積累成現在的樣子；化肥和農藥災難性地毒害了幾乎所有蔬菜產品和水土；重型機器長年不絕地壓在泥土上，使泥土因空氣不流通而貧瘠；巨型牧場的乳牛患上精神病，不能造奶；同時農業從工業那裏吸吮更多的能源——製造機器、人工肥料，在地區專業化程度持續增長的時代不斷提高運輸成本，等等。簡言之，症狀可怖，誰也不能預測未來數年和數十年還會有甚麼令人震驚的變化。

這是荒謬的：在科學和科技年代，人們確信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為他們能夠探索和掌握自然的複雜性與規律。但是，到最後，竟正是這些規律悲劇性地指出人們的差錯，並使人類受

拙。人類以為他們能夠解釋和征服自然，結果卻摧毀了它，自己剝奪了繼承自然的權利。「脫離自然」的人類前景究竟會是怎樣的呢？畢竟，正是最新的尖端科學發現，人的身體只不過是數以兆計的有機微體的某種特別繁雜的交接，它們一同參與了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大有機體的形成，那大有機體我們稱之為「生物圈」，它覆蓋着我們的地球。

這不是科學本身的錯，而是在科學時代人類自大狂妄的錯。人類明明不是上帝卻去扮演上帝的角色是有嚴重後果的。人類取消了他們所有關係的絕對界域，否認自己對生活世界的「前客觀的」（pre-objective）的經驗，同時把良心和自覺趕到浴室中去，彷彿那只是個人的私事，與大眾無關。我們把我們的責任看成是「主觀幻覺」，把它丟棄了，卻在它原先的位置，另外放置了今日正被證明是幻覺中最危險的一種：一種杜撰的、完全沒有具體人性的客觀性，聲言能理性地認識宇宙，虛擬出一個公認的「歷史必然性」的抽象大綱。在這幻想的頂峰，我們建構了一個「普遍福利」的幻想，它是純粹科學上可計算和科技上可實現的，只需要由實驗機構發明並由工業和官僚主義化的工廠把它變成事實。在科學指引的集中營裏，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將會被奉獻給這個幻覺，但「現代人」不會介懷，除非他或她偶然地處於鐵圍之外，並被猛然擲回他或她的自然世界。畢竟，體驗屬於那被廢棄了的個人偏見的嶺域，早已投降給科學、客觀性、歷史必然性、科技、系統和「黨機構」——既然是非個人化的，便不會有憂愁。它們抽象、無個性，往往是功利主義的，因此也往往是先驗地清白的。

當與永恆有關的一切都被鎖進浴室——假如還不曾被放逐到童話世界——的話，誰（個人地）關心未來？甚至誰會擔憂？如果一個當代科學家會想及未來二百年會怎樣，他／她只是作為旁觀者去思考，毫無本人的興趣或利益介入其中，這跟他／她研究

跳蚤的新陳代謝，脉冲星的放射信號或地球的天然氣存量比較，基本上不會多關心一點。一個現代政客呢？他／她完全沒有理由要關心，尤其當這會影響他／她在競選中的機會，只要他／她生活在一個有競選的國家……

捷克哲學家比羅勒斯基（Vaclav Belohradsky）曾令人信服地展釋了以下這個想法：建基在抽象理性和非個人化客觀性的假設上的現代科學理性主義精神，除了自然科學上的奠基者伽利略外，還有一個政治學上的奠基者，馬基雅維利，他第一個把政治理論表述成——雖然用的是惡毒諷刺的語氣——一種有關權力的理性科技學^①。儘管歷史錯綜複雜，我們仍還是可以說，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權力的本源，就在這裏，即就在那一瞬，人類理性開始再次離棄人性，離棄個人經驗，離棄個人良知和個人責任，離棄所有責任均以之作為其絕對界域並都與之具體關連的自然世界。一如現代自然科學家把真實的人類（作為對世界有活潑經驗的主體）拋開一樣，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也是如此，而且更昭著。

誠然，權力匿名化和非個人化的過程，以及把自身化約為僅僅是統治技術和操縱技術的手法，有上千種偽裝、變種和表現方式。它一時隱密難辨，一時卻剛好相反，完全公開；有時它迂迴曲折偷偷摸摸的出現，有時卻粗暴而直接。然而，實質上它是相同的一種普遍趨勢。它是所有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徵，直接由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構中生長出來。它盤根錯節的扎根在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構之上，即使在思想上，也無法跟它的科技本質、大眾性格和消費取向區別開來。

統治者和領袖也曾憑其本身的人格，有真體實的人的面目，在某種意義而言個人地負上自己行為的道德責任——不管他們是由於皇朝傳統、人民意志、戰爭勝利抑或陰謀奪權而上台的。然而，在現代，他們都被經理、官僚、黨幹部所取代了，變成一種

專業的統治者、操縱者、擅長含混技巧的專家，安插在各功能關係非個人化地交接的位置，成為早被派定角色的國家機器（machinery of state）的一個齒輪。這個專業的統治者是「清白的」匿名力量的「清白的」工具，其正當性來自科學、控制論、意識形態、法律、抽象和客觀性，來自除了對人類（作為個人和鄰居）的個人責任以外的一切。現代政客是透明的：在他或她的果斷英明的面具後面，在矯揉做作的辭令後面，一點人類（以愛、熱情、興趣、個人意見、恨、勇氣或兇惡植根在自然秩序上的人類）的痕迹都沒有。他或她都會把所有這些鎖進自己和別人的浴室裏。如果在面具後面我們還會瞥見甚麼，那將只是一個較能幹的或較不能幹的權力技術員。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機構（apparat）已經剝奪了我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一樣——的良知、自然理解和自然言語，從而剝奪了我們真正的人性。國家愈來愈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成各類沒有性格的角色類別，如投票者、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客或士兵。在政治上，好與壞，這些自然世界的範疇——因而是過往的古舊殘餘——失去了所有絕對的意義；政治上唯一的方法，就是能數量化的成績。權力是先驗地清白的，因為它並不是來自一個像罪惡和清白等字詞仍然保有自身意義的世界。

這種非個人化的權力，在極權主義制度中獲得了最完全的表現。正如比羅勒斯基指出，權力的非個人化以及它對人類良知和言語的征服，已經成功地跟一種歐洲外的傳統連結上，這傳統有「宇宙論」式的帝國觀，把帝國看成是世界的唯一中心，並在這樣的世界裏視人類為帝國的專有財產。但是，正如極權主義所清楚顯明，這並非表示該現代的非個人化權力本身是歐洲以外的事情。事實剛好相反，正是歐洲和根源於歐洲文明的西方世界，提供了這種權力今日的各樣基礎（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工業革命、革命本身、革命作為自然世界的某種狂熱抽

象)，並不時把此基礎強加於這個世界。也正是歐洲——民主的西歐——今日在面對這種模稜兩可的輸出時，感到迷惑了。當代的兩難證明了這點：對此以前輸出的，現在回輸過來的擴張主義，是投降還是對抗？由歐洲輸出精神上的和科技上的潛能所製造的火箭，現在正瞄準着歐洲。歐洲應否不惜代價參與這場極不道德的遊戲，回報以相同和更好的火箭，從而顯示保衛其留下來的價值的決心？抑或歐洲應退讓，從而顯示出關心地球的責任感，並祈望藉着這種責任感的神奇力量，感染其餘的世界？

西歐面對極權制度最大的偏差，我認為是關於極權制度其實最終是甚麼的普遍誤解。它其實是所有現代文明的凸透鏡，是嚴厲的——或者是最後的——呼喚，呼喚文明的自我理解要作出全球性的徹底調整。如果我們忽視了此呼喚，歐洲文明將不會作出任何實質改變，它可能於歐洲自身的理性主義傳統的精神中，理解極權主義為某種地區性的以期達至「普遍福利」的風格化嘗試，而只有邪惡的人才會歸因於擴張主義傾向，或者——於相同的理性主義傳統的精神中，不過這一次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把政治看成是權力科技學的觀念——它可能視極權主義政制為來自擴張主義的鄰國的外在威脅，藉着適當地顯示力量便可把這些鄰國趕回可接受的範圍內，而無需另作甚麼深刻反省。持第一種看法的人，是那種即使煙霧污穢醜陋和氣味惡臭仍會與冒煙煙囪和解的人，因為畢竟那是為了一個美好的目的：生產大眾需要的物品。持第二種看法的人，會以為這不過是科技計算上的失誤，用科技手段便可補救，例如加裝過濾器或滌洗器。

我相信，不幸地，情況其實更為嚴重。「污染天堂」的煙囪並非只是一個科技上可予修補的設計失誤，也不是為了美好明天所需繳付的代價，它是一種文明的象徵。這種文明拋棄了絕對，不顧自然世界，蔑視其命令（imperatives）。因而，同樣的，極權主義制度提出的警告，遠比西方理性主義願意接受的要嚴重得

多。它們是映照出理性主義必然後果的凸透鏡，是理性主義內在深層趨向放大的風格奇特的圖象，是理性主義自身發展的極端顯現，是理性主義自身膨脹的不祥產物。它們是理性主義對自身危機的深刻而富啟發性的反映。極權主義政制不單是危險的鄰居，也不是世界進步的某種先驅，剛好相反，它們是這個文明的全球危機的先兆（該文明危機首先是歐洲的，然後是歐美的，最後是全球的）。它們是西方世界的未來學研究的一個可能題目，這樣說並不是因為它們終將會在某日進攻和征服西方世界，而是因為更深刻的意義——它們生動地呈現了正如比羅勒斯基所稱的「非個人的末世學」的可能後果。

這是一種腫脹的、匿名的官僚力量的全面統治，還沒有負責任便已在所有良知之外運作，建基在一種無需面對真理卻能合理化任何事情的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的虛構上。它是作為控制、壓逼和懼怕的全面壟斷的力量，使思想、道德和私隱被國家壟斷從而令它們非人性化。這種力量在很久以前便已不是只與一撮專橫統治者相關，它佔領並淹沒了每一個人，以致所有人都結合到它裏面去（即使沒有積極參與，至少是透過他們的沉默來進行這樣的結合）。沒有人真正的擁有這股力量，因為事實上是這股力量擁有每一個人，它是一頭怪獸，不但不聽人類指引，反倒拖曳着全人類，沿着它的「客觀的」術勢——客觀在它脫離了所有人類標準，包括理性而言——進入恐怖的未知的將來。

讓我再說一遍：這種極權主義力量是對當代文明的嚴重警告。或許在甚麼地方會有某些將軍以為，只需用武力把這類制度從地球上剷除掉，世界便會美好起來。可是，這跟一個身段平凡的女子，以為只需把提醒她的鏡子打碎便能解決身段問題，沒有分別。這種「最後解答」正是非個人化的理性的典型夢想，能夠（如「最後解答」這個詞彙形象地提醒我們）把夢想轉變成現實並而把現實轉變成惡夢。它不但解決不了今日世界的危機，反

而——要是還有人生存的話——更加劇了危機。它為早已負擔沉重的文明再添加上數以百萬計的死亡，卻阻止不了其極權化的趨勢，反倒加速了它。這將會是一場代價慘烈的勝利，因為勝利者將來自如斯的一種矛盾：要勝利便要更像敵人，像得比今日任何人願意接受和可以想像的程度還更厲害。隨使舉一個小例子：試想一下，在國家、民主、進步和軍事紀律的名義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個多大的古拉格羣島式的監獄，才能把所有拒絕參與行動的人拘禁起來（不管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天真、原則、還是因為恐懼或邪念。）？

只對付表面的徵狀根本不能消除任何邪惡，我們必須從原因本身着手。

我常有機會與不同的西方知識分子談話，他們到我們的國家訪遊，想在行程中探訪一下異議分子。有一些人這樣做是出於真正的關懷，或者很希望去理解，和表示團結與支持；另一些人只不過是出於好奇：在旅遊者看來，除了哥德式的和巴羅克式的紀念館外，異議分子顯然是沉悶單調的旅程中唯一令人感興趣的事物了。這些談話常常有啟發性，我從中學到很多，認識到很多。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你們人數這樣少，又幾乎沒有甚麼影響力，你真的以為能改變任何事情嗎？你是反對社會主義呢，抑或只是想改進它？你會否譴責在西歐部署潘興二型飛彈和巡航導彈？我們能為你們做些甚麼？你所做的一切只會為你帶來迫害和牢獄，卻又沒有可見的成效，是甚麼驅使你去做現在你所做的一切呢？你會不會希望在你的國家重建資本主義？

提那些問題的動機都是良好的，從渴望理解出發的，而且顯示出發問者真的關心世界的實況和將來。

然而，正是這類問題不斷一次又一次的向我揭示出很多西方知識分子是如何壓根兒不明白——在某方面言，不能明白——究竟這裏發生了甚麼事，究竟我們這羣所謂「異議分子」在為甚麼

奮鬥，和最重要的，我們的處境最終說明了甚麼。例如，就拿「我們能為你們做些甚麼？」這個問題來說，當然可以做很多很多。愈多自由思想的人支持我們，關心我們，跟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們便愈少被捕的危險，愈有希望我們並不只是荒野中的一聲吶喊。但是，在這個問題深處的某個地方有內在的誤解。畢竟，說到最後，關鍵並非幫助我們這一小撮「異議分子」能暫時不致入獄，甚至也不是幫助捷克與斯洛伐克這個民族能生活得好一點、自由一點。我們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幫助自己。我們等待別人的幫助太久了，太依賴於此了，也失望得太多了：要嘛就是人家在最後一刻毀約，要嘛就是結果跟我們的預期完全相反。在最深刻的意義上說，還有某些事情更為生死悠關：救贖我們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對話者。難道它不是與我們全部人相關嗎？難道我的暗淡的前景，或者相反，我的希望，不也同樣是他們暗淡的前景和希望嗎？難道我的入獄不也是對他們的公開侮辱：他們受到的欺騙不也是對我的攻擊嗎？難道在布拉格人類的毀滅不也是每一個地方人類的毀滅嗎？難道對發生在這裏的事視若無睹，甚至心存幻想，不正是在為其他地方發生同樣的悲劇做準備嗎？難道他們的慘況不正是我們的慘況的先決條件嗎？關鍵並非某個捷克異議分子作為一個受難者需要幫助。我能够最好的幫助自己脫離危難，只要我不再做「異議分子」便成了。關鍵是那些異議分子徒勞無功的努力和他們自身的遭遇告訴了我們甚麼：是關於這個世界的環境、命運、機會和困難等各方面，他們見證了甚麼：是他們如何作為或如何可以作為他人的思想養料的方面：是他們了解自己的命運（因而也是我們共享的命運）的角度：是他們在甚麼形式下變成向我們的探訪者提出的警告、挑戰、威脅或者教訓。

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也是這樣。它給我一種來自上個世紀的深處的感覺。在我看來，這些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和多

層神秘化的範疇根本離題萬丈。問題根本不在於此，它其實更為深刻，並與所有人都同樣相關：我們應否——先不管用甚麼方法——努力把自然世界帶回給政治，並使之成為政治的真正舞台？應否重新恢復人類個人經驗作為評斷事物的首要標準的地位？應否置道德於政治之上，置責任於欲望之前，使人類社會有意義，使人類的說話再獲內容？應否把重建人性的「我」——自主的、整體的、有尊嚴的，因尊崇——更高的存在而自我負責的「我」——作為所有社會活動的核心？在面對這場極為簡樸而又有全球意義的嚴酷鬥爭（反抗非個人化權力的擴張）時，究竟對手是一個西方的經理抑或東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點問題，根本毫不重要。如果我們能保衛自己的人性，那麼可能還有一線生機，使我們也能找到某些更有意義的途徑去平衡我們的各種自然權利，去參與經濟決策，去取得有尊嚴的社會地位。配合行之有效的所有推動力，我們或許能在真正的市場交易中創造出合符人性的企業。然而，假若我們不被保衛自己的人性，我們便不用指望任何用以改進經濟運作的科技設計或組織安排可以保護我們，正如在工廠煙茆加裝過濾器不可以阻止普遍的非人化發展。畢竟，制度運作的目的是甚麼，比它如何達致目的更為重要得多。難道為全面毀滅服務不也是可以運作得頗順暢嗎？

我這樣說是因為，從命運分配給我的角度看這個世界，我無法避免如下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民，仍然並不明白當代的真正危機是甚麼。

舉例說，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種今日西方知識分子搖擺於其間的政治選擇，我們便會發現，它們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玩相同的遊戲，這個遊戲由權力的匿名性操縱。正是這樣，它們其實是殊途同歸的：向着全球極權化邁進。這個匿名理性的遊戲其中一種玩法，是繼續調弄物質的奧秘（toying with the mystery of matter）——「扮演上帝」——不斷發明和部署新式的威力強

人的武器，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衛民主」，然而事實上卻把民主貶成「不切實際的幻想」（uninhabitable fiction），這在東歐，社會主義制度早已是如此了。

匿名理性的遊戲的另一種形式，是所謂「為和平而鬥爭」（Struggle for peace）^②運動，這誘人旋風捲入了很多認真的好人投身其中。我常有這樣的印象：這股旋風是非個人化權力所設計和調度的，這奸詐的、瀰漫一切的權力以更詩意的手法征服人類意識。請注意，我所說的非個人化權力，是一種充斥全球的原理，而並不只在莫斯科——說真的，莫斯科還沒有能力去組織甚麼事情足以像當代和平運動那樣廣泛普遍。然而，在這個理性主義的和意識形態的世界，要使一個誠實和思想自由的人（一切非個人化權力的主要敵人）迷失，還有比下述方法更好的嗎：告訴他／她最簡單易明的論題，伴隨着高貴目標的各種表面特徵，讓他／她去為此奮鬥。要毀滅公正的心靈——先迷惑它，然後佔領它，最後令它失去理智的批判能力——你能想像甚麼比令其相信「反戰鬥爭」的有效性更厲害？比起欺騙人民，令他／她們以為只要干擾武器的部署（在任何情況下總得部署）便能阻止戰爭的爆發有更聰明的做法嗎？很難去想像一個能令人類意識極權化的更容易的途徑。武器始終都會部署在某個地方——這結果愈明顯，原先完全認同反部署的人就變得愈激進，愈狂熱，而最後愈與自身疏離。於是，被最高貴的意圖所驅使上路的人走到盡頭，卻發覺自己恰恰走到匿名權力要他／她去的地方：極權主義思想的巢窩，在那裏他／她不再是自己，他／她為了另一「不切實際的幻想」，放棄了個人的理性和良知！

只要還是為了極權主義的目標服務，我們稱那幻想做「人類福祉」、「社會主義」或「和平」都無關重要。當然，從保衛的立場和西方世界的利益着眼，有人宣稱「赤化總比死好」確是不太妙。然而，從全球性非個人化權力的角度看，藉此還可以炫耀

炫耀其邪惡無處不在——沒有更好的了。這句口號清楚無誤地反映出說話者已經不要自己的人性了，因為他／她已經放棄了一種能力——人藉着這種能力，可個人地保證和體認到使他／她超越自己的某些甚麼，甚至願意為這令生命有意義的某些甚麼奉獻出生命。柏托加曾經寫道，人若不願意為「賦予生命以意義的」犧牲自己，生存下去也沒有甚麼價值。③

正是在這個棄絕生命的世界上，在這樣的「和平」裏——即在日常生活的單調的條件下——最容易發生戰爭。在這樣的世界，沒有道德屏障——由最高犧牲的勇氣所保證的屏障——能對抗戰爭。大門向非理性的「保護我們的利益」的想法闊闊敞開。沒有願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通向萬人塚的第一步，堆滿像牲畜般被屠殺的人的屍體。「赤化總比死好」這句口號，作為向蘇聯投降的表述，沒有令我不安，但作為西方人民放棄追求有意義的生活和接受非個人化權力本身的表述，它令我震慄。因為這句口號的真正意思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為它犧牲個人的生命。然而，沒有了最高犧牲的界域，所有犧牲都失去意義。於是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價值和意義，結果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否定人性的哲學。對蘇聯的極權主義而言，這種哲學只不過提供了多一點點政治上的幫助；對西方而言，這種哲學直接產生極權主義。

總之，我總有這種印象：西方文化對自身的威脅，遠遠超過SS-20飛彈對它的威脅。當一個法國左派學生目光懇切地對我說，古拉格羣島是為社會主義理想所繳納的稅，蘇辛尼津兄不過是一個心懷個人怨恨的人時，他像是把我投擲到深深的憂鬱裏。難道歐洲真的不從自己的歷史學到教訓嗎？那個快樂的年輕人能否明白，即便是「普遍幸福」的最誘人的計劃，一旦要求一個人非自願的赴死（即非自覺的為生命的意義而犧牲），就等於承認自身的非人性？是否直至他自己也被囚禁在Toulouse附近的蘇式監獄，他才能理解這點？現代的新語言是否已滲透到自然的人類

說話裏，以致即使是如此基本的經驗也無法溝通？

在經過前述的嚴厲批評後，我看來得解釋一下，在當代世界的政治兩難面前，我認為甚麼才是今日西方人性的有意義的選擇。

正如我全部所說的指出，我以為，我們所有人，不管東方抑或西方，面臨一個基本的任務，其他的任務相比之下都是從屬的。這是一個抗拒的任務——警戒地、深思地、專注地抗拒，但同時在每一個步驟和任何地方都全身投入——抗拒那匿名的、非個人的、非人性的力量的非理性發展趨勢，即是：抗拒意識形態、黨官僚、官僚、人工語言和政治宣傳口號的力量。不論它以消費、宣傳、壓抑、科技還是陳腔濫調的形式出現，我們都必須抗拒它複雜與全然異化的壓力，這種種形式，其實是狂熱主義的兄弟，是極權主義思想的溫床，我們必須不怕被嘲笑，從我們的自然世界中揀選準則，重新確認那裏被否定的真確性。我們必須以智慧的謙卑之心，去讚美自然世界的各式界線，讚美界線後的神秘，並接受顯然是超出人類能力以外的存有（Being）的秩序裏有重要的東西。只要我們願意，我們會不斷再發現和經驗到我們的存在（existence），此存在的絕對界域，我們必須恒久地與之關聯。我們所有的行動，所有由個人體證、公開地思索和不被意識形態檢查的生活經驗，必須以價值和責任為出發點。我們必須相信自己良知的聲音多於一切抽象推論，而且只對良知的呼喚負責。我們必須堂堂正正地承認自己有愛、友誼、團結、同情和忍耐的能力，根本不用為此覺得難堪；正相反，我們必須把自己的人性中這些基本方面自「私下的」放逐中召回，並以之為有意義的人類社會的唯一真正起點。

我知道所有這些聽來非常籠統，含混和不現實，但我向你保證，這些表面上幼稚天真的字詞，源於非常具體真實而難得的與世界同在的經驗，容許我這樣說，我知道我正在說甚麼。

非個人權力拖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之路上走，沿途盡是火箭發射台和被蹂躪的自然。它的前鋒，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極權主義政權。無論是忽視、原諒、歡迎、或是接受它們的遊戲手法，從而令我們變得跟它們差不多，都是不可能的。我確信面對它們的最好方法，是沒有偏見地研究它們，從中學習教訓，徹底而激進地與它們區分開來——並不是簡單地與體現了極權主義精神的顯而易見的邪惡鬥爭，鬥爭是應持續不斷的，對象就在四周，在每一個地方，因此甚至在我們心裏。我們自己下決心，以回歸人類自身和重認對世界的責任來否定這種邪惡，比之於用火箭指向這個或那個國家，更能戰勝邪惡。對抗極權主義的最好防衛方法很簡單，只需把它從我們自己的靈魂、我們自己的環境、我們自己的土地趕出來；把它從人類中消滅掉。對所有極權主義政權下的受害者的最好幫助，就是去正視和對抗構成極權主義制度的邪惡，極權主義制度從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鋒」也是由此得到滋養。

極權主義制度假如不能充當某些東西的先鋒或前哨，它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重新肯定人類的責任，是防衛一切不負責任的最自然的屏障。例如，如果先進世界的精神潛能和科技潛能不是只在自私的利潤計算的壓力下，而是真的負責任地傳播，我們便能夠防止其不負責任地轉化成毀滅性的武器。從原因方面考慮和運作，比起簡單地待影響出現後再反應，肯定有意義得多，否則，按照常規唯一可能的反應便是用上同等不道德的手段。繼續這種做法，等於繼續在世界上擴散不負責任的邪惡，結果正是製造出餵養極權主義的毒藥。

我贊成「否定政治的政治」：即是說，政治不再作為權力和操縱的科技學，不再作為高於人類的控制論規律或利用的藝術，而是作為找尋和達致有意義的生活，並保衛這種生活，為這種生活服務的眾多途徑之一。我贊成政治應作為可實踐的道德，作為

對真理的服務，作為對我們人類同胞真正的、人性的、並以人性為判準的關懷。我看得出，在這個世界上，這進路是極不現實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是極是困難的。然而，我看不到有更好的選擇。

當受審訊和服刑時，我直接感受到國際團結的重要性和有益的力量。我永遠感謝所有那些聲援。但是，我不以為我們這些在我們的環境下努力去宣揚真理的人，是處於只是接受幫助的非平衡位置，而不能回饋我們的力量去支援對方。

我肯定在蘇維埃集團裏所謂「異議」是一種很特別的現代經驗，這是一種在沒有人性的權力堡壘中的生活經驗。正是由於這樣，「異議者」有機會甚至有責任去反省這種經驗，見證它，傳遞開去給幸福的沒有經歷過它的人。於是，我們也一樣有相當的機會以某種形式去幫助那些幫助我們的人，在我們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類的利益上去幫助他們。

這些基本經驗其中之一是：否定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是有效的，即使它本質上無法事前計算效果。這種效果，肯定跟西方對政治成效的考慮完全不同。它是隱藏的、間接的、長期的和難以量度的。通常它只存在於看不見的社會意識的領域，因而也幾乎不可能去決定它的價值和它形塑社會發展的貢獻——如果有任何貢獻的話——有多大。

但是，愈趨明顯的——我認為這是一種有本質意義和普遍意義的重要的經驗——一個無權無勢的個人敢於為真理吶喊，並以自己個人的全部生命來支持自己的聲音，即使形式上被剝奪了選舉權，卻比數千計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驚的更強大的力量。愈趨明顯的，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別是在這處更受烈風煎熬的赤裸前哨中，依然可能用個人經驗和自然世界去對抗「清白的」權力和揭穿它的罪惡，就像《古拉格羣島》作者所做的一樣。愈趨明顯的，真理和道德能夠為政治提供一個新的起步點，而且，即使在

今天，也有其不容否認的政治力量。一個勇敢的科學家，儘管被困在偏遠的鄉間，被受唆使的周遭社會所恐嚇，他所發出的警告，卻能越過大洲，為他人所知悉，並且比起整隊整隊的受僱宣傳者的自言自語，能更清楚地對這個世紀的強者的良知說話。愈趨明顯的，全屬個人範疇的像好與邪惡等觀念，仍然自有不含混的確定內容，而且，在某些情況下，足以動搖貌似無法動搖的權力及其軍隊、警察和官僚。愈趨明顯的，政治沒有理由再只是專家的事情，隨便一個人，例如一個電子工程師，只要心術端正，懂得讚美能使他超越和無所懼怕的某種力量，一樣可以影響他的民族的歷史。

是的，否定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自下而上」的政治；人民的政治，而不是黨官僚的政治；由心滋養成長的政治，而不是由理論推衍出來的政治。並非偶然的，這充滿希望的經驗必須就在這嚴酷的城堡上生衍，在單調的「日常性」（humdrum everydayness）的環境下，我們只得先沉到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當柏托奇加寫有關七七憲章的文章時，他用了「振作者的團結」（solidarity of the shaken）這詞彙。他想到的是那些敢於以自己唯一能支配的東西——自己的人性——去反抗和面對非個人化權力的人們。由這些振作者團結成的國際社會蔑視國界、政治制度和權力集團，不參與傳統政治的腐朽遊戲，不追求名望和職銜，努力從被權力工程師嘲笑的現象——人類良知的現象——中締造出真正的政治力量。難道較美好的將來，它的前景不是依賴於振作者的國際社會這一類東西嗎？

註釋：

①Václav Bělohradský, *Krise Exchatologie Neosobnosti* (*The Crisis in the Exchatology of the Impersonal*), London 1982.

- ②原英譯本編者（John Keane）註：關於哈維爾對和平運動的跨歐洲對話的貢獻，其背景可參考Jan Kaven和Zdeba Tomin編的*Voices From Prague: Documents on Czechoslovakia and the Peace Movement*，1983年倫敦出版。哈維爾有關這個題目的最重要作品是*Anatomy of a Reticence, East European Dissidents and the Peace Movement in the West*。1985年斯德哥爾摩出版、1987年倫敦出版。
- ③Jan Patočka, *Kacirské Eseje*, 1980慕尼黑出版，法譯 *Essais Hérétiques*，1981年巴黎出版。

奕雯 譯 李金鳳 校

1984年，University of Toulouse授與哈維爾名譽博士學位，為此哈維爾寫了這份講詞，但後因無法獲得護照而沒有出席典禮。本文轉譯自E. Kohak 和R. Scruton的英譯本。

「七七憲章」 意義何在？

「七七憲章」運動源起以來，一直要面對一個基本問題：從事這麼危險的活動，究竟有沒有產生實際的政治影響？「七七憲章」做的事，有沒有意思？

「七七憲章」即將進入第十周年，這個問題重新挑起我們的思索，我想是順理成章的。這樣做會是有益的重溫，儘管思考的結果很可能不過重申以往的說話，未必會有新意。但這又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憲章」的本質就是不斷反詰、認真正視這個問題。

.....

華約軍隊入侵之後，以往被公開譴責為極度違反人性的一切事物（當局曾信誓旦旦地允諾這些事不會再發生），不需多久已經捲土重來，而且迅速鞏固，也沒引起一點內疚。人們也同樣迅速地不再對任何事表示詫異。曾幾何時，人們熱情奔放，一旦希望幻滅，全社會陷入冷漠沉寂之中。專制制度再次構建，人們大

都放棄雄心，不再願意介入公共事務，接着是連關注也拋開，退入個人生活圈子裏。對投身公眾事務的信念業已消失。仍未完全死心的人，則被狠狠地懲以鐐銬。社會崩解分化。獨立思考和創意性活動避匿在私生活中。多姿多采的橫向社會聯繫一度為真正的公眾生活創造了空間，現在已經支離破碎；無歷史感的、專制制度的消費主義的空虛沉默則覆蓋着大地。人們覺得被政治欺騙了，於是掉頭背向。同樣地，人們對所有意識形態表示反感，因為他們日夜都要在鬱悶灰暗的現實中過活，而高調子的、裝腔作勢的意識形態，只會為這現實遮羞。不久前還那麼強烈的團結精神，一下子煙消雲散。人們變得自私。恐懼統治着一切。人們無異議地接受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盡忠職守，內裏甚麼也不相信。

這不僅是政治危機。這也是道德危機。

……

質疑「七七憲章」的意義，由是就很自然了。「憲章」尋求與政權對話被拒絕，政權既不與「憲章」討論，對它的建議也不聞不問。它宣布「憲章」是一幫「政治遺孽」並把他們交給警方。而同時，社會也不見得有甚麼認同「憲章」的表示。聯署人的數目沒有多少增加，沒有甚麼重要的社會層分無保留地參與，也沒有公眾公開地表示支持。反之，一般的印象是人們與「憲章」保持一段距離，不敢與它有甚麼瓜葛。人們甚至可以認為，「憲章」根本提不起他們的興趣。這麼，「憲章」取得了甚麼具體的成效嗎？它要怎樣做才能扭轉局面？它不是實際上失敗了嗎？

我認為，假如不全面地了解「憲章」進行活動時的社會狀況，不了解「憲章」的本質意義——它是甚麼、想做甚麼、產生、嘗試如何影響社會的一般狀況——便不可能恰當地回答「七七憲章」有甚麼實際政治意義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上述基本了解而要衡估「憲章」有甚麼意義，就好像沒有碼尺卻要量度一件物件的長度，又或用錯了量度的手段，用秤來量長度，用尺來秤重量。

……

由自己來強調本身行為的道德意義，往往會有自命不凡或至少是不够謙遜的危險。遺憾地，除非我們解釋了「憲章」活動的道德基礎，（至少是為了保存真實、記錄在案），否則將無以界定「憲章」的意義。因此，我不得已要冒自吹自擂之險了。

發起「七七憲章」，並不是為了另樹一幟，抗衡政權現行的政治或意識形態系統。「憲章」無意成為一支政治力量與政權競逐權力，也無意自翊為取代當權者的更佳選擇。誠然，「憲章」的聯署人中，有曾任政府官職的人，有許多擺出政治立場的人；甚至，假如情況轉變（看來是不大可能的）而時機到來，也有一些人是有能力參與政治權力運作的。不過，所有這些，卻不會改變「憲章」（至少它的內在動機是如此）並非要為危機提供政治解決方法的事實。在外面開放的社會或沒我國那麼士氣低沉的社會，某些觀察者很自然地會認為要有政治取向才較合情理。可是，在「憲章」的情況來說，假如是這樣來理解，就會是徹底地誤解了時局和憲章。

要我們社會的民衆面對社會的道德危機，只有一個合邏輯的、有意義的方式，就是採取一個道德立場。

我絕對不是首個這樣理解「憲章」的唯一目的的人，我估計我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憲章」創始的一刻，柏托奇卡（Jan Patocka）也是這樣理解的。「憲章」以後的反思及內省，大體上或是與柏氏同一理解，或是以其理解為出發點。

……

要理解「憲章」的取態的基本性質，最容易的方法是探知直接催生「憲章」的環境。

在七十年代中期，社會復甦的跡象逐漸出現——雖然，正如流行的說法一般，只環繞一羣「知名的小眾」。很多人從較早前的歷史震撼中恢復過來；很多人終於拋開僅餘的幻想，開始讓思想自由奔馳；他們之中就有很多人「厭於散渙」，開始明白到不應再等別人（從上面？從外面？）來改善現況。很多人受够了，不願永無休止地扮演歷史被動者的角色；他們開始感到需要成為歷史的某種主體。那些為數不少的隱遁者被他們避難所發出的晦臭薰得透不過氣，重新感到自己對社羣的整體命運有一份責任。還有那些逐漸長大的年青人，因為年紀的關係，沒有經歷蘇軍入侵所引起的震慄。到當時為止還沒有交往的、或只關注自身發展的各類團體，開始感到需要跨越現存的界線，即是，要公開活動了。團結精神再一次冒頭，隨之而來的是對自由不可分割的認知：人們開始明白侵奪一個人的自由，等同侵奪所有人的自由；當社會因人們的冷漠而分割，當社會上有部分人仍對受迫受害者視若無睹，任何人都不能祈望自己可以從全面的擺佈中解放出來。

1976年，搖擺樂隊「宇宙膠人」的成員和支持者被判入獄。統治者這項行動，超乎他們在七十年代初期打擊政敵的做法，已經直接打擊生命本身，即打擊生命以其自發及至高無上的方式自由地表現自我的衝動。人們察覺到這行動所代表的危險，立刻發生我在前面描述的轉變。新的氣候在具體事例中反映出來：從各團體衝破小圈子的決心到深切意識到自由之不可分割性。「知名的小眾」的行動並不是偶然的，它是醒覺中的社會意識對統治者這項行動順理成章的反應。支援被迫受害者只會加速醒覺的成長。曾經分隔人們的障礙被推倒。廣泛的同舟共濟的氣氛露出端倪。

這一連串事件直接誘發「七七憲章」的產生，極不相同的個人和團體走在一起，提出互相支援和個人的社會責任這類意識，然後再將它轉化為社會現實。

「憲章」是胡薩克時代第一次對公民概念的重要肯定。它聯

結了作家和舊日的政治家、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知識分子和體力勞動者、大學教授和反叛的年青人。他們走在一起不是基於政治立場，而是基於更深刻的考慮。他們關心人多於政治，他們的共同動力主要是道德的。

這是絕對自然的，也只能這樣發生。它並不是專業政治分析、冷靜估量的結果；驅策人們採取道德的立場並不倚靠這些。這是良心而不是理性的結果。「憲章」的興起，並不是基於邏輯思維而是基於理想本身的內在邏輯，也就是當時的情況和人們對這情況所作的反應的邏輯。這是公民對道德敗壞情懇意切的反應，他們渴望反抗道德敗壞造成的壓力、拒絕接受強加諸人的精神分裂的狀態、衝破個人利益和恐懼的框框、離開個人的小天地、重新自視為社羣的一分子、不再為皇帝的新衣唱頌歌而是大聲說出真話——一句話，就是要憑個人的良心行事，重新像一個人那樣站起來。曾經被侮辱，被壓言論、被欺蒙、被擺佈的人，正努力抬頭、說話，拒絕接受謊言，自由地行動。他們嘗試行使曾經被剝奪的做一個負責任的人的權利，奪回人的尊嚴和完整性，以及重獲自尊。

我仍然清楚記得，參與簽署「七七憲章」的人士，在寫下名字後所表現的如釋重負的喜悅。他們的行動使他們心中感到充分的自我肯定——甚至是一分淨化了的欣悅。他們看似突然卸下肩頭大石，或者脫下穿上多年的緊身衣。他們目睹侮辱和欺騙的年代即將結束，變得生趣盎然。

這些感情並不是偶發的心理現象。我在這裏指出「憲章」對無數人的意義，正好說明它所代表的真實的、亦即道德的基礎。

……

道德基礎，或者道德原則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最基本的意思是我們不以「利」而行事——即不是由於我們肯定有立刻的、可見的、可確知的（因此本質上是外在的）成事

機會——而是只因我們認為理應這樣去做。道德的考慮驅使我們做正當的事，只因為那是正當的事，這是原則。相對於以利行事，這原則有賴於另一種信念：我們深信不論何時，做正當的事都是有意思的。我們當然希望這個真實意志的體現——或遲或早，以它自己特定的方式——得以昭示於世，在人間扎根。同時我們完全知道可能甚麼也不會發生，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所抱的宗旨。我們的確信本身，就包含了準備接受至終的失敗；換一句話說，道德動機驅使我們不管何時、怎樣、甚至是否能夠成功而去做某事。亦即是說，做這件事沒有任何保證將使我們得益，獲得成果。

參與憲章運動的人士並不頭腦簡單，不會自欺地相信政府會立刻跟他們對話，或社會會立刻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亦不相信他們的行動會帶來任何即時的改善。他們最清楚不過的只有一件事：他們將會被懲罰。

然而，他們義無反顧。他們做了自認為正當的事，深信無論何時這都是有意義的。他們常常希望，終有一天，這行動在他們內心產生的良好感覺得以顯露，就算是顯露得多麼緩慢、間接和難以察覺，也會添加一分喜悅。套用柏托奇卡廣為人所稱頌的說法——他們深明有某些理想是值得為之受苦的。

外界的觀察家假如要適當地評價「憲章」的意義、估量它確實的目標，他們一定要先自問一下，「憲章」到底是否道德復甦的行動。只當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們才能夠開始審視憲章更廣泛的社會意義；然而，即使這樣，也得在這唯一的範圍內才能找到：即秉持道德立場會產生政治效應的範圍。對於慣於在表層觀察政治行動誘發政治效應的觀察家而言，這是更難以掌握的領域。

讓我們試探這條路，看它帶我們走到那裏。

「七七憲章」是否真的一項道德復甦的行動？

.....

如果我們細察「憲章」的實際行動——這裏主要是指閱讀它的文件——我們不難發覺它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堅決地用上公民這個字的最良好和最完整的意義來談及人民。「七七憲章」可以被形容為公民意識再生、公民良知和自覺甦醒的表現，它是公民伸張權利——那些在理論上屬於他們，在實踐上卻被壓抑的權利——以及行使權利的手段。從而，他們再不當奴僕，並覺醒到自身的自由。

這樣的成就可能看似微不足道。或許會有人想「憲章」不久會直截了當地提出它的政治綱領，並為此更稱頌「憲章」。

這誠然是一直存在的選擇。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這樣做，而「憲章」不單不會阻攔，更會全力支持他們採取這一步的權利。然而「憲章」本身的目的卻有所不同。這目的看來謹少微慎，但在某意義上，卻更加野心勃勃。

政治綱領存在的機會——將存或亡、得到或喪失支持、對事件能否有真正的影響——端視乎這種視野是否和更新的公民操守（citizenship）並存，而這正是「憲章」在締造的視野。俯首低頭的羣衆沒有能力體認、確立和肯定一個政治綱領，只有自由和自主的公民才可做到。沒有公民就沒有政治。你只可以從根基築起房舍，而不能從屋頂開始。政治並不能導致公民操守的更新。相反，公民操守才是政治的先決條件。

我會進一步加以說明。政治是可變更的，而公民操守恆久而又決定性的需求作為政治的先決條件則無可妥協。這需求是永無止境、永不涸竭、永遠新鮮、無以滿足。因為它需要勇氣，尋求真理的意志、良知，內在的自由和對公眾事務的責任感。我們何時才能聲稱已經滿足所有這些要求呢？

我們可以跟隨喜登力（Ladislav Hejdanek）的論調，說政治目的是有限的，而「憲章」的目標則並無止境。

它們並無止境乃由於它們是道德的。

那麼，相信公民更新只是道德更新的一方面、結果或表現，是否錯的呢？我們能夠視之與道德動機毫無關係嗎？說到底，公民必須是全心全意並克盡己責的，這是「憲章」心目中的公民，他要隨時在身心上都準備接受——責任遠比報酬為大！

我相信，從「憲章」日復一日地致力於徹底更新公民操守這努力本身，已是它在公眾事務上的立場有一個真正的道德基礎的明證。

.....

「七七憲章」之目的不在於拖垮現政權，或破壞現行的社會秩序；因而亦不會攻擊現行的法制。相反，「憲章」傾力尋求更新公民操守的方法，正好是要求法律能夠切實執行，獲得尊重，引起人們關注現政權對法例無節制的解釋權，及要求權利不是紙上談兵，人們得以真正行使。對那些它認為是壞的法例，它會通過合法途徑要求修改。這種做法決定了它和既成權力的關係：它堅持不懈地給國家機關呈交文件，雖然後者恆常地冷漠，並從不（正式）討論有關文件。

這種做法或許會招來反對。向他們提了十年書信而從來得不到回覆，還有甚麼意思？這不是毫無意義的行動嗎？這種做法不是實際上肯定了那個罔顧人民意願的政權，並且為他們的認受性制造幻象嗎？不是使人更覺得，任何的改善都有賴於「在上位者」，而「在下面的」則無能為力？不是替這個徹頭徹尾的專制統治披上一層想當然的民主面紗嗎？這不是讓人以為，我們相信「他們」也希望改善情況、留意我們的意見，儘管我們都清楚「他們」為所欲為，而武力是「他們」唯一所了解的手段？

從一個政治或務實的角度看，情況可能是這樣。但是，假如我們從另一角度看，準備理解道德取向所獲致的政治效果，情況就並不相同。如果我們用即時的效果來衡量，政權的力量和認受

性好像加強了；但現實是，從歷史的將來和我們堅守的原則出發，一直得到鞏固的是**公民醒覺**。政府會變更，法制會轉變，甚至社會制度亦然。但有些事物是恆常而又切身的，這個理念是，**公民必定要——原則地——承擔社羣命運的責任**，堅持不懈。他們要不斷地以洪亮的聲音說出真相，而不理會一時的反應（當然要以合適的態度）。同時，他們應使社會上其他人和當權者知道他們的想法，要求政府不要漠視這些真相。這些行動的目的——在不同時候有不同效果——是要為**民主的公眾辯論**創造空間，從而幫助提醒和恢復公民有權處理公眾事務的原則，並確認個別公民參與這過程的權利。

「憲章」的工作並不在於判別國家領導人的性格，它要做的是行使歷久不變的基本公民權利，作為國家事務的一面鏡子。

因此，我再次重複，向這個政府不斷發出呼籲是否有意義這種短期的政治考慮，總要面對人人關心公眾事這道德原則。換一句話說，以一個自由公民的身分行事，關注「置身其間」的權利和責任，在任何時候——直到永遠——都是有意義的，不管這種行為要多久才能滲透到一般人的意識——或者到底在某段時段能否發生作用。

.....

要衡量「七七憲章」在過去十年發出的數以百計的函件內容，不應是我去做的，就算我有條件這樣做。但是，就算這些函件沒有以最好的方式去處理某一問題（永不犯錯已可算是奇迹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撰寫這些函件時，我們的動機都是為了就某問題提供一幅真實的景象。

就算是最出色的政治家，為了迎合某些權力政治的口味，從而獲取權力政治上的利益，有時亦會裁剪自己的政治見解——無論多麼輕微或不自覺。然而，**「憲章」由於不以權力政治為目的，能夠不受牽制地追求真正無私的真理**，即不以個人利益為依

歸的真理。

我們都知道，「完全屬實，並無虛言」是難以想像的，然而，「憲章」在追求無私的真理時，仍堅毅地選擇了這條最不切實際和不要花巧的道路，正好是再一次表明它的道德立場和由此而引伸出來的永恆目標。如果追求真理在原則上是正確，同時又有意義的，那麼，這項原則亦要求我們任何時刻不向制肘低頭。

但就是在這一點上有時候也會引起混亂。有些人認為，假如我們願意向或這或那的政治力量或權威表示忠誠，我們所產生的政治影響力會更大。也許如此。但「憲章」一旦這樣做，就是出賣了自己。人們不能採取某一立場而拒絕接受隨之而來的後果。

……

我曾提過，「憲章」出現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們開始認知自由和權利是不可分割的。

這原則是公民操守更新和結果的先決條件和構成部分。一個人如果妨礙他人的公民身分，他就不可能成為公民（至少是在積極的和民主意義下的公民而言）；要肯定自己的公民身分，首先就要尊重別人的公民身分。只要有一個人被侵奪了這個權利，全部人的權利都受到限制。這個說法的意思是，公民——在法律、社會及政府眼中的公民——在原則上人人是平等的。沒有人會因信念、信仰、出身、性別、身屬某個社羣或團體或任何類似身分，而較其他人擁有更多或更少的權利和義務。他們運用或漠視這些權利和義務，即怎樣運用這公平的機會，則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

這信念亦深藏於「憲章」的多元主義中，是它的內在原則和普遍理想（或者是投射於「內在」的普遍理想）。假如有人在某時刻比其他人更顯赫，只會是他們的工作質素和個人的投入所致，而與他們身屬的宗教、政治或其他「憲章」內的組合完全沒有關係。即是說，他們的權威是有設限、被「認受」的，而不是

來自其他標準。

「憲章」不是一個聯盟。例如它並不像戰後的國民陣線。國民陣線實際上是一個政治聯盟，一開始就排除了不同的政治取向。「七七憲章」不是一個封閉的羣體，它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憲章上簽名，並以自己的方式來信守他的投身。

這種徹底的開放性、平等關係和由此產生及繼續發展的兼容並蓄，是現代捷克史上獨特的現象。在短期內，它不需要有任何巨大的重要性，但這並不減損它在道德上——亦即潛在的政治上——的意義。雖然，基於我們目前社會的屬性，它受到莫大的限制。但它仍能突顯那普遍的理想。它遠遠超越自身，以先行者的姿態，作為模範、挑戰和經驗，滲入社會的意識和記憶裏。至於未來會怎樣回應，我們只可以猜度；事實上，在我國，它說明了——雖然在很小的規模上——就算在現存的條件下，人民能夠堅持以民主方式合作。就算「七七憲章」明天消失，他們亦不能把這經驗從民衆的記憶中擠掉。

明顯地，就算是「憲章」的這一分貢獻亦難以用一般的政治標準來衡量，但這不等於它沒有發生作用。

.....

政客慣於說服公民相信他的觀點正確。他們使出渾身解數，用無數的保證和諾言來拉攏選民。他們又會拋出鋪天蓋地的政策和訴求。我們知道有些政客以指令、甚至恐嚇來獲取選票；他們發起集會，組織忠心的支持者，要求選民投他們一票，向他們表示支持、信任和忠誠。

「憲章」不喜歡來這一套，它甚至沒有刻意尋找新的簽署人。當然，任何人都可以隨時簽署，但「憲章」沒有組織任何的推廣活動。它不強求任何人做任何事，它不嘗試拉攏公民或者向他們作出訴求，不試圖教訓別人，或代表他們；它亦不因別人不支持它而耿耿於懷。

間接挑戰是它唯一可以被理解為向別人發出的訴求。「憲章」所有的行動都是自發的，且自己負上責任。它至多不過是起些示範作用，點明甚麼是可能的：即使在最艱巨的條件下，人民仍可以公民的身分行動，伸張並嘗試行使自己的權利。它陳示了，制度化的謊言雖然四處充斥，公民仍然可以說出真相，而每個人都可以不受高高在上的訓令而為全體承擔責任。一句話，它指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從自己出發，立即行事。

相信我，「憲章」並不想聚合最大數量的支持者，不想訓練他們，把權威建立在數量之上，將他們引向某個目標。

外國新聞工作者有時跟我說，憲章成員這麼少，很難冀望有甚麼影響力。這使我想起斯大林曾經問過教皇有多少屬土。我當然不是要拿梵蒂岡跟「憲章」比較，我只是想點明，「憲章」的力量——同樣適用於蘇維埃集團下的同類運動——來自人數以外的因素。

「憲章」的宏願是本着良知和信念行事，從而向其他人指出他們有同樣的機會：提醒他們同樣有自尊；提醒他們尚有真理。

「憲章」並不相信它的做法是最好，或者是唯一可行的，也不認為所有人都應效法。怎樣面對這間接的訴求，由每個人自己決定。他們必須跟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怎樣理解它，又怎樣、為何而受它激勵。任何人為社會做了好事，對「憲章」來說都是好的，「憲章」關心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整體的利益；它所宣揚的目標是普遍的目標。

單是為了這緣故，用「憲章」本身的成就或它的「地位」來衡量它的意義是錯誤的；重要的還是「憲章」的行事原則在社會上獲取了甚麼「地位」。

……

從上所述，也許現在大家比較清楚，要辨明「憲章」過去十年活動的意義，着眼點應放在那裏。我們指的是頗難判辨的社會

意識和潛意識的範疇：它存在於人的思維和道德視野中一些難以捉摸的活動裏，尤其當我們沒有清晰的準繩來比較過往，在日常生活的喧騰中更往往教我們忽略。當然，在某些時刻，我們還是能在無形的轉變中察覺到一些可見的事例。

在專制的條件下，這是個光怪陸離的領域。但正是為了這個緣故，我們更應追究。

在任何情況下，權力就是要施之於他人的權力。甚至在最專制的政權下，權力都不能兀自存在或超然於這個世界；在某程度上，權力是受它支配的人所創造的。政權和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它們間恆常地有說不盡的隱秘關連。在這戲局之中兩者經常轉換防守位置。在我們置身其間的專制制度裏，這些交往有它自己的特色和非比尋常的重要性。我們所面對的制度，不獨依賴直接的權力機器，一羣人以赤裸裸的權力支配另一羣人，遠不是我們社會的做法。相反，每一個人都被迫參與專制制度的運作，由是我們很難指出誰要對政權的所作所為負責。每一個人內心的一面都是一個奴僕，畏脅於他的上司，內心的另一面卻是可怕的奴隸主，一腳踏著下屬。專制制度就以這種方式把整個社會拖進它的網絡——不單成為它的受害者，同時亦成為它的締造者。表面上，每一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協助制度運作，但同時，在某程度上，內心深處又要反叛它，有權和無權的疆界穿越每一名社會成員，我們同時是囚徒，又是獄卒。

這是一個進退維艱的處境，使專制政權陷於危機四伏的境地：一方面，它使自己無處不在，但矛盾地，它反而加強了這個它要壓制的因素，使生命包容真理和追求自由的自在意向顯得無處不在。眾所周知，這些意向是深藏不露、被控制和查禁的，但是它們自覺存在，而單是它們覺悉到無權狀態這一點，已對當權者構成威脅。在這領域內，對政權的無遠弗屆的愈多認同，反過來又有助於對無權者的倍加認同。全面奴性一旦結束，全面支配

亦無以為繼。被統治者受權力感染而當權者又會感到無權。說得清楚一點，權力核心的運作從來未曾獲得那麼多人民的支持——亦從未曾面對如此多的無聲反抗。人民都聽命行事，思想卻我行我素。在這分裂的狀態裏，甚至權重位高者亦感到自己被破開兩邊。

無論受到多大的障礙，生命的真正意向不斷從內部滲浸整個權力架構，令之潛移默化。政權要向社會適應，因為後者與前者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不為人察覺間令政權適應社會的需要。社會因而點點滴滴而又不無艱辛地褫奪了政權的部分權力。單是為了這緣故，我們不能不重視在人民所表現的冷漠背後發生的一切。

但這不是我們認真對待這情況的唯一理由。無法體現的人性和社會動力被抑制後所產生的壓力和由此而來的普遍不滿，並不是困在地牢裏，可以在危機來時輕易地安撫；它是在整座大廈裏。因此，危機最後的爆發以何種程度出現，政權怎樣回應，是十分不確定的。

由此可見，最不智的，是低估社會靈魂那肉眼看不見的活動，又或低估道德（不管怎樣也是屬於「先於政治活動」的存在範疇）現象和行動在某些情況下（這裏談及的是政治生活實際被取消的處境）所產生的非比尋常的、政治上的影響範圍。

……

還是讓我們回頭再談「七七憲章」吧：

我們不能以簽署者或予以支持的人數來衡量「七七憲章」；我確信它對社會意識的影響更為深遠及重要——無數個人及一般的經驗更加強我這信念。

首先，儘管政權不斷想殲滅它，但它繼續存在——生氣勃勃地存在，以致再沒有人要認真將它取締。換一句話說，政權只能適應它——這只反映了社會是多麼接受它。因此，那些「曾經一

度」的人士，雖然要付出諸多不便的代價，但他們已經獲得存在的權利。今天，「七七憲章」已經是社會生活中一個無可置疑的組成部分——雖然它的地位十分不尋常，它是國家不得不容忍的社羣，又是國家公開宣稱的敵人。如果沒有社會默默的尊重、國外的公衆支持，以及，更不用說政權內的不便公開的尊重，這情況是沒有可能存在的。

然而，「七七憲章」若單是存在而沒有內涵和身分——假如這種情況是可能的話，這種存在也不足取。

我相信，有兩個重要因素，使「憲章」的身分得以在民衆的意識裏建立：

1) 「憲章」說真話。所有人都察覺到這點，無論他們怎樣看待它的重要性。國內和國外的人民都知道，政府亦然。更重要的是政府知道國內外的人民都知道，這迫使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退讓。雖然公民只能從外國的廣播中得知「憲章」各文件的內容，但到現時為止，已頗為足夠。現在無數人收聽外國電台，人們得以知道「憲章」活動的概略。

2) 基於現政權對待「憲章」的態度，使之代表了一種極端的選擇，令一般人難以追隨。然而，這正好使它構成——雖是無意的——某種道德標準並以此為鑑（雖是負面意義的）。它像地平線上一個消失點，聯繫起所有的立場而又不需跟它們融合。它協助重建一套準繩制度，提供穩實的座標探測不同的立場（我曾經多次聽過，一些跟政權妥協的人說，如果沒有「憲章」的存在，他們會妥協得更多）。可以這樣說，人們感到「憲章」正在監察着他們。對很多人來說，「憲章」更是一種保證，當他們跟手段衆多的政權發生衝突，再無路可走，仍然有一個羣體支持他們。今天，當人們回顧「憲章」成立前的日子，他們會深深震驚於那段虛無的時期，公民價值處於模稜兩可的狀態。

這些活動現在已經產生很多實際的效果。舉幾個例子就足以

說明：政府有時會——所謂「湊巧地」——嘗試解決「憲章」提出的問題；又或「憲章」為獨立的文化開闢了空間，並予以全心全意的保衛，使之獲得史無前例的發展；此外，還有各類在現存架構下獲得社會解放的微細的徵兆，以至「憲章」將政權的不擇手段、違法犯紀的行事公之於世，使政權懼怕由此招來的國際指摘（這正好顯示「憲章」基本上扮演了監察政權的角色）。

我不會高估「憲章」在這方面的可見成效。我提到上述數點，只是作為時代意識「無形的改變」的「可見例證」——即是那些至為重要的事物。

我們始終難以確定「憲章」的催化作用引起或加速了何種過程，亦難以確定它的走向。「憲章」毋需要為這些難以掌握的結果而憂慮；我們已經指出，「憲章」的意義並不在於宣之於世的確鑿成就，否則它也不會與我們並肩同行至今天。

.....

七十年代前期——那段了無生氣、灰暗空無的日子，人們似乎對甚麼都漠不關心——瀰漫着這樣的氣氛，彷彿我們再沒有歷史。歲月漫無目的地流逝。生物性的時間延續着，社會性的時間則停滯不前。一切事物不再自動自發，也了無益處。所有「事件」都井然有序，但又沒有意義。

相對獨立的個體作出社會決策的自然多元性一旦消失，我們就感覺到歷史已經停頓，隨之而來的是它們之間難以預計的互動。換一句說話，歷史消失於集中主義的政權將自己變成作出社會決策的唯一主體的一刻。這種情況取消了真實歷史的先決條件：未來原應是一本開放的書。

多年下來，「七七憲章」是第一個自主的社會主體，跟中央集權的政權分庭抗禮。它出現的一刻，立即使各種關係的互動重新活躍起來——國家和「憲章」的關係、社會和「憲章」的關

係、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一個被認為已經死去的軀體，重新顯露生命的徵示。

歷史開始回歸。

未來再一次成為一本開放的書。

……

也許會有人再強行合上它；也許所有希望之苗會被扼殺，歷史的希望再一次被逐出我們的國家；也許「七七憲章」的一切努力都是微不足道；也許我們已獲取的少許東西將會消失；也許「憲章」協力加速的無形轉變會慢下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只會有少數的歷史僻才記起我們；又或者我們將完全被遺忘。

我不太相信這會發生，但我們亦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

最奇怪的是，就算這些真的發生，我們也不會在離開這多災多難的世界時，感到自己曾做過的都一無是處。

阮志雄 譯 劉健芝 校

本文是哈維爾在1986年為「七七憲章」十週年而寫，收在《七七憲章十年》*Ten Years of Charter 77*, Hanover, CSDS, 1986。英譯本已是節譯本。

公敵正傳

譯者按：本文是哈維爾的著作《干擾太平》(Disturbing The Peace)一書的摘錄(第106—155頁)。據哈維爾著作英譯者威爾遜(Paul Wilson)記述：1985年，旅居西德的捷克記者韋達拉(Karel Hvizdala)提議為哈維爾做訪問出書。哈維爾答應了，年屆半百是應該反省走過的道路。哈維爾身居布拉格，無法與韋達拉會面，只能靠地下書信交談。最初，韋達拉提出問題，哈維爾作書面回覆，但兩人不滿意問答結果，因為答案更像論文而不像訪問。於是，韋達拉一口氣給哈維爾提了五十多個問題，哈維爾錄音回答；韋達拉整理錄音後，再提補充問題，交哈維爾最後潤飾。該書在1986年6月完成。本文譯自1990年5月31日《紐約書評》。

□：問 ■：答

□：1968年8月21日蘇軍入侵捷克，你當時在波希米亞北部做甚

麼？

■：那一晚，我與妻子和特里斯卡（Jan Triska）^①剛好在西部城市利貝雷茨朋友家。之後的一周，朋友引介我們參加了利貝雷茨的人民反抗運動。我們在電台工作，我每日寫一篇評論文章，由特里斯卡播出；我們甚至上電視，錄映室是在杰斯迪山臨時搭起的。我們也是「國民委員會」主席的正式僱員^②，協調當地各種活動。我為主席撰寫演講稿，同時也為共產黨的地區委員會、國民委員會的地區委員會、國民陣線的地區委員會、國民委員會的市委等等撰寫長篇宣言，在街頭擴音器播出或印成傳單四處張貼。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周的經歷。我親眼目睹蘇軍坦克將中心廣場的拱頂走廊壓毀，瓦礫活埋了好幾個人；坦克上一名指揮官向人羣亂槍掃射；我耳聞目睹和親身經歷了許多事情，但最強烈地震撼我的，却是當時非常普遍的特殊現象——民衆發揮團結互愛的精神。市民不斷把食物、鮮花、醫藥送來電台，不管我們需要與否。當特里斯卡暫停廣播幾小時，電台的電話就會響個不停，查問我們是否平安。滿載混凝土的大貨車包圍着電台大樓，以防電台被接管。多間工廠送來通行證，好讓我們在危急時有地方藏匿。

在這段時間，蘇軍還沒有佔領利貝雷茨，只是穿過它。因此，利貝雷茨人民的自發反抗運動能不斷發展，較其他蘇軍佔領的城市規模更大，形式更多。全城各處有反抗行動的富創意性的建議，行動效率也突然大增，印刷所可以在兩日內出版一本書，甚麼事都好像可以辦得到。

我記得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故事。當時利貝雷茨地方的一害是一幫為數百人的強悍青年，叫做「流浪者」團伙，每逢周末他們便四出劫掠，市政府對他們毫無辦法。「流浪者」的頭目叫「牧師」。蘇軍入侵後不久，「牧師」出現在國民委員會主席面

這些忙亂的活動，直到深夜。鄰居都堅忍地接受這一切。可在骨子裏，我總覺得自己的結局會是鐐鑼入獄，雖然我也說不出具體的理由。

我的預感越來越強烈，以致後來我甚至熱切地希望它快點發生，免得我在焦灼不安中生活。1月14日深夜，我被「慣常」地盤問以後，被帶到雷斯尼一間大房裏，來了多名少校、上校，用種種威脅來嚇唬我，說對我瞭如指掌，至少可判我十年監禁，說「已玩够了」，說工人階級對我的憤怒到了沸點。接近早上的時候，他們把我擲進牢房。後來，我獲釋之後，寫了約一百頁紙，憶述憲章初期的情況，以及我的被捕和入獄。我把文稿藏起來，到現在還記不起藏在那兒。也許有一天可以把它找出來。

他們逮捕我的原因是很顯然的，我想。我是發言人中最年輕的，只有我，他們當然會認為我是一切活動的主要策動人和組織者。帕托奇卡和哈耶克無疑比我收斂、溫和，被視為發揮象徵性的意義。當局顯然希望拘捕我以後就把憲章拖垮。

他們卻是大錯特錯了。我被監禁的期間，憲章運轉得最好！人們事後告訴我，帕托奇卡和哈耶克把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放進去，自己做傳訊人、組織者。許多朋友請纓分擔部分工作時，帕托奇卡斂顏正色地回答：「我是發言人，我還走得動。」

當局為了要說明它是用「政治」方式而不是鎖人的方式來應付憲章的問題，所以要提出一個與憲章無關的逮捕我的借口。他們把我扯入「安尼斯一伙」(Ornest)的案件；這是有關國內文稿交由巴黎流亡雜誌《見證》(Svedectvi)發表的案件。然而，盤問期間有九成問題是關於憲章的；公安人員尤其希望把我的案件牽連到安尼斯案件上，以便獲得物質證據，支持官方的論斷，說憲章是在國外發起和指揮的。他們冀望證明是由於我秘密地通過安尼斯與鐵格里(Pavel Tigrid)聯絡，憲章的最初宣言得以在國外發表。他們當然無法也不可能證明這一點，因為整件事的組

重要，於是運用他的威望推動他周圍的人也踏出這一步。

到目前為止，總共約一千二百人聯署了憲章。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由於種種原因，確切的數字很難得到。最初，有二、三十人簽名但不想發表名字，至少是不會立即發表。我們尊重這一點。但後來，警方連沒發表的簽名也拿到了（警方甚至把一些名字交給官方御用文人來做材料，例如迪丁那博士 Prokop Drtina^⑦的簽名），我們便停止接受不予發表的聯署人。原因不是這些簽名難以保密，而是不發表的簽名沒有甚麼意思。如果有人心裏支持憲章，但礙於某些原因不便公開簽名，他可以有多種做法更好地表達同情，不必在一張紙上簽名然後收藏起來。所以，現在沒有第二個、地下的、超級的憲章。順便一提，我們也遊說一些朋友不要簽名，因為他們的工作很重要，本身已體現七七憲章精神，不值得為一個簽名危及其工作。例如特雷斯納克（Vlaista Tresnak）和胡達卡（Jaroslav Hutka）^⑧都是這個情況，但他們最後還是簽了名。

□：憲章發表後發生的事大致已為人知，憲章的歷史、發展、社會作用，也有不少歷史學家寫過。我想請你談談你第一次被捕之後、第三次被捕（即是你開始牢獄生涯）之前那幾年的情況。

■：憲章發表後，當局也開始了打擊憲章的宣傳運動，但實際上卻為憲章做了許多宣傳。這個時期是我一生中最混亂無章的日子。當時妻子愛嘉（Olga）和我住在布拉格的迪維斯區（Dejvice），再向前走便是雷斯尼監獄（Ruzyne）。我們的寓所開始變得古怪，就像1929年股票大瀉時紐約股票交易所，又或一些革命風暴中心。在雷斯尼監獄，常常整日盤問憲章的負責人，但初時，所有人都在晚上獲釋，大家就會自發地在我家聚集，比較各人的筆記，起草各種文件，會見外國記者，打電話到全球各地。被當局疲勞轟炸十小時甚或更長時間後，緊接着就是

而入搶走所有簽名。後來，我更為緊張，因為預約的四時已過，差不多五時了，還沒有姆利納日的踪影：他是在前捷共黨員中間收集簽名的。原來僅是時間上有點誤會，姆利納日終於出現，帶來超過一百個簽名，把我嚇了一跳。最後點算，第一輪收集到的簽名有二百四十三個。警察沒有來，我們把簽名全部送走，然後幾個人喝香檳慶祝。

在一切就緒和爆發之間那段昏沉的日子裏，在我家開了另一次會議，約二十五人出席。我們商討怎樣可以繼續推進憲章工作，甚麼情況下可以做甚麼，等等。我們知道以後恐怕難以安排這麼大型的會議了。差不多所有人都到齊了。例如，這是沙巴達（Jaroslav Sabata）^{①⑥}出獄後我第一次見他。我被推選主持會議；由我來主持讓以前是大學教授、部長、共產黨書記等人輪流發言，在我來說是有點不自然。但其他人卻好像沒有甚麼不自然，顯示了即使在一開始，憲章內人人平等的感覺已很強烈。

也許我應該多說點有關憲章的多元性的問題。要所有人壓制或克服內心久積的厭惡，容納其他人，並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每個人卻都做到了，因為我們全都覺得這是共同的事業；這兒，歷史上很新的事物出現了——一個真正的社會上互相容讓的胚胎在成長；這種社會上的互相容讓絕不是二次大戰後國民陣線政府內一些勢力協議排擠另一些勢力的那種做法。不管憲章往後如何，這個新的現象，也會長留在民族記憶之中，不能抹去。

民族記憶中的這個新的挑戰，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可以引起反應，提供經驗的泉源。要非共產黨人走這一步固然不容易，要共產黨人走這一步則難上加難。踏出這一步，就是走向生命，真正思考共同的問題，超越自己的陰影；這樣做的代價，就是向「黨的領導角色」作永恆告別。仍然恪守上述口號的共產黨人其實所餘無幾，但他們的血液和意識裏尚殘存這點。姆利納日在這方面功不可沒；他以純熟的政治才能，認識到走出這一步是多麼

覺得有更合適的人選，就是切爾尼。切爾尼一生勇敢地投身民間社會事務，有時比帕托奇卡更直接地參與，在大戰期間曾參加地下反抗運動。簡言之，帕托奇卡認為切爾尼德高望重，應做發言人；不提名他，可能會引來反感。帕托奇卡似乎是愧於替代了切爾尼，也憂慮切爾尼的反應。

於是，我去拜訪切爾尼，將情況原原本本告訴他。我說帕托奇卡認為他更有資格做發言人，但我們卻覺得請帕托奇卡擔綱是極為必需的，因為他的政治形象較切爾尼溫和，可以團聚更多人；相反，切爾尼辛辣坦率，一出師便會招來抗拒，對憲章工作的影響難以估計。切爾尼即時同意這個做法：我覺得他是真誠的，沒有任何不快。我回去告訴帕托奇卡這次談話。帕托奇卡顯然放下了心頭大石。最後一個障礙跳過了。帕托奇卡做了發言人，投身這個工作，甚至為此犧牲了生命（他在1977年3月13日心臟病發死去，當時被審訊了很長時間）。如果憲章發起之初沒有帕托奇卡以其偉大人格使憲章生輝，憲章的發展會如何，真不得而知。

再說那些預備會議。我們同意在聖誕期間逐步收集簽名；這個時候進行一般的朋友間的造訪、聚會，不會太快引起當局注意。我們大致分工：我負責技術問題，把文件交給各收集者，並告知各人應注意的事項。我也會在朋友之間——大都是作家——收集簽名。我們決定了聖誕與新年之間的某日某時將所有簽名拿到我家，按字母先後排列名字，一切就緒後把簽名送去聯邦議會，並予以出版。同一時間，要把第一次聲明文稿打出多份，每一位簽名者保留一份。一切應該在1977年1月1日準備妥當，但將在一週後才宣佈，以便有時間準備各種宣傳，配合將聲明遞交當局的時刻。

所有簽名應交到我家那日，我有點緊張。警察似乎知道了一些情況（他們全然不知就奇怪了），我怕他們在簽名集合後破門

(Anna Sabatova) 的主意。我不知道做發言人會有甚麼後果，但知道這將會佔用很多時間，使我無法寫作。我不想做發言人——其後的發言人也沒一人真的願意做——但唯有接受。我對這個事業有很強烈的感情，在籌備時投入很多精力和心血，又不斷遊說其他人參與，假如我拒絕做發言人，不是引人笑話嗎？

我已記不起是誰最先建議帕托奇卡 (Jan Patocka) ⑮做第三位發言人的了。可能是涅梅茨吧。我記得涅梅茨和我支持帕托奇卡的提名，解釋為甚麼他是適當人選，因為有些與會者不大熟悉帕托奇卡。我們覺得，帕托奇卡是非捷共圈子深受敬重，與哈耶克同為發言人會取得良好效果。況且，我們覺得他比任何人更能賦予憲章道德的感染力，而這點幾乎立即便得到證實。

當時，我多次拜訪帕托奇卡，有時自己去，有時與涅梅茨同去。他猶豫了很久才接受。他從來沒有直接捲入政治，也沒與政權發生甚麼直接、尖銳的衝突。在這類事情上，他是勉為其難、遲疑、有所保留的。他的戰略有點像戰壕戰略：無論在那兒，都盡量堅守陣地，不作妥協，但也不進攻。他全神貫注地投入哲學思考和教職，從不修改自己的主張，但會試圖避開可能窒礙工作的事情。

但同時，他總覺得（至少我看他是這樣覺得）有朝一日，他會用行動來驗證思想；他不能總是避開，或無限期地推遲，否則他的整套哲學思想最終會受到質疑。但他也知道一旦走這最終一步，就要全部投入，不容許留下一扇太平門；他會以投入哲學的同一堅韌來行動。當然，這可能是他最初不願做發言人的另一原因。他絕不魯莽，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必猶豫很長時間，但一旦下了決心，就會堅持到底。

其他人也遊說他做發言人（我知道他的兒子起了很大作用），但也有人勸他不要做。在這一點上我介入了一次或許頗為決定性的事件：帕托奇卡向我表示，他猶豫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們要互相選擇對方，達致某種共同點。但我們卻朝向另一方向，要發展更廣闊、更公開的聯繫。所以，我們便得出了發揮「公民主動性」的想法。

一開始，我們便尋求較恆久的東西——這是會議召開的目的而不是議決的結果。我們聚在一起，並不是要寫一次過的宣言。一開始，每個人都清楚，我們得出的東西在本質上將是多元化的。所有人都平等，不會有任何一個團體（不管它如何強大）會扮演領導角色或把自己的「烙印」加在憲章上。第一次會議後，我們準備的東西的輪廓仍不清晰，我們只是同意下次會議起草一份初步聲明的建議書。我記得，這次會議後，涅梅茨和我拜訪了黑達內克（Ladislav Hejdanek）^⑩，他建議我們的聲明可以建基於最近發表的人權公約。同一時間，也是在第一次會議之後，姆利納日也有同一想法。

這就是聲明初稿形成的過程。雖然我清楚知道聲明是誰草擬的，誰加入了哪些句子，誰又刪去了哪些句子，但我覺得現時在原則上不宜披露這些細節，因為憲章的宣言原稿表達的是集體的意見，所有聯署人都支持它。現在已成為優良傳統的是，我們都強調這個原則，象徵這點的是我們都不說出撰寫人是誰，儘管它顯然不可能由首批聯署人一起撰寫。或許我只可以說：「七七憲章」這個名字是科胡特的主意。

在接着的兩次會議上，我們修訂這份文件，斟酌每一個字，議定誰擔當首位發言人、怎樣收集簽名。我們仍不大知道憲章實際上會怎樣運作。至於發言人，大抵從一開始已知道哈耶克會是其中一人。據我知道，前捷共黨員構思他們原先的委員會時，認為哈耶克是最合適的主席人選。我記得歐爾當時建議設三個發言人。我們普遍同意他的意見，因為這既能表達憲章的多元性質，也能兼顧一些實際的考慮。

歐爾建議我做發言人，雖然我知道這是他妻子莎巴杜華

訊)只判處四人坐牢，刑期也頗短，僅僅抵銷他們被拘留的時間，又或只多坐幾個月牢。唯一例外的是希羅斯，他的刑期當然是最長的。

這次審訊是一次壯觀的事件。我就這次審訊寫了一篇文章^⑩。那時，關注審訊的人還可以在法院走廊或梯間聚集，可以看到被告戴着手銬進入法庭，可以大聲互打招呼。人們的支援越來越多時，上述活動也很快被取締。

在法庭外聚集的人，是「七七憲章」的未來參與者。這羣人感受到的平等、團結、歡樂、友愛、互助，引發自共同追求的事業和共同面對的威脅；「七七憲章」開始時頭幾個月瀰漫着這種團結友愛的氣氛。涅梅茨和我都感覺到變化已發生，不應任由它蒸發掉，應該把它轉化為行動，產生較長久的影響，扎下較深的根。當然，有這個感覺的不只我們；很多人都有同樣感覺，科胡特有這個感覺，姆利納日也有這個想法（我們通過高美達（Vendelin Komeda）與姆利納日接觸）。

進行試探之後，終於在1976年12月10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出席的有姆利納日、科胡特、涅梅茨、我、會議召開場地的主人、高美達（會議召集人）。之後再開了兩次會，歐爾（Petr Uhl）^⑫、哈耶克（Jiri Hajek）^⑬、瓦丘利克等有出席。但請理解一點：「七七憲章」屬於所有憲章聯署人，誰有份兒參與草擬創立時的文件，並不重要。

這是我第一次憶述這些會議，因為我知道記憶會衰退，有朝一日，細心的歷史學家會指責我們把這些事情嚴守秘密，以致結果把細節都遺忘了。總之，憲章就是在這些會議上草擬的。我們每個人又與自己圈子的人一般地討論這事情。所以，即使在這個雛型期，已有不少人知道情況。團聚在姆利納日周圍的前捷共幹部曾討論成立某種監察人權的委員會又或類似在蘇聯已成立的赫爾辛基委員會一樣的組織。可是，委員會的成員必然人數有限，

良好市民以為他們的作為一如國家的作為那樣對社會有危害性。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有許多我們還以為對這類文化沒甚好感的人，卻很快欣然拋棄以往的成見。這與時勢有關。當時，我們正開始學習怎樣再次挺起腰板走路，我們都「厭倦了厭倦」，許多不同類別的人都受够了孤立的折磨，感覺到若要改變現狀，就要超越原先的視野。況且共同為某些事情工作的基礎條件已存在。假若政權在兩年前發動這個文化上的進攻，恐怕沒有人會留意。

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們行動的高潮是給伯爾（Heinrich Boll，1971至74年任西德小說家國際筆會主席）寫公開信，聯署者有我、塞弗特（Jaroslav Seifert）、切爾尼（Vaclav Cerny）、科西克（Karel Kosik）。⑨最後，逾七十人簽名，為「膠人樂隊」請願。由於新聞媒介紛紛報導，使這件事很快傳遍世界。捷克斯洛伐克已有一段時間沒在國際新聞中出現了，因此，「膠人樂隊」事件引起了很大關注。由於事件獲得廣泛關注，產生了自己的發展動力。我們沒有計劃發動律師站出來說話，但就好像有計劃般，律師說話了，甚至前黨幹部也說話了，發言人是姆利納日（Zdenek Mlynar）⑩。這個發展肯定震驚了最高掌權者。各個階層的人都參與了；雖然從這次抗議事件的聯署人名單乍眼看不出來，但正是因為「膠人樂隊」事件，才使新的接觸、關係、友誼得以建立，一向孤立存在的主要反對派圈子，也非正式地聚合起來。它們後來成為「七七憲章」的核心。

國家機構這次缺乏警惕，沒想到「膠人樂隊」事件會引起這麼大反響。他們本打算循慣常做法，像千千萬萬件刑事案件一樣，處理掉「膠人樂隊」事件。他們初時反攻，對「膠人樂隊」大肆誣蔑，在電視上播出攻擊「膠人樂隊」的節目，在青年周報《青年世界》上刊登多篇文章；但後來，他們退卻了，開始放人，被檢控人數下降，到最後（不計在皮爾桑進行的較小規模的審

（ Jiff Nemec ）與地下社會來往很密，他是哲學家、心理學家，我們以往曾在《創造》共事：我知道要先徵求他的意見才可行動。最初，我們恢復交往的過程非常謹慎，主要是他對我防範。我曾脫離《創造》，這件事仍梗在我們兩人中間。我與《創造》一班人的關係，就好像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關係一樣。（為公平起見，我卻要加說一句：「七七憲章」發表以後我被捕入獄，《創造》的朋友發表了共同立場文件支持我。）

漸漸地，涅梅茨和我融洽起來，我們笑談舊日的分歧（這個期間他也經歷了變化，不再是以往那個正統的「《創造》主義者」了）。以後的歲月，我們成為真正的朋友。涅梅茨和我共同「導演」支援「膠人樂隊」的運動。我們從中學了許多東西，也相互給對方不少啟迪。直到那一刻為止，涅梅茨一直有意避免介入公民運動、公開運動或政治運動。他認為他正在做的工作更為重要——建構地下社會，不顯眼地影響着天主教教會圈子，啟發獨立哲學思想的運動。如果他公開站出來，肯定會與當權者衝突，會損害他既往的工作。因此，他一向較為主張在「內部」做事情，不在「外面」做事情。但是，他終於認識到只有發動公開的宣傳運動才能幫助「膠人樂隊」，所以只得改變立場。我想，在這個新的領域，由於我畢竟較為熟悉，所以我給他提供導向：他則引導我走出「建制內的反對派」的藩籬，幫助我擴闊視野。

我們細心籌劃這次運動，開始時漸進地在圈內進行，逐步引發動力。我們想讓政權有機會體面地退卻，不想迫它立即躲在權威後面，否則就會無法動搖它了。第一個階段，我們四處向人遊說，尋求支持。初時我們遇到人們誤解以至抗拒，這是意料中事。但這種不信任情緒很快消解了，比我預期的快得多。不同階層的人很快明白，這些青年的自由所受到的威脅，同樣威脅着我們每一個人：要保衛這些青年需要有力的運動，因為他們的處境非常不利——他們寂寂無名，加上一向不願同化於社會，令一般

當時，我覺得我們不僅是為了原則——反對無理拘捕——而要有所行動，更因為這件個案有特殊的意義。七十年代初期被關入監獄的政治犯已陸續出獄；政權判他們長期徒刑，顯然是要在政治上打擊反對派；政權知道這些反對派不會投降，所以在算政治賬時要擊倒這些不屈的對手。這批政治犯的審訊在幾年前進行，之後似乎停止了。一切似乎顯示，把反對者關入牢獄是極端的、不得已的威嚇，當權者其實已成功發展了更高明的操縱控制社會的方法。人們已大致上習慣了新的情況，因此傾向於視「膠人」事件真的為刑事案件。

這次衝突比起七十年代初的審訊，其實更嚴重、更危險。以往，當權者與政治對手算賬時，後者某種程度上對所冒的險有心理準備。這次卻不是甚麼政權與政治對手的算賬，也不是甚麼兩個敵對政治派系的互相傾軋。實際上的情況更為惡劣：獨裁政權攻擊生活本身，攻擊人的自由、人的尊嚴。被攻擊者不是政治舊仗裏的老手；這些青年根本沒有政治的歷史，甚至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他們只不過是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創作自己喜愛的音樂，唱自己想唱的歌，不與自己過不去，要真誠地表達自我。政權利用司法制度打擊他們，不動聲息地下手，這樣做可能成為邪惡的先例：政權可以開始把所有獨立思考、獨立表達意見的人（即使只是私下裏思考和表達意見）都關起來。正因如此，這些青年人被捕的事件是真正令人震驚的：政權正在打擊人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自由，但卻用打擊刑事罪行作為掩飾和借口，更企圖取得不明真相的公眾的支持。這裏，權力在不覺之間暴露了它最主要的意圖：要令生活變得千篇一律，凡出現稍有不同的、個人的、突出的、獨立的，以至不能歸類的事物，都要用手術刀切除移走。

我明白自己的角色：我要運用我的各種關係，引起人們關注這事件，激發支援和保衛的行動。我知道不久之前，涅梅茨

則滔滔地解釋一切。他送給我他寫的《關於第三次捷克音樂復興的報告》，播放各種捷克地下團體包括「膠人樂隊」、DG307等歌曲。破舊錄音機播出的歌曲，立即給我十分特別的感覺：雖然我不太熟諳搖擺樂，但我覺得他們並不如別人傳說那樣是故意嘩眾取寵：他們的音樂深深地、真誠地表達了他們所感受到的生命的衝動，儘管他們被這世界的苦難折磨和壓迫够了。這種音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

經希羅斯自己解釋後，以往我從各處聽來的、曾一度引起我疑竇的可笑的傳言，都煙消雲散了。我突然領悟到，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麼粗俗，頭髮多麼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在他們中間，在他們的態度和創作裏，我感應到一種奇異的純真、廉恥感、脆弱性。他們的音樂裏有一種形而上的憂思，有一種追尋解脫的冀盼。我似乎覺得希羅斯的地下組織意圖給最受社會排擠的人一線希望。我本應赴科胡特的聚會，但已經遲了，我打電話道歉：科胡特很不高興，但在電話上，我很難解釋為甚麼當時我會覺得與希羅斯談話更為重要。希羅斯和我去了一間酒吧，繼續談到幾乎天明。他邀請我出席兩週後在布拉格郊區的一個音樂會。音樂會不能如期舉行，因為當局逮捕了希羅斯及其樂隊，還有地下社會的一些歌手，總共十九人。

我聽到他們被捕的消息時是在赫拉德茨，我立刻趕到布拉格，因為顯然我應該做些甚麼。我知道，要為這些孩子爭取廣泛的同情支持殊不容易。可能會幫忙的人不認識他們，認識他們的人又大都像我與希羅斯見面以前那樣，有很多疑竇。我要證明這些青年並非如政權所描黑那樣是懶漢、流氓、酒鬼、癮君子；我要證明政權不過是想把這班人肅清；可是，我手上幾乎沒有甚麼具體證據。

沒多久，麻煩就來了。這件事引起了大地震，各類機構都捲了進來。審問和禁制沒完沒了。憤怒的官僚向布拉格的官方劇藝界傳令，說由於我的關係（！），政府的文化政策會變得更加嚴厲，整個戲劇界都會遭殃。不少淺薄的演員信以為真，紛紛指責我和我的業餘演員，認為我們妨礙了他們的藝術發展——這個他們當然是指他們從事的配音、戲劇、電視、電影的各項優薪工作，也就是蒙騙社會大眾的各種活動。但問題不在於此。在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七年來第一次（而且在以後十一年也不再會有這個機會）看到自己的話劇在舞台上演出，告訴自己我仍然有能力寫出能夠演出的劇本。

以上幾件事總的來說令我覺得我身體裏面流動着一股力量，使我有信心從事其他工作。

□：你是否可以回顧一下「七七憲章」醞釀的歷史和源起？

■：對我個人來說，事件始於1976年1、2月左右。當時我獨個兒在赫拉德茨。外面是暴風雪，我在寫作，突然大門被人拍得呼呼響。我打開門，外面站着一個朋友（我不想說出他的名字），已經凍得半僵了。我們徹夜聊天，喝他帶來的干邑酒。朋友像是漫不經心地建議我與希羅斯（Ivan Jirous）見面，並表示願作安排，因為他們經常碰頭。我是認識希羅斯的，我們在六十年代後期見過兩次，但之後沒有再見過。我問中聽聞有關希羅斯一伙的謠傳，後來我發覺這些謠傳其實歪曲了他們的形象。希羅斯稱呼團聚在他周圍的人為「地下社會」，在社會的中心是反叛的搖擺樂隊「宇宙膠人」，希羅斯是樂隊的藝術總監。

我從雪中來客口中，得知希羅斯對我的印象也不見得好多少：他似乎認為我是官方（又或是官方容忍下）的反對派，即是說，是建制內的一分子。一個月後，經雪中來客的介紹，我在布拉格與希羅斯見面了。他長髮披肩，其他長髮青年來來往往，他

白。這些事大大鼓舞了我，也使我回想起以往上演劇本時的快樂日子——當時，人們熟知我的劇本幾乎是文化上的責任；同時，它使我意識到一個劇作家即使與劇院隔離，但仍然能夠影響本國環境，仍是本國環境的組成部分。

1975年第三個重要的經驗是我的話劇《乞丐的歌舞劇》在賀力保切尼斯（Horni Pocernice）上演。劇本是蓋伊（John Gay）舊劇本的自由改編，與布萊希特沒有關係。最初是布拉格一家劇院請我寫的，上演時會用其他劇作家的名字，但計劃後來告吹了。我的老朋友克魯（Andrej Krob）以前與我在巴洛斯達劇院（Balustrade）^⑧合作過，他與一班業餘朋友、青年學生和工人喜歡這個劇本，儘管當局嚴格禁制我的劇本，但他們還是決意排演。排演後，就在賀力保切尼斯一間名叫 U Celikouskych 的餐廳上演；不用說，這個劇只能上演一次。

可直到最後一分鐘，我仍不相信劇本能夠上演。但它終於演出了，因為當地官員並沒有留神，他們聽到劇本名字好像頗熟悉，沒有追問劇作家是誰便放行了。我們知道只能上演一場，所以把能想到的人都請來，觀眾裏有三百多個朋友和熟人。今日，重看觀眾照片時，我看到其中有「七七憲章」幾個未來的發言人和無數個聯署者，也看到布拉格劇藝界許多演員、導演、文化界人士。

那次演出好極了；觀眾的笑聲和歡樂之情像是無窮無盡的；有那麼一刻，我像是回到了六十年代的巴洛斯達劇院的氣氛中間。再加上當時的特殊處境，我更加覺得興奮。參加演出的年青人是那麼煞有介事，沒有矯情，令演出更富舞台效果。這個由人作出的行為，很奇特地轉化成寓意很深的戲劇性行為。演出後的酒會上（從我們所在的餐廳拐一個彎就是巴吐洛米士加街的警察總部），我對劇團說，我從這場首演得到的歡樂大於紐約和東京等所有國外演出。

的事情。所以，我寫了一封長信給胡薩克，描述我國可悲的現狀，指出社會生活的表面平靜之下潛伏着深刻的精神、道德、社會危機。我敦促胡薩克認識到他個人要為這個普遍的苦難負責。

這封信基本上是一種自療做法：我不知道往下會發生甚麼，但冒險是值得的。我恢復了自我的平衡和信心。我覺得我能重新振作起來，沒有人可以再指責我甚麼也不做，指責我緘默地旁觀這一切苦難。我可以更輕鬆地呼吸，因為我沒有窒息我內心的真理。我已不再等待世界自行改進，而是行使我自己的權利，介入這世界，至少表達我對這世界的看法。這封信同時有更深廣的意義：它是最早一個有條理的、一般人都可理解的批判聲音。不久之後，普遍的反應便來了。顯然，在我寫信的當時，無止境的等待已令許多人不耐煩了，人們開始厭倦自己的疲憊，厭倦自己的厭倦，開始從重創下恢復過來。因此，許許多多的人傳抄我的信，幾乎所有還有熱情的人都讀了這封信。我當然極為高興，為這個反應大大鼓舞。

對我來說，這一年的第二件大事是我寫了獨幕劇《觀眾》。靈感來自啤酒廠的經驗，我筆下的人物作家范力克（Vanek）（譯按：哈維爾共寫了三個以范力克為主角的獨幕劇，這個角色也激發了其他捷克作家以同名角色寫了另外四個獨幕劇）首次出現。我寫得很快，幾日便寫出來了，最初不過是在夏季的聚會中娛樂朋友，但出乎意料之外，這個劇本引起很好的反應，大受歡迎，在全球各地與以後其他的范力克獨幕劇一起上演。在我來說，更重要的是這個劇本深入民心，初時是文字劇本，後來我和朋友蘭多夫斯基（Pavel Landovsky）把它錄了音，由瑞典的「藏紅花」（Safran）出版錄音帶。

此後，在我周圍開始發生了一些事。例如，有一次我載一個搭順風車的人，他不知道我是誰，但卻在談話中引用這個劇本的台詞。或者在酒吧中，我也會聽到青年人互相喊出劇本中的對

中，我們輪流朗誦自己的作品。

但我們始終是十分孤立的。要形容這個時期，我想「少數民族集中區」這個詞就最貼切了。社會大眾當然熟悉我們、同情我們，但又十分謹慎地不與我們往來，因為這似乎太危險了。在這種遊散的狀態下，我們與其他組織或圈子也沒有甚麼密切聯繫。我們每個人各自修行，看不到獲得民眾廣泛支持的前景，沒有方法積極地自我表達，所以大都是消極地接受現狀，埋首寫作。當時，我們在克利馬家定期開會，朗讀新作。有好幾個人參加這種聚會，我也朗讀了兩個劇作，是《陰謀者》和一年後寫成的《乞丐的歌劇》。我們也互相傳抄作品，這就是今日有名的地下刊物《掛鎖》叢刊 *Edice Petlice* 誕生的經過。^⑤（1975年，它的妹妹《遠征》叢刊 *Edice Expedice* 也誕生了。）

1974年，我到一間離赫拉德茨十公里的釀酒廠做工。1975年，在和列特雷爾（Jiri Lederer）^⑥談話時，我說做工只是為了賺錢；現在回想起來，我看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要轉換環境：我忍受不了周圍的死寂，我想走出庇蔭之所，看看外面的世界，走入不同的人羣中間。

造成當時鬱悶氣氛的另一原因，是東西方處於緩和時期。這點看來是矛盾的，但實際情況是，不少西方的友人及合作者也避開我們，就像國內的官方作家一樣。他們不想惹惱當權者，怕會損害與當權者修好的努力。幸而，在今天，除卻西德一些社會民主黨人這種天真、愚蠢、自殺式的「緩和緊張關係」的做法外，在西方已不是那麼普遍了。

對我個人來說，1975年是七十年代漫長沉悶日子的第一個突破。原因有三個。第一，我當時覺得不能再扮演比羅勒斯基（Vaclav Belohradsky）^⑦所說的「歷史記載的勝利」下的被動客體，而是試圖成為主體；也就是說，當時應該不再等待看「他們」會做甚麼，而是自己做一些事情，迫使他們要應付預想不到

看不見。獨立思考、創造性都躲進了私生活的深深的塹壕裏。

對我來說，七十年代的頭幾年，好像是沒有形狀的、單調的霧靄。我說不出1972年與1973年有甚麼分別，也說不出我在這兩年裏做了些甚麼事情。我像許多同僚一樣，被革除所有職位，被公開指責為「人民公敵」，甚至被控以顛覆罪名（沒有審訊，也沒有判刑）。最後，我也只好無奈地退入自我放逐的精神生活。我與妻子大部分時間住在赫拉德茨市，在克爾科諾謝山的小屋內度過時光。我們把房子一點點裝修、翻新。我痛苦地開始寫作《陰謀者》，這是我被禁制後的第一個劇本。經歷了幾年前事變的激情和感召後，寫這個劇本很艱難，這也是我寫得最差的劇本。我曾形容這劇本像一隻燒鷄，放在焗爐太久了，過於乾癟。當然，沒有人等着看我的劇，催迫我完成它，所以我是在真空狀態下寫作的。在寫作過程中，我花了太多時間忖度怎樣與社會和我個人的新境況妥協，這樣一來，劇本的生命力便無可避免地被擠走了。

七十年代初期，我與遭遇同樣困厄的同僚開始密切往來，他們是前共產黨人，我稱他們為「反教條主義者」，以往他們曾是我的對敵。每年夏天，科胡特（Pavel Kohout）、瓦丘利克（Ludvik Vaculik）、克利馬（Ivan Klima）、特雷福加（Jan Trefulka）^③等人在我們的小屋裏召開小型作家會議。另一批也是逢夏天來我家的，是較早期的朋友，一些我在五十年代便已認識的非共產黨人，那時我跟他們「學師」，有些與我一同辦文藝刊物《創造》（*Tvar*）^④，他們後來參加了「獨立作家聯盟」。

這兩批人漸漸融合，或是相約一起來我家，或是有其他共同活動。這個現象有象徵意義：這些人過去的歷史很不同，但以往把他們分隔開來的意見分歧，已不再重要了。我們在同一條船上，對一般事物有共同見解。那時建立起來的傳統，在以後的日子裏以各種形式發展，到今天仍以另一模式延續。在那些聚會

怎樣怎樣的，說我們會做甚麼、不會做甚麼。

這一周的經驗，也顯示了：當軍事權力面對的對手並非它習以為常的那些對手時，它會顯得多麼無奈，又當人民即使不是用軍事力量來自衛，然而所有公民組織都與侵略者為忤時，管治一個國家會顯得多麼艱難。此外，現代傳媒本身是一股政治力量，發揮着重大的、未為廣泛認識的作用，而且有能力指揮及協調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8月那一周的歷史經驗，不能從我們民族的知覺中抹去，儘管我們仍不能說出它有甚麼實際的意義，它對社會的深層結構留下了怎樣的烙印，以至它甚麼時候會以甚麼方式表現出來。

□：你會怎樣描述七十年代的捷克？從1970年到1979年第三次被捕這段期間，你有甚麼經歷？

■：約翰連儂在一次訪問中說七十年代不值一錢。真的，回顧這個時期，在全球都一樣，比起豐富多采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意義、風姿、氣氛各方面都大為遜色，沒有甚麼顯著的精神運動或文化運動。七十年代是乏味、悶翳、淒蒼的。對我來說，七十年代有兩個象徵，一個是勃列日涅夫的封閉統治，一個是尼克遜總統令人不解的政策，他發動奇怪的越南戰爭，得到奇怪的結果，還有荒謬的水門事件。

在捷克，七十年代更是陰沉的。蘇軍入侵後，杜布切克被胡薩克取代，開始了長期的死寂。新的統治精英集團（它和舊的相類似）迅速形成，進行整肅、清算。疲憊的社會很快習慣了恢復過來的舊貌：一度被宣稱永不再發生的事物復活了過來，已被人民揭發、嘲諷的荒謬統治再次箝制着社會。人們退縮到個人生活的圈子內，不再關心公眾事務。冷漠、沮喪的社會情緒，把我們帶入了一個灰黯專制的消費主義年代。社會重新變成一盤散沙，碩果僅存的小規模反抗也被摧毀，失望、累極的民衆裝作甚麼也

前說：「我隨時候命。」主席有點為難，只好勉強給這幫人派了點考驗性的工作：「好吧，今晚請你們除下所有路牌，使侵略部隊無法認路。這工作不便叫警察去做。」「牧師」點點頭，第二天早上，全城所有路牌整齊地疊放在市政廳的台階前，一個也沒弄壞。

當「牧師」再要求分派任務時，某種奇特的合作便開始了：「牧師」的幫眾臂纏輔警袖章，在街上巡邏了兩天。你可看到三人一隊的巡警：一名軍裝警察在中間，兩旁是長髮的「流浪者」成員。這幫人還在市政廳日夜站崗，保護市長，檢查進出人士，場面很動人。例如，市政廳的階梯擠滿了站崗的青年，手抱結他，彈唱着比知樂隊的“Massachusetts”，這是當時全球嬉皮士的流行曲。這情景使我想起不久前在紐約東村看到同樣的青年人唱着同一首歌，只是他們背後沒有坦克。

我不是那種一生都在緬懷這一週經歷的人。我也無意浪漫地描述這個時期。我只是覺得，這個時期的一些獨特現象，至今還沒有人從社會學、哲學、心理學、政治學等角度作深入剖析。但有些事情是很清楚的，不用甚麼科學分析，你都能立刻理解：例如，社會是很神秘的多面的動物，有許多隱藏着未發揮的潛能，如果以為它一時的面目就是它唯一的真面目，就是極度的短視。

我們沒有人能全面地認識在人民精神中沉睡的潛能：當事變有形或無形地互相作用時，人民可能做出驚人的舉措：1967年，諾沃提尼政權仍在腐蝕着社會，全國都像帥克般（譯按：捷克作家Hasek著《好兵帥克》的主角）冷漠；誰會相信，半年之後，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時期，同一社會竟發揚了真正的公民意識；一年之後，先前還冷漠、躊躇、沮喪的社會，竟以莫大的勇氣和智慧，對抗入侵的強權！誰又會相信，在這之後不到一年，同一個社會又像旋風過後般墮入比以前更可怕、更深沉的沮喪之中。經歷過這許多變化後，我們要小心，不要隨便下結論，說我們是

織過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而且方式簡單得多。

由於種種不同原因，我的第一次入獄很難熬，這點我在另一處已談及，也寫過文章，所以毋須在這裏重複。最後的一週最難受，當時我懷疑我將會獲釋，但也同時會公開蒙羞，而部分還是咎由自取的。我每日只能睡一小時，其餘時間在牢房裏折磨着自己，又折磨着同房的犯人（他是一個小偷，偷竊雜貨店——不知他現在怎樣了？）。他以極大的耐心忍受着一切，他了解我，試圖幫助我。如果可能的話，我會替他買下一整間超級市場，以示我的感激。

我的公開蒙羞比想像中更壞。例如，當局說我在獄中放棄了發言人的身分；但這不是事實。事實是，我決定了要辭職（當然，我不會向警察提出請辭，而是向當初委托我的人提出）；理由我至今仍認為是成立的。不過，我在獄中沒有辭職，我只是極愚蠢地沒向盤問員隱瞞這個意圖。

出獄後的最初日子，我的精神狀態足以令全球任何一間精神病院收容我。我不僅具備所有監禁後精神變態的常有症狀，更同時夾雜極度的絕望和狂喜。外面世界發生的事與我在獄中想像的截然不同，更加深了我的狂喜狀態：憲章並沒有被打垮；相反，它正經歷壯烈的階段。我驚歎這工作的範圍竟如此廣泛，引起的反應竟如此熱烈，激發了這麼多文章，聚攏了的團結氣氛是如此不可思議。我深深地感到，我在獄中的幾個月時間，歷史比過去八年跨前了更大一步。（這段時期的氣氛至今大都消散了；憲章的壯烈時期已由冷靜、苦悶的日常瑣事所取代——若不是這樣，反而有悖生活和自然的規律呢。）

不久，我從出獄後首幾週的精神病態中恢復過來，但某種內心矛盾和絕望仍殘存，從1977年5月獲釋至1979年5月「確定」地入獄之間的兩年內，仍然一直困擾着我。我投入各種各樣工作，甚至有點過分熱衷；我非常緊張（即使未至於歇斯底里），急於

要從公眾蒙羞中「平反自己」。我協助創辦「保衛被無理檢控人士委員會」(VONS)^②，再次成為憲章的發言人，參加各種論爭（約在這時，憲章經歷了第一次危機；危機不可避免，都是完全有益的，它迫使各人重新深入反省憲章的本義）。這個期間，我還被送入雷斯尼監獄，坐了六周的牢；當局試圖羅織破壞公安的罪名，把我隔離開來，但不得逞。這六周對我很有幫助；每過一周，我便覺得我又走了一小步，走向我的「平反」；我覺得欣慰。

另一個令我緊張不安的因素，是警察對憲章和對我個人施加的與日俱增的壓力。我經常被釘梢，經常被盤問；當地官員施展各種陰謀詭計來對付我；我幾次被軟禁在家，被潑辣地侮辱、唬嚇；「不知名的作惡者」闖入我們的寓所肆意破壞，又或弄壞我的車子。這是非常刺激的時期，有警察的襲擊，有逃避釘梢的遁逸，有在叢林中爬走、在同謀者家中藏匿，有搜屋，有重要文件被沒收等等戲劇性時刻。

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開始與波蘭的持不同政見者會面，地點是我們共同的邊界。[最怕遠足的哈維爾被迫五次爬上斯涅日卡山山頂，但這是有回報的：他可以會見米茨涅克(Adam Michnik)，庫倫(Jack Kuron)以及「社會自衛委員會」(KOR)的其他成員，建立長久的友誼。]這個時期留給我許多難以置信的故事，但我還不敢把它們公開，以免傷害一些人。當情況越來越嚴峻時，我倍加清晰地看到，可怕的結局將會到來，我極可能再次入獄。

但是，這一次，我不再懼怕這個前景了。我大概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我知道我之入獄是否會產生甚麼價值，端視乎我的態度。我知道我經得起考驗。我得出這個結論（這樣說好像太戲劇化，但我發誓我真的是這樣想），不活下去，比沒有尊嚴地活下去好。（為免產生誤解，這裏得說明：我不會用這個準則來要求

別人；這只是個人的結論，是從我自己的實際經驗中得出來的，它有助我在危機時期簡化有關個人抉擇的考慮。）假如直覺告訴我，我正走向監獄，如1977年一樣，那麼，不同於當年的的是，這次不是只對未知之事有預感，而是清楚地認識到它有甚麼含意：要沉着堅忍，無可避免地度過幾年艱辛的獄中歲月。

他們終於進行打擊「保衛被無理檢控人士委員會」的運動，把我鎖入牢獄；突然，我以往的不安惶惑全部消失。我冷靜地迎接將要發生的事，內心是堅定的。我們沒有人預先知道在極度逆境下會怎樣自持（例如我不知道在酷刑下我會怎樣），但如果我們至少肯定知道我們會怎樣回應大致熟悉或大致可以想像到的情景，那麼，生活就會大大簡化。我在1979年5月被捕後坐了近四年牢，這是我生命中一個新的、不同的階段。

□：你在獄中寫了多篇文章，結集為《給愛嘉的信》。我們可以理解該書為甚麼沒有談到獄中的生活。你在獄中究竟做了甚麼？你被分配甚麼工作？

■：在獄中時，不斷在想我最終會怎樣憶述獄中生涯。也常試圖記着許多我經驗過的既古怪又感人、既可笑又震驚、既奇特又典型的事件，以便有朝一日我會描述一切我遇到的不可思議的荒謬情景。我期盼着用小說家赫拉堡（Hrabal）那種精采的文字記述我遇到的無數怪異複雜的人間事物。使我苦惱的是我無法將一些即使是很原始的資料用筆記載下來。

但出獄後，我突然發覺可能永遠也不會寫甚麼有關牢獄生活的事。這點很難解釋。絕對不是因為我生命中這個黑暗的時期的記憶太痛苦或太惱人，也不是因為這樣做會撕開已癒合的傷口。我想，這背後有一大串原因。首先，我不是講故事的作家，我不懂得寫小說，也很容易忘記各種細節。我沒有赫拉堡的天分。第二，出獄後的生活非常忙碌，有各種主題要直接即時回應，到現

在仍是這樣，使我沒有時間回到那截然不同的、遙遠的牢獄歲月。

第三，獄中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是無法言喻的。真的，我是這個意思：這種經驗是深刻的存在經驗，深刻的個人經驗，因此，我根本無法說出來。當然，有許多事，只需稍加努力，是可以回想起來加以描述的，但我恐怕寫出來的只會是虛假的東西，只是事件、情景、行為、人物的表面輪廓，而不是他們內在的、個人經驗了的本質，結果可能反會歪曲了事情真相而不是還它本來面貌。二、三十年以前，我們在軍隊裏有許多不明確的冒險行動，多年以後，在讌席上不時談到；而突然，我們發現我們生命中這兩年非常艱難的時間，已經以劃一化的形式濃縮成記憶的片段，並以劃一化的方式、相同的字眼說出來。但事實上，這一大堆回憶與軍隊中兩年的經驗、軍隊生活對我們的塑造毫無關係。

我有幾次實驗性地試圖有條理地描述牢獄生活，但每一次都發覺，儘管我準確地描述所有事件的細節，仍然無法把握問題本質。本質隱藏在事件細節後面，奇異地反被後者掩蓋其真實性。有許多人寫過監獄和集中營的情況，有一些書能夠真誠地以啟發性的、真實的方式表達這個經驗。例如，我記得帕路加（Ferdinand Peroutka）寫的《浮雲與華爾滋》所描繪的集中營的精彩情景，又或是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和璧加（Karel Pecka）筆下的一些片段。但我恐怕無法做得到，尤其因為我不想做。與其錯失這個經驗的意義，不如索性不去談它。所以，我寧願不談牢獄生活，雖然我會回應你的問題的具體部分。

在埃蒙尼斯，我最初的工作是焊工，把格柵焊接起來。頭幾個月我不能完成指標，但接着，我發現比我年輕二十歲、身體強健得多、慣於做粗重工作的小伙子，也不能完成指標。無論如何，這正是他們給我指定這項工作的理由，以便他們有借口用各種方法折磨我。監獄裏所謂無法完成指標的人，是賤民中的賤

民，受到各種懲罰：加工作量、少配給食物（這點我不在乎）、減零用錢，還會時常被責為懶散，被警察和同獄犯人恥笑。幾個月後，我被分配做較輕鬆的工作（我的工作難度和健康狀況之間的差異開始顯著，他們害怕外界知道我的健康狀況）。但必須補充一點：那時我開始能夠完成指標，他們較少機會折磨我、羞辱我。

接着，我在一間氧乙炔吹管燒焊廠做工，把巨型厚身的鐵塊切凸緣。田士比（Jiri Dienstbier）^⑩和我輪流做，兩人都能完成指標。我被調往保里之後，在洗衣房工作，工作條件較好（但那兒人際關係較差，幾乎每個人都打小報告）。最後，我被派往一間廢金屬廠，工作是把電線和電纜上的絕緣體刮掉。這個工作不太差，只要能習慣嚴寒和無盡的污穢。監獄裏的工作是奴隸般的工作，也是懲罰性的；工作指標比一般公民生活中的工作指標多出一倍。要補充的是，我所在的第一類勞改監獄，犯人一般視工作為心理上的休息，對工作是冀盼的。非工作的時間，反被當局騷擾折磨，這就是「勞動教育」。

□：你是否認為能完成你被判刑後給自己定下的目標？你出獄時是否身心更平衡？

■：被判刑時，我便確知將有幾年時間在獄中度過。儘管有心理準備，這種確定性還是重要的分水嶺。一下子，一個人的等級價值完全改觀，時空角度轉換，一切有了新的意義。我是無可救藥的「計劃官僚」，在新環境下重新定位時，我首先就為自己定一套計劃。這是一種即時的自我療救。

我也知道，要能更好地熬過獄中生活，最好是能從中得出一些正面積極的意義，能從中得益，令監獄生活變得有某種意義。我已談過被捕前兩年所感受到的絕望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安和焦躁。所以，我當時想像自己可以利用這個漫長的時期，在龐大的

監獄機器裏做一個藉藉無名的小螺絲釘，在獄中尋找內心的安寧，尋回曾經擁有的心理平衡，取得某種對事物的透視。我有點緬懷六十年代時期的我，那時的小伙子，是平衡、快樂的，對一切事物抱有健康的、冷然的距離，不會經常陷入傷痛、沮喪之中。當然，我無疑把青年時期理想化了，而我打算怎樣度過牢獄生涯的想法也是極端天真的：我甚至還幻想可以在獄中寫劇本，學新語言，做很多事情呢！

更大的幻想是我以為可以在獄中享有安寧平靜，我只會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小螺絲釘」！事實剛好相反。監獄是無盡的一連串令人神經緊張的狀況。我發覺我無時無刻不被監視着，比起我自由時期最黑暗的時刻更難過。不用幾天，我便明白原先的計劃是多麼愚蠢。但這並不表示我放棄全部計劃。我開始嘗試沿着一條無比艱辛的小徑，向同一大方向前進，至少也按原計劃的精神去做。正如我說過，我的書信在這方面很有幫助。②它們成為我真正能夠做的唯一的事，成為我試圖為自己做一些事，達到一些成果，澄清一些問題。

我出獄時是否身心更為平衡，我自己不是最好的判斷者。我也許擺脫了被捕前感覺的不安焦躁。但有些情況比以前更壞。我更難有即興的快慰，更多墮入憂鬱消沉，要完成為自己定下的工作時需要更大的決斷力。我妻子說我在獄中變得冷峻。我不知道。如果我變得更差，那麼，受觸動的只是我的內心深處、我的個人隱衷。我在工作上是真的更平衡、更冷靜，也許更體諒和寬容別人。也許，我的視野更廣了。如果回顧出獄後做過的事，從所寫的劇本、文章以至不大顯著的一些公民行動，我覺得情況好像是這樣。（畢竟，即使是最個人化的劇本《荒涼地帶》也是頗冷漠和剖析性的作品。）但我的印象是否正確，最好留待他人來評說吧。有關這些問題，我不是最得當的評判！可是，這個進步——如果真的是進步的話——並不是免費的；顯然，它的代價

是我作為人更難享受單純的快樂……

註釋：

- ①特里斯卡是演員，創辦「布拉格鬧門後面的劇院」，1979年以後居美國。
- ②「國民委員會」是地方行政機構。
- ③科胡特是詩人、劇作家，1978年以後居於維也納，作品有《反革命分子的日記》，《可憐的謀殺者》。瓦丘利克是小說家、記者，作品有《斧頭與天竺鼠》。克利馬是小說家，作品有《我的歡樂的早晨》、《我的初戀》、《愛情與垃圾》，後者在1990年在英國出版。
- ④這是一份小型的文學雜誌，1963年由一批年青的非共產主義者創辦，包括古魯沙（Jiff Grusa）。哈維爾在1965年該刊物被查禁前不久加入編委會。該刊1968年復刊，哈維爾任主編，之後再出版了八期，又被禁。哈維爾說：「我加入《創造》編委會時，已要捲入這本刊物掙扎求存的鬥爭中。這個時期，是無止境的辯論、會議、爭持。我在這兒上了許多政治課。……不僅政治上，而且思考上。《創造》並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指引，只要它覺得某作品寫得好、有趣、深刻，不論作者是海德格（Heidegger），還是特爾赫（Teilhard）、特拉嵩（Trakl）、韓克（Jan Hanc）、庫本納（Jiff Kubena），他們都接納，不介意別人怎樣看他們的立場。」
- ⑤這是瓦丘利克創辦的地下印刷所，在過去十五年內出版了許多捷克民間文學的重要作品。
- ⑥列德雷爾在1969年以前一直是《人民報》和《報導者》的記者，在1972、74、77至81年入獄，之後移居國外。
- ⑦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是熱那亞大學教授。
- ⑧這是位於布拉格的小劇院，1958年成立，哈維爾在1960至1968

年間在此工作。哈維爾這樣描述演劇院：「我在68年離開劇院之前，整個生活都投入劇院裏，為劇院塑造形象，完全認同它。在這裏，我做過各種工作，有舞台佈景、燈光控制、秘書、講解員以至劇作家。我在做那項工作是無所謂的，許多時我同時做幾項：早上組織劇院遊覽團，晚上為演出打燈，深夜重寫劇本。」

- ⑨塞弗特是詩人，1984年取得諾貝爾文學獎；切爾尼是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1950年以前是查理士大學教授；科西克是哲學家，又是捷克文化史學家，曾是查理士大學教授和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委員會成員。
- ⑩姆利納日是政治家和記者。1968年任共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77年以後一直旅居奧地利。高美達是歷史學家，現居德國。
- ⑪《審訊》，寫於1976年9月。
- ⑫歐爾是學生領袖和記者。
- ⑬哈耶克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1977年以來在查理士大學任教授。
- ⑭哲學家。
- ⑮傑出的捷克哲學家 and 學者威爾遜，在《給愛嘉的信》的序言中寫道：「向捷克及斯洛伐克知識界介紹現象學的主要的人，就是哲學家帕托奇卡。他的一生是寓思想於行動的典範。他是胡賽爾（Husserl）和海德格的學生，共產黨在48年掌權以後，帕托奇卡幾乎被摒諸大學生活門外，除了1968至72年的短暫時期。」
- ⑯他一度是黨幹部，後來成為「七七憲章」發言人。
- ⑰迪丁那1948年以前是司法部長，後來被捕入獄，在80年去世。
- ⑱特雷斯納克和胡達卡是地下歌手，1978年流放國外。
- ⑲鐵格里是記者，與「自由歐洲電台」有關，他出版海外刊物

《見證》*Svedectvi*。

⑳「保衛被無理檢控人士委員會」在1978年4月27日成立，十八名創辦成員中包括哈維爾。

㉑田士比是記者，1989年12月以後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

㉒指《給愛嘉的信》，1988年由 Knopf 出版社出版。

劉健芝 譯 李金鳳 校

希望的政治

□：訪者 韋達拉 Karel Hvizdala

■：答者 哈維爾

□：你在一九八四年寫的《政治與良知》一文，提到在意大利熱那亞大學教書的捷克哲學家比羅勒斯基（Vaclav Belohradsky）。比羅勒斯基是帕托奇卡的學生。是甚麼使你對他的著作感到興趣？你的「自生動力」的概念和比羅勒斯基的「非人格末世學」的概念有沒有關係？

■：出獄後，差不多是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現了比羅勒斯基的《非人格末世學危機》一書。我對這本書非常着迷，在很多事情我都有相似的體驗，而比羅勒斯基卻能優美、有說服力地表達出來，並且還把它們全部貫串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很多我以前沒注意到的關係，現在也明白了。我也很喜歡這本書的語言。比羅勒斯基文字言簡意賅，隱喻豐富，聯想獨特。偶爾，他的文字在傳統

意義上，詩的意味濃於哲學的意味，因此不能老是照字義來了解他。

讀完他那本書後，我開始尋找更多他的著作，它們都是分散在不同流亡雜誌上發表的。我把這些文章收集起來，再加上幾篇其他作者寫的，不是引伸自他的著作就是論述其文章主題的文章，湊成一本選集。這本選集叫《存有常態的政治問題》，並在我自辦的地下刊物《探索》叢書上發表。我亦開始和比羅勒斯基通信，甚至還為選集寫了跋。你提到的我那篇《政治與良知》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比羅勒斯基的觀點影響的。

所謂權力或制度的「自生動力」，是指那種盲目、無意識、不負責任、控制不了、不受抑制的動力，它不再是人的努力的成果。反之，人卻被它牽着走，因而受它擺佈。顯然易見，這種「自生動力」實際是比羅勒斯基所說的非人格權力動力。他從一些我也發現的事物中看到這個步向末日的力量的黃昏或危機的種種徵象。但比羅勒斯基是哲學家，我卻不是，他的解釋有很充足和穩固的根據，而我只是偶爾為文的雜文家或有哲學傾向的文人，因此把我們視為可以相比，甚或同一類人，也是不恰當的。

□：不久以前，我和比羅勒斯基做了一個訪問，也是在你的《探索》叢書上發表的，題目叫《綠色思考》。比羅勒斯基說：「我是一個被打敗了的人。作為捷克人、流亡者、歐洲人、知識分子、哲學家 and 意大利公民……我這樣看待被打敗了的知識分子的角色：我們務必不讓自己被收進勝利者們寫的歷史中。」你是否認同這樣看待知識子的角色呢？

■：如果比羅勒斯基認為知識分子根本的角色就是不讓自己被收進勝利者寫的历史中的話，我是完全同意的。他是以不同的說話講出了法國哲學家格魯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說過的話。格魯克斯曼最近來了布拉格，我和他談了很久，直至深夜。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角色是作出警告，預測恐怖的事情，扮演希臘

神話中能預知禍事的卡珊德拉，告訴人們在他們的世界以外發生的事情。不管是格魯克斯曼的說法還是比羅勒斯基的說法，我都同意。我也認為知識分子要經常問難，要證言世間的苦難，一士諤諤，對一切隱閉的及公開的壓力和操縱的手段均要反抗，應該是制度、權力及其魔力的主要的質疑者，要拆穿這些東西的謊言。因此，對任何可能分派給他的角色，知識分子也會顯得格格不入的，他也不會在勝利者寫的歷史中找到合適的位置。知識分子基本上並不屬於任何地方；無論在那裏，他也使人感到刺痛；也不能完全適合地把他歸類。比羅勒斯基顯然就是這樣子的。捷克的流亡分子一直也不大清楚該如何看待他。

嚴格的分類趨向於成為勝利者的工具，所以知識分子經常對嚴格的分類表示不一致的意見。在這方面我是同意比羅勒斯基的，但「被打敗了」的概念卻較為複雜。對，在某程度上講，知識分子是註定要遭受挫折的，在這方面，他是像西西弗斯的。知識分子站在勝利的一方總是教人覺得可疑。然而，從另一更深刻的意義而言，知識分子儘管飽受挫折，但他又像西西弗斯一般屹立不倒。事實上，他是在挫折中獲勝。因此，他的位置是不明確的，不承認這一點，最終可能是意味着接受在勝利者寫的歷史中佔有一位置。比羅勒斯基，或許甚至是我，不是均為那些勝利者歸類為失敗者嗎？如果我們肯定這種身分，我們不是也在肯定他們所寫的歷史嗎？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我是受挫敗的，但在另一種意義上而言，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受挫敗了。够奇怪的，有時我也會對自己的表現微微感到震驚；我竟是這樣地非要不讓自己被擊潰不可，而我和勝利者的歷史又這樣的格格不入。

□：在西方，我有時見到捷克人或波蘭人被指思想偏狹，而在另一些場合卻又見到你被吹捧為最重要的一個和平戰士，但我從未聽聞有人因為接受了你論及人之謂人受到威脅，繼而會去問在西德、瑞典或英國的人是否也面臨着這樣的威脅。西方的傳媒似乎

從來也不承認你提出來的問題可能是大家的問題。你是否有時會因此而感到煩惱呢？

■：我並非一個舉足輕重的思想權威，不足以使每一個人也要面對我的看法。但我知道在西方的人一般不傾向於承認人類正處於某種危機的狀態，因此亦不認為他們在為人方面也身陷危機。每次有機會和西方人談話時，我總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談。

西方人在這方面的短視，近期一個例子就可見一斑：多年來來，整個西方也知道卡達菲是恐怖分子，而仍然向他購買石油及助他採鑽石油。所以，事實西方一直是在培植及支持他。直至今今天，他們也未能攜手推出針對卡達菲的像樣的貿易禁令。換句話，西方人為了幾桶原油就甘冒安全受到威脅、放棄基本道德原則的危險。個別的利益比大眾的利益還要重要。每一個人人都指望炸彈不會掉在自己的頭上。然後，當情況太不像話了，他們能夠想出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轟炸利比亞。這是猝然、粗糙的反應。

□：在西方，對有關政治庇護的法律的解釋正在漸漸改變。政治庇護越來越明確地被視為逃避暴政而非逃避極權制度。意義解體或教育制度強制推行的無神論及集體主義等情況，已不再被認為是准予政治庇護的足夠理由。你會如何向西方國家的政府解釋極權的國家對個人構成的威脅不下於暴政統治呢？

■：西方國家的政府不會問我怎樣想的，但只要是能夠的話，我總會嘗試說明這個問題。我常常發現人們在知性理論上同意我的意見，但我很少遇到有真正理解的人。我沒有因此而感到驚奇：一些體驗就是不能轉移的，是解釋不了的，只有在親身經歷才能理解。但在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說，在庇護權的問題上，不能肯定簡單地譴責西方政府是否合適。世界大多數的地方都有極權或獨裁的政權。我懷疑在這些地方居住的所有那些不滿意他們的政府的統治的人能否由數個民主國家全部容納。因此，很不幸地，西方國家的政府被迫要作選擇了，而他們在那些生命正面臨

着暴政威脅的人和那些只是不喜歡你所說——他們的兒女教育的那種方式的人之間，對前者給予了優先考慮，一般說來還是說得過去的。

但我要進一步說：對那些在極權國家生活的人說，偶爾提醒他們，或者是含蓄地告訴他們，除了逃離國內的極權制度外，在國內針對這樣的制度也是有所作為的，我不認為這樣跟他們說會使他們感到刺傷。如果我要求西方國家的人不要只顧自己利益，而該像我們全體都該的那樣去做——即猶如我們對整個社會的命運直接負有責任——那麼我看不到為甚麼我不該要求在極權國家生活的人做相同的事。這樣似乎聽來苛刻，而事實上我的想法也不是這樣嚴厲的，但很不幸地，當我聽到你的問題時，我的腦海中不期然浮現起所有那些我很熟識的形象了，不挺起胸膛的人們，步步為營、不著痕迹地支持着和製造着極權統治，然後，這些人在第一次出國時，突然決定寧願在一個生活較容易的國家過活，並即時要求給予他們政治難民所能享受的權利和光榮。為甚麼當他們在西方時會認為所有這些權利均是政府必然要承擔的責任，而當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時他們卻在做着各種各樣的事情，助長着不讓人民有任何權利的國家制度的強大？我並不敢要求任何人為我們的自由流血，但我會毫不猶豫地指出：對這裏的無神論教育制度進行批判，會較逃往西方國家的神那裏更有意思。

□：你有沒有注意捷克的流亡文學？你有甚麼看法？有沒有令你感到意外喜悅或興致索然的東西呢？

■：雖然我較部分的其他捷克人更容易接觸到捷克的流亡文學，但我必須承認我並不十分熟識這類作品，我沒有有系統地留意流亡文學的著作。在近年我有兩次了不起的遭遇。第一次是帕路加（Ferdinand Peroutka）寫的《雲與華爾茲》（*The Cloud and the Waltz*）這本精彩小說，它是近數十年來我所知的其中一本頂呱呱的捷克小說。我也很喜歡斯科勒基（Skvorecky）《靈魂工程

師》(The Engineer of Human Souls) 。

□：我想再回到問題的第二部分：流亡文學中有甚麼是你不喜歡的？流亡作品中是否有些東西使你感到不適合、甚或不舒服的？

■：是，流亡雜誌中確有些東西是這樣的。我偶爾會閱讀到那些堅決反共的深深記恨的人寫的無聊的東西。例如，有文章稱我們所有留在本國的人為左翼分子（幼稚的布爾基維克），甚至還指我們是掩飾了身分的莫斯科的特務。我也不知自己是左翼還是右翼，但我必須承認，每當我面對這類右翼精神，我必然會向左靠。

□：在布拉格有時會聽到對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嚴厲的批評，或者這是對他在國際文學界的成就的反應（捷克作家有這樣的成就這可能是第一次）。（例如，他上次出版的書《存在那不那麼一回事的難受》(*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在意大利賣了逾二十萬本，並是意大利戰後以來最暢銷的外國作家寫的書。這書在美國和法國亦很成功。）這一情況是否使人要問，為何捷克國內的文學品味和歐洲其他地方的品味有這樣的分歧？

■：我並不太了解何以對一本書或一個作者的不同意見就是意味着和歐洲其他地方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我也不明白何以要把有這樣的「分歧」的責任自然地歸咎於導致分歧產生的人。但無論怎樣，我認為有自己的意見比較好，就算因此而出現分歧也較為了避免分歧而放棄自己的觀點好，我個人是喜歡昆德拉這本書。這和書的銷量無關。況且，不管怎樣，這種長期的惟恐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致的心態不是地方主義的明顯標記嗎？根據我對昆德拉在文學上的愛好的認識，看來他和一些為他辯護的流亡人士不同，他並不犯有這種地方主義。

□：你對民族文學企圖成為「世界第一水平」的問題有甚麼看法？

■：沒有看法。我至多認為這只不過是捷克傳統的一個假問題。

□：我承認「世界第一流水平」這個詞在今天已用得太多了，並且使人誤解，但我相信哥德是第一個提出關於一種價值極高的文學寶庫的概念：人類，不論是那一個民族，也可以依憑這寶庫來理解自己及其歷史。今天，昆德拉在某些國家已被看待為是這樣的傑出作家。你允許的話，我想自你寫的一篇文章中引述一些話。那篇文章是在《創造》(*Tvar*) 發表的，叫《關於貌似教育的問題的簡論》。文中你說：「在我們的國家（更甚於其他地方），真正值得世界寶貴的東西往往是在和本土文化的特質對立的情況下，而非和諧並存的狀態下建立起來的。」你當時舉出了麥卡 (Macka)、哈錫克 (Hasek)、卡夫卡 (Kafka)、約那卓克 (Janacek) 為例子，在今天，或許我也可把昆德拉加進他們的行列。

■：如果在你看來是這樣的話，你當然可以這樣做。我個人來說，並不認為昆德拉對捷克的文化而言是外人。多年來他都得到讀者愛戴，今天他已熟為人知了。他年青時，曾得過國家最高文學獎，如果他的書可以在捷克出版，可以斷言銷量會媲美西方的成績。就你引述的那篇文而言，那已是三十年前寫的了，我今天只想作這樣的補充：我會更加謹慎對待「世界第一流水平」這個概念。對我來說，這一概念，就正如「社會主義」一樣，已失去了意義。

□：你在一九六九年至七九年間寫的文章輯成的選集《論人之為人》，其中節錄了你和昆德拉在一九六八年及一九六九年的爭論。但昆德拉的回答沒有收進選集裏。昆德拉這篇題為《激進主義與表現主義》的文章是在《*Host do Domu*》刊登的，他在立章中反駁了你的觀點。昆德拉一向主張以勝利或成功的妥協為目標，而對相信「正確的目標受到挫敗也起着照明的作用，如爆炸所產生的光芒，把世界的一切苦難，該實踐者的性格的一切榮耀清楚地顯露在人眼前」的那些人，他總是嘲笑的。選集沒有輯錄昆德

拉這部分的駁詞，是否好像顯得你逃避他的問題？

■：首先，你講的那本選集是柏利勒（Vilem Precan）和湯姆斯基（Alexander Tomsy）兩人編的，當時我還在獄中，因此是他們而不是我選擇輯錄那些文章。其次他們作出的選擇是有其邏輯的，畢竟這是我的文章選集，對於輯錄其他作者的文章也只限於那些與之進行辯論的文章，不會包括那些回應我的觀點的在內。再說，我並沒有迴避你提出的那個問題。昆德拉對不能希望可以直接產生效果的公民行動的（先驗的）懷疑態度，我頗熟識，他並因此把這樣做的人視為在追求表現自己是如何值得欽佩的目的，我並不同意這種懷疑態度。在《存在那不那麼一回事的難受》中，有一段情節是這樣的：湯姆士（Tomas）的兒子要求父親簽署一份支持政治犯的請願信，父親拒絕了，並這樣解釋，請願信對政治犯不會有幫助，而事實上這也不是寫請願信本來的原因。寫信的人首要是吸引別人注意他們，並借此來向自己保證他們仍能對歷史產生影響。但事實上他們已是身處失去了一切的境地，傳遞請願信也不會使他們冒着損失的危險了。幫助政治犯的家人是更加有效但卻不那樣惹人注意的途徑，但他們卻不這樣做。事實上，他們是以政治犯的痛苦為養料，志在為自己留名世上作打算，並不考慮這樣做可能會使政治犯的處境更加不妙。

根據那段小說的觀點，那段情節是那一個請願動觸發的、而那次請願行動有沒有意義等問題並不重要。但我並沒有意思談論小說，我要回到現實來講。所有的情況均清楚地顯示，觸發昆德拉寫那段情節的事件是在「正常化」時期開始後第一次出現在很多作家之間流傳的請願信，而湯姆士大致上是昆德拉借以發表自己的想法的工具（你引述的那話證明了這點）。我很記得那次請願事件，我協助了這次請願搜集簽名。這封請願信非常客氣及謹慎，也沒有質疑當局的判刑，只是訴求於總統的寬宏大量，要求他把政治犯包括在聖誕節的大赦名單內。（順便說，我認為當年

簽署這個請願信的憲章運動人士今天就不會簽這樣的請願信了，因為它的語氣是妥協的。）在當時，還沒有明確界分那些作家是受禁的，那些作家可以出版，也不知道誰會誰不會簽署。事實上，一些當時簽署了這個請願信的作家，今天已被視為是官方的作家了。但那次行動是胡薩克時期的第一個有重大意義的行動，因此也帶有頗新的東西。當局對這個請願信充滿了敵意，而在這種敵意明顯表示出來後，隨即便有數名簽署者撤消簽名。所有那些沒有簽名或撤回簽署的人分辯的說話，和昆德拉小說中湯姆士的論點相似。他們表示這樣做對別人沒有幫助，反而激怒了政府，那些已遭禁的作家顯露了他們的表演癖，或更甚，他們希望藉這個簽名運動，利用別人的善心把對方也捲進他們所陷的深淵中。總統當然沒有批准特赦，沙巴達（Jaroslav Sabata）、賀寶（Milan Hubl）及其他人等自然亦要繼續在獄中受苦，而我們性格上美麗的地方卻因此而顯現出來。這樣看來，歷史似乎証明了批評的人是對的。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我不認為是這樣的。當坐牢者經過多年因禁出獄歸來時，他們都說對請願信感到很大的滿意，它使他們感到在牢中的日子是有意義的：幫助了受到破壞的團結重新建立起來。他們較在監獄外的人更清楚了解到，請願信的意義超越了他們是否能獲得釋放的問題——因為他們知道是不會獲得釋放的。但能夠知道人們知道他們的事，有人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並且毫不猶豫地公開支持他們，就算是在普遍冷漠及逆來順受的氣氛也這樣做，這是很寶貴的，不能代替的。如果沒有其他原因，就是因為這種感受，這請願信也是重要的。（據我自己的經驗，能得到外界表示與他團結一致的消息，有助於受囚禁者在獄中的生存。）

但它還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它標誌了人們的公民勇氣在伸張的開展。這是七七憲章及憲章現時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先驅，此一

開展的過程無可否認是有所成就。自那次以後，數以百計的請願信相繼出現，雖然政府沒有對任何請願信作出回應，但這些不斷湧現的要求最終促成了局面的變化，政府卻不得不對此變化作出回應。這些成就是間接的，並不顯著，要長遠才見效，但它們卻是實在的。這裏可舉一例：在七十年代早期，被囚者在沒有任何緣故的情況下被判長期徒刑，但國內國外幾乎沒有任何人表示關注，這是政府不須為此付出代價的原因。今天，經過了十五年蟻一般的工作，雖然這些工作很多時都使人想起唐·吉訶德，儘管一直以來請願者均被疑有表演癖，圖以行動照亮「整個世界的痛苦」及他們的光榮的性格，但一切竟還是改變了。現在，當局只要以政治理由把人囚禁四十八小時，全世界的報章都會發表文章報道。換句話說，已引起了國際對這樣的事情的關注，政府不得不有所顧慮，不能再像以往一般，幹了這種事情後也不用付出代價。它不能再期望沒有人會發現它在幹甚麼，或者沒有人敢批評它。儘管它可能不願，但也必須面對其可恥行為造成的現象。

這情況造成的後果自然涉及更大的範圍。在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更多。想想看，數以百計的人今天做的事情，是他們在七十年代初時沒有一個人敢做的。我們今天真正是在新的不同的處境中生活了。這並不是因為政府變得更能容忍了，而是它必須去適應新的境況，必須對不斷從下而來的壓力讓步，即對那些看來是尋求自殺式自我表演的公民行動的壓力低頭。只習慣「從上」的位置看社會的人傾向感到不耐煩，他們要求即時見到效果，任何不能產生即時效果的事件看來都是愚蠢的。對那些只能在多年後才能評價的行為，他們都不大寄予同情，因為這些行為的動力來自道德考慮，因此總是存在着不能有任何成就的危險。（在你所提及的文章中，昆德拉責備我常常以危險為話題——我相信他甚至點算過我用了多少次危險這個詞。不錯，我常用這個詞——這是我在文體上犯的毛病，對此我亦感到慚愧——但我並不會因為

指出了有危險的成分即意味成功沒有先驗的保證的事實而感到羞愧。不幸地，我們生活的環境的改進常有賴於一些在人類記憶中可能會永久留下不良印象的行動，就如《存在那不那麼一回事的難受》中關於請願信的那種印象：絕望者要表現自己的行徑。

我不想對昆德拉不公平，但又禁不住有這樣的感覺：他認為歐洲受亞洲掠奪的看法，他那精神基地的比喻、及歷史為健忘所主宰並且是殘酷的笑話的不盡的泉源等觀點，均給以下的說法提供了支持：捷克自七十年代初至今都沒有甚麼改變，一切的請願行動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沒有希望及荒謬的，它們更加明顯是亡命者力圖引人注意的行徑，而此種行經更是使人痛心地沒有意義。

很自然地，在每一次請願行動中，甚至在每一個簽名行為中，均可能含有一點昆德拉所奚落的東西。這是為甚麼我不能夠因為他的嘲笑，特別是在小說中的嘲弄，而對他抱有成見。我不同意他的地方是別的東西：他沒有看見（或固執地拒絕去看）所有這些事情的另一面，而這一面是沒有那樣明顯，較隱秘的，但卻又更加有希望的。我是指這些事情可以或可能產生的間接及長遠才見的意義。昆德拉可能有點是自己的懷疑態度的俘虜，因為這種態度並不容許他承認有時冒着予人以荒唐的印象的危險幹些勇敢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我可以理解他懼怕顯得荒謬及惹人憐憫，特別是鑒於他本人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經歷所汲取到的大量的教訓。但在極權制度中，人的行為總是難以理解的、模稜兩可的，而我相信昆德拉的恐懼使他不能看到這點。當你發現自己的熱誠原來是建基於幻想上，因而變得對一切都表示懷疑，這在心理上是理解的。但此一態度是同樣輕易就可變成同一個假錢幣的另一面，因而把事物更有希望的一面隱藏起來——或者說得溫和點就是把事物的不明確性掩蓋起來。

□：冒着把事情過於簡單化的危險，或者我們可以把捷克的知識

分子對昆德拉的保留態度作這樣的概括：昆德拉成功的代價是要有過之而無不及地仿效西方塑造的東方印象。甚至他貶低那些「抗議行動」的做法，也可能迎合了西方的意思，有利於他們為自己常常不熱心支持那些抗議的行為辯護。容許我引述昆德拉的說話，他的回答會是，我們突然對西方期望太多了，這使西方不能理解我們，因而我們一點信息也不能傳遞給對方，或只能告訴他們很少的事情，並且只能與很小的圈子的人達到這樣的溝通。

■：你可能會感到掃興，但我現在要改變位置一下，為昆德拉辯護。我不相信他主要的動機不過是為了攀上最暢銷書籍的階梯，或者他能夠假借使人易於明白的名義來出賣信仰換取成功。我不能相信他在東歐這邊就會改變他對抗議或表示團結精神的行動的看法。因為他這樣的看法並非出於他對西方讀者心態的假設，而是他就是這樣看這類事情的，因此就算他是在東歐生活，不用愁西方書業市場對他的影響，很顯然他也是會這樣看的。不管怎樣，他的看法是他自己的事，而我有很不同的看法只不過說明了事情就是如此吧了。

□：紹爾（Gordon Hubert Schauer）在近百年前對捷克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偶爾都會重提這個問題。最近，在一九六七年一個作家會議上，昆德拉又有力地令我們想起這個問題。我現在想據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時間雜誌》（*Cas (Time)*）發表的原文引述這個問題：我們國家的角色是甚麼？我們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是甚麼？我們國家存在的狀態是甚麼性質？我們是否如我們所想像那樣「穩坐家中」呢？我們國家的生存真的值得我們費勁嗎？它的文化價值真的如此巨大嗎？我們國家保存下來的東西是否這樣豐富，以致能向那些在極困苦的情況下為了國家而鬥爭的人提供足夠的精神力量？今天你會怎樣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仍有價值嗎？

■：我個人不會為這些問題操心。對我來說，我是捷克國民，就

如我是男人，或長有髮毛，或活在二十世紀一樣，是生來的事實。假如我是活在十九世紀民族復興時期，捷克國民的身分可能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我可能真會為了是否值得努力的問題而苦惱。我們是否應該發展這個國家，或者乾脆將它完全放棄的問題，不是我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由其他人處理了。不管怎樣，我有其他煩惱，而我最大的煩惱又是週圍所有人也有的煩惱：就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生命，如何忍受及梳理身處的困境，不論這些困境是和人本身有關，或和存在或道德或公民問題有關。處身於這些困難中的我，是一個住在布希米亞的捷克人，而非住在阿根廷的阿根廷人，這顯然和（如帥克所說那樣）我們全都是來自某處的這個事實有關。由於某種原因，上帝決定了我是在捷克而非阿根廷生活並為世界及自己添加煩惱。總括而言，我不覺得捷克國民性的問題是一個迫切尖銳的問題。在我看來，假如國家的命運要依靠甚麼的話，主要就是在於我們如何履行我們作為人的任務。

說到這裏或許我該回到你提及的我和昆德拉多年的爭論，因為這問題正牽涉到捷克國民性及國家命運的問題。

當時，昆德拉（絕非只他一人如此）對蘇聯的入侵及捷克的遷就的做法進行解釋，視之為國家命運中的一種安排，就好像蘇聯入侵捷克並非是為了對不臣服它的「封地」恢復它劃定的秩序，而只是實現捷克的命運，而我們國家的掌政者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簽署了議定書。這使我感到不安。所謂捷克的命運實際上是事件發展的結果，但卻被說成是這些事件的原因。我並不反對歷史上類似事件的比較，及對國家歷史趨向的深思。但當這些行為是把我們的注意力從我們生活的時空中的實在的，與人、道德及政治相關的困境中分散開來時，我就覺得不安了。因為，假如我們去解決或處理這些困境，我們將會在製造自己的國家歷史，並最終賦予它某種意義。前共產主義者對事情發展的結果感到灰

心，這我完全理解並且尊重。但當他拿古代時提出的國家命運來充當緩衝物，以減少在鐵一般的真相上着陸的震蕩時，我就不喜歡了。他們這樣做，嚴格來說就是洗脫他們和歷史的關係，就好像歷史該對歷史自己負責！

至現在，昆德拉的著作還有某種借歷史作托辭的成份。正如一個曾自以為手中緊握着歷史的舵輪的人，一旦在極度痛苦中發現到歷史卻在朝着別的方向走去時，就頗簡化地歸結認為根本就沒有人掌管着歷史的舵輪。這是他把歷史非人化的根源。歷史變得好像是在位於高高在上的某種非凡的宿命世界中，一代接一代地漂流着。歷史好像在走自己的道路，和我們無關，是我們絕對不能理解的。歷史儼如一個聰明的神，只會毀滅我們，欺騙我們，苛待我們，或在最好時也要戲弄我們。對我來說，這種態度是過分從自己的幻滅來進行推斷了。歷史不是在「別的地方」發生的事情，它是在這個世界裏發生的，我們每一個人也有份參與製造歷史——昆德拉透過他的小說，你通過對我做訪問，七七憲章成員通過他們的請願行動。我們每天做的好事及壞事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生命並不是在歷史以外進行的，歷史也不是在生命以外存在的。

讓我們回到捷克的問題。我並不是說國家的問題不存在。我只是建議不要把此問題看待成萬用掛衣架，把生命裏一切不愉快的東西掛到上面，又或把它視為一個抽象的惡魔，人類的一切苦惱也可歸咎於它。我太多次看到「捷克問題」扮演了上面的角色，因此每當被要求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時，我都會變得特別小心。

或許我該先談談我常常在思索的那種希望（特別是在身處諸如監獄等特別無望的處境時），在我的理解中它首要是一種精神狀態，並非世界上的一種狀態。我們要嗎就是心中有希望，要嗎就是沒有，這是心靈的一面，並不需要以對世界有某種特定的看

法或對處境有某種特定的估量為基礎。希望不是預言。它是精神的一種指向，內心的朝向，超越了直接經驗的俗世，在俗世外某處植根。我不認為你可以解釋它為僅僅是眼前一些事物的派生物，僅僅是世界上一些活動或一些有利的徵兆的派生物。我感到它最深遠的根是在超越的境界裏，正如人的責任的根源那樣，雖然我不能像諸如基督徒那般對超越境界提供任何具體的描述。每一個人都可以否認或証實自己的希望的根基是如上所述的，但也不會對我此一信念產生任何影響（這不單是我的信念，更是我的深刻體驗）。最深信唯物主義及無神論的人也可能較十個玄學家加在一起更多地懷有這種真正的、根源於超越境界的內心的希望（這是我本人的看法）。

從這深刻、有力的意義來說，希望不同於感到一切暢順的歡樂，或對明顯會很快就得到成功的事業投身的那份願意，卻是那種能夠因為一些事情是好而為之付出努力的力量，能否有機會成功已不再是唯一要考慮的事情了。處境越不利，所展示的希望就越是發自心底。希望絕非樂觀。希望不是相信事情總會有好結果的心情，而是無疑問地知道某事是有意思的，不管事情的結果會怎樣。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切、最重要的那種希望，即唯一可以助我們生存下去並促使我們行善的東西，是人類心靈令人最驚奇的一面及使其所作的努力彷彿是自「別處」得到其唯一真正的泉源似的。最重要的是，也是這種布望給予了我們力量，在就算如我們現在所處的那樣看似絕望的境地中，繼續生存及嘗試新事物。

以上是引言。現在回答你有關世界目前的狀況及我看到其中有希望的現象是甚麼的問題。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你也可以找到一些使人可予寄以希望的原因。至於我們能對戈爾巴喬夫及一般而言，對上層（即權力領域中發生的事情）有甚麼期望，這個問題我還是留待那些更有資格的人去解答。我從來不把希望集中在

這方面，我一向都對「下面」在發生着甚麼事情更加感興趣。我更加想知道我們對「下面」可以期望甚麼，那裏可以爭取到甚麼，有甚麼可以保衛。一切權力都是支配某人的權力，而又不知怎樣總是對受其統治的人的行為及心態做着回應，並且通常都是不知不覺地這樣做着的而非經過週全的盤算。你常常可以從掌權者的行為中看到「下面」所發生着的事情的反映。沒有人可以在真空中進行統治。權力的行使是受有權勢者的世界和無權勢者的世界之間的眾多的互相作用的關係所規限的，特別是由於這兩個世界之間從來也不存在很清晰的分界綫，每一個人總也有一小部分的他同時處於兩個世界之中。

在這樣說之後，如果我試圖公平地去看「下面」在發生着的事情的話，我必須指出我在這裏發現到一個緩慢、不為人察覺的、但確實的，並且毫無疑問是帶着希望的運動在進行着。經過十七年來看似停滯及毫無生氣的局面，現在已是頗不同了。如果我們拿現在的社會和七十年代初的社會比較，它的運作、表達的方式，敢於做的事情（或更該說一羣為數不多卻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人敢做的事情），我們必能看到很明顯的分別。人們似乎開始漸漸恢復過來。走路時，腰也挺得直多了。對以往極力疏遠的事情，他們現在又再次感到興趣。在一些點上開始出現了自我意識及自我解放的活動，而這些獨立的點之間的聯繫雖然在過去曾遭粗暴打斷，但現在又開始蓬勃起來。未遭受過蘇聯入侵造成的震驚的打擊的新一代正在成長；對他們來說，入侵的事是歷史，杜布切克（Dubcek）在他們的心目中佔的位置就好像克拉馬（Kramar）在我們那一代的心中佔的位置相似。社會的意識正在發生着一些變化，儘管這些變化仍只是一股暗流，並非明顯可見。

這一切對掌權者構成了微妙的壓力。我並不是在談論着來自異議分子的公開批評的明顯可見的壓力，而是現時的那種一般的

心態及這種心態各種各樣的表達形式所產生的無形的壓力。面對着這股無形的壓力，當權者就算在採取行動對抗時，也在無意中在適應着它。當你獲釋返回社會時，你會特別清楚地感受到這樣的轉變，在你入獄前深深烙在記憶中的經驗和獲釋後所接觸到的新處境，形成強烈的對比。我自己就有這樣的體驗，其他人亦有相同的經驗。一而再地我們都為在發生着的新事物感到驚訝，人們在承担着更大的危險，更加不忌諱，而他們對真理、對真實的說話及價值的渴求，更見強烈，更加公開。就拿獨立文化那不能遏止的發展為例：十年前是沒有民刊的，抱有辦民刊的念頭也被認為是自殺；今天已有十二份民辦刊物存在，而那些直至最近還是人人皆知是謹慎的人，現在也在民刊撰稿了。想想所有那些新的民辦刊物及那些大胆的出版嘗試；想想有多少不知姓名及意料不及的人在抄寫傳閱這些民刊；想想這些民刊在公眾中受到的歡迎程度！這和七十年代早期比較，真有天壤之別。另一方面，在公眾或獲得允許的文化領域方面，或更確切地說，在這一領域的邊緣地帶，在獨立文化和官方文化之間存在的一片重要的灰色地帶，想想在這裏所出現的所有新的事物。在這裏，直至最近仍截然分開的官方文化和獨立文化，現在開始互相混和結合。假如你前往某青年歌手和作曲家或一隊不遵從傳統規範的樂隊的音樂會，或去看某個現時四處也在出現的新的新小劇場的演出，你會感到這些年青人是活在屬於他們的世界中，和報章、電視及布拉格電台每天感染着我們的世界非常不同。這兩個世界簡直就不能聯接起來，並且和六十年代那些不能和當時的意識形態產生聯繫的類似的活動比較，在某種意義下，現在的不聯接是來得更基本和徹底的。每當他們在外國電台談及我時，獲悉這些消息的公眾遠較黨辦的文化刊物《創造》週刊對我的攻擊能傳遞到的公眾為多。

這並不單單是因為現在有七七憲章此一監察當權者的工具，而十年前是沒有的。還有其他現象出現了：例如，爵士樂隊這組

合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典範。爵士樂隊一點也沒有蓄意去反抗或表示異議；很明顯這樂隊不是出於有意識的政治對抗行為而產生的。它的成員只不過是在做好自己的工作；換句話說，他們只是在做着每個人理論上也可以做的事情。政權感到受到了爵士樂的內在活力的威脅及不直接的譴責，樂隊脫離了官方的文化路線，樂隊在思想上表現的自由不但使官方感到威脅及間接受到譴責，更使它感到其全面操控的制度出現了使人丟臉的缺點。因此，當局開始針對樂隊採取行動，但他們沒有屈服，三年來一直為了自己的存在作出勇敢的鬥爭——而這一組織原初是官方組織的一部分的！這有點讓我想起我已談過的《創造》的古老的故事。這裏我們又看到富有挑戰的行為新模式的前例。當然，這樣的例子在社會很多不同層面及領域也可見到。還在不久前，這樣的情況是不可想像的。

就舉從年青人身上看到的正在迅速甦醒及蔓延的宗教感情為例，在韋萊勒得（Velehrad）見到的朝聖活動是一種證明。這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必然的發展：在社會主義消費社會中過着的無邊無際、沒有變化的荒原似的牧羣生活，知性和精神陷於空虛，道德情操貧乏。這樣的生活必然導致青年人對更遠更高的境界關心起來，推使他們追問生命的意義及期待一套更有意義的價值觀及標準，並盼望能在擴散而支離破碎的瘋狂的消費主義的世界（這是一個貨品短缺的世界）中找到一處可供站穩的位置——這一切在他們心中喚醒了對終究的真正的道德的追求，對一些更純潔更真實的東西的追求。這些人就是要追求站到普遍在自動運作的社會的外面，重新發現他們的自然世界及對這世界的希望。為了反對「非人化的終極路向」，他們簡單地提出了另一種末世學。

今天的情況和數年前不同了，而且今天還正正是處於所謂的異議者或憲章運動的社會氣候當中。雖然當權者對參加憲章運動

的人的看法並沒有改變，但他們仍要去習慣他們。雖然異議運動只佔有邊緣位置，但今天它已是捷克的社會生活中不易分割的一部分。社會現在更多地視它為社會關係追求的最終的境界，或是各種各樣的價值的最終的焦點，是大家仿效的東西，而非對大家的直接挑戰。在今天，要去想像憲章運動並沒有存在過，已是很困難的事了。假如真的嘗試這樣做，一股空虛及道德成為相對的事情的感覺會油然而生。

又舉「保衛被無理檢控人士委員會」(VONS)為例吧！我們有幾個人因為在這個「反對國家中心」工作而被捕入獄。委員會沒有因此而屈服，其他人隨即加入把工作繼續。我們也沒有屈服，坐牢服滿刑；而委員會至今天仍在，繼續在積極工作，似乎再沒有人打算因為它的工作而檢控它。在官方而言，它仍是一個「反對國家的組織」(掌權者過於狂妄自大，因此不能收回這個稱號)，但他們的執着只把這個詞變成沒有意義的東西：一個能夠公開運作了九年的組織能算是怎樣的一個「反對國家的組織」呢？在某一意義上說，我們的判刑為我們爭取到辦「保衛被無理檢控人士委員會」的權利。

對在外面的觀察者來說，這些變化可能並不顯得重要。他們可能會問你們的千萬人的工會在那裏？國會有沒你們的代表？胡薩克為甚麼不和你談判？你們的政府為甚麼不考慮你們的建議並據之作出行動？但對於在這裏生活，仍沒有變得完全冷漠的人而言，這些決非不重要的變化；它們是未來的主要的希望，因為他們很早已認識到不要期望在別的地方找到希望。

我忍不住要提出我自己的問題來結束這段話。所有這一切微細但充滿希望的徵象的活動的報酬，不正是那深植內心的希望嗎？這內在的希望不依憑預測，它是在這場力量對比不平均的抗爭中的原始的出發點。若果在「裏面」沒有這偉大的希望存在，會有那樣多的微細的希望「出現」嗎？沒有這希望，要活得有尊

嚴、有意義也沒有可能，更不用說要有那種意志去支持那「沒有希望的事業」，而這沒有希望的事業，卻又是實現大多數好的東西的開始。

□：在你的一生中你與受排斥的作家、音樂家及信徒站在一起。你對歧視採取激進的態度，是否出於你自己受歧視的經驗；還是出於某些關於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抽象的哲學信念？

■：事實上，我從來沒有特別感到受到歧視。我不認為我曾經有過特別成為受惡待的對象的感覺。我常常帶着體育精神來面對歧視，視它為我生命的一部分，一份以後可以對我有用的經驗，是我自己作出的選擇的後果。因此我受排斥的經驗不大可能成為我聲援其他人的自覺的動機；當然我並不清楚它在我的潛意識中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我也不是出於理論上的信念才這樣做。對我來說，不待說我總會這樣做的——換言之，它不是由我的生命或哲學觀點所決定的。若我曾想過是甚麼推動我這樣做，也是總是在回顧的時候才會這樣問自己。如果我在獄中寫的信其中一個基本主題是問：我們做人為甚麼要嘗試負責任？那麼我所得出的結論只不過是我的自我體驗的反映吧了，而非是知性上的覺醒所產生的足夠推動採取某些行動的力量。

□：一個稍為不同的問題：你曾否認真想過自殺？在你獄中的信中，你當然否定了自殺的想法，但這表示最少你也思考過這個問題。自殺是否一種解決呢？

■：有沒有人從來也未有過自殺的念頭的？我當然有這樣想過，還很多次呢，並且現在還會這樣想，但很可能就如每一個有思想的人想到這個問題那樣吧！例如，自殺對我可以是一條常常懸在我頭頂的繩，我甚麼時候再沒有力量繼續下去它就可派用場。如果我真的把這條繩抓在手中，這將是我最後的決定性的行動，它當然不但將解除生命的苦惱，快樂也會一併化為烏有。我自己來

說，我仍然可以生存下去，不須用我那條繩：至目前我也未試過自殺，看來眼下的將來我也不會這樣做。相反地，不管怎樣，我也希望繼續生存下去。弔詭的是，因為存在着自殺的可能才能够這樣下去：我們知道我們總是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使我們得到力量不去嘗試這樣做。生命不是有點像不斷把自殺延後嗎？

我不能夠回答自殺是否一種解決。對那些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人而言，自殺顯然是一種解決。對，這是來得頗突然的解決——但或許這只是沒有自殺的我們才是這樣看的。我們是否有權以自以為是的姿態來談論一些我們還不認識的東西呢？（在這裏我不是指自殺行為本身，而是之前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的憂傷，重得已不能盛載的那股憂鬱。）

在獄中，我常常要勸阻同囚的人不要自殺；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假如我本來能夠說服一個想自殺的人不要自殺但卻又沒有這樣做，我的良心會很過意不去。（有一次，我因為試圖阻止一個人自殺而被關進了隔離牢房兩個星期；我們半瘋的監獄長喝罵我不要干涉他管理這座監獄。）不過，坦白說，假如我是想自殺的對方，我在這種情況下所用的論點很可能說服不了我自己。真的很難說得上人為甚麼要活。當然，生命不是我們賦予自己的，因此我們沒有權奪去它。但假如有人表示他本來就沒有向上帝索取過生命又怎樣呢？假如他對你說不管是誰給了他生命，他本人才是要去活此一生的人，而非給予他生命的那個存在。又或他如果說，若然是上帝賜給了他生命，但上帝卻沒有賦予他活下去的堅強性格！幸而在這些情況下，論點的說服力並非關鍵所在，生存的意志才是決定性的因素——而通常我們都能够以最糊塗的論據鼓舞起對方的生存意志。

因此，假如我也到了吃不消的地步，一些巧妙卻又「愚蠢」的論點也可能救了我，這是完全可能的。無論如何，我從來也不能夠譴責自殺行為。反之，我傾向於尊重自殺，這不單是因為自

殺毫無疑問需要勇氣，兼且是因為自殺在某一意義上把生命的價值看得很高：他們認為生命太寶貴了，不能容許漫無目的、空洞、沒有意義、沒有愛和希望的生存所糟蹋。有時我會問自己，自殺是否生命的意義的可悲的保衛者。

□：我聽聞你改信了天主教。如果是真的話，這是否意味着你體驗過你在獄中書信上提及的神秘的經驗，作為真正的內在轉化的很有可能的條件？

■：這要看我們如何理解轉化。照我的理解我寧可說沒有這一回事，我並沒有皈依天主教。我當然沒有成為一個天主教信徒：我沒有定期去做禮拜，自小孩以來就沒有告解了（我是指各種制度化的告解），又沒有祈禱，在教堂內也不畫十字。在獄中我有參與秘密彌撒，但沒有接受聖餐。童年以來我都有這樣的一種感受：在我之上存在着一個玄之又玄的奧妙境界，是一切意義及最高的道德根據的依歸：叫「世界」的這個事件是有更深刻的秩序及意義的，因此並非是一組不大可能的偶然事件併在一起這樣簡單：在我自己的生命我一直在追求超越於我及我所認識的世界的東西；在每一件我做的事情中我都在一種莫明的狀態中接觸到永恒。但在我入獄前，我一直也未有對這個情況作過任何連貫的思考。在獄中，我嘗試了描繪及分析我對這個世界及自己的根本的經驗。

但這並不表示我轉變了——而改變信仰畢竟就是意味着轉變。或許我今天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天主教及基督教朋友——顯然我和他們有了更多接觸，這可能是讓人認為我有信仰轉化的原因。就我所理解，真正的皈依，意味着以絕不含糊的以人形出現的神取代了某一不明確的東西，並完全地、在心靈深處接受基督為神之子以至包括禮拜儀式在內的一切神之子的存在所必然包含的東西。而我沒有走這一步。我不再如前那樣肯定我必須有那份神秘的經驗：我一些極度虔誠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沒有這樣的經

驗，他們的信仰或皈依此信仰的轉化亦不需要有這樣的經驗。

不管怎樣，我只從在信中所用的意義來說自己是有信仰的人：我相信這一切——生命及宇宙——並不只是「自然地自在」的。我相信沒有甚麼會永久消失的，我們的行為更不會這樣，這是為甚麼我相信在一生中要嘗試做一些事情，一些超越了明顯會帶來報酬的事情是有趣味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可稱得上有這樣的信念，但我不認為稱這些人為基督教信徒是負責任的做法（最進步的神學家也不會這樣做）。我可以嘗試追隨基督教的道德精神生活（不錯，並不很成功），但這並不表示我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我就是不能肯定基督是否神之子或是一個神人，即如一個基督徒那樣深深信奉而非只是作為比喻（喻人的一種典範）來說「神之子」和「神人」。

□：你已提過你的話劇。你還寫過其他甚麼作品呢？

■：我在青年早期已開始寫文章、冥想錄、隨筆，最早在五十年代寫的從沒有發表（我也不欲發表它們）。我把它們留在家中，集錄成一本本用打字機打印的小冊子。這些作品包括如一篇寫勒保（Hrabal）的頗長的隨筆，當時他的書還只是以手稿形式流傳，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分析他的作品的文章。在六十年代我經常發表文章談論劇場、演員及導演的簡介，及關於藝術的較一般的文章；主要都是替一份叫Divadlo的劇場評論撰稿。除此之外，我為劇場節目及藝術展品目錄寫了很多短文章、序及跋。如果要我把所有這些文章集在一起，我看是辦不到的。

我已提過一本叫《觀察錄》（*Protocols*）的書，由Mlada Fronta出版。那本書收錄了我的排字印刷的詩集《反規則》。我在七十年代寫的隨筆、文章、小品文及各種各類的作品，集錄成一本集叫《論人之為人》（*Rozmluvy London, 1984*）。其中最大篇幅及最重要的文章可能是《無權勢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在一九七八年寫成。我亦談過《給愛嘉的信》（最先

在多倫多由「六八出版社」出版），集錄了我在獄中寫的信。最後一輪的信亦以《超越的招手》（*An Invitation to Transcendence*）為書名發行出版（Rozmluvy, London, 1984），和這些信一同收錄書中的還有西當尼斯（Sidonius）的一個出色的研究。出獄後，我寫了好些文章，諸如《政治與良知》（*Politics & Conscience*），《以責任為命運》（*Responsibility as Destiny*），《驚險小說》（*Thriller*），《沉默的剖析》（*The Anatomy of a Reticence*）等，是其中較重要的作品。出獄後不久一個外國記者對我做了一個很長的訪問，這訪問對我個人來說非常重要（它作為Listy的附錄以捷克文刊出）。或許這些作品有一天會集錄成書。

我有沒有忘了一些甚麼呢？還有我為AMU寫的論文（是對我自己的《越來越難集中精神》的話劇的分析），及在七十年代初就《共謀者》寫的十多頁篇幅的評論文章。此文事實上是對「人之為人」這一主題寫的一篇頗詳細的研究。我相信這是我首次賦予我的基本戲劇主題一個名稱，而那篇評論可能是較那個劇還好。最後，為了完整起見，我亦該提及我自己及和人合作寫的無數的立場書、宣言、文件及其他相類似的文字，它們主要是在「七七憲章」出現後下筆的。

□：你會怎樣形容你的話劇的美學或詩學？照你看，它們有甚麼是共通的，你又會如何描繪你作為一個劇作家的特性呢？

■：要恰當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暫時走出我自己，對自己作客觀的觀望，這並非輕易的工作。不過我們會嘗試的，但要附帶說明我的自畫像只會是一幅頗粗糙的草圖，只能局限於我能到見的幾點最顯而易見的特點。

先從表面開始講。在我的話劇中很難會看到一種不顯露的基調或情態貫穿其中。也不易看到多種分別細微的心理狀態或瞥見人的心靈、思想的秘密而複雜的活動。你會發現這些話劇的內在結構沒有很巧妙地隱藏起來，不過它們看來也不是自然流暢，讓

生命透過一連串的事件自然地開展出來。我是建構自己的話劇的那類作家，我承認這點；我刻意使它們的結構容易了解。但求那些話劇的結構不被理解為是笨拙的錯誤的結果，或只是出於本身的考慮而設計的，為了它們能被理解為還可以有某種意義的東西，我對這些結構加以強調、揭示，並常常賦予它們幾何結構般的明白及勻稱特色。

正如我在別處說過，我的聽覺對音樂不敏感，而我顯然對音樂缺少廣博的認識，但我仍然認為在我的話劇裏，由於我對組織加倍重視，以至接近音樂及音樂思維的東西出現了。我真的喜歡的東西是，諸如把主題進行對稱地——以至最終是對稱地不對稱地——交織及混合；逐步把它們引入及淡出，有節奏地發展它們，通過和它們相反的東西把它們反映出來。我一再發現自己傾向建構類似的對話：反覆使用對話的部份片段，將它們重述或互相對換，把某角色說過的話由另一個角色說，然後又由原來的角色再說，如此反覆進行，把對話的次序倒轉或造成自相矛盾，刻意勾劃談話主題的有規則的循環更替，這又再意味是對時間因素的強調。所有這些，或多或少都可在我的話劇中看到。在其中一個話劇——《山地旅館》——我甚至嘗試把這些技巧發展成為該劇的主題；換言之，《山地旅館》在某一意義而言是一個關於自己的話劇，而這劇當然有——或者更確切的說，應該有——它自己的「更高一層的意義」。

因此，你一看就可以見到我的話劇是有意識地、刻意地、明顯地建構出來的，像按照圖式似的，幾乎是機器似的。這並非因為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曾作出了一個冷血的決定，要以這種古怪的方式而不以其他方式寫作。反而這是來自我本身傾向的興趣、我的本性。這些事情在學術研究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例如，這個情況可被視為一種旨在清楚說明某些社會及心理過程的內在機制，及人在現代世界所受到的操縱的機械本質，而這又是和推動

這種人的操縱出現的科學以至最終是和科技有關。我並不反對這樣的詮釋；他們是說得通的，事實上還有些道理。我只不過要再次說明在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懷着任何意向，為了任何和「意識形態」有關的理由，選擇以某一特別的方式寫作。事情並非這樣簡單。事實上各個作家是出於各自的本質而朝某一方向發展，並在其進程中接觸到其他事物——或者確切地說，引使他們接近的東西亦引領他們接觸其他東西。所有有價值的東西總合有較作者心中意欲的更多的東西。

另一件我須在此提出的事，是我對語言的興趣。我對語言的矛盾狀態及妄用感到興趣。語言塑造生命、命運及世界；語言是最重要的技能；語言作為儀式及不可思議的魔力；言語可充當輸送激動人心的變化的載體，可證明某些事情是合理的，可作為我自肯定及投射的一種途徑。老生常談的說話也很有趣。在我們的世界，評價的言論，在文字堆砌出來的片段中佔一位置，在語言上的註釋常常都較現實本身還重要；在這樣的世界，陳詞濫調及其意義是「真正的現實」的由來。有人曾說《游園會》（*The Garden Party*）的最重要的主角是陳詞濫調。陳詞濫調在組織生命，剝奪人們的個性。它變成統治者、辯護律師、法官、法律。我喜歡寫花言巧語的說話，以清楚不過的邏輯為胡言辯護。我喜歡寫獨白，以真實、精妙的文字表達純粹的真理——由始至終是完全在說謊的真理。我還更加喜歡寫一些如在刀鋒上保持平衡的說話：觀者會對這些說話表達的真理感到認同，但這些說話道出時的場合及佔的位置讓他們隱約感到虛假的痕迹，這使他們不自在起來，奇怪究竟是甚麼回事。例如在《誘惑》一劇中，歡士嘉（Foustka）對瑪加達（Marketa）闡述他對存在的根本問題的看法，這些說話幾乎如出自我自己的口，是我的真心話，我在別的地方也說過，如在獄中寫的信裏，或在現在的談話裏也說過。但同時，歡士嘉的說話卻又帶着不易捉摸的不對勁的地方。他說這

番話的部分原因——這是我們不該看漏的地方——是為了使瑪加達愛上他，而他成功了。因此，無論他是如何的不着痕迹，他還是在妄用着他經過可貴的經驗體驗出來的真理。

那麼，這還算是真理嗎？如此不露痕迹的濫用真理及語言，不是歡士嘉的苦痛的真正開始嗎？不是我們生存的世界的苦難的真正開始嗎？觀眾不用對這些東西完全清楚；那種矛盾狀態會使他們產生不安，特別是他們本身的經驗——假如他們是男性的話——讓他們知道當他們欲討女人的歡心時，他們的口才通常都變得能言善辯最能譜道起來。在《備忘錄》(Memorandum) 演出期間，我記得碰過這樣的情況：主角在他最後一番說話中為自己的墮落進行辯護。他以剛剛再為人發現到的存在主義的術語把責任歸咎於世界普遍的荒謬狀態及疏離狀態。有人問我我想講的究竟是甚麼——即我是真的在為他的墮落辯護，或我是打算透過對這類說話的嘲弄而把自己和當代哲學復興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劃分開來。向我提出問題的那人感到困擾，這是我所期望的最好的反應了。陳詞濫調總脫不離是陳詞濫調；並沒有「進步」的或「反動」的陳詞濫詞之分；一句說話越「進步」，就越不似是陳詞濫調，我對它就越發感到興趣。

在我的話劇裏，機械形式的結構可能正是這些話劇最重要的美學素質。總的來說，在我的話劇裏，人物的行為及事件的發展並沒有意義、主題、思想、符號、論據、觀點、論點、文字等的變化那樣重要。所有這些變化似乎長了生命，最終更是真正的活動的媒體（如果這還能看作是活動的話），並且是劇本的真正根源。當然，這必然意味着我的話劇是充滿了節略、簡圖似的符號。它們有點近似木偶戲似的，宛如有生機的機器似的。不只一個劇評家或導演或演員感到不容易接受這些話劇；他們希望劇情帶有神秘、意想不到及不規則的情節安排。在我的話劇裏，一切都好像冷冰冰、計算過似的，好像是根據某圖表，通過綜合歸納

構成似的：他們感到這些話劇沒有適當的地方安插神秘、奇蹟、意料不及和使人感到希望的情節及表達生命個體的獨特性的空間。我完全了解他們，但我同時仍然堅守自己的立場。

或許我應該問自己，我的話劇究竟是講些甚麼。不論是我所想或計劃的與否，一個基本的主題近乎執着似的總會在我的話劇中出現。這樣自非偶然了，而是這世界那些把我置於註釋它們的位置的不同面向的本質造成的。這個主題就是人的身分的問題。在傳統上，話劇和這個主題一直都有關聯。所有戲劇最終都是環繞着一個角色所表現的他／她和真正的他／她的衝突而建構出來的。從古到今，我們都可以在所有戲劇中看到從外表到顯露到認出本身的真面目的過程。面具的運用已隱含了身分的問題，偽裝的情節亦然。在我的話劇中，這個本身就是戲劇或劇場的題材的主題，只不過是以更為特別的形式出現吧了：即以身分危機的問題出現，這並不只是關於躲在面具、虛假或一個社會角色背後的身分問題，而是關於在腐蝕中，崩潰中、消磨中、化滅中的身分問題。

這個危機由於沒有為人反思而變得情況更壞。我第一個話劇《游園會》(*The Garden Party*)，主題是主人翁的故事——主角雨果 (Hugo) 闖進世界找尋生活——有點像民間故事中的杰克 (Jack)，為了追求幸福，而闖蕩 (朝聖者的典型)——並發現到那個世界的中心原則是陳詞濫調。漸漸地，他適應了陳詞濫調 (他「學習」了)；他和陳詞濫調認同起來；認同的程度越深，他在社會的地位就爬得越高。當他爬到頂峰時，他竟然和陳詞濫調溶為一體，因而失去了自己。在話劇的終結，雨果前往採訪自己。他這樣做並非要再次尋回自己，而是要去接近一個他認為是非常重要的。那人原來是他自己這個事實只不過是一場「誤會」，儘管這只是象徵而言：他聽聞自己的重要地位，在不知那個重要人物就是自己的情況下，他開始去找尋自己。他對陳

詞濫調的執迷不誤使他回到自己身邊，他就是陳詞濫調的最高化身。在尋訪自己的行為中，他確確實實地失去了自己。在我其他的話劇中，失去自我的主題均以各種各樣沒有那樣明顯的形式出現。

我還能說些關於它們的甚麼呢？或許可說它們都絕不是前衛話劇。在創作方面，我是忠於荒誕劇的傳統的。開幕，台上有一間有數道門的房間（我喜歡門的神秘感，它們是劃分空間的境界，入口和出口的所在，通往舞台上的存在和非存在），有人進來，打招呼等等；沒有把觀眾拉上台上，或演員跑到觀眾中間，沒有巫術，沒有從角色走出來或諸如此類的事情，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話劇，一場接一場的發展下去。在開始時有明確的法則和規矩，只有在這些東西確立後，漸次對它們進行顛覆及破壞過程才能開始，將之滑稽化並中斷，中斷它們的破壞與濫用的過程才可展開。一直以來我都斷言在甚麼樣的事情也可接受的情況下，沒有東西再可以使人驚奇。戲劇自有其秩序，只有如此它才可以通過破壞這個秩序來令人驚奇。

□：你提到有人反對你的話劇沒有超越的東西，沒有關乎神秘及生命的複雜面貌的地方，你怎樣回應這些批評？

■：先拿和視覺藝術來比較說吧。試想象一幅超現實主義或後超現實主義的畫，類似畫一個地下鐵道車站，有一個神話中的巨人似的女人在月台上來回走動，某處有一個魔鬼出現，地上有打破了的雞蛋，一把傘子靠牆放着。假如畫畫得好，將會散發出魔幻神秘的感覺；我們會發現我們自己的心靈或無意識中的陰暗秘密的活動。望着它，我們會微微感到不寒而慄，因為我們覺察到在我們心中的那些原始的想象的東西。但這樣處理神秘的活動當然是以神秘作為其明顯的主題的做法；神秘就是寓於的主題之中，就好像被直接繪畫出來似的。

但我可以想象另一幅畫，例如一張來自光效應畫派或幾何圖

形抽象畫派的畫。在這張畫上沒有甚麼明顯是神秘的東西；可能只有一系列的同心圓或繪上顏色的正方形；一切都是很有條理的，沒有任何可能使人感到問題的不規則的情況。整幅畫看來似乎沒有任何神秘的地方；一部電腦也可能可以根據程序的指示完成這幅畫；這幅畫沒有甚麼超越自己的地方；這幅畫本身是多餘的，因為它要表達的意念是可以透過其它途徑去思考和表達的。我確信這樣的一幅畫（看不到在溶解中的手錶及破裂的蛋的畫）也有它秘密的地方。但秘密要在潛在文本（subtext）中才能發現，並不能在展示的圖象中看到，而是在同心圓與圓之間的空隙，在組成圖象的元素的組合本身，在它們的意義的莫測之處，在它們是甚麼、有甚麼意義、出自何方的問題上才能找到。畢竟，那些幾何形狀的存在本身不是不可思議嗎？它們不是存在的原始形態嗎？或者是我們的心靈的原始形態吧？它是否創造的顯現？還是死亡的顯現？圓與圓之間，圖之內及背後、周圍是甚麼呢？甚麼也沒有？它們本身究竟是否可以算是甚麼呢？還是只不過是甚麼也沒有的無的另一個形態呢？它們是否人類心靈對宇宙進行抽象思維的結果？還是只是人們腦中的瘋狂幻象呢？畫這幅畫的人究竟是受了甚麼迷住心竅呢？他想對我們說甚麼呢？他是否懂得甚麼特別的東西嗎？這是否關於存在的領域的信息，還是完全絕望的表現？我可以不停的繼續這樣問下去。

我認為每一件真正的藝術品都帶有神秘的地方，儘管這只可以在其結構、鋪排、筆觸、不調和或沒有不調和的個中玄妙看到，在形態與形態之間、在那些有其結構的事件的奧妙中看到。每一件藝術品都指向超越本身的境界，它超越了自己和其創作者；它在自己的周圍生發了一個特別的力場，對人類的心靈及神經系統產生牽引的作用，而這又是創作者鮮能在先前就計劃了的。藝術品放射出的光芒是不可能點算的，也沒有人能看到它們會在那處中斷。當然它們減弱下來，不過它們會不斷伸延至無

限。假如我不是希望我的話劇能有類似的素質，不論它們能影響何人，我也不會把它們寫出來。

□：有些人批評你的話劇，特別是《誘惑》這個劇，指它們是徹底的悲觀，不讓人看到任何出路或一絲希望。你會怎樣回答呢？你會否承認你的話劇的世界和你在生命的路途上採納的公民位置是有點矛盾的？

■：在我的理解和實踐中，劇場的任務不是要向人們呈示正面的英雄人物，好讓他們把他們所有的希望投射到這些人物的身上，然後抱着這些英雄會替他們收拾局面的心情回家，讓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容易。我認為那樣將是把最重要的工作代勞了。我已談過我們每個人該如何在他自己心中找尋真實的、根本的希望。你不能够把這項工作委托他人去做。

我的雄心不是要以仁慈的謊言來安慰觀者，或假裝會為他解決困境來安慰他。如果我這樣做也不會幫了他甚麼。我嘗試做的卻是別的事情：就是透過最激烈的可行途徑，把他推向一個他應該面對且也不能迴避的問題的深處；要他面對自己的苦難，面對我的苦難，面對我們共同的苦難，而我的做法是提醒他該是時候做點事情了。要真的有出路、有解決方法、有可以稱得上有價值的希望的話，我們必須要透過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心中、為自己發掘出來的才可。或許我們需要上帝幫忙。但劇場不是教堂，並不是獲得那種助力的中介地方。劇場該是——在上帝的幫助下——劇場。助人的一個方法是提醒他們時間越來越迫切了，處境嚴峻，不容忽視。目睹可怕的事情的概略圖能引發面對它的意志力。正如希羅斯（Ivan Jirous）撰文談論《誘惑》時說：這個話劇包含的希望就在於你不能够和魔鬼結盟的體驗。但這必須由觀者體察得來才可——我只可以透過展示給他看，和魔鬼結盟會發生甚麼事情，來助他得出這個結論。我再說一遍格拉斯曼（Glucksmann）說過的話：我們的任務是作出警告，預測可怕

的事情，清楚察看甚麼事情是邪惡的。正面看着邪惡的精粹，可能會使人認識到甚麼是好的。在台上向他展示甚麼是好，最終我們會剝奪了由他自己去識辨出來的可能性——即作為他存在的體驗行為的可能性。

在《誘惑》中，菲士圖拉（Fistula）說：「我不會作出實用的建議及為任何人作出安排。最多，我會激勵人行動起來。」這番說話可以是我作為作家的信條。每一個人都要在他的內在為自己作出安排。如果我能够激勵人以更強的迫切感認識到有事情待他們料理的話，我已完成了我的任務了。我的任務就是要提醒人們他們所處的困境，要強調那些被放到一邊，遺忘了的問題的重要性，要說明這裏確有些事情要解決。唯有自己發現的解決方法才是真正的。這才是屬於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創造及自我創造的行為。

你可能提出反說，曾有一段時期戲劇是不能沒有偉大的英雄人物及正面的、即使是悲劇的人物。的確是那樣，不過那個時期已過去了。戲劇常常是以其獨特的形態反映其時代的重要的東西。今天不是英雄的時代了，假如他們出現的話，他們看來會顯得虛假、荒謬及空洞的多情。這並非是劇作家合謀造出來的局面。唯有現代世界才有答案解釋它為甚麼會如此。

最後一點，大多數人不知如何讀話劇。（他們為甚麼應該懂呢？不然劇場便是多餘了。）其中一點就是他們不能放下自己獨自的閱讀經驗，及想象劇場那根本不同的集體經驗。當你在一羣觀眾當中，你的經驗和安坐家中的是不同的。當我在劇場樓座觀看我自己的話劇演出時，我可以仔細地觀察觀眾的反應。每一次的經驗都提醒我在觀眾當中的處境使事物有了另一個面向。如果你讀到一個話劇直接道出了邪惡的東西，其中一切都沒有好結果，一個正面的人物也沒有，你很容易會被弄得沮喪起來，不大會有其他可能。但如果你是在劇場觀看這個劇的話，在那種共通

的了解的活躍氣氛底下你突然會對這個劇有完全不同的感覺。就算是最難接受的真相，在公開地，在其他人的面前表達出來時，也會突然變得有把人解放出來的力量。唯有在劇場的場合才有這種美麗的矛盾狀態，它讓那真相的可怕（為甚麼要隱瞞呢——它在台上較在文字上來得更難看）和一些至少是就我們的閱讀經驗而言是新的和不熟習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使人快樂（這只能是集體經驗），因為終於不再收藏起來，公開地、大聲地把真相說出來了。

一開始時，這種經驗的矛盾狀態就有些地方是劇場的其中一部分：淨化、消解的作用。高斯文（Jan Grossman）曾寫文章謂我的話劇的實在的英雄就是觀眾。這不只是說觀者在受到所觀看的東西感動後可能會開始找尋真正的解決方法（不是像縱橫字謎的答案那樣可以一般地轉換主人翁，而是出於不能轉讓的行為：是他的存在本身的醒覺）。這還意味當他們仍是觀眾的其中一人時，就成了實在的英雄，在整個淨化、消解憂懼的過程中，是參與者也是集體創造整個過程的一分子，和其他人分享從披露邪惡所啟發的解放情懷的喜悅。透過在人們面前明示世界的苦難，一個極有啟發性的經驗（很矛盾地）會在人們的心中油然而生。在這裏某處就是希望——真正的希望而非對快樂結局的希望——的開始。但如果這個話劇真的要能喚起真正的希望，不知道怎樣的它本身就要含有這樣的傾向。可怕本身或只是任何一種可怕不會帶來淨化。編織話劇的纖維必然含有一些不可思議的激素在發生作用。但怎樣才能如此是我自己的問題，就只讓我只根據結果而被評價吧。當然只是根據劇場的效果而言。

至於我的話劇的世界和我的公民活動的世界之間的矛盾，我在獄中寫的信談論過這問題了，在這次談話中也說過這個問題。因此，簡短點說：說甚麼藝術活動的法則和現實生活或評論文章表達的思路的活動法則是不同的這個淺薄的事實不談，我要再次

指出有意義和無意義兩者互為作用的性質。對無意義的經驗越深刻——換句話說，荒謬感越強——追尋意義的勁就越大；沒有和對荒謬的經驗進行重要的鬥爭，就不會有甚麼要竭力想達到的；心底深處沒有對意義的渴望，就不可能會受到無意義的傷害。

□：你對自己作為劇作家已作出了評價；作為一個人，你怎樣評價自己？你目前正接近五十歲，或許這也是反省的時刻——

■：這是一項非常殘酷的工作。第一件事，也是唯一我現在可以說的事，是我的生命，我的工作，我的位置，一切我所做的事情，似乎都和異常大量的矛盾糾纏在一起。就舉以下這個例子說吧：很多事情我也有介入，但沒有一樣成為我的專才。又多年來，人們都以我為一個政治活躍分子，但我從來也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想成為一個政治家，亦不是這樣的材料。我的敵人和我的支持者都視我為政治人物，雖然我做的事情沒有一件可以稱為真正的政治事件。久不久我會作哲理性的思考——然而，無論如何我又算是甚麼樣的哲學家呢？當然，我自年少已喜歡閱讀哲學書籍，但我在哲學的學習基礎是很不濟的，完全是零碎的。偶爾我會談論文學——然而，如果有甚麼我一定不是的話，那就是文學評論家了。有時我甚至會弄起音樂來，然而，我的音樂天分要說得上是甚麼的話，就是惹人發笑的源泉。就算是在我會認為是我自己的本行——戲劇——而言，我也不能真的算是專家。我草草完成了在戲劇學校的教育，並對這個訓練沒有產生多大興趣；我不喜歡閱讀話劇或談論劇場的書；大部分的戲劇我都不喜歡看；對那一類戲劇我會喜歡，我有可算是我個人的看法，而我也以這樣的態度寫我的話劇的，不過，就再沒有別的了。

因此我絕不肯定戲劇是否是看自己獨一無二及不能缺少的使命。我可以輕易想象到，假如讓我碰上不能抗拒的機緣的話，我可以不大費力就能把相同的精力轉而放到另一項學科上去。我絕對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戲劇專才，和戲劇結下不解緣，自己的命運

和戲劇的命運是永不分開的。我寧願返回啤酒廠工作也不願只因為我是這樣訓練出來而在古老的劇場做劇作家。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劇作家，我是有我可疑的地方的：我可以依照自己極獨特的方式，在我自己嚴格界定的詩學的範圍內寫我的劇，但如果要我就算只是稍微偏離這個做法來作劇，可能也會糟得很。

總的來說，雖然多處都有我的存在，但無論是從我的職業、專才、教育及成長過程或我的品質及藝能來說，沒有一處能說得上是我不能動移的、命中注定的位置。我並不是在說像我自己的存在那樣的漂泊、無根、不安的存在是沒有必要的。但這並不改變人家接受我的那種嚴肅態度和我的業餘性質之間的矛盾張力的任何東西。我個人所有的矛盾的清單並不止於此，這只不過是開始吧了。隨便舉一些其他例子：我選擇了風風火火的生活，我自己常常都會在興波作浪，然而還有甚麼能較和平和安寧是更為我渴望呢？我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友善的互相了解，相安無事和意見相合的關係非常嚮往（如果每個人都率真地喜歡別的其他人，我會最快樂不過了）；緊張的關係、衝突、誤解、不明朗和混亂會使我煩亂不安；然而我在這世界所站的位置，一直都是充滿爭議的，並且將來亦會繼續如此。在我的一生，我一直和國家及不同的機關和組織過不去；我的名聲是一個永不改變的反叛者抗議者，在我眼中沒有東西是神聖的；而我的話劇一點也沒有和平與和諧的圖象。我對自己非常沒有把握，近乎是神經質的。我很容易動不動就恐慌起來；我常常害怕這害怕那，甚至害怕電話可能會響起來；自我懷疑在折磨我，而我常常都會因某些事情就自虐地怪責或詛咒自己；然而在很多人看來（某個程度他們是對的！），我是對自己有信心，惹人羨慕的鎮定，沉默，頭腦冷靜，穩定，百折不撓，腳踏實地，常常堅持自己的。我理性，講系統，喜歡秩序及守紀律；我自律而可靠，有時是近乎官僚態度的迂腐；同時我是敏感過度，近乎有點多愁善感的，一切神秘、

不可思議、非理性、不能解釋、怪誕荒謬的事情都吸引我。我為人和氣，喜歡羣體生活，搞社交活動，安排大家共聚同樂：我是一個愉快的傢伙，有時是聚會中健談的主力，又喜歡杯中物及其他不同的娛樂及越軌的歡樂——而同時我最快樂的時候就是獨自一人的時候，因此我的生命就是不斷尋隙獨處，靜靜進行自省。

你不久前也指出了我另外一些矛盾的地方，雖然我能夠說明那並非真正的矛盾，我承認它一定使人有這樣的感覺：我的話劇是無情的懷疑這、懷疑那，甚至是冷酷的——但在其他方面我的表現卻幾乎像唐·吉訶德那樣，永遠抱着夢想，不是為了這個理想就是為了那個理想而愚蠢地奮鬥。在我心深處，我害羞而胆小——然而在一些討論場合我是有名的煽動者，不懼怕衝着別人說最難聽的說話。又舉別一個我在別處已提及過的例子：對很多人來說，我常常是希望的源泉，然而我常常都屈服於消沉，半信半疑和疑懼，而我要不斷努力找尋我自己內在的希望，經過很大困難後才能從自己把它奪回再次振奮起來，好使我不要露出馬脚。因此對擔當給人希望及鼓勵的角色真的感到不自在，因為我自己常常都希望能够獲得鼓勵。人們對我的認識，是我是堅定不移和勇敢的（假如不是精明而頑固），就算有其他更加有吸引力的選擇給我，我也會毫不猶豫選擇坐牢的——有些時候我的名聲會使我自嘲起來。事實上，我常常都在害怕着一些事情，甚至人家在我身上看到的勇氣和毅力也是出於恐懼的：出於對我自己的良知的恐懼。無論我是真的有所缺失，還是在我的想像中有所缺失，我的良知都樂於折磨我一番。而在獄中過的那段英雄日子，實際上是長長一連串的憂慮、害怕和畏懼的日子：我是一個飽受驚嚇的小孩，在混亂中活着，害怕生命，永不完了地懷疑着自己在事物的秩序中的位置是否正確；仰慕我的人如果坐牢，相信不會像我那樣糟糕。每當我聽到走廊傳來叫我的名字的熟識的呼喊時，我會驚慌起來。有一次，在聽到我的名字的大聲呼喊時，我

一點也不思索就從床上跳起來，把頭碰在窗上撞破了。但我知道，不管怎樣，雖然我有着以上種種的情況，如果是有所需要的話，我會再去坐牢，並且我會活下來。

我可以列出類似這樣的矛盾的清單長長的一張，但我不願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這種品性習性，漸漸戰勝了我想真實地回答你的問題的良好意願，因此我以一些有時我都會問自己的問題來結束這段說話：所有這一切是如何合在一起的？為甚這些互相矛盾的品質不會相抵消，卻反而並存及互相配合呢？這又有甚麼意義呢？我為甚麼要想這些問題呢？我是如何——在這些最古怪的相反的品性的古怪的混合中——在生命中走過來的，並且還在各方都得到好評呢？

□：最後一個問題。在你對自己有以上的認知的情況下，你怎樣看自己的將來？你認為有甚麼在前面等候着你呢？你希望得到甚麼？你期望會怎樣呢？

■：矛盾會繼續存在。我會，一如以往，繼續一面感到厭惡，一面仍然坐在一張空白的紙前面；我會盡力逃避寫東西，仍總是為開頭的文句而心中懼怕。我會繼續找一些人為的途徑來鼓勵自己寫作。我會因為苦思不得而失望，但我總將能完成新劇。造成種種自我折磨的內心中的那些無明的憤怒可能不會讓我得到安靜，最終這些心火也會依照自己的去向燃燒的。一如以往，我會因為懷着所有那些期望的擔子（很多期望都是過分、甚至是愚蠢的），及上天指派給我的角色而感到煩亂。我會繼續反抗這些壓力，並恢復我享受平靜的權利——而我將最終會完成所有這些工作並甚至會在進行期間真的得到樂趣。我會繼續受到這個或那個的困擾，害怕某些事情。陷於情緒化、自我責罵、詛咒及感到失望——但，一如以往，我仍會表現得可靠，我該在的位置總會看見我在那裏。我總會結果因為這樣而要承受痛苦，但，够怪的，我將會在那裏挺下來，那裏有需要的話我就會在那裏興波作浪。

我只能為以上的預測，及我們的談話，嘗試透過把我生命的最深刻而明顯的最吊詭的矛盾說出來而作結語：我懷疑在我內心深處某處，我矛盾的一生對我原來是再過癮不過了。

許兆麟 譯 劉健芝 校

本文是《干擾太平》（《興波作浪》）一書的第五章。該書在1986年6月完成，英譯本由美國Knopf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第五章見該書第163—206頁。

說文解字

此文是哈維爾在1989年10月15日接受德國書商協會和平獎頒獎時的致辭，英文譯名Words On Words。

今天頒給我的獎叫「和平獎」。這是書商對我的稱賞。換句話說，是從事文字傳播業務的人對我的嘉許。因此，相應着今天的機會，或許我該在這裏思考言詞及和平之間的神秘的聯繫，及一般地略談言詞在人類歷史中起的那股神秘的力量。

「太初有道」——我們所知道的其中一本最重要的書第一頁就是這樣說的：它的意思是，上帝的說話創造了萬物。但就人的一切行為而言，不是也可以以此話的象徵意義來形容嗎？而實際上，言詞可以說是我們的存在的根源，並事實上，是我們稱為「人」的這種宇宙生命形態的本質。精神，人的心靈，自我意識，概念思維及歸納能力，把世界看成是世界（而非只是我們的

處所)，以至能够知道我們有一天會死亡的能力——並儘管知道會如此，卻仍然活下去：所有這一切不是均以言詞為介質、甚或是言詞所創造出來的嗎？

若上帝創造萬物只憑神諭，在其眾多創造物中，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沒有上帝的另一個神蹟是不成的——這就是人類言詞的神蹟了。假若這一奇蹟是理解人類歷史的關鍵，那末，它亦是了解社會的歷史的關鍵了。而事實上，也許正是因為後者，才會是前者，因為如果人類的兩個或以上的「我」不是藉此溝通，言詞也就可能不存在了。

自遠古以來，人類已對這些事情有認識了，或至少也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在人類的意識之中，未嘗有過不重視言詞的時期出現。

還有：由於言語的奇蹟，我們可能較其他動物更明白我們所知道的東西實在很少；換句話說，我們意識到奧秘的存在。面對着奧秘——並同時意識到言語在實際上對我們有建構能力——我們不斷嘗試面對匿藏在奧秘中的東西，並以言詞影響它。作為信仰者，我們向上帝祈禱，作為魔術師，我們召來或避開幽靈，使用言詞介入自然或人類事件。不論是信徒與否，作為現代文明的主體——我們運用言詞建構科學理論和政治意識形態，並以此攫住，或改變歷史奧秘的歷程——無論成功或失敗。

換言之，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這點，及作出怎樣的解釋，有一件事似乎是明顯的：我們常常相信言詞能改變歷史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這算是對的。

為甚麼「算是對」呢？

人類的言詞是否真的有改變世界、影響歷史的能力呢？就算曾有這樣的年代，言詞顯示了這樣的力量，但現在還可以嗎？

你們住在一個有頗大言論自由的國家，全國的公民均毫無例外，不論因由，享有此一自由；誰也不用因此謹慎，更用不着因

此而憂慮自己的性命。你們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印象：我這樣高估言語的重要性的理由很簡單，只因我生活在一個言詞可使人坐牢的國家，所以我高估了言詞的力量。

不錯，我確是生活在這樣的國家中，在那裏，你可從因自由言論而引來的制裁中，看到言詞在每天發揮着的權威及輻射效應。剛在不久前，全世界慶祝了偉大的法國革命二百週年。我們無可避免地會記起著名的「人權宣言」，它宣明每個公民都有權擁有印刷機。在「人權宣言」出現恰好二百年的時期，我的朋友斯塔雷克（Frantisek Starek）因為出版民辦文化期刊Vokno而被判處徒刑兩年半——他並非使用私人的印刷機出版這份刊物，而是使用一部發出吱吱聲的「史前」複印機。在不久前，我的朋友希羅斯（Ivan Jirous）被判十六個月徒刑，因為他用打字機以嚴苛之詞把大家都熟識的情況打了出來：我們的國家有很多司法殺人，就是現在也會有人因為不公平的判刑而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我的朋友齊布爾卡（Petr Cibulka）因為散發民刊及發行不與官方同流的歌手和樂隊的錄音帶而被抓去坐牢。

對，這一切都是事實。在我生活的國家，一個作家會議或會上某一言論都有動搖整個制度的能力。你可以想像西德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嗎？對，我生活的國家在二十一年前曾被我的朋友瓦丘利克（Ludvik Vaculik）的一篇文章所動搖。他那篇文章的題目是《二千字》，恰恰像是要證實我關於言詞的力量的結論似的。這篇宣言成為了五國軍隊入侵捷克的借口之一。而當我在書寫這一篇講話的時候，我國的政權正被一篇只有一頁的文字所動搖。這篇文字的題目是《幾個字》——彷彿是為了再證明我以上的說話似的。不錯，在我所生活的制度，言詞確實能夠使整個政府架構動搖，言詞發揮的威力可以勝過十個師的軍隊；索爾仁尼琴〔譯按：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因著《古拉格羣島》揭露集中營真相被逐出國及剝奪公民權。他的公民身分已於1990年中恢復〕說的真言

詞，被認為是這麼危險，以至要把他送上飛機攆走。還有，在我生活的世界那一邊，團結工會這個詞已可把整個華沙集團動搖。

這一切都是真的。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已寫了很多，而在我之前接受這個和平獎的傑出的科佩列夫（Lev Kopelev，他是德國書商協會和平獎在1981年的得獎人）也談過這個問題。

不過，我今天要講的課題和上述的情況稍有不同。我並不打算把話題全部集中在不受拘束的言詞對極權統治的環境何其重要。我也無意藉着在某些國家寥寥數語如何抵得上一整列滿載炸藥的火車有餘的情況來說明言語的神秘的力量。

我想從更一般、更廣泛及更富爭議性的方面，去論述、考慮這個課題。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可以發生這種事情：一個英國公民因為寫了某一本書，便被別一個國家的一位有權勢的人公開而恬不知恥地追殺。那個權傾一時的強人顯然是以其千千萬萬的信徒的名義下達此「格殺令」的。更甚的是，在今日的世界中，他那千千萬萬的信徒，其中一部分——我們希望只是一小部份——是有可能認同這項死刑宣判的。

發生了甚麼事？這意味甚麼？僅僅是狂熱者吹起的一股冷風？他們在出現了多個赫爾辛基協議的年代，偶然尋回新生的希望？並剛巧碰上那些最初不欲接受外來文化的國家，在殘缺的歐化世界過程中，產生了殘破的結果、在使他們又愛又恨的商品把他們陷於永遠無法清償的天文數字的債務中，以致助長這一股冷風吹起？

這一切當然都對。

然而還有其他方面。這是一個象徵。

它是言詞奧秘的。不明確的力量的象徵。

說實在的，言詞的力量並不含糊，亦非明確。它不僅有華里沙的言詞那種解放的力量，或沙哈諾夫的儆醒人心，也不只有拉

什特（Rushdie）那本書〔譯按：即《撒旦詩篇》〕所顯示的（顯然是曲解的）力量。

要點是，和拉基特的言詞並行的，還有高美尼的言詞。有些言詞以其自由和率真的精神激勵社會，而與之相對的，有些言詞是要使人着迷、欺騙人、教人瘋狂及誘騙人；這一類言詞是有害——甚至是致命的。這些言詞與利箭無異。

我不認為還需要向你們解釋，某些言詞怎麼有惡魔般的力量：你們在不太久以前，就曾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一個平庸的小資產階級〔譯按：希特勒〕所說的話，雖然是完全瘋狂的，但在某一政治和社會狀況底下，卻產生了催眠般的迷人力量，並為歷史帶來了無以形容的恐怖經歷。無可否認我不能明白是甚麼使你們的父母輩受到蠱惑，但同時我又認識到，為「是」（Sein），「本是」（Da-Sein）及「生存」（Existenz）這些詞語注入如此現代及深刻意義的偉大天才〔譯按：海德格爾〕，甚至他，儘管只是短暫的，也曾受到一時的蒙騙，這顯然是一些極其毒害而又極誘人、使人不得不相信的事情在作祟。

我在嘗試說明白的是，言詞這一現象既神秘，又曖昧，使人亦愛亦恨，並且有覆舟之虞。猶如別林斯基〔譯按：俄國文評家〕形容奧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y）的〔話劇〕《風雨》那樣，言詞能在黑暗的王國中，發揮光芒的力量。同樣地，言詞亦能成為奪命的利箭，更壞的是，它一時這樣，一時那樣，而且甚至兩樣都是！

列寧的言詞——該如何看呢？解脫桎梏？還是正好相反，是騙人、危險、並且最終只會為人類帶來奴役？對那些愛好共產主義歷史的人來說，這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並且很有可能還會持續好一段時間。我的印象是，它們全是激烈的言詞。

馬克思的言詞又如何呢？它是否有助於了解社會機制後面的全面隱秘？還是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早已伏下了駭人聽聞的古拉

格集中營的種子？我不知道：很可能兩者都是。

至於弗洛伊德的言詞又怎樣？它揭示了人類心靈的秘密世界？還是，它只是製造幻想的泉源，令今天有一半的美國人相信，只要花一筆昂貴的費用，請來專家闡釋一番，就能把他們心中的苦惱及內疚感，消弭於無形？

但我還要更進一步，問一個挑戰性的問題：基督的言詞的本質究竟是甚麼呢？是救贖時代的開始，並且是世界歷史中影響力最大的文化衝擊之一？還是十字軍東征、逼害「異端」的宗教法庭、滅絕美洲原住民文化，以至，白人全面擴張所帶來的重重矛盾及重重的悲劇，令全球大部分的人類世界都被劃分為那可悲的所謂「第三世界」的精神根源？我仍然傾向相信祂的言詞屬於前者，但同時我又不能對無數書籍所指證的事情視若無睹——就算是最純淨、最原始的基督精神，也在不知不覺之中隱含了某些東西，一旦跟人性的慣性及許許多多其他情況碰在一起時，是可以在人的心靈中伏下這樣的傾向，甚至是幹出我在上面提過的那些恐怖的事情。

言詞也會有歷史的。

例如，曾經有一段時期，整代遭受蹂躪及壓制的人都迷戀社會主義這個詞，視之為等同於公平世界的意思。那時，人們可以為了這個詞所表達的理想而付出長期的努力，甚至還獻上生命。你們的國家的情況我並不認識，但在我的國家，在很久以前，新攀上台仍未安頓的、專在雞蛋裏找骨頭的官僚已把「社會主義」這個詞變成一杆棍子，從早到晚拿着它棒打他們思想開明的同胞，把他們打為「社會主義的敵人」及「反社會主義勢力」。事實是：在我的國家，很久以來，這一個詞已變成了只是一個要避開的咒語，不然會犯了嫌疑。最近我參加了一個不是由持不同政見者組織的、完全是自發的示威，抗議把布拉格其中一個最美麗的部分出售給一些澳洲富翁。其中一名講者在大聲疾呼譴責這項

計劃時向政府作出呼籲，為了加強呼籲的力量，他宣稱是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捍衛家園的，卻換來了羣衆的嘲笑。這並不表示人們反對一個公平的社會秩序，而是在這許多年來，他們都聽到一個只知操縱人民、羞辱人民的政權在任何場合，不論合適與否，也在反覆唸誦這個詞。

某些言詞遭遇的命運竟是這樣的怪誕！在某個歷史階段，勇敢、開朗的人可以因為某個言詞具有重要意義而被投進牢獄。但在另一個歷史階段，相同品格的人卻因為這個詞對他們再沒有意義而身繫囹圄。因為，這個詞已由一個象徵更美好的世界的符號，變為一個愚笨的獨裁者口中的迷糊之詞。

沒有一個言詞——這次我至少是不包含形而上的意思來談到這個字的——只包含詞源學的字典的解釋。每一個言詞的意義同時亦反映了說這詞的那個人，及這詞在說出時的境況和原因。同一個字，一時可以散發燦爛的希望，但一時卻又能閃耀着奪命的光芒。同一個字，一時可以是真的，一時卻又會成為妄語；一時能啟迪，一時卻又能蒙蔽。在某一時機，它能够如靈光照耀般使人大開眼界，但在另一時空，它卻成了通往建立集中營羣島的軌道。同一個字，在某個時候可以成為和平的奠基石，而在另一時刻，機關槍的聲音在它的每一個音節都得到回響。

戈巴卓夫希望以市場經濟及言論自由拯救社會主義，李鵬為了保衛社會主義而屠殺學生，壽西斯古出動了推土機鎮壓人民。同一個詞在他們三人口邊掛着，彼此的意思是甚麼呢？以這樣不同的方式去挽救的那個神秘的東西究竟又是甚麼？

我提過法國大革命及隨之而來的輝煌的人權宣言。簽署那份宣言的男士在後來是以滿載人道內容的宣言的名義送上斷頭台的首批人之一！繼他之後，還有數以百計，甚或數以千計的人亦被送上斷頭台。自由、平等、博愛——多麼美妙的言詞！而它們的意義卻又可以是這樣嚇人的。自由：行刑前把上衣解開。平等：

不論是誰的頸項，斷頭台的鋸刀下落的速度都不變。博愛：由一個至高無上者統治的可疑的天堂！

今天，全球對使人看到很大希望的那個詞「改革」（perestroika）都作出了反響。我們大家都相信這個詞為歐洲及全世界帶來希望。

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有時當我想到這個詞也可能成為另一個咒語，成為某人用來毆打我們的棍子，我就會不寒而慄。我並不是想起我的國家來：當我們的統治者說及這個詞時，他們所表達的意思和《好兵帥克》說及「我們的君主」時所表達的意義相若。不，我在想的是，目前坐鎮克里姆林宮的那位勇士偶然會因無以為訴而指摘罷工工人、反叛的邦國或少數民族、或一些頗不尋常的少數派或少數民族的支持者、或持頗不尋常的少數派意見的人，指他們危害「改革」，我可以理解他的感受。他所擔負的任務非常艱巨，要成功是非常困難的，偶一不慎，便會前功盡廢，以致我們大家都掉進深淵。但就算是這樣，我還是禁不住想，這一切的「新思維」是否仍保留着舊思想的一些殘餘呢？它不是仍帶着舊秩序的言語儀式及以前的老一套想法的一些回響嗎？「改革」這個詞不是開始和社會主義這個詞有些相像嗎——尤其是，當它被刻意用在譴責那些一向已被社會主義名義不公正地責難的人身上？

你們的國家對現代歐洲歷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是指最早出現「緩和」浪潮的時期，即那著名的「東方政治」（Ostpolitik：西德1969年秋，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領導的社民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上台，實行扭轉以往孤立東德的政策，許其獲得國際認可的地位，展開東西方關係正常化的緩和政策）的開始。

但就算是這個詞有時也會變得很矛盾，當然它意指將出現一個沒有冷戰、沒有鐵幕的歐洲的第一線希望。但不幸地，它有時

亦意指着放棄自由，這一切真實的和平的根本前提。我仍然很清楚地記得，在七十年代初，西德的一些同僚及朋友怎樣避免和我接觸，他們害怕接觸不受政府歡迎的人物，可能會無必要地激怒了政府，從而危害到剛開始發展的「緩和」的脆弱基礎。我自然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提起這些經驗，更不是出於自憐。畢竟，甚至在當時，憐憫他們的是我，因為自願放棄自由的是他們而不是我。我所以提起這件事，不過是要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一個出於好意的理由也可以很容易就轉變成背叛了自己的好意的東西——再一次，只因人們沒有充分看察一個詞的意義。這種事是如此容易發生，幾乎是在不知不覺間出現了，使人防避不了，而在你終於察覺到事情已發生後，你只餘下一個選擇：遲來的驚訝。

不過，這正是言詞可以出賣我們的那種邪魔般的方法——除非我們時常慎用言詞。但遺憾地，就算是稍一鬆懈往往也能換來悲慘的、不可彌補的後果，影響的範圍遠遠超越了言詞的非物質世界，而深深鑽進了這個太過着重物質的世界。

我最後要談「和平」這個美麗的詞了。

四十年來，我在我的國家的每一幢房子的前面，每一個廚窗上均看過這個字。四十年來，這個美妙的字在我及我的每一個同胞的心中造成了反感，因為我知道這個詞在我們的國家代表着甚麼：不斷擴張軍力，美名為「保衛和平」。

儘管「和平」這個詞被長期有系統地摒棄（更甚的是，還賦予相反於字典給這個詞的意義），然而「七七憲章」的一撮唐吉訶德及「獨立和平協會」數名年青同僚，仍致力於把這個詞的原來意義恢復過來。他們的「語義改革」(Semantic Perestroika)（即把「和平」這個詞再次樹立起來）的努力顯然是要付出代價的：幾乎所有站在「獨立和平協會」前綫的年青人都為了他們所付出的努力而坐牢數個月。不過，這是值得的，一個重要的詞從完全受到貶抑的位置被挽救過來了。而正如我在整篇講話中所

試圖說明的，這不僅是拯救一個字，而是遠為重要的事情。

要點是，在現實世界中的所有重要事件，無論是值得敬仰的還是邪惡的，其最尖銳的部分總是在言語的領域中出現。

正如我早已說明，我不打算在此向你們呈現，一個人怎樣因言詞坐牢而懂得言詞的價值這個經驗。我倒想和你們分享，我們在世界這一角落對言詞所汲取到的另一個重要的教訓。我相信這個教訓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對言詞抱着懷疑及警覺的態度，總是值得的，總不會變得是過慮的。

對言詞懷着不信任的心，總較輕信所造成的損害少，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懷疑言詞，把可能是潛伏其中、不受人注意的恐怖成分拿出來鞭撻，不正是知識分子真正的使命嗎？我回憶起上位拿這項獎、我親愛的同僚格盧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他曾在布拉格談過知識分子學習卡桑德拉的需要：對有權勢者的言詞要留心傾聽，心懷戒備，對危險提出警告，宣示其中所穩含的不幸或可能引發的邪惡。

有些事情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我們德國和捷克這兩個中歐國家的人民，在多個世紀以來都有各種相處的問題。我不能夠代表你們說話，但就我們捷克人而言，我相信可以這樣說，在過去多個世紀以來，曾反覆地藉着無數方式挑撥起的古老的仇恨，偏見與激情，在最近的數十年內，已經消散掉了。這個情況正好是在我們受到一個獨裁政權卡壓的時候發生，並不是巧合的。由於這個政權，使我們對一切的概括化、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陳腐的思想、口號、思想框框及陰謀等訴諸我們從高尚到低微的情緒等行為，產生了深刻的不信任。因此我們現在對催眠似的誘惑大致上已產生了免疫能力，連帶對通常都會有說服力的各種各樣的國家或民族課題也失去了魔力了。空洞的言詞長期像不透風的布幕包裹着我們，不讓我們呼吸新鮮空氣，經歷如斯成長

的我們，對虛假言詞的世界已孕育了如此深刻的疑心，以至我們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有能力看清楚人類世界的真正面目：它是由億億萬萬個獨特的個人交匯而成的一個複雜的羣體，他們之中同時存在着說不清的美麗性格、缺點和負面傾向。從來也不該用一堆混雜、陳舊、老套、空洞的言詞來把他們看作一羣互相之間不存在着差別的羣體，然後用「階級」、「民族」或「政治力量」整體來讚揚或譴責、愛或恨、中傷或美化他們。

這只不過是謹慎對待言詞所能得到的好處的其中一個小小的例子。我特別在這個場合——即藉着一名捷克人能這樣榮幸地對着以德國人為絕大多數的聽眾說話的機會——提出這個例子。

言詞是萬物之始。

言詞是一個奇蹟，因為它我們才成為人類。

但言詞同時又是陷阱及考驗，同時又是圈套與測試。

對擁有非常多的言論自由的你們而言，言詞似乎並不顯得那樣舉足輕重，因此你們可能也不認為它們是這樣重要。

它們是重要的。

它們在任何地方也是重要的。

同一個詞在某一刻可以是謙卑，但在另一刻又變得傲慢。一個謙卑的詞可以在不知不覺間輕易地轉變成一個傲慢的詞，而要把一個傲慢的詞轉化為一個謙卑的詞卻是一個很困難及漫長的過程。我已嘗試以「和平」這個詞在我國的命運為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當我們正面臨着2000年將要終結的時候，世界，特別是歐洲，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個特殊的十字路口。很久以來我們也沒有這樣充分的理由希望一切都會邁向成功。但同時，我們從來也沒有像現在有這樣多的理由憂心，如果一切都出錯了，這次將是最後浩劫。

不難指出，從核戰及生態災難到社會與文化災難（我是指個

人及國家之間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利害的情況），今天世界面對着的主要威脅，均根源於一個不易為人察覺的原因：一個原來是謙卑的啟示，在不知不覺間換過了一張傲慢的面孔。這是不難證明的。

人開始傲慢地相信，本身作為創造的頂峰傑作及同時是發揮創造力的最優秀者的他，能夠完全明白大自然，並可以為所欲為。

他開始傲慢地想，掌握理性的他，有能力全面地明白自己的歷史，因此能夠為所有人籌劃快樂的生活。他甚至還相信，他因此而有權利藉着為大家爭取一個不可置疑的更好的未來（他是唯一掌握了通往這一未來的鎖匙的人）的名義，剷除所有不相信他的計劃的人。

傲慢地，他開始相信，既然他已有能力分裂原子，已是如此完美，以至再沒有核武器的對手，更不用說有核戰的危險了。

在所有這些情況中，他均犯了致命的錯誤。這很糟糕。但他已開始在每一種情況中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這卻是好的。

經過所有這些教訓後，我們應該合力對抗傲慢的言詞，對那些似乎是謙卑的言詞保持警惕，以防其中藏有不為覺察的微慢的種子。

顯然這並非只是一項在言詞上的任務。對言詞負責本身就是一項倫理上的任務。

不過，照此，此一任務是超然於肉眼能見的世界的，其所屬的領域存在於太初之始，聖經的家，而非人的言語世界。

我不會解釋何以是如此的。你們那偉大的前人康德已經解釋過了，這是我永遠也無法企及的。

1989年7月25日

克拉德茨克（Hradecek）

許兆麟 譯 李金鳳 校

意見

——在放逐者與政治家之間

「古典的不同政見」（儘管是個醜陋而不精確的標籤，為了辯論上的方便和簡潔起見，還是沿用了這個名詞）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我所謂「不同政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真正代表了自由公民的聲音。發出這種聲音的只有一小撮人。這一小撮人決心不計後果也要大聲把真相說出來，這在其他許多本國公民眼中，毋寧等於自殺。

儘管這一小撮人得到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的同情，這種同情卻給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因為有一部分人已險些兒便得到像「不同政見者」一樣的懲罰。可以想見，這些獨立思考的起步者已達到某些瞬間可見、可證驗的成功；其重要性——至少在我看來——主要是道德上的。他們代表了一種「道德水平」、一種道德尺度，那是人們可以作為參考的標準。這是一根連續不斷的細線，伸展過森林的黑暗，把自主的公民意識，從過去較光亮的沼澤帶到我們所期待的、將來較光亮的樹蔭去。這並不是對任何東

西的保證。只是希望森林有被清理的一天，使那些看到這一天的人覺得我們這種唐·吉訶德式的行動還有一點價值：他們因而能抓住一些東西，有所依靠，以此為起步的基礎，而不致建造空中樓閣。

我並不是說，這清理的一天已經到來，我只是認為我們已開始看到一線曙光，我們已感到這一天已在水平線上了。

感到這一天的臨近和真正的進入這天是兩回事。那是界限頗清的兩個不同時刻，標誌着一個獨特的階段的開始和結束，其間充滿種種變幻無常、權宜湊合、中斷不繼的跡象。獨立的起步者和獨立的文化，自離開了並行的世界開始，就給長久地切離了整體性的社會生活；現在我們卻不再被封隔成一個「少數民族區」了。但同時，我們所屬的情況，跟正常的政治文化仍沒有絲毫相似。這裏沒有自然的及自然地由公眾自己組建的社團，沒有真正的公眾生活，自由公民的經驗從未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從未有所普及。結果是，儘管獨立的起步者最近已比過去有了很大的進步，卻仍未是（也不可能是）很多人希望他們變成的，或是很多人業已把他們當成的那樣——一股自發的反對力量，承傳了超凡的能力；一批可以應付具體現實政治事項的專業領導人。

在這個全面過渡的處境中，我們已不是原來那樣，卻又不能是（我們甚至不想是）人們所假設的那樣。這種處境實在有點令人沮喪，有點混亂又偏偏要求甚多。它為我們安排了各種各樣的事務（其中包括一種新的自我限制），要我們參加各種辯論（一些相當戲劇化的辯論），想好怎樣對付這些辯論。

沒有人有一張簡明的解決單方，我當然也沒有。我只有一些個人的預感和建議，藉以着手我們面臨的工作：

一、獨立的起步者不要因為人民參加了示威，人民不怕參加簽署反對政權的請願，社會上某部分人把他們視為另一個政治方

向，寄望（往往達到一個不健康的程度）他們解決種種問題而衝昏了頭腦。這些問題只能也必須由整個社會來加以解決。起步者會給衝昏了頭腦，原因不難了解：許多年來，經歷了重重苦難之後，他們的重要性突然給顯示出來。新的處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奇妙的滿足，使我們感到一種親切的安慰：覺得畢竟多年來所幹的那些明顯地不切實際的工作並非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儘管從心理上說，這種沉醉是很自然的，卻不能因此而掉進陷阱，以致不能自拔。第一件我要建議的，就是現實主義。

二、獨立的起步者永不應該向自滿的觀念屈服。這種觀念，根本無法加以證實，而且完全缺乏政治視野——例如以為只有他們才是全國人民中頭腦清醒的分子，遠在十五年前已在談論今日大家議論的種種，因而很自然地給推舉出來擔當「領導角色」，而所有他們做的事自動地會比其他人更好；對於那些最後才覺醒的人，根本不必浪費時間，因為起步者們經歷了那許多，一切理應歸功於他們，而不是後來者等等。

簡言之，他們不應忘記他們一向強調的：他們並非為自己而投入行動，而是為了整個社會。我不認為這是起步者們一種普遍的態度。對這件事加以注視並無壞處。不要嫌警告過多，應該是愈多愈好。

三、新的政治處境，可以從對獨立起步者愈來愈有利和他們擁有愈來愈多羣眾看得出來，這可能誘使他們對自己、對政府、對羣眾顯現出自己的重要性。種種不大扼要的宣言造成這個印象。這些宣言往往無可奈何地從強調他們真正在做的事滑到強調從宣傳可能獲得的利益上去（這其實已經常發生了）。在某些奇怪的情況下，甚至使人有這樣的印象：對一些人來說，盡量大聲宣佈一些計劃，比履行這些計劃更為重要。在我看來，還有另一

個極引人的——雖然較為危險——的誘惑。那就是開始（在此刻的狂熱中）捲入某些行動，這些行動（縱然有用）在最後分析中只能用一次，而且要付出工作的代價，在短期內也許見不到效果也較少吸引力，但長期來說卻可能更為重要。我指的是耐心的每日工作計劃、提高覺悟、進行組織以及促進各種水平的討論精神，那是一種任何民主都需要的馬沙里基式（註）基礎，即具有一種開拓公民意識的想法。很明顯，對於那無法預想的較好的將來，我們永遠無法作好百分之一百的準備，臨時湊合的東西是難以避免的。我們要全心全力做準備的不光是一些具體的計劃，並且也是推廣公民意識；如果沒有公民意識，就是最有價值的計劃也無法有成功實現的希望。

四、最後我要強調一個我認為最重要的觀點。現在我們開始以更有形的方式進入一個真正的政治舞台，我們一定要比過去更緊記在行動中那種最原始最基本的道德動機；我們要比過去更留心到我們的責任會不知不覺中分裂為二：一方面是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是政治的責任。我們只有一個責任：無論作為一個最卑微的囚犯或放逐者還是權充民族意志的喉舌，我們都要受同一簡單的良知所約束。背其道而行只會對我們的去過不忠，將來也一定要付出代價。我一直都深信而堅持的是，在所有包圍着我們的危機中，最根源性的一種就是社會的道德危機；如果不首先解決道德危機，便沒有任何危機（從經濟的、政治的到生態的）可以得到解決。換言之，我們一定要打破「我沒有不妥」這種窮兇極惡的意識形態。對人道和公民意識的冷漠已長久而透徹地侵染我們的社會。因此，我會把布拉格居民把馬拉·史達拉納區讓出來給東德的難民居住，自發地為亞美尼亞人籌款，以及在不同的羣眾集會（無論是示威、宗教崇拜音樂會或其他活動）中所表現的那種團結和友愛的新生迹象視為極端重要的事。事實上這些事情

是所有事項中最重要。作為人類良知行為的這類現象是較好政治的最好社會支柱或滋生土壤。尋找自發性公民意識的真正種子本身就是支持未來政治活動的一種事實。做不好這方面的工作，政治行動仍然是虛懸的。

（註）馬沙里基，二十世紀初捷克政治家，原為捷克布拉格大學哲學教授，1917年被選為臨時政府總統。

古蒼梧 譯

本文發表於1989年第二卷第十期的《人民報》（*Lidove*），一個月後捷克人民革命爆發。譯文原刊於《八方》第12輯。

人民，你們的政府 歸還給你們了！

親愛的同胞：四十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聽到坐在這個總統座位的人講着大同小異的話：我們的國家多麼繁榮，我們每年的鋼產量多麼高，我們活得多麼快樂，我們多麼信任自己的政府，我們的前景多麼光明。但我相信，你們現在委任我擔當此職，並不是要我把這樣的謊話向你們再撒一遍。

我們的國家並不繁榮。我們的民族所蘊藏巨大的創造力與精神潛質目前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多個工業部門生產沒有人要的东西，但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卻又非常缺乏。

這個自稱屬於勞動人民的國家，待工人如芻狗，使他們活在屈辱、剝削之中。我們過時的經濟制度浪費供不應求的能源，曾經以其國民的教育水平而自豪的國家，今天的教育經費在世界上排名第七十二。我們把先人交付給我們的土地、河流、森林給糟蹋了，現在我們環境的污染程度乃全歐洲之冠。我們成年人的平均壽命比大部分歐洲國家為低。

容我向大家講一些個人的體驗。最近，我到布拉迪斯拉發開會，在飛機上我花點時間往窗外望，看到斯洛伐那法（Slovnaft）化工廠以及與工廠緊接的柏特索加（Pertrzalka）近郊，這一看足以使我明白，幾十年來我們的政治領導人都沒有——或者說是根本就不想——從飛機的窗口往外望。真的，我現在手頭所有的統計數據，也比不上這麼的一看，使我明白我們已經陷於一個怎樣的境地。

不過，這些都還不是問題癥結所在。當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正生活在道德淪亡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對心在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經學會不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懷別人，只顧自己。愛、友誼、憐惜、謙讓、寬恕等概念，已失去固有的深義。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些概念只不過是某些個人獨特風格，或是零零落落的古舊遺風，總之都是被電腦與太空時代取笑的事情。我們當中沒有幾個人會高喊當權者不應獨攬大權；高喊為當權者生產供應純正優質食品的特殊農場應當將產品運給學校、兒童院、醫院，因為農業到現在還不可以向所有人提供這樣的食品。

上一個政權，挾其專橫跋扈、不容異見的意識形態，將人降格為生產力；把自然淪為生產工具，破壞了人與自然的本質，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政權底下，有資質、能够自行處事、敢於冒險犯難的民族，結果淪落為畸型、破陋、發臭的巨型機器裏面的齒輪，而機器的能動作用卻無人能明白；機器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把自身與其齒輪慢慢地、無情地不斷磨損。

當我講到道德淪亡的環境時，並不單單針對吃優質蔬菜、沒有從機窗外望的人士。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人，因為我們全部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納這個制度為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就了其運行。換言之，我們所有人都得或多或少對這個極權機器之得以運作負上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

個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這機器得以成形，我們每個人都有出一分力。

我幹嗎這麼說呢？要是我們把過去四十年遺下的爛攤子視為與我們了不相干，仿如由某些遠親傳下來的，則是非常不智。相反，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爛攤子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這樣，我們便會明白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為這個殘局做一點事情。我們不可把責任全歸咎於統治者身上，不僅因為這樣做是錯誤的，而且因為這會削減我們各人目前要負的責任——那就是我們要主動地、自由地、明智地、迅速地行動起來。

讓我們不要自欺：那怕是最卓越的政府、國會或是總統，也不可能獨力幹出多少事情來。若指望他們能獨力把所有事情撥亂反正，是非常不公平的。自由與民主的意思畢竟就是人人都有參與和負責的分兒。只要我們明白這點，捷克人民的新民主政府所承繼的種種恐怖事物，便會頓然顯得沒有那麼可怖了；只要我們明白這點，希望便會重投我們心裏。

我們已經奠下健全的基礎，可以重整秩序。最近的事件——特別是過去六周的和平革命——已顯示出，在我們礙於環境底下不得不戴上冷漠面具的背後，仍蘊藏着一股充滿人道及道德的精神潛力，且有高度的公民文化水平。每當有人斷言我們是這樣那樣時，我總會指出，社會是很玄妙的，在某個特定時間呈現出來的表象，永遠也不可以信以為真。我很高興，事實已證明我是對的。

現在，慣於屈從、飽受凌辱、滿腹狐疑、看來甚麼也不肯相信的捷克民族，突然找到如此龐大的力量，在數周內以完全和平莊重的手法掃除極權制度。對此，舉世驚訝不已。其實，我們自己也感到驚訝。我們反問自己，素來對其他制度一無所知的年青人，究竟是在那裏找到對真理的渴求、對自由思想的熱愛，以至政治上的想像力、公民應有的勇氣與眼光呢？他們的父母一

代——被公認為迷失了的一代——怎麼會與其子女走在同一陣綫呢？怎麼會有那麼多人竟不須任何建議或訓示，便能馬上領略到要怎樣行動呢？

我想，導致目前這種充滿希望的情況原因有兩個。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決不僅僅是四周環境的產物，而是會為更高目標而奮鬥，儘管這種能力一步一步的遭受到物質世界的摧殘。其次，我們的人文與民主的傳統（人們常常非常空洞地談論這些傳統）的確仍潛藏在我們（即捷克與斯洛伐克）國民與少數民族的心底裏。這些傳統默默地代代相傳；只要時機一到，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發現它，並將之付諸行動。

當然，我們也得為自由付上代價。許多公民在五〇年代死於獄中，許多遭到處決；數以千計的生命被摧毀，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被迫流亡海外。在二次大戰時捍衛國土之士慘遭迫害，其遭遇就如那些抵抗極權統治，以及那些只不過設法忠於個人原則、竭力行使思想自由的人一樣。所有曾以種種形式為我們今天的自由付出了代價的人，大家都應銘記於心。自主的法庭應當公正不阿地審查這些迫害人民的元兇的罪責，為受害者平反。

我們也不應忘記，其他國家為了他們今天所享有的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其實比我們的更大，也間接成就了我們的自由。前一陣子在匈牙利、波蘭、東德等地血流成河，而這樣可怖的情況最近又在羅馬尼亞發生了；另外，蘇聯境內各民族也有無數人灑下熱血，這些我們都不應忘記，主要原因是所有人類的苦難都與每一個人有關連。更重要的是，因為有這樣偉大犧牲的悲劇背景，今天世界才能享有這樣的自由，蘇聯集團的國家才會逐步獲得解放，我們也因而得以重獲自由。

沒有蘇聯、波蘭、匈牙利、東德的改變，我國便難以出現目前這個情況，或即使發生這樣的改變，局面也肯定不會像現在這般和平。當然，說我們具有有利的國際環境，並不意味着我們在

那幾周的事變中取得別人直接的援手。事實上，幾百年來，捷克和斯洛伐克一直自力更生，沒有依賴甚麼強國或強權的援手。

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當前一大精神財富。故此我們可以期望日後我們毋須像那些總是受人恩惠的人一樣，心裏感到不安。現在，這個期望能否實現，我們的公民、國家、政治的自信能否以嶄新的歷史姿態復甦，便得全靠我們自己了。

自信不是自負。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國家，才能够傾聽別人的聲音，平等對待他人，寬恕敵人，悔咎自己的過錯。作為個人，讓我們嘗試把這種自信引進我們的社區生活中；作為國家，把這種自信引進我們在國際舞台的表現中。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重拾自尊，尊重他人，尊重其他國家。我們決不應成為任何人的負累，不應與任何人交惡。儘管在許多事情上我們必須向人借鏡，但今後我們必須公平待人，回報他人。

我們的第一任總統（於內戰時任總統的馬薩力克Masaryk）曾寫道：「要仁愛的耶穌，不要暴戾的凱撒」，這裏秉承了捷克哲學家兼神學家赫爾斯基Chelcicky（公元1390至1460年）與科明斯基Komensky（公元1592至1670年）的思想。現在這種思想又在我們心裏重燃了。我敢說我們甚至可能有機會將這種思想發揚光大，令歐洲與世界的政治添上新的色彩。我們希望做到仁愛、瞭解、精神與信念的力量，都可以無窮盡的從我國散發出去。這正正是我們對世界政治所能作出的貢獻。

馬薩力克的政治建基於道德之上。且讓我們在嶄新的時代以嶄新的方法，重振這個政治概念。讓我們教導自己與別人，政治應當是使人們表達為貢獻社會福利的抱負，而不是人們對社會的欺騙或掠奪。讓我們教導自己與別人，政治不一定單單是一門妥協的藝術（一門充滿投機、盤算、密謀、秘密協議、權宜之計的藝術），而且也可以是一門不妥協的藝術；也就是改善自己、改善世界的藝術。

我們雖是小國，但也曾經是歐洲的精神重鎮。難道我們不該東山再起嗎？既然今後我們還得需要別人的幫助，那麼我們作出這樣的貢獻，不是很好嗎？

雖然我們國內的黑手黨——也就是那些不會往機窗外望、吃特別飼養的豬隻的人——仍然環伺四周，但他們已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了。國際間的黑手黨對我們來說更加不足為懼。今天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自身的惡習——漠視公德、自負、貪婪、自私、互相傾軋，這才是我們要面對的主要鬥爭。

我們將會舉行種種自由選舉與競選運動。我們不要讓這次競選運動玷污和平革命那仍然非常乾淨的面貌；我們要確保不會因為捲進權力鬥爭中而失去國際社會迅速給予的同情；我們不要再次假借服務大眾的高尚名義去謀取私利。

當前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哪一個黨、哪一個會社、哪一個團體贏得這些選舉，而是當選者（不論其政治背景如何）應當在道德、公民、政治、專業等方面都是我們當中最優秀的人選。我國未來的政策與聲望，將會取決於我們最後選舉了怎樣的人進入各種代議機關中。

親愛的同胞，三天前，在你們的意願下，我從聯邦議會的代表接過權力，成為共和國的總統。你們希望我以總統身分提出我們有待解決的問題，誠屬恰當。

第一，是運用我所有的權力與影響力，確保我們很快可以莊重地參與自由選舉中的投票，確保我們可以莊重而和平地邁向這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的第二個任務是確保我們以兩個完全自主的民族地位處理這些選舉。在利益、民族身分、宗教傳統與象徵等事情上，兩個民族可以互相尊重。我身為捷克人，並由一位與我有深交的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監督宣佈為本國總統，自當感到在斯洛伐克人飽歷過去種種的痛苦遭遇後，有特別的責任確保斯洛伐克民族

的所有利益受到充分尊重，也確保國家的職位，包括最高的職位，永遠再不會成為斯洛伐克人的禁地。

至於我的第三個任務，就是盡一切努力，給婦孺、老弱病患者、辛勞體力勞動者、少數民族以及因無論甚麼原因而處於困境的人改善處境。較好的食物與醫院，一定再不可以是有權者的特權，而是必須給予最需要的人。

身為國防部隊的總指揮，我希望保證我們永遠再也不會以維持國防力量為托辭，也不會阻撓自發的追求和平的英勇行動，例如我會建議縮短兵軍役、設立另類社會服務以供出於良心拒絕服役者選擇、改善軍人生活使之更符合人道等等。

在我國，不少囚犯雖然因種種罪行遭受懲罰，但他們面對的是變了質、侵犯人權的司法制度，儘管某些主審法官，特別是某些律師，仍然心懷好意的。這些囚犯目前所在的監獄，根本不尋求喚醒他們心底裏人皆有之的真善美，只會羞辱與摧殘他們的身心。

有見及此，我決定宣佈規模頗大的特赦。同時，我呼籲囚犯能夠明白，國家四十年來錯誤的調查、審訊、監禁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糾正過來的。我們匆匆籌劃的改革是需要時間落實的。他們在獄裏騷動，對社會對自己都沒有幫助。我也呼籲大眾不要害怕獲釋的囚犯，不要使他們的生活更加難過，而要以基督的精神伸出援手，讓他們在自己身上找到監獄不能給予他們的東西：就是懺悔的能力與尊嚴地生活的欲求。

加強捷克在世界上的威望是本人深感榮耀的大任。我希望別的國家會因我們所表現的體諒，寬容、熱愛和平而尊重我們。我希望，教宗保祿二世與西藏的達賴喇嘛可於選舉之前到訪我國；我希望我們能加強與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希望甚至可在選舉之前便可與梵蒂岡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我也希望，於明天起程往兩個關係緊密的鄰居東德與西德作簡短之行，以促進和平；

當然，我們也不應忘記其他鄰國：情同手足的波蘭、匈牙利、奧地利，我們的關係已愈來愈緊密了。

總結來說，我希望能當一個實幹而非空談的總統，不單會特意往機窗外望，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與同胞站在一起，聆聽衆人意見。

或者你會問我，我所期望的共和國到底是甚麼樣子呢？我會答說：共和國將是獨立、自由民主的，有繁榮的經濟、公義的社會；簡言之，為人民服務並因此有權期望人民服務其共和國。在我所期望的共和國裏，教育是全面的，要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任何問題，不論是人文的、經濟的、環境的、社會的、政治的，都無從得以解決。

我們最出色的總統馬薩力克以科明斯基的話作他第一次演講的引子。這裏容我以不同字眼但同樣的內容結束我這第一次的演講：人民，你們的政府歸還給你們了！

鍾祖康 譯 劉健芝 校

本文是哈維爾1990年總統元旦文告，刊於《民主雜誌》（*Journal of Democracy*）1990年春季號。

中歐的未來

我十分高興，波蘭國會是我第一個有幸發表演說的外國國會。這不純是巧合，這是有其特殊意義的，我相信你們會明白其中的意義。

容許我作一個簡短的個人回憶：這是我第二次踏足波蘭：第一次是在1957年，我隨一個學生訪問團而來。當時正值你們1956年的十月革命之後，你們全國都充滿希望，這種希望後來經常受到重挫。當時我對任何波蘭的東西都極感興趣，我在讀哈里錫（Hlasek）、米路斯（Milosz）、赫爾拔（Herbert）、高拿歌斯基（Kolakowski）、白蘭狄斯（Brandys），和雷力基（Rudnieki）等有關我們這邊的歐洲的大災難、反猶太主義和種種劫難的作品，我並看過華茲達的電影「播種人」。當時我十分崇拜波蘭文化發放出來的自由思考精神和特別的英雄主義，這比捷克文化中的終極懷疑主義，以及對平凡和潦倒的崇拜，似乎更深得我心。我從那時開始寫作所謂荒謬劇，劇中往往充滿懷疑主

義、嘲弄和恐怖，並且有着千篇一律的悲哀結局，但出奇地，我對波蘭文化的崇拜，卻沒有被我的文學世界觀所掩蓋。

三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再來到這裏，並且以捷克總統的身分出現。我難免問自己：你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以及我們這邊的歐洲到底有甚麼改變？

很多東西改變了。最重要的改變，是希望乍沉乍現，幻覺和幻滅無盡循環，以及自由與死亡醜惡地共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首次可以肯定，民主自由、公義和民族自治已經在勝利中，不會再走回頭路了。這種肯定，是因為我們爭取自我解放的努力，不再是在重重誤解中孤軍作戰，而卻已是匯集成流。波蘭民族致力於轉變的鬥爭，在短暫挫敗之後勝利了；匈牙利和東德重要的和平演變；接着是我們捷克的和平革命；羅馬尼亞人犧牲慘重凜烈地戰勝了吸血鬼的獨裁政權；以及我們正目睹的保加利亞的運動——全都已匯流到同一條河流。

但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它將來也不能得勝。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他們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歷史的人才會安於得勝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還有許多困難的時刻等着我們。得勝的只是一個真正的希望。我們將以自由、獨立和民主的國家和民族重返歐洲。

但這也是好的。我們之中誰可在十二年前想像這種事？米哲歷（A. Michnik）、庫倫（J. Kuron）、列定斯基（J. Litynski），你們還記不記得我們在捷克和波蘭邊界的首次秘密會議？那時我們全是所謂離心分子，即一些被警察控訴、禁錮和嘲笑的人。我們也許曾嘲笑我們的守衛，並因逃脫他們的看守而興奮；但如果當時有人對我們說我們會在二十年內成為國會議員、部長、總統，我們可能笑得更厲害。

無論如何，這畢竟發生了。蘇聯集團的極權政府在崩潰，我們這些過去不過把想法大聲說出來並因此而被囚禁的人，卻突然

發現自己身居政府要職；現在我們只能在電視攝影機並非對準我們時才能大笑了。

我們的主要任務——我不再只是指我的波蘭和捷克朋友，而是指我們兩個民族而言——是一同構思如何利用這新得來的自由。在進入正題之前我想打個小岔子。

我們捷克的革命由11月的屠殺學生開始，但其後的發展卻是出奇地和平及迅速；這革命現在被認為是溫和、善良、和平及充滿着愛的。我們固然為我們國家只有少數人罹難而感到高興，但我們不會忘記那些以鮮血換取自由的民族；沒有這些民族的罹難者，我們很難會如此迅速地醒覺及差不多毫無苦痛地爭取到自由。我在新年演辭中已經強調，但我仍希望在此重提：我們清楚知道，匈牙利人和波蘭人也曾為我們流血，我們絕不會忘記。雖然羅馬尼亞的革命發生在我們之後，但羅馬尼亞人在某種意義上也為我們付出了代價。要不是有羅馬尼亞人民英勇自衛的榜樣，誰敢說我們國家中的黑暗勢力不會捲土重來？

簡單點說：雖然沒有人直接協助我們的歷史性的革命，我們仍自覺到，如果沒有波蘭多年的鬥爭，沒有蘇聯爭取自我解放的民族，沒有德國人1953年起義和匈牙利1956年起義的回憶，我們很難享受這新近的自由，也很難為事情進行得如此順利而雀躍。

我們當然也知道，是華里沙領導的團結工會首先找到持久對抗極權政府的和平而有效的途徑；我們不會忘記是波蘭的參議院和國會最先譴責（那已是去年夏季的事了）68年可恥入侵捷克的。讓我在這裏感謝你們和整個波蘭民族。

我說過會分析新形勢給予我們的任務。任務實在是很多的。首先我們必須善用這個事實，就是經過這許多年以後，我們的民族之間產生了一種真正的友誼。在我們共同面對極權主義的現實下，長久以來的爭執、仇恨和敵意都被隱藏了。極權主義通過華沙公約和經濟互助委員會由上而下地推動了一種只求形式的所謂

友誼，並且暗地裏、靜靜地、惡意地煽動一種民族主義的自私情懷，以配合他們「分化以臣服」的口號。

這許多年來我們有着相同的命運，並為相近的理想作出同樣的鬥爭，這種生活現在應該為一種真正的友誼和尊重所取代了。這些年來，我們懷着這種精神，揹着滿袋獨立創作的文學，秘密地越過我們共同的山嶺，終於能成功地在〔波蘭〕華羅高（Wroclaw）舉辦了捷克的秋季獨立文化節。有賴於波—捷團結支援那些永不氣餒的成員、以及雅拿斯、雅先斯基等的協助，這個節日非常成功，並在無意間成為捷克革命的前奏之一。

在我們不約而同地稱作回歸歐洲的這個過程中，政策的協調最終應該帶來真正的友誼；這種友誼建基於我們曾被迫接受的共同命運，友誼給予過我們的共同指引，以及，最主要的，是建基於團結我們的共同理想。我們同時也應該與匈牙利及我們這邊的歐洲的其他民族通力合作。我明天將和我的同僚到匈牙利——這也一樣不是巧合。

我們不應該互相競爭以求超越對方，或是追求首先進入某個歐洲組織之類；反之，我們應該有團結精神，互相幫助，就像我們過去在最惡劣的時刻遙相抗議對方所受的壓迫那樣。

此刻我們很難預計未來的合作會帶來甚麼樣的組織。西歐在整合的道路上比我們走快了很多，如果我們個別地回歸歐洲，那將比我們先有一個共同協定然後才加入更複雜得多。這不單純是經濟範疇的事情，而是所有範疇的事情，包括裁軍的談判。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邀請你們政府和匈牙利政府的不同代表、公衆代表、甚至是其他中歐國家的觀察員，到比達斯拉華堡安靜地討論這些事情。我們到時可能會有更多智慧。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肯定一點：我們面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時機，讓中歐在繼斯堡帝國瓦解後遺留的政治真空得以填上有價值的東西。我們有機會把「中歐」從一個悠來只具有歷史和精神意

義的現象，變成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現象。我們有機會將一些曾淪為蘇聯殖民地，但現在正嘗試與蘇聯各個民族在平等權益的基礎上建立友誼的歐洲國家，組成一個特定組織以和富裕的西歐接觸；我們不是以一個可憐的離心分子或是無助的特赦犯般和他們接觸，反之，我們是帶着精神和道德的動力、大膽的和平建議、豐富的創造潛能、新獲得自由的精神面貌，以及勇敢和敏捷地解決問題的靈感而來。

我們甦醒了，我們也應喚醒那些在我們甦醒期間沉睡的西方人士。我們愈是團結，愈能完成這任務。

如果我們希望在走向歐洲的步伐上協調並且同步前進，我們顯然要先搞清楚我們的目的地，即是說，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歐洲。

我們對一般的理想也許十分清楚。我們希望廁身於一個由獨立民族和民主國家組成的歐洲，一個穩定而不被任何集團和協約分割的歐洲、一個能够建立自己的防衛系統以自衛，而不需超級大國保護的歐洲。

蘇聯為了與她過去的衛星國保持良好關係而將會逐漸從這些國家撤軍，這個希望是存在的。有關談判已在進行，不久將獲得成果；赫爾辛基的會議在我看來是一個不錯的起步點。如果談判加速和深化發展，聯同其他裁軍談判和單方面的裁軍建議，那麼，隨着時間進展，撤軍談判將可達成某種和平會議或和平協議，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帶來的冷戰和歐洲的人為分裂。到時兩個軍事協約都可解散，而一個全歐整合的步驟便可以開始了。

歐洲在目前是分裂的。

德國也是分裂的。

難題的兩面：一個分裂的德國和一個不分裂的歐洲令人難以想像；在一個分裂的歐洲中有一個統一的德國也是同樣難以想

像。兩個統一的过程明顯地應該同時並盡速地進行。

故此，締造一個和平的歐洲，關鍵之一就在她的中心地帶——德國。德國人對我們有很大的貢獻：他們首先推倒了長久以來把我們和理想分隔的牆；我們的理想是一個沒有任何牆、鐵幕、或鐵網障的歐洲。

我在當選總統後不久，便到兩個德國探訪了幾個小時，希望知道德國人如何看歐洲的現況，因為我十分明白德國問題對我們全都十分重要；而且如果德國沒有和平，我們全都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我同時希望透過這次探訪，強調我們未來的命運和德國未來的命運關係是多麼密切。

我帶着一個良好的印象回國：兩個德國中通情達理的人的想法和我們一樣——和平地走向一個和平而民主的歐洲。

我相信這個印象對你們來說也是個好消息，因為你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人數遠超我們，故此當你們想及德國人時，無論是對於屠殺你們的多數人或只是他們的後代，你們都有權比我更不信任他們。

我無意掩飾這個事實：我們捷克有許多人比我更不信任德國人。我首先探訪德國也是因為他們，我決定盡一己棉力，在今天這缺乏信任的世界，嘗試作為信任的提倡者。而當我在這裏談及德國時，我很高興履行這職責，向你們保證，捷克亦認為奧特—納斯河的疆界是最終及不容違議的疆界。

我相信，在未來歐洲疆界不會像現在那麼重要，人民將可以自由往返每個國家，而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的共同疆界將來會是這樣自由的。

反之，不應在我們的疆界間往返的是毒氣、硫磺、酸雨雲等，不管它們是來自史東拿羅或哪裏……

當然，在我們的面前還有很多比分隔歐洲的牆更危險的牆：這些牆分隔着個別的人以至我們自己的心靈。我希望直言攻擊這

些牆。這主要和我的出生地有關。

我們目前最危險的敵人，不再是極權主義的黑暗勢力，或各種敵對而懷着陰謀的黑社會，而是我們自己的壞品質。我的總統政綱故此提出把精神文明、道德責任、人道和謙遜帶進政治；並表明，在我們之上有更高的主宰，我們所作的不會被時間的黑洞吞噬，而是，會被記取並被審判；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利或理由認為我們明白一切、可以做任何事情。

波蘭人堅強的宗教意識由他們給予世人可敬的教宗表露無遺，我相信你們能明白我這恭謹的總統願望。

三十三年前我在波羅的海海邊逗留了兩星期。而今天我在波蘭勇敢的心臟華沙；假如這意味着除了我個人以外，我所代表的行動和思想也是逐漸接近波蘭的心，我當感到欣慰。

多謝你們的聆聽，末了，我向你們大聲疾呼這個名句：

波蘭仍未滅亡！

1990年1月21日

馬嶽 譯 李金鳳 校

在波蘭參議院和國會上的演說，英譯文載於《紐約書評》1990年3月29日。

對德國統一的看法

我們的客人，代表他的國家，就有關許多德國人——或更確切地說，是許多今日德國人的父輩——帶給世界及尤其是我們的痛苦的不安真相，已經說得够多了。

而在我們方面，是否有勇氣說出所有必須說的話？我不肯定我們有這勇氣。舉例來說，六年的納粹統治足以令我們感染了邪惡的病菌；在戰爭期間及其後，我們互相告發，且不只一次地懷着兼備正當和誇大的憤懣接受了集體有罪的不道德原則。我們沒有把所有犯叛國罪的人給予應有的聆訊，而是把他們驅逐出國外，對他們施加我們的司法制度所無的懲罰。這不是懲罰，而是報復。而且，我們不是根據他們個別被證實的罪行，而是簡單地只因他們是某國的國民而將之驅逐。

因此當我們自以為是在執行着歷史的公義時，我們其實是傷害了很多無辜的人，特別是婦女和小孩。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我們這樣做不只傷害了他們，也傷害了自己：我們以如此的方式

去和極權主義算賬，是讓極權專制的傳染病去污染我們的行動以至我們的靈魂；而不消多久，這事實殘忍地以另一種形式再現——我們無力對抗一種外來的新極權主義。我們之中很多人甚至更積極地幫助把這新極權主義帶到這世界上來。

但那決定還要在其他方面給我們帶來不幸：我們遽然破壞國家的一大部分，致使疏忽地容讓了這破壞的勢力蔓延到整個土地上去。

我們為糾過而作出的必須犧牲，也因此成為償付我們父輩的錯誤和罪惡的各種罰款之一。

歷史的時鐘不能重撥，因此，除卻真相的自由考核，留給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去熱情地接待那些來訪者，他們的心中帶着祥和，去到祖先的墳前逗留，或是到他們出生的鄉村去，看看還剩下些甚麼。

鑒於德國的面積、力量及中心位置，它與歐洲各國大家庭的關係，以及這個家庭與它的關係，德國向來是歐洲穩定的重要因素：在今天這仍然是真實的。全歐洲應感激德國人首先把分開他們自己的圍牆拆除，因為這樣一來他們也拆毀了那把歐洲分開的圍牆。儘管如此，很多歐洲人仍懼怕一個統一的德國。

我認為這給德國人提供了一個歷史良機：消除歐洲人的恐懼端賴於他們。譬如他們如果能明確地承認所有現存的國界（包括波蘭）的最終有效，又或是決意去處理那到如今仍敢於和納粹意識形態擠眉弄眼的人，那麼，他們將對不再恐懼他們或阻止他們迅速統一的歐洲作出了至大的貢獻。

德國統一到底會是全歐洲統一的可喜動力，或是減慢此統一的力量，這也全視乎德國人怎樣做。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着想，他們出名的有規律和愛秩序的個性應帶動此統一過程；任何倉促行動或混亂——尤其當它們只不過是選舉猜測而產生的結果——

將無助於德國人的信用。

另一方面，如果所有都合理地進行，那全歐洲所長久等待的一天將指日可待，就是：給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它災難性的結果劃上最後一條底線，終結把歐洲分割成東西兩邊及演變成兩大武器陣營的局面。若所有都在合理的情況及互相了解的氣氛中進行，這最後一條線可以劃上——或許可以早在明年，而這肯定要比很久以前在法國凡爾賽所劃下的線更好。

從此歐洲終於可向它舊有的夢想邁進，那夢想是各友愛及民主的國家共同組成一個友好的聯盟，並以對人權的普遍尊重為基礎。二次大戰結束至今已有四十五年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應足夠去締結一條真正明智的條約；那條約不會再受憤怒所影響，不論這憤怒是如何的可以理解。我們的將來明顯地十分依賴着德國的發展。

我們已談過關於德國現時面對的歷史性任務，這已該是適當時候讓我去提出我們自己應該做的事。

在經過所有發生的事以後，我們對德國人以及一個大德國仍有某些恐懼。那些曾經歷過戰爭而仍然活下來的人，失去了親人，在集中營內受過苦，或是受過秘密警察追捕而要被迫躲藏起來。他們對德國人缺乏信任是可以理解的，而這恐懼感染了其他人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我們有自己的任務：克服這種恐懼。我們應明白到，我們的受苦不是由德國國家所造成，而是被某些人，因着惡意、盲目服從，以及對同類無動於衷而造成的——所有這些都是人的素質，而不是民族的。我們大家不是知道很有一些壞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嗎？在我們之中不是有過不少人曾是德國秘密警察的線人，之後又為國家安全局服務嗎？我們之中不也是有着同樣的冷漠和自私自利？在好幾年、好幾十年，容許我們的國家被破壞，

只因不想危及將會得到的獎金，及在電視螢光幕前度過悠然自在的黃昏而沉默嗎？而我們的人民至少在近幾年已不那麼被死刑、入獄所威脅了。經過所有這些已說過和做過的事，我們不也是——說到底，執行了這種惡毒活動的人嗎？

無論如何，將他們自己的目標狡詐地印證在德意志民族的是納粹黨人。我們永不要追隨他們的步伐。如果我們接受他們的謊言，我們就只會將他們破壞性的欺騙繼續留傳下去。

人們有時會攻擊那些不說他們那種語言的人，特別當那種語言是由一個暴君說的。但語言本身不因出自暴君之口而負上責任。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若是以人們的語言、膚色、出身，或鼻子的形狀去判斷人的話，我們就是種族主義者了。用輕蔑的方法去談及德國人、或是越南人、又或是其他民族的人民，只因他們是德國人而譴責他們，或是只因這樣的理由而懼怕他們，那麼我們同樣都是反猶太主義者。

換句話說，同意集體有罪和集體負責的想法，就等於有意或無意地減輕個人的罪責。這是很危險的。只須回想一下，直到最近，我們中有多少人，藉詞我們捷克人從來就是如此，而且永遠不會改變的云云，藉此來擺脫個人責任。這種想法是道德虛無主義的不顯眼的病菌。

當然我們作為捷克人或斯洛伐克人，總有些素質是與其他人不同，及在我們彼此之間也有所不同。我們有不同的品味、不同的夢想、不同的回憶、不同的經驗，但我們不因我們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德國人、越南人，又或是猶太人而成了好人或壞人。

若是因某些德國人所犯的罪行而說德意志民族有罪，那就等如釋放了那些犯罪的德國人的罪行，因而讓他們淹沒在人海中，因之就沒有人須負上責任了。而這樣的想法會剝奪我們自己的希

望——因為若有人宣稱我們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的國家，情況也會是一樣。痛苦迫使我們有責任去公義地處事，而不是去做不義的行為。那些受過苦的人知道這點。

分析到底，只有在公義的王國裏，寬恕才會慷慨大度，因而亦可脫離憤怒的束縛。

我不知道在將來多極的世界中，究竟一個統一的德國會否被稱為超級強國。就算情形如此，其實，在字義的某方面來說，德國已是有潛力的超級強國，即它能够成為歐洲的精神支柱：假如它願意，它能够幫助我們去抵抗科技文明、消費主義及普遍深入各處的商業化主義那令人麻木的專制統治的惡性壓力，這些壓力足以導致德國哲學家所常分析的異化現象出現。

一旦德國發展並肯定了它的國家地位——它在傳統上已嚮往着有系統、有等級制度的精神，並且熱切應用——它便可以把它創造性潛能毫無保留地投向為了全球人類的更新服務。這是對當代世界唯一可能的拯救，這項任務對德國知識界的傳統最為適合。

若今天代表了歐洲中間部分邁向了解所踏出的一小步，那麼它同時亦能令我們整體從麻醉狀態中踏出醒覺的一小步。這種麻醉狀態由道德物質主義每天不擇手段地引誘我們而引起——長此下去的結果，是我們經常感到，繼我們之後，災難也要來臨。

岑淑群 譯 劉健芝 校

1990年3月15日，是德國1939年侵佔捷克的五十一週年紀念日。當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統魏茲薩克訪問捷克布拉格，發表了演說。哈維爾以總統身分也發表了以上演辭，刊於《紐約書評》1990年4月26日。

附 錄

抗議

角色：范力克

斯坦力克

地點：布拉格，斯坦力克的書房。

斯坦力克的書房。左邊，有一張大寫字桌，桌上有一具打字機、一具電話、一副眼鏡，許多書和紙；書桌後有一扇看到花園的大窗。右邊，有兩張舒適的扶椅，其間倚了一隻小茶几。整幅後牆放了書架，裝滿了書籍，其間有一個入牆酒櫃。書架上一格中有一具錄音機。在右後角有一道門；右牆上，有一張大幅的超現實主義油畫。幕啟時，斯坦力克和范力克已經在台上：斯坦力克站在書桌後，感情充沛地看着范力克，後者提着公事包站在門前看着斯坦力克，露出尷尬的神情。短暫、緊張的停頓。然後斯坦力克突然興奮地走向范力克，雙手捉着他的肩膊，友善地搖幌他，喊出來。

斯坦力克：范力克！——好嗎！

（范力克羞怯地微笑。斯坦力克不理會他，嘗試掩飾他的激動）

這個地方難找嗎？

范力克：還好——

斯坦力克：我忘記告訴你那些開得很燦爛的木蓮。這樣你就找到我的家了。它們很漂亮，對吧？

范力克：是的——

斯坦力克：我花了很多心思令它不用三年開花兩次。上一手就做不到。你的村屋有種植木蓮嗎？

范力克：沒有——

斯坦力克：你一定要種！我替你找兩株優質木蓮，親手給你栽培。（走向酒櫃，打開櫃門）來一杯拔蘭地吧？

范力克：不用了——

斯坦力克：就要一杯吧，嗯？

（盛了兩杯拔蘭地；一杯遞給范力克，另一杯高高舉起祝酒）

來——慶祝我們重聚！

范力克：乾杯！（各自喝酒；范力克的身體輕微抖動）

斯坦力克：我剛才恐怕你不會來了。

范力克：為甚麼？

斯坦力克：呃，我的意思是，事情都變得顛三倒四——怎麼？你不坐下來嗎？

范力克：（在一張扶手椅上坐下，把公事包放在地板，靠着他）謝謝——

斯坦力克：（在范力克對面一張扶手椅上深深坐下，吁了一口氣）

這樣子好多了！要點花生嗎？

范力克：不用了，謝謝——

斯坦力克：（自己吃了一把，咀嚼。）你知道，你這些年來沒有怎麼改變？

范力克：你也沒有——

斯坦力克：我？得啦！快五十歲，頭髮快要白了，坐下來身子都疼痛——跟往日全不一樣，嗯？現在的時世也不教人好過些，是吧？說起來，我們上一次見面是哪時？

范力克：我不知道——

斯坦力克：是不是你上一次首演的時候？

范力克：有可能——

斯坦力克：說起來仿如隔世！那次我們有點爭論——

范力克：是嗎？

斯坦力克：你責備我有幻想和過分樂觀。天呀！自此以後，我不止一次對自己承認，你是對的！當然，在那些時候我仍然相信，不管怎樣，我可以拯救我年青時候的一些理念，而我看你是一個無可藥救的悲觀主義者——

范力克：但我不是悲觀主義者——

斯坦力克：你看，所有事情都倒轉過來了！（稍停）你——一個人嗎？

范力克：你指的是甚麼，一個人？

斯坦力克：嘿，是不是有人——你知道的——

范力克：跟踪我？

斯坦力克：我才不管這個！說到底，是我給你打電話的，對吧？

范力克：我沒有注意到甚麼人——

斯坦力克：說起來，如果有一天你要擺脫這些人，你知道在哪裏做最好？

范力克：不知道。

斯坦力克：在百貨公司。你混在人羣裏，然後趁他們沒有看着你

的時候溜進洗手間去等大概兩個小時。他們最後會相信你一定是從側門跑掉，這樣他們就會放棄。有機會你一定要試試看！（停頓）

范力克：這裏看來很安靜——

斯坦力克：所以我們搬到這裏來。根本就不能够在那個在火車站附近繼續寫作！你知道，我們搬到這裏來已經有三年。當然，我最大的樂趣是這個花園。待會我帶你四處看看——恐怕我到時要誇口了——

范力克：你自己親手種植嗎？

斯坦力克：這已經成為我近來最大的喜好了。我差不多每天都到那裏磨蹭一番。最近我正在整修杏樹。你看，我自己摸索出來的方法，就是，利用天然及人工的肥料，加上無臘接枝的特殊辦法。你簡直不能相信得出來的效果！我遲些給你一些剪枝——

（斯坦力克走到書桌，從抽屜裏拿出一盒外國香煙，取了火柴和一只煙碟，放到范力克前面的桌子上）
費汀南，來抽根煙吧。

范力克：謝謝——

（范力克拿了一根煙點上；斯坦力克重新坐下；各自喝酒）

斯坦力克：現在，來，費汀南，告訴我——你好嗎？

范力克：很好，謝謝——

斯坦力克：他們不再麻煩你吧——至少在這陣子？

范力克：得看情形——

（稍停）

斯坦力克：那邊怎樣？

范力克：哪裏？

斯坦力克：你多少受得來嗎？

范力克：你指在監獄？還可以怎樣？

斯坦力克：據我記得，你時常被痔瘡搞得很苦惱。想到那裏的衛生條件，一定是很可怕。

范力克：他們給我塞藥——

斯坦力克：你一定要認真治療一下，你知道。我湊巧有一個醫生朋友是最好的痔瘡專家。真是個神醫。我替你安排一下。

范力克：謝謝——

斯坦力克：你知道，有時候想來一切真如一場美麗的夢——所有那些震人心弦的首演、試演、講座、集會——那些無休止的文學和藝術討論！所有的活力、希望、計劃、活動、理想——酒吧裏擠滿了朋友，大伙兒酗酒狂歡，在夜闌人靜中唇槍舌劍，瘋瘋癲癲的女孩子隨時恭候我們跳舞！還有我們要做的堆積如山的工作，這一切！——現在一切都完了。永遠不再來！

范力克：嗯——

（停頓。各自喝酒）

斯坦力克：他們有打你嗎？

范力克：沒有。

斯坦力克：他們在那裏有打人嗎？

范力克：有時候。但不是政治犯——

斯坦力克：我常常想起你！

范力克：謝謝你。

（短暫停頓）

斯坦力克：我敢打賭你那時甚至不會想到——

范力克：甚麼？

斯坦力克：一切會如此收場！我敢打賭你甚至做夢也不曾想到會這樣！

范力克：嗯——

斯坦力克：真令人嘔心，費汀南，真嘔心啊！國家由渣滓來統治！而人民？這真是同一個民族嗎，不久以前她看來還是那麼無與倫比？所有這些阿諛、卑躬和吹捧！到處你碰到的是自私、腐敗和恐懼！他們把我們搞成甚麼，老朋友？這真是我們嗎？

范力克：我不相信事情都變得這麼灰暗——

斯坦力克：原諒我，費汀南，可是你湊巧不是生活在常態裏。所有你認識的人都抵抗這種糜爛。你們繼續互相扶持互相激勵。我要忍受的是甚麼一種環境你不會知道！你和這個環境已經各不相干是你的幸運。真令你倒胃！
（停頓。各自飲酒）

范力克：你是說電視台？

斯坦力克：電視台、製片廠——任何你說得出的地方。

范力克：那天電視上有你的作品。

斯坦力克：你不能想像那些嚴格審閱！他們首先把它擱置一年，然後他們這裏改一點、那裏改一些——把我的開場和結局的場面完全改掉！你簡直不會相信這些日子他們那些無聊的對對錯錯！我一次又一次地對自己說——捲起包袱吧，老兄，忘掉它，躲到某處——種杏樹吧——

范力克：我明白你的意思——

斯坦力克：問題是艱辛的；人有時不能不去想，人是否有權利這樣逃避。就是小人物吧，在今天，不管怎樣，也能够用某種方式幫助某個人，至少是給他一點鼓勵，拉他一把。——我給你拿雙拖鞋。

范力克：拖鞋？做甚麼？

斯坦力克：你穿着這雙靴子不會舒適。

范力克：我這樣很好——

斯坦力克：真的嗎？

范力克：是的，真的。

（各自喝酒）

斯坦力克：（停頓）藥，他們要你吃藥嗎？

范力克：沒有。

斯坦力克：沒有一些古怪的注射？

范力克：只有維他命劑——

斯坦力克：我敢打賭食物裏放了畸怪的東西！

范力克：只有對付性慾的溴片——

斯坦力克：他們必定想方設法要你屈服！

范力克：這個——

斯坦力克：如果你不想談，我不會介意。

范力克：是這樣，在某方面來說，這正是開庭前的審問的用意所在，不是嗎？挫挫你的銳氣——

斯坦力克：使人開口！

范力克：嗯——

斯坦力克：如果他們把我抓去問話——這早晚會發生的——你知道我會怎樣做？

范力克：怎樣？

斯坦力克：乾脆不回答他們任何問題！拒絕和他們說話！這是最好的辦法。至少肯定知道沒有說過甚麼不應該說的。

范力克：嗯——

斯坦力克：無論如何，你一定是有鋼鐵的意志才可以忍受這一切，而且還堅持做你要做的。

范力克：譬如說？

斯坦力克：你看，我是指那些抗議、請願、函件——所有爭取人權的鬥爭！我的意思是你和你的朋友們堅持做的——

范力克：我做得不多——

斯坦力克：你不用太謙遜，費汀南！我注視着所有發生的事情！我知道！如果每個人都做你所做的，情況會很不一樣！這是事實。這裏應該至少有些人不怕大聲講出真理，保衛別人，實話實說，這非常重要！我要說的聽來或許有點煞有介事，不過，坦白說，在我看來，你和你的朋友擔起的是一個差不多超人的任務：在這種艱難時勢，心存節義，傳播遺風！這一線牽繫或者是脆弱的，可是——誰知道呢——這個民族的道德重生或者就繫於它了。

范力克：你太誇大——

斯坦力克：可我是這樣看的，不管怎樣。

范力克：我們的希望無疑是在所有正派的人身上——

斯坦力克：但這種人還有多少？多少呢？

范力克：也够多的——

斯坦力克：有嗎？就是有，最曝光的是你和你的朋友了。

范力克：而這不正是令我們做起事情來比較容易點的原因嗎？

斯坦力克：我不會這樣說。你們曝光愈多，你們對那些知道你們、相信你們、指望你們和尊崇你們的人的責任就愈大，因為你們也多少伸張了他們的榮譽！（起立）我去拿雙拖鞋給你！

范力克：不必勞煩——

斯坦力克：我一定要。光看着你的靴子就使我難受。

（停頓。斯坦力克拿了拖鞋回來）

范力克：（嘆氣）

斯坦力克：拿着。把這雙醜怪的東西脫去，求求你。讓我——

（試圖脫去范力克的靴子）讓我替你——坐好——

范力克：（尷尬），不——請不要——不——我自己來——

（把靴子掙扎脫下，套上拖鞋）看，蠻好看啊？非常感謝你。

斯坦力克：不要客氣，費汀南，謝甚麼呀？——（向范力克，遲疑一陣）

再來點拔蘭地嗎？

范力克：我不要了，謝謝——

斯坦力克：好啦，別這樣。給我你的杯子！

范力克：對不起，我有點不適——

斯坦力克：不習慣了，是不是？

范力克：可能——問題是——你看，昨天晚上——

斯坦力克：哈，原來如此。喝多了，呃？

范力克：嗯——

斯坦力克：我明白。（返回座位）說起來，你知道那間新酒吧「鬆毛狗」嗎？

范力克：不——

斯坦力克：你不知道？聽着，那裏的葡萄酒是直接從酒桶開封的，不貴，而且人通常不多，真是個清雅的地方，你知道，全靠幾個蠻好的藝術家被容許——由你信不信——做室內裝飾。我可以向你大力推薦。可愛的地方。這麼說，你去哪裏？

范力克：哦，我們有時會泡酒館，我的朋友蘭度夫斯基和我——

斯坦力克：噯，我明白了！你和蘭度夫斯基一起，是吧？這麼說，你結果搞得一塌胡塗就一點不奇怪！他是一流的演員，不過他一旦喝起酒來——就完蛋！真的你可以多來一點拔蘭地！是吧！

范力克：（嘆氣）

（斟酒。各自喝酒。范力克微微抖動）

斯坦力克：（回到座位。稍停）這麼，其他近況怎樣？你有寫作嗎？

范力克：在嘗試——

斯坦力克：劇本？

范力克：獨幕劇——

斯坦力克：另一個自傳性的？

范力克：多少有點——

斯坦力克：我太太和我讀過那個關於啤酒廠的①。我們覺得十分有意思。

范力克：我很高興——

斯坦力克：可惜我們得到的副本很差②。讀起來很困難。

范力克：抱歉——

斯坦力克：是一篇很精彩的小品！我說的是實話！只是結局看來有點胡塗。整件事要引到一個更直接的結論，不過如此。無問題。你做得到的。

（停頓。各自喝酒。范力克微微抖動）

斯坦力克：這麼，事情怎樣？巴維爾③怎樣？你有見他嗎？

范力克：有——

斯坦力克：他有寫作嗎？

范力克：他最近也寫完一個獨幕劇。應該是和我的一起上演——

斯坦力克：慢着。你不是告訴我你們也成為同一陣線的作者吧！

范力克：多少有點——

斯坦力克：啊，啊！——坦白說，費汀南，怎麼想我也不懂。真不懂。我一點都不明白你們的聯盟。你這方面是真的嗎？真的？——天啊？巴維爾！我不知道！記一下他開始的方式！我們兩個屬於同一個年代，巴維爾和我，我們同時——可以這樣說——度過類似的發展歷

程，但我不介意告訴你他在那些日子做過甚麼——咳！就是對我來說也是有點太難堪的！——罷，我想這是你的事。你在做甚麼你會最清楚。

范力克：不錯——

（停頓。各自喝酒）

斯坦力克：你太太醉心於菖蒲嗎？

范力克：我不知道。我想是——

斯坦力克：你不會在很多地方找到像我這裏一樣多的品種。我一共有三十二種，而一般的園圃如果找到六種已經算是幸運。你想你太太會願意我送她一些花蕾嗎？

范力克：我肯定她會——

斯坦力克：種植它們的時間還是有的，你知道。（停頓）費汀南——

范力克：甚麼？

斯坦力克：我突然打電話給你，你驚奇嗎？

范力克：有一點——

斯坦力克：我想得到。畢竟，我恰好是那些避免沾惹麻煩的人之一，而我也很明白——由於這樣——你會想和我保持一定距離。

范力克：不，不是我——

斯坦力克：或許不是你自己，但我懂得你的一些朋友相信，任何人在今天如果仍然可以有一些機會發展，要嘛就是道德上退卻了，要嘛就是不可饒恕地愚弄自己。

范力克：我不這樣想——

斯坦力克：如果你這樣想，我也不會責怪你，因為我很知道產生這些偏見的基礎。（尷尬的停頓）費汀南——

范力克：是？

斯坦力克：我懂得你為你所做的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不過，一個

是有幸或是不幸地仍然得到官方容忍的人，請你不要以為他過的日子真的這麼容易；而他——同時——希望心安理得地生活。

范力克：我明白你的意思——

斯坦力克：在某方面來說對他可能更艱難。

范力克：我了解。

斯坦力克：事實上，我叫你來不是為了自我辯解！我實在不以為有這個需要。我找你是由於我喜歡你，要是你跟你的朋友一樣，懷着我沒想他們會有的偏見，我會感到難過。

范力克：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人說過你一句壞話——

斯坦力克：巴維爾也沒有嗎？

范力克：沒有——

斯坦力克：（尷尬的停頓）費汀南——

范力克：是？

斯坦力克：對不起——（起立。橫過舞台走到錄音機前。按動：柔和、性質不拘的背景音樂。斯坦力克返回座位）費汀南，捷夫里克這個名字對你有甚麼意義嗎？

范力克：那個流行歌手？我跟他很相熟——

斯坦力克：那我想你會知道他出了甚麼事。

范力克：當然。他們把他關起來，由於他在一次演出裏說了一個故事。這是一個關於一個警察在街上碰到一隻企鵝的故事——

斯坦力克：當然。這只是一個借口。事實是，他們憎恨他的膽色，因為他唱自己要唱的歌。整件事是這麼殘忍、荒謬和卑鄙！

范力克：以及怯懦——

斯坦力克：對！以及怯懦！看，我一直嘗試為這個孩子做點事。

我的意思是，我認識幾個鄉議會和檢察處的人，不過你知道那些地方。承諾，承諾！他們全都說會察看一下，可是你一轉背他們就會把事情像燙手山芋般甩手，以免把手指頭燙壞！真作嘔，每個人都這樣恐防冒頭！

范力克：無論如何，你嘗試過作一點事，我覺得真好——

斯坦力克：我親愛的費汀南，我實在不是你的朋友想當然的那種人！吃點花生？

范力克：不，謝謝——

斯坦力克：關於捷夫里克——

范力克：是？

斯坦力克：既然我用私人干預不能達成甚麼結果，我就想到或者有必要用某種不同的方式來處理。你懂得我的意思。干脆寫點東西——一封抗議書或是請願書？實際上，這是我想和你討論的主要事情。這一類事情你自然比我有經驗得多。如果這份文件簽上幾個有名氣的名字——譬如說，你的——它必定會在外國刊登而多少會產生一點政治壓力。對吧？我的意思是，實際上，這些事大抵不會很打動他們——但老實說，我看不到有其他幫助這個孩子的辦法。更不要說安妮——

范力克：安妮？

斯坦力克：我的女兒。

范力克：喔，她是你的女兒嗎？

斯坦力克：我以為你已經知道。

范力克：知道甚麼？

斯坦力克：她在待產。由捷夫里克——

范力克：哦，我明白了。這是為何——

斯坦力克：慢着！如果你想說我只是由於家庭原因而對這宗案件感興趣，而——

范力克：我不是這個意思——

斯坦力克：但你剛剛說——

范力克：我只是要說，這是你如何得知這宗案件；你剛才向我解釋你怎樣知道這件事。坦白說，我不指望你會熟悉現在的流行樂壇。我抱歉假如我聽起來好像指——

斯坦力克：即使待產的是別人，我也會介入這宗案件！不管誰——

范力克：我知道——

（尷尬的停頓）

斯坦力克：這麼，你對我想寫封抗議書的意見有甚麼看法？

（范力克開始在公事包內摸索，最後找到一張紙，遞給斯坦力克）

范力克：我猜你想的是這一種東西——

斯坦力克：甚麼？

范力克：這個——

斯坦力克：（攫去文件）這是甚麼？

范力克：看一下——

（斯坦力克從范力克手上拿了文件，迅速走向書桌，拿起眼鏡，架上，慫慫地讀。長時間停頓。斯坦力克顯出詫異狀。他讀完後，把眼鏡擱下並激動地來回走動）

斯坦力克：這不是很了不起嗎！真是笑話，是吧！嗯？我這邊廂絞盡腦汁看怎樣入手，最後我不顧一切並且向你諮詢——而在此期間你不動聲息，並且準備就緒！這不是匪夷所思嗎？當我向你求助時我知道我是做對了！

（斯坦力克回到書桌，坐下，再架起眼鏡，重讀文件）這個！恰如我腦子裏想的！簡潔、切題、公允，並且有力。顯見是專家手筆！我要辛苦經營一整天而

結果距離這個還很遠呢！

范力克：（尷尬）

斯坦力克：聽着，只有一個小意見——最後這裏——你認為「任意」是正確的用詞嗎？不可以找到一個較輕的同義詞嗎，或者？看來有一點錯置，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整篇文章處理得十分有節制、有理據——而這個字眼在這裏突然冒出來，聽起來有點太情緒化，你同意嗎？否則它便十分完整了。第二段或許有點不必要；事實上，它不過改寫了第一段。除了說明捷夫里克對不合流的青年的影響這點。這一點十分卓越而應該保留！用這個來取代你的「任意」來作結怎樣？那麼不是達到預期目的嗎？——不過這些都只是我的個人印象。天哪！幹麼要聽我的！這篇文章總的來說十分卓越，它無疑會達到目標。容我再說一遍，費汀南，我多麼欽佩你。你懂得這種竅門，一方面表達了事件的基本要點，同時又避免了所有無謂的咒罵，在我們這類人中確實十分罕有！

范力克：好啦——你不是認真的——

（斯坦力克拿下眼鏡，走向范力克，把紙放在他前面，重新坐到椅上，啜酒。稍停）

斯坦力克：不管怎樣，在這類案件，知道有個人可以隨時求教和信賴，真是好。

范力克：這是理所當然的，不是嗎？

斯坦力克：對你而言或者是。可是，在我活動的圈子裏，這類事情却絕對不是理所當然的！最自然的反應多半是剛好相反。當一個人遇到麻煩，每個人，所有人，都盡快甩掉他。他們由於害怕自身難保，會義無反顧地極力洗脫和這個人的關係；並且，還會聲討他，揭發他！

可是我為甚麼對你說這些呢，你最知道這一類事情！對吧？當你坐牢的時候，你在劇院的老朋友在電視上現身指摘你。真令人深惡痛絕——

范力克：我不憤恨他們——

斯坦力克：可是我氣憤！而且我對他們也這樣說。毫不含糊！你知道，像我這種位置的人懂得事事忍受，但是——原諒我——凡事也有個極限！我欣賞你可能難以責怪他們，因為你碰巧是受害者。可是，聽我說，你一定要保持距離！試想一想：當我們一旦，也一樣，開始容忍這一類胡言亂語——我們事實上便是整個道德淪亡的一部分，也間接地進一步助長了它。我說的不錯吧？

范力克：嗯——

斯坦力克：（稍停）你把它發了出去沒有？

范力克：我們還在收集簽名——

斯坦力克：至今有多少？

范力克：約有五十個——

斯坦力克：五十個？很不錯呀！（稍停）喔，沒關係，我剛好錯過了，如此而已。

范力克：你沒有——

斯坦力克：可是已經準備就緒，不是嗎？

范力克：是的，但仍是開放的——我的意思是——

斯坦力克：好的，不過現在已經打算送出和刊登，對吧？說起來，如果我是你，我不會把它交給任何一個通訊社。他們只會刊出一條微不足道的小新聞以致被人忽略。最好是把它直接交給歐洲一份大報，這樣全文和全部簽名可以得到刊載！

范力克：我知道——

斯坦力克：（稍停）他們已經知道嗎？

范力克：你是說警察？

斯坦力克：是的。

范力克：我想沒有。我猜沒有——

斯坦力克：看，我不想給你甚麼建議，不過我看你應該盡快把事情打點好，否則他們會聽到風聲並且會想出方法制止。五十個簽名應該够啦！而且，簽名的數量不重要，主要是他們的重要性。

范力克：每一個簽名都有它的重要性！

斯坦力克：絕對是這樣，不過以海外宣傳來說，有好幾個名人的簽名出現是至為重要的，對吧？巴維爾有簽名嗎？

范力克：有——

斯坦力克：這好。他的名字——不管人們對他個人有甚麼意見——在今天的世界上確是有某種意義的！

范力克：無疑——

斯坦力克：（稍停）聽着，費汀南——

范力克：是？

斯坦力克：我還要和你討論一個問題。不過這事有點難於啟齒——

范力克：哦？

斯坦力克：看，我不是百萬富翁，你知道，可我至今還可以——

范力克：真難得——

斯坦力克：噯，我在想——我的意思是——我有意思——看，你的大部分朋友都失去工作。我在想——你會準備從我處接受一筆錢嗎？

范力克：你真好！我的一些朋友的確是有點拮据。但是有些困難，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人們實在是不大知道怎樣去進行，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往往是最不情願接受

的——

斯坦力克：我拿得出來的也幫不上甚麼大忙，可我想也有錙銖必算的情形。（取出錢包，拿出兩張紙幣，猶豫，拿出第三張，遞給范力克）拿去——請——一宗小小的捐獻。

范力克：非常感謝你。讓我代表我所有朋友多謝你——

斯坦力克：不要客氣，我們應該互相幫助，不是嗎？（停頓）順便說一句，你不需要提到這宗小小捐贈是來自於我的，我不希望樹立牌坊。我肯定你已經收集得够多了，嗯？

范力克：是的。再一次非常感謝——

斯坦力克：那麼現在，到花園去看看怎樣？

范力克：斯坦力克先生——

斯坦力克：是？

范力克：我們希望明天送出——

斯坦力克：甚麼？

范力克：抗議書——

斯坦力克：非常好！愈快愈好！

范力克：所以今天還——

斯坦力克：今天你應該想到睡眠！這是最主要的！不要忘記昨晚之後你有點宿醉而明天對你將是艱辛的一天！

范力克：我知道。我只要說的是——

斯坦力克：至好直接回家和拔下電話插座。否則蘭度夫斯基打電話給你而天曉得你們又要怎樣收科！

范力克：是的，我知道。我還只有幾個簽名要收集——不會花很多時間的。我要說的是——我的意思是，你不以為這會有所幫助——事實上，事情會，當然，很轟動！畢竟，實際上每個人都讀過你的《轟》！

斯坦力克：哦，好啦，費汀南！那是十五年前的啦！

范力克：可它從沒有被遺忘！

斯坦力克：你是甚麼意思——轟動？

范力克：對不起，我好像覺得你實際上有意思——

斯坦力克：甚麼——

范力克：參與——

斯坦力克：參與？慢着。你說的是（指着紙）這個？你說的是這個嗎？

范力克：是的——

斯坦力克：你是說我——

范力克：對不起，我是有過這個印象——

（斯坦力克把酒喝乾，走到酒櫃，倒了一杯酒，走向窗前，向外眺望一會，從那裏突然回頭向范力克微笑）

斯坦力克：真可笑，是不是？

范力克：甚麼可笑？

斯坦力克：得啦，你看不出有多荒謬嗎？嗯？我叫你來一意希望你為捷夫里克的案件寫點東西——而你製作了一份完整的文件，並且裝備有五十個簽名！我像一個毛孩子那樣大吃一驚，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想方設法阻止他們破壞你的計劃——而與此同時，我竟然沒有想到我首先應該做的至簡單、至自然的事！就是，我自己立即在文件上簽名！噯，你一定承認這是荒謬的，不是嗎？

范力克：嗯——

斯坦力克：現在，費汀南，聽着，這不是對我們落到這個境地的可怕的觀照嗎？不是嗎？想想看：甚至是我——儘管我知道還是廢話，甚至是我也習慣於這個念頭，以為

簽署抗議書是一小撮專家、職業聲援家和異議者的事務！至於我們其他人等——當我們希望盡人類的德行做一點事情——則自動地求教於你們，彷彿你們是道德事務的服務機構。換句話說，我們干脆守口如瓶換取相對的安寧和清靜，而你們則為我大聲疾呼而換來人間的打擊和天國的光榮！乖理，不是嗎？

范力克：嗯——

斯坦力克：當然是！而他們甚至弄到連秉性聰明和品和良好的人——容我說，我仍然認為我是的——也多少安於這種狀況！彷彿這樣是正常、理所當然的！你有甚麼話說？令人作嘔，呃？

范力克：這個——

斯坦力克：你想民族可以從這一切中更生嗎？

范力克：很難說——

斯坦力克：可以做甚麼呢？可以做甚麼？看來很清楚，不是嗎？即是，從理論上來說。每個人應該從自己開始。對麼？可是，這個國家只居住了范力克一類人嗎？看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人權鬥士。

范力克：不是每個人，不——

斯坦力克：在哪裏？

范力克：甚麼？

斯坦力克：當然是簽署名單。

范力克：（尷尬停頓）斯坦力克先生——

斯坦力克：是？

范力克：原諒我，可是——對不起，我突然有一個滑稽的感覺，我是或許——

斯坦力克：甚麼滑稽感覺？

范力克：我不知道——我覺得很尷尬——是這樣，我或許有點

不公平——

斯坦力克：在哪方面？

范力克：是這樣，我剛才做的——有點取巧——在某方面來說——

斯坦力克：你在說甚麼？

范力克：我是說，我首先讓你說話，然後才請你簽名——我的意思是，你看——

斯坦力克：你是不是暗示，假如我知道你正在為捷夫里克收集簽名，我就不會談起他？

范力克：不，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斯坦力克：那你的意思是甚麼？

范力克：怎麼說呢——

斯坦力克：喔，來吧！你以為我自己不會着手進行整件事，是嗎？

范力克：不，不是這樣——

斯坦力克：那麼，是甚麼呢？

范力克：是這樣，假如我立即請你簽名，那麼看來事情會完全不同。這樣你可以有選擇——

斯坦力克：這麼，你為甚麼不立即向我提出？是否由於你從一開始就把我排除了？

范力克：喔，我以為在你的地位——

斯坦力克：哈！就是了！看到吧？你到底怎樣看我，現在慢慢露出來了，是吧？你以為，由於我的東西不時出現在電視上，我便再沒有能力做最簡單的聲援行動！

范力克：你誤解了我。——我的意思是——

斯坦力克：讓我告訴你，費汀南。（喝酒。稍停）看，如果我已經——不管願不願意——習慣於這種乖念，以為公認的品格和道德只是異議者的專長——那麼你也已

經——不管願不願意——習慣於這種想法！因此你從來不會想過，某些價值對我而言，可能比我目前的位置更重要。但假設我終於也想做一個自由人，我也希望恢復我的內心完整，擺脫羞愧和恥辱的枷鎖呢？你從來不會想到，我實際上或許年復一年地等待這個時刻，是不是？你只是干脆把我放到無可藥救的那類人之間，認為沒有理由再存甚麼指望。是吧？而現在你發現我對其他人的命運也不是漠不關心——你叫我簽名就流露了你的想法！可是你立即看到了情勢，因此你開始向我道歉。天啊！難道你看不出你怎麼侮辱了我？說不定我一直希望有機會行動，做點甚麼使我重新成為一個人，幫助自己再一次獲得安寧，幫助自己重新得到自由的想象力和恢復幽默感，擺脫我用埋首於木蓮和杏樹的開花結果來逃避苦惱的需要！假設我也情願生活在真理之中！假設我要離開樣版文學和電視主流文化而回到不需要遵命於任何人的藝術世界呢？

范力克：對不起，請原諒我！我無意傷害你的感受——等一等，我將——等一等——

（范力克打開公事包，搜索一會，最後抽出一份有署名的紙張遞給斯坦力克。斯坦力克慢慢站起來，拿着紙走到書桌，在那裏坐下，架上眼鏡，細心閱讀及不時點頭。一段長時間之後，他拿下眼鏡，慢慢站起來，來回踱步沉思，最後轉向范力克）

斯坦力克：讓我思考一下。可以嗎？

范力克：當然可以——

斯坦力克：（停下，喝酒，在說話時開始踱步）我相信我已經考慮到事情涉及個人方面的各項要點。如果我簽署文

件，我將會重新獲得——經過這些年的五內翻騰——我的自尊，我失去的自由，我的榮譽，或甚至得到那些和我親近的人尊敬。我將把那些由地位和良心衝突所造成的無法解決的困境拋諸腦後。當那個青年人回來，我將能夠坦然面對安妮、我自己以至他。我將失去工作，儘管這工作不給我任何滿足感——相反，它給我帶來的是恥辱——不過，這份工作的確能夠養活我們一家，總比我做看更好得多。我的兒子多半不能再上學。另一方面，我肯定他將會因失學而多點尊敬我。勝過假如他知道他獲准上學是由於我拒絕為他正好的崇拜的捷夫里克簽名——好了，這個個人方面。那麼，客觀方面怎樣？假如在著名的異議者和捷夫里克的少年朋友的簽名名單之中——突然跳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和想像——我的簽名——會產生甚麼效果？一個在公民事務方面已經絕迹多年的名字！吓？我的聯署者——以至許多不會簽署這種文件而心裏卻無疑認同他們的人——自然會樂於見到我的簽名。在慣於簽名者那個緊密圈子——說起來，他們的簽名已經開始失去法力，因為他們實際已經毫無所失了。我的意思是，這些問題人物早已經失去由於簽名而可能失去的所有代價。對吧？嘿，這個圈子將會破產。一個新的名字將會出現，這個名字的價值完全由於它從前沒有出現過。而當然，我還得補充，由於它的出現而要付的龐大代價！我這備受期待的簽名會帶來多麼多的客觀「勝數」。現在看看當局會怎樣？我的簽名將令他們震驚、疑惑和困擾，理由和其他簽名者會有的喜悅相同。我的意思是，因為它抵觸了當局一向以來用盡一切辦法在你們這伙人中圍起來的屏障。好

了。我們看看捷夫里克。我極之懷疑，關於他的案件，我的簽名會帶來甚麼有力的作用。即使有，恐怕也多半會是不利的。當局會熱衷於表明他們並無慌惶失措。他們要表示這種意外沒有令他們失去鎮定。如此就得該我考慮他們應怎樣對付我。肯定地，我的簽名對我的情況注定會有更顯著的影響。毫無疑問，他們給我的懲罰會超出你們的估計。我的懲罰會作為一個警號，儆戒未來那些躍躍欲試，想追隨我的榜樣，選擇自由，從而壯大異議者的行列的人。你可以肯定，他們必會向他們顯示代價有多大！對嗎？情形是——來吧，讓我們面對吧——他們對自成一窟的異議者活動已經不再怎麼擔心！在某方面而言他們大概甚至會推一把呢。可是！他們真正害怕的，是這一窟的圍板有怎麼風吹草動！所以他們必定要鎮魔伏煞，抑遏那勢將刮起的異端邪風，拿我來殺一儆百。他們要防患未然，就是這樣。（喝酒。停頓）我最後要問自己的是這個問題：對那些在某程度上你可稱之為走「調和路線」的人，可以期待他們對我的簽名有甚麼反應呢。我是指那些我們要顧及，或應該要顧及到的人，因為——我肯定你會同意——未來的希望視乎能不能把他們從沉睡中喚醒，令他們成為積極投身公民事務的一份子。嗯，恐怕我的簽名會招來這個重要階層的人的勃然大怒。你知道為甚麼？因為，事實上，這些人暗地裏憎恨異議者。他們成為他們的良心陰影，活生生的指摘！他們是這樣看異議者。與此同時，他們羨慕他們的榮譽，他們的內心自由，這些他們自己的命運所不容的價值。這是他們所以不會放過任何機會詆譏異議者的原因。而我的簽名恰好給他們

這個機會、他們將散播關於你和你朋友的各種卑鄙的謠言。他們會談你們這些失無可失的人——你們早已經山窮水盡，以至，盡力安於其所了——此刻試圖把一個至今生活得還好的不幸的人拖到你們的田地。只因你們自己的妄想，希望製造聲勢壯大的假象來刺激當局，你們毫不動容地——如你們的不負責任——把他拖垮！他失去工作與你們有何相干！無所謂，是吧？又或者你們準備在你們自己賴以維生的垃圾堆中替他找一份工作？是不是？不——費汀南！對不起。我恐怕我太熟悉那些人的想法了！說到底，我得生活在他們的中間，日復一日。我知道他們要說的每一句話。他們會說我是你們恬不知恥地凌辱、誤導，用冷嘲熱諷呼喚我的良知下誤入歧途的犧牲者！他們會說，你冷酷無情，使你不惜利用我的捷夫里克的私人關係！你知道麼？他們會說你們一直宣稱的人道理想已因你們這樣對待我而黯然失色。你可以從他們那裏得到這一類推論！毋須多說，當局肯定會支持這類解釋，還會火上加油！當然，也有另一種大抵是較明智的人。他們多半會說，我的簽名在你們中間突顯出來，實際上會造成反效果，把注意力從捷夫里克方面轉移到我的簽名上，他們會說，這樣一來，會損害整場抗議，因為人們難免會問這個舉動是怎麼一回事：是幫助捷夫里克呢，還是炫耀一個新誕生的異議者？如果有人說，捷夫里克實際上被你和你朋友所累，我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可以這樣認為，他的個人悲劇是為促進你們的目的而服務——和這個不幸的人的命運遠遠無關了。此外，你們藉着拿我的簽名來表明你們務求斷絕我用其他途徑——即所謂走後門，靠私人

介入這種我至今還能够使出的招數，而我或者可以證明這樣更能幫助捷夫里克呢！我真希望你會明白我，費汀南。我不是要誇大那些意見的重要性，也不打算成為它們的奴隸。另一方面，顧及這些因素看來更有利於我們的情況。畢竟，這是一宗政治決定，而一個好的政治家必須考慮到影響行動結果的所有方面。對吧？在這種情勢下務須解決的這個問題：我的意向是甚麼？我寧讓我的簽名給我內心自由和解放，換取客觀方面的負面作用——一如現在證明了的——或是選擇另一種出路。我的意思是，抗議信要是沒有我的簽名，效果會更好，可代價是我辛酸地意會到我得再一次——天知道，或許這是最後一次了——失去擺脫多年來羈縛着我的屈辱妥協的枷鎖？換句話說，如果我要合乎人倫地行動——我希望你現在已經毋須懷疑這是我只要做的——我應該走哪條路？我應該順從無情的客觀考慮，或者是主觀的內心感覺？

范力克：在我看來很清楚——

斯坦力克：在我也是——

范力克：那你會——

斯坦力克：不幸地——

范力克：不幸地？

斯坦力克：我以為我是——

范力克：原諒我，我或者不太理解——

斯坦力克：對不起，假如我有——

范力克：沒關係——

斯坦力克：但我真的相信——

范力克：我知道——

（各自喝酒。范力克輕微抖動。長時間的尷尬停頓。）

斯坦力克微笑着把紙遞給范力克，後者將之和抗議書一起放到公事包。他露出了尷尬的神情。斯坦力克走到錄音機，按停，回來坐下）

斯坦力克：你生氣嗎？

范力克：不——

斯坦力克：不過你不同意——

范力克：我尊重你的推論——

斯坦力克：但你怎樣想？

范力克：我應該怎樣想？

斯坦力克：這很明顯，不是嗎？

范力克：是嗎？

斯坦力克：你以為我看到所有簽名，我會，始終，感到害怕！

范力克：我沒有——

斯坦力克：為甚麼你不跟我擺平！？難道你不知道，你的假仁假義實際上比單刀直入對我更侮辱！？抑或你認為我甚至不配你的評論！？

范力克：可我告訴過你，沒有嗎，我尊重你的推論——

斯坦力克：范力克，我不是白癡！

范力克：當然不是——

斯坦力克：我知道你「尊重」背後的意思！

范力克：你錯了——

斯坦力克：只是，我不很肯定你——你們所有人——是否有權感到優越！

范力克：你的意思是甚麼？

斯坦力克：你完全知道我的意思！

范力克：我不——

斯坦力克：要我告訴你嗎？

范力克：請說——

斯坦力克：哈！據我所知，你在監獄裏講的比你應該講的要多！

（范力克跳起來，俯視着斯坦加克，後者勝利地微笑。短暫對峙。電話鈴響。范力克崩潰，墜回座位上。斯坦力克橫過舞台拿起電話聽筒）

斯坦力克：喂——是——甚麼？你是說——等一等——我明白了——明白——你在哪裏？是，是，當然——一定！——好——當然！——肯定——我在這裏等你！再見。（斯坦力克放回話筒，目光空洞地凝望空間。長時間停頓。范力克尷尬地站起來。斯坦力克似乎現在才覺察范力克還在。他突然轉向他）你可以回去樓下的火爐把它燒掉！

范力克：甚麼？

斯坦力克：他剛走進食堂！去看安妮。

范力克：誰？

斯坦力克：捷夫里克！還有誰？

范力克：（跳起來）捷夫里克？不是說他釋放了？可這真神呀！到底，你的私人介入發揮作用了！幸好我們沒有早幾天把抗議書發出去！否則他們必定暴跳如雷，不肯放人！

（斯坦力克探視着范力克，然後突然微笑起來，堅定地走向他，雙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斯坦力克：親愛的朋友，你不要煩躁！行動從來都有累事而不是成事的風險！對吧！天啊，如果你要擔憂這一類事情，你永遠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來，讓我拿那些樹苗給你——

—完—

註釋：

①斯坦力克是指《聽眾》。

②地下刊物流傳的打字稿的質素通常欠佳，是很可理解的，譬如，要是你拿到的是用碳紙覆打在蔥皮紙上的第六份副本，閱讀效果自是差強人意。

③斯坦力克指的是 Pavel Kohout（譯者按：捷克劇作家）。

（譯自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Vancouver 1987: *The Vanek Plays*, 編者：Marketa Goetz-Stankiewicz）

譯後記

在七十年代期間，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每年都和他的幾個親密的落難文友到他的鄉間小屋共渡幾天，這些時光也養成了他「以文會友」的習慣。1975年，哈維爾首次向友人朗誦他剛完成的獨幕劇《觀眾》。這是個關於知識分子在啤酒廠做勞工時遇到人性「現形記」的故事（在1989年捷克巨變以前，異議者經常有求職困難，許多知識分子往往要當體力勞工糊口。《觀眾》的場景正反映了哈維爾的現實經歷）。豈知這篇小品就引來了在場聽眾的共鳴，誕生了後來七篇取用同一主角而寫成的獨幕劇。

哈維爾：《觀眾》（*Audience*）

《揭幕》（*Unveiling*）

《抗議》（*Protest*）

Pavel Kohout：《許可證》（*Permit*）

《泥潭》（*Morass*）

《鬧劇》（*Safari*）

Pavel Landousky：《逮捕》（*Arrest*）

Jiri Dienstbier：《接待》(*Reception*)

哈維爾筆下的范力克，是一個寡言靦腆的男子，在其他作家筆下，他有時像哈維爾的范力克，有時也會口若懸河、機靈敏捷。無論如何，哈維爾在1985年寫的一篇文章這樣概括范力克現象：范力克是開啟他處身的世界的景觀的一道「鑰」，他是某種媒體，在他掠過之處照見無限風光。

哈維爾說，「范力克」不是他個人的專利品。誠然如此，他就表示過，《抗議》是回應《許可證》之作。

李金鳳 譯

本譯文最初發表於《八方》第12輯

錯誤

人物：

西培

王爺（一個受到優待的囚犯）

囚犯甲

囚犯乙

囚犯丙

（幕啟時，囚犯甲、乙和丙擠在台左方的一道門邊，堵住了門。王爺站在他們前邊。四個人人都給剃光了頭，手臂和軀幹上刺上了各式各樣的紋身——王爺身上的紋身尤其多。他們都穿着囚犯制服，狠狠地盯着西培。台的另一端擺着一架鐵造的三層牀，西培坐在牀的最高的一層上。他跟其他的人一樣，穿上囚犯制服，剃光了頭，可是身上沒有紋身，他不安地注視着堆在門口的這羣人——他是新來的。一段冗長而沉重的靜默……）

王 爺：（向西培）聽說你起牀①後抽了一根煙……

囚犯甲：（向王爺）是呀，我親眼看見的……

王 爺：（向囚犯乙）當真？

囚犯乙：沒錯，絕對真。

王 爺：（向西培）你不曉得我們這裏甚麼時間集合吃早飯的麼？

（略頓）

囚犯甲：（向王爺）他曉得的……起牀後十分鐘。

王 爺：（向囚犯乙）有人告訴他嗎？

囚犯乙：那能沒人告訴他，新來的一進門他們便吩咐得一清二楚了……

王 爺：（向西培）老弟，你聽着，這裏起牀後有十分鐘才吃早飯。我們得在這時間裏穿好衣服……要洗臉撒尿只管去，沒人管得着，懂麼？你要馬上收拾牀鋪也可，不用所有人堆在一塊，礙手礙腳。我們一起牀便要開窗，放一放臭氣，這是規矩，從來都這樣……然後我們拿好帽子和飯碗，一聽到喊列隊，便得馬上神神氣氣的到門外列開隊來，誰要是慢了就會被趕回牢房去等下一趟。所以我們不想有人在緊急關頭才扭扭捏捏的去找東西和丟煙頭，知道沒有？我們不想被一隻慢吞吞的王八拖累……聽懂了吧？誰要不懂我們就再說個清楚！

囚犯甲：（向王爺）放心好了，我們都懂。我們都聽你的。

囚犯乙：（向西培）對呀。那個小臭氣戶敢跟我們對着幹，他就會後悔一輩子……

王 爺：（向西培）所以我說嘛，從起牀到吃早飯，中間的事情多着，放屁的時間都沒有，還說抽煙哪，這裏不能這樣，不過吃過了早飯又不同，那時候要抽煙只管抽個夠——如果你有煙的話——你拉屎放屁也沒人管。可是

早飯前不能這樣。這一直是我們這牢房裏的規矩，永遠都得這樣。別他媽的告訴我那十分二十分鐘也忍不住。這樣說不過分吧？（向囚犯乙）你說對不？

囚犯乙：對的。

囚犯甲：（向西爺）忍一下子沒關係的。

王爺：（向西培）你記住，早飯前不能抽煙……

囚犯甲：特別在開窗放放那他媽的臭氣的時候……

王爺：（向西培）對的，就是這樣，有些人大清早受不了香煙的味兒，他們不喜歡煙味，他們的肺受不了。這是他們的權利，知道沒有？

（西培沒答話，尷尬地縮了縮肩膀）

囚犯乙：（向西培大嚷）你沒聽見他的話嗎？

（西培重複同樣的表情和動作）

誰在吃早飯前抽煙就要挨揍，懂麼？

王爺：（向西培）別的牢房裏怎樣我不管，我們這裏早飯前不許抽煙。人人都得聽話，特別是你們這些新來的。好了，老弟，我說完了。這些話不單是我要說的，所有人都這樣想。（向囚犯乙）是不是？

囚犯乙：是的。

囚犯甲：（向西爺）我們的確這樣想……

王爺：（向西培）你抽煙人人都看見，你可賴不了。他們都大吵大鬧，可是我說，他到底是新來的呀，不曉得規矩嘛，他們便不做聲了。今天就這麼算了吧。這不是鬧着玩的；下次再這麼自把自為耍花樣，我們可不放過你……

囚犯甲：（向西爺）我在這兒耽了這許久，從沒人敢在早飯前點過一根煙。

王爺：（向西培）所以我說嘛，這一次饒了你，可別來第二次

了，明白麼？

（西培尷尬地聳聳肩）

囚犯乙：（向西培大嚷）你這小臭戶裝甚麼蒜？王爺跟你說話哩！

（靜默）

王爺：（向西培）我們都想和和氣氣過日子的，你知道麼？所以這一次算了……現在你懂得這裏的規矩了，識趣的就不要胡來。

（更長的一陣靜默）

唔，說起來也該提醒你……從明天起，你要跟我們完全一樣地收拾牀舖，人家做得到的你便懂得做……我們不能為了一些不懂得收拾牀舖的混蛋天天給扣分的吧？我們不可以給這麼一隻剛出殼的王八羔子拖累。我看你還是乖乖的快點學學怎樣收拾。明天你不把牀舖收拾得跟別人的一模一樣，學一個通宵你也得學。

囚犯乙：（向西培）不叫你一口氣收拾十遍才怪！

王爺：（向西培）被單兩邊一定要離開牀沿兩寸，牀單一定要摺疊整齊……就是這麼着……弟兄們會教你的了。

囚犯甲：（向王爺）我來教他……

王爺：（向西培）懂得了麼？

（靜默）

這兒的人都學會了，只差遲早，沒道理你偏不會。聽見沒有？

（靜默）

囚犯乙：（向西培）操你娘的戶！臭小子你啞了不成？王爺問你，你答腔呀！

囚犯甲：（向王爺）這混蛋怎麼了？

王爺：（向西培）洗臉盆弄乾淨了沒有？

(靜默)

留神點兒來着，這個星期輪到你打掃。別以為你娘的在地上那麼一掃便行了，牀底下的地板你得趴下來使勁擦……特別是牆角……那些找渣兒的專愛拿電筒往那裏照……所有的塵都要掃得乾乾淨淨。臉盆要洗乾淨、揩乾、擦亮……茅坑也一樣，那裏邊今天髒得要死，找渣兒的沒來算你走運，不然够你受的。今晚巡查之前我會親身先檢查一遍。同在一條船上，可沒有優待這等事，特別是那些剛從殼裏爬出來的王八，煙頭也不捏掉就丟到房門外邊去……

囚犯乙：(向西培大嚷) 王爺跟你說話呀，小臭戶，你還不快下來！

(西培依然坐在牀上，十分尷尬地笑着。一段很沉重的靜默。囚犯乙正想撲前去把西培扯下牀來。王爺制止住他)

王爺：(向囚犯乙) 慢着！

(靜默)

(向西培) 老弟，敬酒不吃，非得要吃罰酒不成？你想做王爺是不是？操你娘的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你這種小臭戶我們自有辦法收拾的。聽懂了沒有！

(靜默)

囚犯甲：(向王爺) 這小子性子真硬。

囚犯乙：(向西培) 你娘的給我下來！快！

(靜默，西培一動也不動)

囚犯乙：(大嚷) 下來呀！

(靜默，西培依然動也不動)

王爺：(向西培) 好小子，跟你爺爺對着幹不會有好收場的，別裝蒜了！

囚犯甲：(向西培) 馬上下來向王爺認錯！

(靜默，西培始終沒動，只管尷尬的坐在牀沿傻笑)

囚犯乙：(大嚷) 狗娘養的殺千刀！

(囚犯乙撲前抓住西培的一條腿用力把他拖到地上，狠狠的踢幾腳，然後回到王爺身邊，西培慢慢的站起來，困惑地望着眾人，靜默)

囚犯丙：(輕聲) 弟兄們……

(靜默，眾人注視着西培)

王爺：(依然注視着西培) 甚麼？……

囚犯丙：(輕聲) 我看……他也許是外地人……

(三人疑惑地看着王爺，靜默的氣氛變得沉重)

王爺：(稍定，輕聲地) 那……算他倒霉了……

(王爺帶着脅迫的神情慢慢向西培走去，其餘三人也慢慢向西培圍過來，幕下)

①「起牀」原文作 slop-ont，這個字的原義查不出來，據推斷或許是「拉屎」的意思，但拉屎與午飯之間只有十分鐘，而且每個人的生理運作不同，故決定譯成「起牀」。

[這一齣短劇是哈維爾出獄後第一個作品，於1984年11月在斯德哥爾摩首演。中譯本原載於《八方》第12輯。]

萬分的感謝瑞典友人們

——斯德哥爾摩首演致詞

從四年的牢獄生涯放出來不久，我就寫了《錯誤》。這是我特

地為支持我們捷克的非官方文化而組織的瑞典戲劇之夜寫的一齣短劇，也是我向給予我精神和物質支持的瑞典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他們隸屬的幾個團體，還有許多許多沒出名的瑞典人民表示的一點微不足道的謝意。

每一個國家都存在着自己不同的問題，這些問題跟我們面對的不一樣，可是不管問題是甚麼，都總有瞭解我們的情況、對我們要做的事表示同情的人。他們明白到要是一個國家失去自由，其他的國家都會受到嚴重影響。這許多的同情和瞭解給了在牢獄中的我不少的支持，也給了我和其他好些志同道合的人許多的鼓勵。

我寫《錯誤》並不只是展現牢獄生涯的一個片段，我希望透過這小小的作品提出一點警告，因為自發的極權主義思想普遍地在今日世界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社團裏潛伏着，觀眾們也許還在這短劇裏看到其他的東西——比如說，我們國家最初引起人們注意時的印象，還有人類對自己，包括了對他們出生的國家的責任問題，我知道有些人也許會覺得生為捷克人是一種錯誤。在我來說，這倒是一項特殊的任務，我當然沒有主動的給予自己這個任務，但我接受它而且希望能把它辦得最好。

謹代表我和我的朋友們向全體瑞典演員、作家和藝術家們衷心地感謝他們為我們做的所有事情，包括了今晚的演出。

黃奇智 譯

本文是哈維爾為短劇《錯誤》的首演親作介紹：首演在1984年11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本譯文最初發表於《八方》第12輯。

浩劫

——致哈維爾

貝克特

人物：

導演（導）

導演的女助手（助）

主角（主）

洛克，主管燈光、幕後（洛）

排練中。最後一幕執排。空的舞台。助手與洛克剛調好燈光。導演剛到。

導演坐在觀眾席左下方的一張搖椅上。毛皮大衣。配上毛皮圓帽。年齡與外型不重要。

助手站在他身旁。全身白裝。光着頭。耳朵夾着鉛筆。年齡與外型不重要。

主角站在台中央一個十八英寸高的黑色平台上。黑色闊邊帽。長及腳跟的晨褸。赤腳。垂頭。雙手插進衣袋。年齡與外型不重

要。

（導演與助手打量着主角。長久的停頓。）

助：（終於開口）喜歡他的造型嗎？

導：勉強吧。（停頓）這底座幹麼？

助：讓堂座可以看見他的腳。

（停頓）

導：要帽子幹麼？

助：讓他的臉藏起來。

（停頓）

導：這袍子幹麼？

助：讓他全黑。

（停頓）

導：他裏面穿甚麼？（助手走向主角）說呀。（助手停步）

助：他的睡衣。

導：顏色呢？

助：灰色。

（導演拿出一支雪茄）

導：火。（助手走回來，燃點雪茄，呆站着。導演抽着雪茄）這頭蓋怎麼樣？

助：你看過的。

導：我忘了。（助手走向主角）說呀。

助：在脫毛。疏落的幾撮。

導：顏色呢？

助：灰色。

（停頓）

導：雙手插進衣袋幹麼？

助：令他全黑。

導：不應該這樣。

助：我記下來。（她拿出一本拍紙簿，取過鉛筆，記錄。）雙手
外露。

（她放回簿和筆。）

導：它們怎麼樣？（助手惘然。惱火。）這雙手，這雙手怎麼
樣？

助：你看過的。

導：我忘了。

助：廢了。肌肉纖維硬化。

導：像爪子？

助：看你喜歡怎樣。

導：兩個爪子？

助：除非他緊握拳頭。

導：他不應該這樣。

助：我記下來。（她拿出拍紙簿，取鉛筆，記錄。）

雙手無力。（她放回簿和筆）

導：火。（助手走回來，重新燃點雪茄。呆站着。導演抽雪
茄。）好。現在讓我們看看。（助手惘然。惱火。）馬上動
手。去掉那長袍。（他察看他的計時鐘。）爽快點兒，我有
個決策會議要開。

（助手走向主角，脫下長袍。主角順從，呆滯。助手退後，
長袍搭在她的臂彎上。主角穿着灰色的舊睡衣，頭下垂，拳
頭緊握。停頓。）

助：脫下了他像樣點吧？（停頓）他在顫抖。

導：不全是。帽子。

（助手上前，摘去帽子，退後，帽在手中。停頓。）

助：要那頭殼嗎？

導：需要弄白些。

助：我記下來。（她拿出拍紙簿，取鉛筆，記錄）弄白頭殼。

(她放回簿與筆。)

導：雙手。(助手惘然。惱火。) 拳頭。馬上動手。(助手上前，弄開拳頭，退後。) 和弄白。

助：我記下來。(她拿出拍紙簿，取鉛筆，記錄) 弄白雙手。

(她放回簿和筆。他們打量主角。)

導：(終於開口) 有點不對勁。(狂號) 是甚麼？

助：(畏怯地) 如果我們是……是……合攏它們？

導：不妨試試。(助手上前，把雙手合攏起來，退後。) 高一些。(助手上前，把合攏起來的手提到腰間，退後。) 再多點。(助手上前，把合攏起來的手抬到胸口般高。) 停！(助手退後) 好一些。顯現出來了。火。(助手回來，重新燃點雪茄，呆站着，導演抽雪茄。)

助：他在顫抖。

導：那真好。

(停頓)

助：(畏怯地) 來點……來點……打呢？

導：天啊！這些畫蛇添足狂！清楚玲瓏！來點打呢！天啊！

助：肯定他不會張聲？

導：一聲不吭。(他察看他的計時鐘) 時間剛好。我去看看從大堂處看起來甚麼樣。

(導演離場，不再出現。助手沉到搖椅裏，剛坐下不久便彈起來，拿出布片，使勁擦椅背和座位，丟掉布片，再坐下。停頓。)

導：(場外，叫苦般) 我無法看見腳趾。(惱火) 我正坐在堂座前排而無法看見腳趾。

助：(起來) 我記下來。(她拿出一本拍紙簿，取鉛筆，記錄。) 升高柱腳。

導：還看到臉孔。

助：我記下來。

（她拿出拍紙簿，取鉛筆，寫筆記。）

導：把頭弄低。（助惘然。惱火。）馬上動手。把頭弄低。（助手放回簿和筆，走向主角，把他的頭弄得更低，退後。）着迹點。（助手上前，把他的頭弄得更低。）停！（助手退後）行。出來了。（停頓）可以赤裸點。

助：我記下來。

（她拿出拍紙簿，寫筆記。）

導：馬上動手！馬上動手！（助手放回拍紙簿，走向主角，猶豫地站着。）露出脖子。（助手解開上面的鈕扣，翻開領口，退後。）雙腳。腳脛。（助手上前，捲起一隻褲腳至低於膝蓋處，退後。）另一隻。（同樣捲起另一隻。退後。）高一點。膝頭。（助手上前，捲起兩隻褲腳至及膝處，退後。）和弄白。

助：我記下來。（她拿出拍紙簿，取鉛筆，記錄。）

弄白所有皮肉。

導：顯現出來了。洛克在嗎？

助：（喊）洛克！（停頓，更大聲）洛克！

洛：（場外，遠處）我聽到。（停頓。近一點。）又有甚麼事了呀？

助：洛克在。

導：熄台燈。

洛：甚麼？

（助手以術詞轉述。一般照明淡出。

燈只照射着主角。助手在暗處。）

導：只要頭。

洛：甚麼？

（助手以術詞轉述。照明淡出主角的身體。只餘頭有光。長

時間停頓。)

導：真好。

(停頓)

助：(畏怯地) 假如他是……是……抬起他的頭……一瞬間……露出臉孔……只是一瞬間。

導：天啊！接着怎辦？抬起他的頭？你以為我們在那裏？在巴塔哥尼亞嗎？抬起他的頭？天啊！(停頓。) 好。這是我們的浩劫。就是這樣。再來一次，然後我便走。

助：(向洛克) 再來一次然後他便走。

(燈光淡入主角身上。停頓。一般照明淡入。)

導：停！(停頓。) 現在……到此為止。(一般照明淡出。停頓。身上的燈光淡出。燈只照射着頭部。長久的停頓。) 妙極！他將令他們五體投地。我這裏聽得到。(停頓。遠處傳來如雷的喝采聲。主角抬起頭，凝視觀眾。喝采聲衰竭。長久的停頓。臉上的光淡出。)

陳炳釗 譯 李金鳳 校

《浩劫》是貝克特為哈維爾寫的劇本，收在《見克特短劇集》(*Collected Shorter Plays of Samuel Beckett*, London, Fober and Faber, 1984)，1982年在法國南部「阿維尼翁戲劇節」上首演。

哈維爾年表

1936年10月5日

哈維爾出生，父親為土木工程師。

1951年

年青的哈維爾完成義務教育，但因「階級」及「政治背景」理由，屢被拒於高等教育門外。

1951至55年

最初在布拉格工業中學任學徒，後成為實驗室技術員。同時在夜間進修文化學校課程，並於55年成功通過考核。

1955年

開始在幾份刊物發表有關文學及戲劇的文章，直至1969年止。

1956年秋

在布拉格附近的多比斯作者之家的工作會議上，初次公開露面，作高度批判性的發言。

1955至57年

數次申請大學人文學系被拒，終於在布拉格的捷克工業高等學校修讀經濟。

1957年

申請入讀布拉格演藝學院的電影學院被拒，無法繼續學業，開始兩年的兵役。

1959至60年

被拒於演藝學院的戲劇學院門外，開始在布拉格的ABC劇團做後台工作。

1960年

參加Na Zábřadli劇團，初時做後台工作，後成為劇團的文學顧問。他寫了幾個舞台劇本，同時為布拉格城市劇團著名的製作人雷鐸Alfred Radok做副手。

1963年12月3日

哈維爾第一個劇作《游園會》在Na Zábřadli劇院首演，劇本後來相繼以各種文字編印成書：捷克文（1966）、英文（1969）、德文（1967、1970）、法文（1969）、意大利文等。

1964年7月9日

跟愛嘉Olga Splichalova結婚

1964年

哈維爾完成了他的系列作品*Anticodes*，相繼以不同文字出版：捷克文（1966）、德文（1967）等。

1965年

加入具爭論性的月刊《創造》*Tvář*的編輯部，並成為捷克作家協會年青作者工作小組的主席。《創造》*Tvář*的員工後來將刊物停辦，因為他們拒絕接受作協和共產黨官員的指示。

1965年5月

在作協紀念解放二十周年的大會上，哈維爾批評了作協的一些活動及其對某些作家的不公平待遇。

1965年7月26日——《備忘錄》

哈維爾第二個作品《備忘錄》在Na Zábradli劇院首演，劇本後來相繼以不同語文出版：捷克（1966）、英文（1980）、德文（1967、70）、意大利文、挪威文、波蘭文等。

1966年《筆記本》——*Minutes*

哈維爾第一本書《筆記本》*Minutes*由布拉格的Mladá fronta出版。內容包括《游園會》和《備忘錄》兩個劇本，*Anticodes*系列和兩篇文章：《論辯證形而上學》和《插科打諢的解構》，Jan Grossman為該書寫導言。1967年在德國出德文版。

1966至67年

哈維爾完成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校外課程。

1967年6月28日

在捷克作協第四屆大會上發言，抨擊作協內部的不民主做法。在共黨官員的壓力下，他和Ivan Klime, Parel Kohout和Ludvik Vaculik從作協中央委員會的候選名單上被剔除。

1968年3月

哈維爾在一份由二十名作家草擬的宣言上簽名，爭取在作協內成立獨立作家團。該團最初有五十八名非共黨的作家及翻譯家成員。四月間，該團選出七人委員會，哈維爾成為主席，並一直運作至1970年整個作家協會解散為止。

3月尾，他在一封由一百五十名作者和文化界人士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上簽署，評論在杜布切克政權下民主化進程的現狀。

1968年4月4日—《論反對派》

《文學報》*Literární listy*刊登了他的文章：《論反對派》。該文章宣揚兩黨制，和在捷克人道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民主政黨。

1968年4月11日—《越來越難集中精神》(*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

哈維爾第三個劇《越來越難集中精神》在Na Zábřadli 劇院首演，日後相繼以不同文字出版：捷克文（1969）、英文（1972）、法文（1976）、德文、意大利文等。

1968年5、6月

哈維爾在美國度過六星期。《備忘錄》在紐約莎士比亞節中作美國首演，演出十分成功，為他贏取了著名的Obie獎。

1968年6月

哈維爾在一份由三十名文化界人士草擬的文件上簽名，鼓吹復興社會民主黨。

1968年夏

辭掉Na Zábordli 劇團文學顧問一職。

1968年8月21至27日

在蘇聯佔領捷克第一個星期，哈維爾加入自由捷克電台，每日從Liberec 廣播，對現狀作出評論。

1968年9月

由蘇聯支持，評論捷克局勢發展的《白皮書》，攻擊他在4月發表的文章《論反對派》。

1968年秋

成為捷克作家協會中央委員會成員，直至協會在1970年解散為止。他亦成為復刊的《創造》月刊的編輯部主席，直至1969年雜誌停刊為止。

1968年

獲奧地利歐洲文學國家獎。

1969年2月—《捷克的命運？》

以《捷克的命運？》為題，《創造》刊登了他回答米蘭·昆德拉《捷克的命運》一文的文章。

1969年3月

哈維爾發現家中被警察安裝了偷聽器

1969年8月21日

跟九名人士共同簽署了一份名叫《十點》的宣言，向政府、國會、黨中共譴責杜布切克落台後的「正常化」政策。他和其他簽署人在秋天被偵訊及被指控推翻共和國，正式審訊本定在1970年10月15至16日，但後來被無限期延期。

1969年—《明喻》

布拉格C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出版社出版了《明喻》一書，由哈維爾寫序，是十八位作家的結集，他們的作品在繼之而來的「正常化」政策中被禁。

1970年12月

一份黨的文件《十三屆黨代表大會後黨及社會充滿危機的發展的教訓》，刻意攻擊哈維爾。

1970年

隨着《越來越難集中精神》在紐約百老匯的演出成功，哈維爾再獲美國的Obie獎。

1970年—《同謀者》

哈維爾寫了《同謀者》一劇，只能以《遠征》叢刊1979年打字稿第八十六號的形式，私底下流傳。1974年2月8日，此劇在德國Theatre der Stadt Baden-Baden 首演，後來以不同文字發行：捷克文（1977）、德文（1972）、意大利文等。

1971至72年

跟另一些作家名列於官方機密通告。他作的書從學校、地區及所有圖書館消失。

1972年5月31日

「正常化」政策下成立的作家協會在成立大會上，攻擊哈維爾及其他被禁作家。這個協會將大部分重要的捷克作家排除。

1972年12月4日

包括哈維爾在內，三十五名作家聯合發出請願信，要求捷克總統特赦政治犯。

1974年

哈維爾在波希米亞東北的Truturov釀酒廠工作九個月。

1975年2月25日—《天綫上的蝴蝶》

他在六十年代寫的電視劇《天綫上的蝴蝶》首次在德國播出。

1975年4月8日—《致胡薩克博士的信》

哈維爾簽發《致胡薩克博士的信》，信的副本私底下在捷克流傳。信有不同的譯本：英文（1975夏在《調查》雜誌）德文、意大利文等。

1975年下旬

哈維爾發行打字稿系列《遠征》叢書，到1979年四月止，該系列共有五十一個書目。哈維爾入獄後，他的妻子繼續該項工作。

1975年—《乞丐的歌舞劇》

以John Gay的劇作為本，他完成《乞丐的歌舞劇》。在捷克，此劇本以《掛鎖》業書*Edice Petlice* 第四十九號打字稿及《遠征》第十號打字稿私底下流傳於捷克。

一個業餘劇團於76年11月1日在布拉格外圍的Horni Pocernice演出此劇，亦是在捷克唯一的一次。76年3月4日在Trieste的Teatro Stabile，此劇在國外首演。往來被印成：捷克文（1977）、德文（1975）、意大利文等。

1975年—《觀眾》

哈維爾完成他的獨幕劇《觀眾》，以《掛鎖》1975年第四十七號及跟《個人觀點》一起以「兩個獨幕劇」為名，作為《遠征》1975年第三號在私底下流傳於捷克。《個人觀眾》與《觀眾》一起於76年10月7日在維也納的Burgtheatre首演。後錄編印成：捷克文（1977）、英文（1976，1978）、法文（1979，1980）、意大利文、瑞典文等。

1975年—《個人觀點》

哈維爾寫作《個人觀點》，以《觀眾》1975年第五十一號及與《觀眾》以《遠征》1975年第三號私底下流傳於捷克。首演，參閱上節，後錄編印成：捷克文（1977）、英文（1976，1978）、德文（1976）、法文（1979，1980）、意大利文等。

1976年9月16日—《審判》

他與六名捷克作家和哲學家寫信給波爾（德國作家，7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請他聲援因作了異議者的演出而被控的青年流行樂隊。他自己不懈地為他們組織抗議活動。他以這些青年受審為題材，撰述文章《審判》。

1976年末

哈維爾應奧地利教育部長邀請，出席《觀眾》和《個人觀點》的首演，但捷克外交部長不讓他出境，理由是他「並不是捷克文化的代表」。

1976年—《山間酒店》

哈維爾完成劇本《山間酒店》，以《掛鎖》1976年第六十二號和《遠征》1976年第十號私底下流傳於捷克。1981年5月23日在維也納的Burgtheater首演。後印行成：捷克文（1977）、德文（76）、意大利文等。

1976年末

參與一連串的討論，終於導致「七七憲章運動」的成立和七七年一月「宣言」的發表，七七憲章宣言發表後，哈維爾、哲學家Jan Patočka和上任外交部長Jiří Hájek成為七七憲章運動第一個三人組發言人。在向政府、國會和報界發表宣言期間，哈維爾跟演員Pavel Landovský和作家Ludvík Vaculík被拘留偵訊，住屋被搜索，還要接受電視的監視。七七憲章的宣佈，引來針對運動的發言人和所有參加簽署人士的大規模的鎮壓行動。

1977年1月14日

哈維爾接受問話，並拘留至5月20日。作為《致胡薩克博士的公開信》和七七憲章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他被控推翻共和國。

1977年8月

在多倫多由流亡者辦的六八出版社用捷克文出版了哈維爾《在被禁年代》的劇本選，名為《劇本1970-1976》。包括：《同謀者》（1970），《乞丐的歌舞劇》（1975），《山間酒店》（1976），《觀

衆》(1975)，《個人觀點》(1975)，《作者跋》：Jiří Voskovec則為書寫序。

1977年10月17至18日

布拉格市法院刑事審訊Ota Ornest, Jiří Ledereš, František Pavlíček和哈維爾，哈維爾被判14個月監禁，有條件緩刑三年，罪名是試圖損害共和國的利益。

1977年12月

哈維爾簽署了一封由十三個捷克人寫的公開信，發給海外的全人，請他們趁赫爾辛基協議的簽約國在布爾格萊德開會，就資訊的自由交流和被禁作品的出版，要求確立明確的原則。

1978年1月20日—《我的個案報告》

哈維爾跟一些朋友在抵達鐵路員工舞會時，被警察拘留，一直至3月13日才被偵訊。他被指控阻差辦公和襲警。刑事訴訟在4月21日終止，哈維爾將這次拘留的前因後果寫在《我的個案報告》裏，日期是78年3月20日。

1978年3月21日

哈維爾在一份由298名公民向國會發出的請願信上簽名，要求廢止死刑。

1978年4月7日

哈維爾和七七憲章的二十三名簽署人在一份名為《捷克社會主義百年》的文件上簽名，紀念捷克社會民主黨成立會議的一百周年。

1978年4月27日

「保衛被無理檢控人士委員會」(VONS)成立，哈維爾是十八名成員之一。直至1979年5月29日被捕為止，他都積極支持這個組織。

1978年8月至9月

哈維爾在捷克邊境參加兩次聯席會議，各代表來自波蘭的「社會自衛委員會」和捷克的七七憲章。10月1日的第三次會議被波、捷警方的共同行動取締。

1978年10月—《無權勢者的力量》

完成《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後，在捷克私底下以《掛鎖》1979年第一百四十九號流傳。七七憲章成員討論此文的文稿，以《自由與權力》成冊，在私底下流傳。後來以下列語文出版：捷克文（1980）、英文（1986《無權勢者的權力——中、東歐公民抵抗國家》）、德文（1980）

1978年11月6日

哈維爾恢復他「七七憲章」發言人的身分，直至79年2月8日。

1978年11月7日—《家中軟禁》報告

安全部警察開始不斷監視哈維爾。12月起，更二十四小時監視他在布拉格的公寓和在波希米亞東北Trutuv附近Hradčec的鄉間房子。哈維爾分別在79年1月和3月就這情況寫下《家中軟禁》報告兩份，79年3月3日，他寫信給內政部長，抗議行動受監視。

1979—《抗議》

完成獨幕劇《抗議》。私底下以《遠征》1979年第八十九號流傳於

捷克，79年11月17日在維也納的Burgtheatre首演，同場還有Pavel Kohout的獨幕劇《家譜證件》。後印行成德文（1978）、法文（1980）、意大利文等。

1979年2月27日

寫信給奧地利總統Rudolf Kirschlager，請他在訪問捷克時，為捷克的政治犯說話。

1979年5月29日

安全部警察開展大規模行動，對付「保衛被無理檢控人士委員會」成員。一連串搜屋行動，引致十五人被捕。其中十人被警察拘留，包括哈維爾，刑事起訴顛覆共和國。而其中六人在79年10月上庭應訊，其他四人在12月22日獲釋。

1979年8月

在哈維爾被拘留期間，外交部一名官員向他透露，他被邀到百老匯做一年文學顧問。哈維爾拒絕討論此事。

1979年10月22至23日

Peter Uhl、Jiři Dienstbier、Otká Bednářová、Václav Benda、Dana Němcová和哈維爾的審判在布拉格市法院進行，各人應其在VONS的活動被控刑事顛覆共和國。哈維爾被判入獄四年半。

1979年12月19日

在AIDA（「國際保衛受壓迫藝術家協會」）的鼓吹下，巴黎的Cartoucherie劇院以戲劇重現VONS六成員受審經過，在1980年2月9日和82年11月12日分別以德語在慕尼黑和英語在紐約的格林威治劇場重演。德文版更在奧地利、瑞士和德國的電視播映。

1980年1月7日

哈維爾由布拉格監獄轉到Ostrava附近Hermanice的監獄。

1981年3月24日

巴黎的Mathurins劇團演出哈維爾的《抗議》和沙特的《禁地》*Huis Clos*，聲援VONS委員會，尤其是服刑中的成員。

1981年6月18日

歐洲議會就捷克境內因政治理由被捕及判刑人士達成一項決議，要求捷克政府釋放包括哈維爾在內的政治犯。

1981年7月

在布拉格監獄醫院住了一個星期後，哈維爾被轉往Plzen-Bory的監獄，在那裏囚至1983年1日。

1981年11月21日

華沙的Mala Scena Teatru Powszechniego劇團上演哈維爾的三個短劇—《觀眾》、《個人觀點》和《抗議》，演期至12月13日。

1981年12月8日

Plzeň的地區法院拒絕哈維爾申請，不給予他服滿一年刑期的有條件假釋。

1982年2月17日

「國際保衛七七憲章委員會」頒授Jan Palach獎給哈維爾，讚揚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及在保衛人權上無私的行徑。

1982年6月10日

多倫多的約克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給哈維爾，表揚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亦是對這位被壓制的作家的支援。

1982年7月21日

第三十六屆國際「阿維尼翁戲劇節」安排了六小時「哈維爾之夜」的節目，上演了貝克特的《浩劫》和亞瑟·米勒的《深深想念》。

1982年8月17日

Toulouse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給哈維爾，儀式在84年2月舉行（參看84年2月）。

1982年12月

在胡薩克總統出訪奧地利前，內政部官員向仍在獄中的哈維爾提議申請總統特赦，但為哈維爾所拒。

1983年1月—《給愛嘉的信》

在1979年6月至82年9月哈維爾被拘留及入獄期間，他寫了大量信件給他的妻子，亦有託他妻子轉給友人，有部分被沒收。然而有為數一百四十四封寄到她的手裏，副本更在私底下流傳。1983年1月，這些信被收入一個集子，題為《給愛嘉的信》，以《掛鎖》1983年第二百六十號和《遠征》第一百六十六號編印。日後，信札付印為捷克文（1985「六八出版社」多倫多）、德文（Joachim Bruss翻譯1984）

1983年1月23日

哈維爾突然感染肺炎，帶着手扣被轉往布拉格的監獄醫院。2

月7日，他在醫院收到市法院的決定，因連串理由暫緩他的刑期，然後被轉到布拉格的Pod Petřínem醫院。

1983年3月4日

離開醫院回家休養，1985年9月，剩下的刑期正式以紀念解放四十周年大赦為理由而省免。他一旦回復自由，即參與草擬「七七憲章」的重要文件。

1983年4月3日

哈維爾在出獄後接受第一次訪問。記者是法國的Antoine Spire，訪問在83年4月10/11號的《世界報》刊登。

1983年5月—《錯誤》

10月29日斯德哥爾摩Stadstheatre為哈維爾和「七七憲章」舉辦「聲援之夜」，哈維爾為此寫了《錯誤》一劇。同日演出的還有貝克特向哈維爾致意的《浩劫》。之後以下列語文出版：英文（1984）、波蘭文等。

1983年10月15日—《以責任為命運》（*Responsibility as Destiny*）

哈維爾為Ludvik Vaculik的小說《捷克之夢》的英、法文版寫序，題為《以責任為命運》。這篇文章在捷克只能在私底下流傳。

1984年2月—《政治與良知》（又名《否定政治的政治》）

哈維爾完成《政治與良知》一文。此文是為Toulouse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的儀式而寫的。在捷克境內只能在私底下流傳。後來以下列語文印行：英文（Salisbury Review 3/2 Jan.1985）。

1984年8月11日—《文化的六面體》

哈維爾為討論捷克的「第一」（官方）和「第二」（非官方）文化而寫《文化的六面體》。當時只能在私底下流傳，1986年以英語印行。

1984年8月—*Largo Desolato*

哈維爾完成歌劇*Largo Desolato*，私底下以《遠征》1984年第一百八十五號在捷克流傳。在維也納Burgtheatre的首演於85年4月14日舉行。日後印行：捷克文（1985）、德文（1985）、法文（1986）、意大利文等。

1984年9月—《論人之為人》

倫敦流亡出版社Rozmluvy出版了一本捷克文的選集，包括哈維爾自69至79年寫的議論文、短文、抗議文章、爭論和宣言，題為《論人之為人》，由Vilem Prečan和Alexander Tomsy合編。

1984年11月—《驚險小說》*Thriller*

哈維爾完成了德國電台Hessischer Rundfunk廣播的文章《驚險小說》，談論現代生活中的神話。在捷克只能私底下流傳。後來以英文印行（1985）。

1985年1月3日

哈維爾被警方扣留四十八小時，起因與「七七憲章」委任新的發言人有關。

1985年4月—《沉默的剖析》

哈維爾為阿姆斯特丹舉行和平會議而寫《沉默的剖析》，在捷克只能私底下流傳。日後以下列語文出版：英文（1986）；德文

(1985) 。

1985年8月

為「七七憲章」就蘇聯入侵捷克周年紀念起草文件而兩次遭警方拘禁四十八小時，一次在8月9日於布拉格，另一次在8月16日於布拉迪斯拉發。

1985年10月—《誘惑》

完成《誘惑》一劇，只能以《遠征》1985年第二百二十三3號私底下在捷克流傳。86年5月22日在維也納的Burgtheatre首演。日後發行：捷克文（1986）

1985年—《論文集》

哈維爾編，並寫序。文集內論文由超過二十名國內或流亡海外的捷克哲學家執筆。

1986年1月

哈維爾獲阿姆斯特丹Erasmus Prize Foundaton頒授Erasmus獎。

1988年

8月，布拉格民眾大示威，標誌恐懼年代的終結。10月，哈維爾與一百多人聯署的《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公佈。

1989年1-5月

1月16日，哈維爾再度被捕，原因是他聯同獨立運動人士進行紀念柏勒（Jan Palach，為抗議蘇軍入侵捷克自焚）自焚20週年的活動。2月21日，哈維爾被控煽動罪，

罪名成立，入獄，5月17日獲釋。

1989年10月—《說文解字》

哈維爾接受德國書商協會和平獎，頒獎禮上致辭《說文解字》。

1989年11月

11月20日，哈維爾參與推動的「公民論壇」正式成立，在全國有二千多個組織。11月27日，全國總罷工，捷共讓步，與非共人士組織聯合政府。

1989年12月

哈維爾出任總統。

1990年1月

發表總統元旦文告：《人民，你們的政府歸還給你們了！》。

本簡介 1936-1986 部分載於《活得磊落》（*Living in Trut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由阮志雄譯出，劉健芝校；1987-1990年部分由本書編者輯。

編·後·語

《哈維爾選集》由策劃、編譯到出版，歷時近兩年。雖然說，我們只能利用業餘時間工作，而且其間總有數不清的雜務和突發的事件要處理和回應，但要兩年才完成此書，令關心的朋友擔憂，實在說不過去。所幸的是，我們沒有讓時間白白浪費。現在呈獻給讀者的這本選集，文章以寫作時間先後排列，另有三個附錄，比兩年前開始編譯時更全面、更豐富，希望藉此可以彌補出版時間延誤之失。很多謝譯者、校訂者、校對者和所有工作人員的參與，以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民主基金的贊助，沒有大家的支持、鼓勵、容忍，這本選集是不可能成功出版的。

編者

1992年2月



哈維爾選集

東歐變革震撼世界，捷克的「布拉格第二春」更與八九中國民運的結局成強對比。劇作家——囚徒——總統的哈維爾(V. Havel)，見證了這段歷史，並從謊言和冷漠的後極權世界參透人的存在困境、文化困惑與未來出路，他參予發起的「七七憲章」運動，更為人民和平鬥爭道路立下楷模，足為關心中國民運前途人士參照借鏡。本選集收錄了去年捷克民運後受擁戴上台的哈維爾近年最重要的政論著作及多篇反映捷克民運發展的文章，對研究比較東歐民主運動、反思中國民運前途甚具參考價值。中國流亡良心作家劉賓雁特別為此選集作序。